

姜照远◎著

末路穷途

——日本战败前后

北方文艺出版社



姜照远◎著

末路穷途

——日本战败前后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 / 姜照远编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17-3012-5

I . ①末… II . ①姜… III . ①现代史－研究－日本－1945 IV . ①K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708 号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

作 者 / 姜照远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王 刚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开 本 / 695×975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27 千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12-5

目 录

前言	1
一 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	1
二 一场诡异的日苏外交战	12
三 苏联出兵远东	17
四 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25
五 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崎	41
六 苏联对日宣战与苏军重创关东军	50
七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	68
八 伪“满洲帝国”灭亡	87
九 中苏会谈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94
十 日本无条件投降	106
十一 二战最后一役——虎头要塞攻坚战	121
十二 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屠杀	127
十三 接受日本投降	131
十四 中国军队未能进驻日本领土	173
十五 苏军撤出中国东北	177
十六 中国同港英当局的交涉与让步	184
十七 中国同澳葡当局的交涉与让步	191
十八 日本“和平宪法”的诞生	196
十九 叛国投敌者——汉奸的可耻下场	201
二十 东京审判	217
二十一 上海审判	246
二十二 广州审判	255

二十三	南京审判	259
二十四	伯力审判	268
二十五	沈阳、太原审判	282
二十六	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回国	291
二十七	遣返日本侨民和战俘回国	295
二十八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	301

前言

日本是亚洲东北部、太平洋西北角、中国东方一个陆地面积 37.78 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弧形岛国，是中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邻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日两国有着 2000 多年的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理应世代友好相处下去。然而，历史表明，中日两国的关系在很多时候却极不正常。在中国强盛时期，日本总是依附中国，从而受益；而在日本强大之后，中国则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的欺侮，成为日本的受害者。特别是近 100 多年来，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总是妄想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多次发起侵华战争，使几代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1874 年日本侵略者进犯中国台湾、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屡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14 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广大城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破坏和蹂躏，对中国的物资财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毁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笔笔血债，难以偿还！

日本无条件投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 60 多年。60 多年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远未肃清。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不仅不对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进行反省，反而对侵略的历史百般抵赖和否认，甚至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不仅不对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惨祸愧疚和忏悔，反而至今仍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进行无端亵渎与伤害。他们甚至公然替侵略者辩护，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妄想东山再起。近些年来，在日本政坛上一个又一个内阁大臣屡出狂言，掀起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阵阵浊浪。“入侵”

在日本教科书中被篡改成“进入”；30万南京同胞被屠杀，在一些政客的口里竟成了“虚构”；当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被歪曲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一批批日本内阁要员接连不断地竟相对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日本法院对中国民间的历次索赔一概无理拒绝。近年来，一些右翼势力时常叫嚣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扬言修改“无核三原则”，妄想将日本自卫队改为“国防军”。特别是最近发生的日本政府“购岛”、蓄意强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狼子野心，这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一直警醒地关注着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动向。“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历史不容翻案，罪行不容否认，民心不可违背。

笔者是在1933年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出生的年过80岁的老人。亲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侮与压迫。多年一直牢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和亡国奴的生活，而对抗战胜利果实备感珍贵和欣慰。为了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忠实地记录下来，笔者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搜集和积累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的一些历史资料。最近，将收集和积累了50多年的历史资料加以分类、整理、编辑，编写成《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一书。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一书，记述的是从1945年初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到1946年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和遣送日本侨俘回国期间，发生在远东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其内容既包括了日本侵略者从面临战败到最后覆亡的全过程，也包括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收复失地、修复战争创伤和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全过程。把在这个时期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将历史真相重新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侵略战争及其必然结局。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总是妄图发动侵略战争？为什么至今仍需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本书为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了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增强保卫我国神圣领土的决心和信心的精神武器。同时，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结局和日本战犯的下场，是一把刺向蓄意侵占我国领土的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利剑！60多年来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还没有彻底清算，你们还对中国人民抱有险恶的狼子野心吗？还想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吗？请睁大眼睛看看你们的前

辈——当年日本战犯的可悲可耻下场吧！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一书所记述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页，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多是由于胜利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大快人心事。同时，由于美英苏三大国的无理干预和压制，也发生了一些让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心中不快、不平，以致伤心遗憾的事件。如从日本手中收回了东北三省，却丢掉了比东三省大得多的外蒙古；香港和澳门未能及时回归祖国；苏军撤出东北时掠走中国大批工业设备等。在书中记述这些事件，目的不是引导人们与当年的同盟国算历史旧账，而是通过记述历史，向人们说明，由于中国当年贫困落后，不仅长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压迫，而且在打败侵略者后还要受到某些强国的歧视和欺侮。以此告诫人们吸取“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从而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振兴中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而奋发图强。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一书还在最后三章记述了释放在押日本战犯、遣送日本侨俘回国、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史实。这些人类绝无仅有的善举，彰显了忠厚善良、宽容大度的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这会使广大读者受到高尚的思想品德教育，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末路穷途——日本战败前后》一书，不是单纯地平铺直叙历史事件，也不是抽象而枯燥的说教，而是完全以记录者的视角立体地重现历史画面，并把事件同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非常生动、形象、逼真。是一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史学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典型的纪实文学作品，既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期望这本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作者

2012年10月10日

一 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

1

1944年10月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同来访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举行会谈。参加者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方翻译伯尔斯少校、苏方翻译巴甫洛夫。

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已经进入第6个年头。现在，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垮台，发动战争的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此时此刻，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作出很大贡献的丘吉尔，却感到无限的悲凉。在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的大英帝国精疲力竭，遍体鳞伤，雄踞世界之巅两百年的大不列颠将不可避免地衰落成二流国家。趁战争即将结束之机，他要及早做好准备，力争分到应得的胜利果实。丘吉尔此行面晤斯大林的目的，就是为与斯大林商讨胜利后欧洲的瓜分问题，也就是如何划分西方世界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丘吉尔放下口中叼着的哈瓦那雪茄，看着正抽着烟斗的斯大林那掩在缭绕烟雾中显得有些朦胧的脸，微笑着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

斯大林：“好啊，现在的时机正适合商谈这个问题。”

丘吉尔：“你们的军队已收复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如何才能使我们双方共同确保各自利益不受损失？我想，不要为了枝节问题使我们的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来说，怎样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90%的

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 90% 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

在译员翻译这段话时，丘吉尔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英国 90% 俄国 10%

译员译完了丘吉尔的那段话，斯大林放下烟斗对丘吉尔微笑着说：“你的意见呢？”

丘吉尔把字条递过去。斯大林阅后拿起蓝铅笔在纸条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丘吉尔，放在桌子中央。

丘吉尔吃惊地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吧？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

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不，你保存着。正如我珍藏着阁下在德黑兰会议上赠给苏联红军的那把宝剑一样，留作纪念。”

丘吉尔：“谢谢大元帅阁下。但愿我的这个设想最终能够实现。此外，一切较大的问题，特别是打败德国后对日作战问题，希望能在适当时机，苏、美、英首脑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斯大林：“从现在战局看，此时机为期不远。”

丘吉尔：“届时希望贵国能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作出具体安排。”



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赠送给苏联红军一把宝剑。

2

1945年2月初，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参谋长和顾问们。

2月2日，美、英两国代表团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下，先是在海上作了为期10天、航程8000多公里的航行，再乘飞机飞行2000公里，抵达克里米亚。

身着笔挺的大元帅军服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一起到机场迎接。并从机场一直将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送到已安排好的行宫。



雅尔塔会议上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2月3日上午9时，斯大林到里瓦几亚宫拜访罗斯福。

罗斯福握着斯大林的手说：“斯大林元帅，感谢苏联红军帮助我们粉碎了德军在阿登地区的最后一次反攻。”

斯大林：“总统先生，我们的红军一直在发动进攻。尽管近期天气不好，雨雪交加，进攻却是令人满意的。从喀尔巴阡山至波罗的海的整个中部战线，德军正在仓皇逃跑。盟军在西线的处境缓和了。现在，红军已经到了华沙，越过了维斯杜拉河。下一个目标是奥德河。”

罗斯福：“是的，是的。十分感谢您。贵国的英勇红军创造了伟大的业绩。我们的联合努力缩短了敌人接受投降所需要的时间。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先后登陆菲律宾、冲绳岛，占领了通往日本的门户。而在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在美军B-29轰炸机的‘软化轰炸’下，已疲惫不堪了。”

斯大林：“日本帝国主义和那些穷凶极恶的战争罪犯的末日来到了。”



正在进行的雅尔塔圆桌会议

罗斯福：“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大元帅就说过‘一旦德国最后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斯大林：“只要满足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将遵守这个承诺。”

罗斯福：“我们这次会晤就是商谈这个问题，相信会达成共识。”

斯大林：“应当正式发表一个协定。”

罗斯福：“我希望盟军东西两路大军快些会师，德国早日崩溃。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把力量调到太平洋地区。希望苏联尽快做好在远东对日作战的准备。”

斯大林：“我的总参谋部已经开始筹划出兵远东了。”

3

2月4日，美、英、苏三巨头在里瓦几亚宫宽大的会议室里，进行一般性的讨论。

丘吉尔：“联合国安理会这个组织应该有能力反对某个大国可能统治世界的企图。这一点很重要！”

斯大林放下手中的烟斗，不紧不慢地说：“我倒愿意请丘吉尔先生指出哪个国家可能打算统治世界。”他向窗外望了一眼，不待丘吉尔回答，又说道：“法国是不会统治世界的，这一点我肯定，这就少了一个可疑的。我还可以肯定，美国也是不愿意统治世界的，这又排除了一个国家。”

丘吉尔：“请等一下，斯大林元帅，让我来答复这个问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将来的危险是在我们之间！”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和斯大林。

斯大林：“不，只要是我们这三个共同指挥这场伟大战争的人还活着，就不会有冲突的危险。”他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把罗斯福也划了进来。“我一直这样想，我们会合作得很好的。”

罗斯福：“我以为在管制德国的问题上，法国也应该参加。”

斯大林有点恼怒地说：“我忘不了法国为德国侵略者打开了大门。法国对胜利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丘吉尔：“我们这个三大国俱乐部，必须拿出500万士兵当做入会费才行。”

斯大林几乎是大喊起来：“苏联已经付出了比500万战死的士兵多得多的入会费了！我们共牺牲2700万！”

罗斯福：“当然，苏联的代价是巨大的，英国也同样付出很大的代价。”

斯大林：“下面，请宣读三国外长草拟的关于联合国托管从德国手中收复领土的计划。”

丘吉尔吃惊地：“什么？联合国托管领土计划？”

罗斯福：“是啊，从纳粹手里收回的有些领土，需要由联合国托管。三国外交部长先拿出一个初步计划。”

丘吉尔听罢立即暴跳起来：“我不赞成托管！这个计划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同意过！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件托管的事！”接着，他站起来向在场的人宣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领属！只要我当首相，我绝不会把大英帝国世代的财产交出去，哪怕一分一毫也不成！”他边说边毫不掩饰地任凭泪水顺脸颊流下。



身穿戎装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美国第 32 任总统罗斯福

2 月 8 日下午 3 时，斯大林和罗斯福秘密讨论出兵远东的问题。

斯大林：“听说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美国国内高层军政首脑意见不大一致。”

罗斯福：“是这样。美国太平洋陆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坚决反对拉苏联参加东方对日作战。他认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垮日本。这样整个东方的战后问题就简单多了：美国可以独吞亚洲对日作战的全部胜利果实。作为最高统帅我已否决了麦克阿瑟的

主张。麦克阿瑟不懂政治。据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估算，如果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美军将付出近百万人的伤亡。美国政治和人民都不允许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阶段牺牲这么多的美国子弟。所以，非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不可。”

斯大林：“早在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我就对总统阁下和丘吉尔先生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现在，德国法西斯正在全面大溃退，离垮台日子很近了。倒是应该把苏联对日作战提到日程上来。”

罗斯福：“应该在这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决定。”

斯大林：“总统先生，我想讨论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去年我已就这个问题同哈里曼大使谈过。”

罗斯福：“是的，我已收到这个谈话的报告。”

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我提出过苏联出兵打击日本，应该是有条件的。比如，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还有外蒙古保持现状等等。这些条件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也可以说是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前提条件。”

罗斯福：“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要求。当年沙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

位英国人曾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的合理的愿望……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我认为，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

斯大林：“总统以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罗斯福：“虽然尚未同中国蒋委员长讨论此事，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苏联向中国租借。二是使该港成为国际自由港。我倾向第一种方式。”

斯大林：“总统先生，还有一个涉及俄国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您知道，沙皇曾使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港的铁路线，以及从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的铁路线，它在那里同哈巴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连接。”

罗斯福：“关于铁路问题，我还没同蒋介石委员长商谈。不过我想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二是，置于一个中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

斯大林：“总统先生，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如果我说的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同一个与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把这项涉及国家利益的决定向最高苏维埃和俄国人民解释。”

罗斯福：“我觉得同中国人讲话很困难。你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 24 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

斯大林轻蔑地说：“我想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只需我们三国签署即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总统阁下和丘吉尔首相都能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我们将立即考虑出兵远东问题。”

罗斯福：“我想这是没有异议的，阁下请放心。日本现在还有陆军 400 多万人，海军 120 万人，6 艘战列舰、4 艘航空母舰等 70 多艘战舰，飞机 3000 架；美军在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

太平洋和东南亚有 160 多万，英军有 60 多万，6000 架飞机，军舰 600 多艘。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我的将军们告诉我，我们大约还要损失 100 多万人。这个代价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大了，而且至少还要打 3 年。所以，希望苏联尽早出兵远东。”

斯大林点了点头：“我们不会食言，可以订出一个出兵的时间表。我看打败了德国，再有 3 个月的准备，苏联红军就可以出兵远东，打日本关东军一个措手不及。”

罗斯福很高兴：“我想我们这个协定，可以再请丘吉尔首相签字。”

斯大林：“当然可以。”

罗斯福：“关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会充分考虑的。至于欧洲，战后美国军队也不可能停留太长的时间。”

斯大林：“会停留多长时间？”

“大约两年时间。”

其实，罗斯福哪里知道，斯大林早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决定要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曾说过：“1904 年日俄战争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对这一点，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就预言：“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出兵。除了使用原子弹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苏军的行动。”

5

2 月 10 日下午 2 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应莫洛托夫之请，来到尤苏波夫宫进行会谈。

莫洛托夫首先把一份文件交给哈里曼。这是苏方拟订的《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英译本。

哈里曼看完文件，感到内容基本上是 2 月 8 日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时已讨论的。但似乎还有点出入。还应按总统的精神作必要的修改。他对莫洛托夫说：“外长先生，我相信总统将要作三点修正方能接受这些条件。第一，旅顺和大连应成为国际自由港，而不应成为苏联的租借地。第二，满洲的铁路应为中苏两方共同经营。第三，没有蒋委员长的同意，总统不愿最后处理

涉及中国人的两个问题。”

莫洛托夫：“大使先生，斯大林对您提出的前两点意见曾经同意过。只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国人来决定我们之间的谈判呢？”

哈里曼：“外长先生，应该考虑，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是一个反抗日本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旅顺和大连以及满洲铁路涉及中国主权，在道义上也应该……”

莫洛托夫：“大使先生，应该明白，我们的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无关紧要。如果那样做，肯定要引起麻烦。那会影响我们之间既定的谅解条件的实施。”

哈里曼回到美方代表团驻地里瓦几亚宫后，立即把苏方建议草案的抄件以及他自己提出的三点意见呈送总统。

罗斯福看了哈里曼拿来的材料后，对他的三点意见十分赞成，并批示，应将苏方草案中那句“苏联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就毫无疑问予以满足”改成“不言而喻，上述关于港口和铁路的协定，须有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

最后，罗斯福授权哈里曼将修正案交给莫洛托夫。

6

2月10日下午4时。三国首脑正式会谈后，斯大林走到哈里曼面前说：“我觉得协定有待进一步修改。我非常愿意使大连成为国际管理下的自由港。但旅顺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已计划将要作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因而俄国需要租用。”

哈里曼：“还是请大元帅同总统直接讨论此事。”

斯大林来到罗斯福身旁，把他同哈里曼说的话向罗斯福重复了一遍。罗斯福表示同意。

随后，斯大林告诉罗斯福：“我们接受总统关于满洲铁路由中苏合营的建议。同意将‘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一段文字放入文中。但后面应再添上‘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一句话。”罗斯福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这样，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上的交易基本完成。在美苏进行上述交易时，罗斯福没有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也没有同丘吉尔首相商量，

甚至连他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蒙在鼓里。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内容被以密约的形式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了。其内容如下：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尔塔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 由日本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国首脑同意，苏联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约·维·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2月11日晚8时，雅尔塔尤苏波夫宫。斯大林主持正式晚宴欢送美国总

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出席晚宴的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全体随员，斯大林的随员作为东道主全体出席作陪。

斯大林：“让我们为丘吉尔先生祝酒，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政府首脑。当欧洲其他国家直挺挺地倒在希特勒的铁蹄下时，这位英勇无畏的领导人仍然领导他的伟大国家独自巍然屹立。”

接着，丘吉尔站起来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大元帅是伟大国家的一位伟大领袖，领导他的国家狠狠打击了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对它造成了重创。”

斯大林向罗斯福祝酒：“罗斯福总统是一个胸怀最宽阔的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即使他的国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他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希特勒。”

席间，宾客们站起来频频祝酒，晚宴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



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会议结束时的晚宴上

二 一场诡异的日苏外交战

1945年2月初，美、苏、英3国首脑签订了著名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其中一项条款便是在欧洲战场结束后2-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然而，在日本高层，仍有不少军政要员并不知道这一秘密条款，还希望苏联政府保持中立，并展开了一场诡异的对苏外交战……

1

进入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的战火很快从远洋向日本列岛逼近。盟军的轰炸机频繁地空袭东京，大半个东京陷入火海，几成废墟。美军战斗部队经过血战已攻占塞班岛、琉璜岛等岛屿，并着手对有8万日军固守的冲绳岛发动陆、海、空全方位进攻。

1945年5月12日，经天皇御前会议批准，由铃木首相主持，外相东乡、海相米内大将、参谋总长梅津大将、新任军令部长丰田海军大将、陆相阿南大将等6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东京郊外一处别墅的地下室里秘密召开。

米内光政大将提出：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已没有什么希望的战争，减少平民的惨重伤亡。东乡外相也较开明讲求实际。他求和的心情比在座其他人更迫切。但是他反对米内的提议，厉声说：“如果米内认为苏联真的会帮助日本，那么说明他对苏联不够了解。”然而，铃木首相却认为，没有理由不去试探苏联人的口风。毕竟日苏两国之间保持着外交关系。丰田辅武大将一直愁眉苦脸，心情沉重。他忧心忡忡地向与会者建议：我们只限于在这里讨论，免得严重动摇军队士气。

梅津美治郎大将则认为，苏联的力量和威望使其可能成为日本最好的中

间人，居间调停日本与美国、英国间的战争。

阿南大将 10 年前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在中国长春、哈尔滨等地与不少苏联军政官员打过交道。自认为是了解苏联人的。他表示据他所知苏联希望日本战后能强大起来，成为苏联亚洲领土与美国之间的缓冲国。苏联完全有可能居中调停太平洋上的战争。

东乡脸色阴郁，直率地指责他们不切实际。他说：“日本问题必然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问题在于我们的情报部门近一年来效率太低，搞不到重要情报。所以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一边来，很可能没有希望。从苏联过去的作为来看，我认为要使他 不参战恐怕难以做到。我看最好还是与美国直接进行停火谈判。”

全场气氛相当沉闷。铃木首相表示支持军方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可能会应日本的请求做出外交努力。东乡外相显得很孤立。作为资深外交家，他对国际政治动态具有相当的敏感。不过，他想来想去，还是同意了米内大将等军方的意见。他认为广田弘毅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2

广田弘毅曾担任过日本首相与外相，曾几次赴莫斯科访问，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副外长维辛斯基等高层人物关系较熟。东乡请他出马探探苏联驻日大使雅珂夫·马立克的口风，再作下一步打算。广田弘毅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为了与马立克拉交情，广田特意让随从人员搞来两瓶英国威士忌和当时罕见的鱼子酱作为见面之礼。当时马立克正待在箱根风景区的疗养胜地强罗，离东京只有两小时的车程。广田的任务是要尽量说服马立克，让苏联改变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决定，并请苏联帮助调停战争。

6 月 5 日下午 2 时，广田走访苏联驻日使馆，会见了马立克大使。广田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和苏联没有打起来。众所皆知，二战中，日本和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国。但日本与苏联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约）确实让斯大林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在两个月后就爆发的德军入侵苏联的战争中避免西东两条战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马立克与日本外交官们打过好几年交道，深知日本眼下的处境。他已猜出广田登门拜访的来意。他虚与应付，彬彬有礼，甚至带点亲切，说话分外小心。

广田向马立克坦称：“日本人民真诚地希望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马立克却有所戒备，含笑暗示在日本有人对苏联表现出相当大的敌对情绪。

接下来，谈到雅尔塔会议与至今严加保密的协定条款。广田说，他已听说其中有3项条款与日本有关，即苏联可能在几项要求得到美国、英国满足后转而向日本宣战云云。马立克显得很惊讶，连连摇头，大笑一阵后说道：“阁下可能太敏感了吧，我一点也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内容。而且，就我个人判断，我国政府会慎重对待与贵国的友好关系。”



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

马立克的神态很真诚，以至广田不能不相信他的话。他迫不及待地谈到日本要延长中立条约的愿望。说日本希望甚至不等条约终止就增加与苏联的关系。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设想如何处理这个条约。马立克话中有话地回答说，苏联一贯奉行和平政策，苏联对日本的不信任是基于日本过去多次的好战行动以及反苏情绪。广田指出：“现在开始了解苏联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日本希望找到与苏联长期和平相处的捷径。”马立克做沉思状，过一会儿问这是不是广田个人的意见。广田回答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刚才说的不但反映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态度。”马立克又沉思了片刻，严肃地回答，他要考虑几天，并请示苏联政府，然后才能回答。

分手时，马立克邀广田第二天中午过来共进午餐。马立克不愧是老牌外交官。他在这次外交中，很成功地掩盖了苏联的意图，不动声色地戏弄了广田弘毅。其实，马立克早在两个月前回国述职时，就从莫洛托夫口中得知了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知道不久苏联就要对日开战。苏联高层指示他与日方周旋，注意密电码通信的保密，制造出苏联不拟参战的假象，必要时可以弄些假的外交电文。马立克的外交才干表现得很充分。广田回到东京后即向东乡做了汇报。

6月6日上午10时，“六巨头”再次召开秘密会议。书记官递给东乡外相一份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编写的题为《今后指导战争之基本大纲》的文件。文件正式要求再次确认把战争进行到底，还列举了一系列必须全面准备保卫本土和组织400万国民义勇军的计划。东乡一边读一边发愣。很显然，军方巨头们由于受到军内主战派的压力突然变卦，同意放弃寻求谈判的做法，继续打下去。至于后果如何就全然不问了。东乡很气愤，却又无奈。他表示反对这份文件的内容，陈述了具体意见。但遭到丰田大将、阿南大将的厉声驳斥。只有米内海相保持沉默。争吵了一阵，东乡筋疲力尽。铃木首相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他提议将文件提请御前会议，请至高无上的天皇对“和”、“战”两议作出裁决。

6月8日，御前会议在宫内省的地下办公室召开。天皇裕仁无精打采，板着面孔坐在御座上听取军政巨头们的意见。他指示大臣们精诚团结，互相尊重，共渡难关。而且从他对铃木首相与东乡外相的冷淡态度可以推测，他更倾向于军方将战争坚持下去的观点。同时，他指示铃木与东乡，要摸准苏联的真实意图，必要时大本营可从满洲南部和朝鲜抽调20个师团的关东军回国。

与此同时，梅津总参谋长与阿南陆相紧急召见了陆军省情报局长神木中将，要求情报局尽快破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文。神木表示，一定在两个星期内破译苏联外交密电码。他已指示了30余位专家不分昼夜地工作，可望成功。梅津当下表示他会找米内海相和陆奥光见海军参谋长，请海军方面调派几名电信专家来陆军省情报局支援“攻关”。果然，只过9天，就从情报局传来好消息：苏联最新的外交密电码已被破译。“六巨头”在一次会议上传阅了已译成日文的60余份电文汇编。从电讯内容看来，未发现苏联有参加对日作战的意图，倒是莫斯科方面急于想知道在太平洋战争中穷于招架的日本与美国私下进行外交接触的情况，以及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等。苏联政府甚至指令马立克设法了解被日军防空兵击落的美军轰炸机等情报，对坠机的自动地航仪等先进装备也感兴趣。这一切令军方巨头们感到苏联对盟国美国怀有敌对情绪和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

其实，日本军方巨头们和情报局首脑们都上了苏联的当。马立克在两个月前回国述职时就与上级部门商定：为了迷惑日本人，可切断真实的电讯往来。

另外由大使馆情报官员拟出一系列虚构的电文内容，不定期发回莫斯科。莫斯科这边当然也假戏真演，予以配合。

1945年6月底，东乡外相又派广田再次去拜访马立克。这一次，广田抛弃了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要求用新条约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胸有成竹的马立克躲躲闪闪地说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条约。因为原定的条约现在仍然有效，苏日之间不是保持和平共处吗？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铅和铝去换取苏联的石油。他说，如果苏联陆军



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

和日本海军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日本与苏联加在一起就将无敌于天下。马立克对此不感兴趣地说：“苏联的石油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当然，除非日本近期内拿出具体计划来，否则就恐怕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不到一个星期，广田奉日本政府之令，拿着一个书面的东西又去找马立克，表示：作为换取互不侵犯条约和石油的条件，日本答应让“满洲”独立、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马立克仍不置可否、虚与应付，表示请他别急，他要等到莫斯科的回电后再作答复。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军在5万蒙军协同配合下，分三路越过边境向日军发起猛攻。战争打响后，苏军3个坦克师且战且进，一马当先，空军、炮兵配合机械化步兵师战斗，以排山倒海之势前进，打得关东军溃不成军。

三 苏联出兵远东

1

1945年5月1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苏军最高统帅部将在此研究苏军出兵远东问题。

早在1944年9月，斯大林就命令总参谋部就苏军在远东地区集结兵力的时间、兵力配置和战役保障等制订具体方案。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便按照最高统帅的指示带领总参谋部开始研究远东作战问题。很快作出了将苏军集中在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的初步设想，还对战役所需物资的数量和运输时间，作了大致预算。1945年4月27日，东普鲁士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斯大林从前线调回指挥该战役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签署命令，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军总司令。其任务就是制订对日作战的详细计划，并为指挥远东战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下午5时，斯大林抽着烟斗在踱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走了进来。

斯大林：“现在请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汇报远东战役部署情况。”

华西列夫斯基打开文件夹：“斯大林同志，根据最高统帅的意见和中国东北地区地形分布，远东部队编为三个主要兵团：在后贝加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展开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四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共37个师，20个旅，65万人。突击方向：一是以坦克集团军为主，穿越浩瀚的沙漠、草原和大兴安岭，直插

满洲‘首都’新京（长春）和东北工业中心沈阳。二是以机械化集群向长城以北推进，直指张家口、多伦一线，牵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阿穆尔河地区展开的是远东第2方面军，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11个师、12个旅，共35万人。突击方向：沿黑龙江直指哈尔滨，支援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团军群；在滨海地区展开的是远东第1方面集团军，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32个师、



罗科索斯基元帅在发号施令

14个旅，共60万人。突击方向：牡丹江地区，攻占哈尔滨、长春，并会同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方面军作战。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集结和运送部队。”

听完汇报，斯大林高兴地说：“我们的作战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各项部署安排得很充分、很周到，令人非常满意。”

安东诺夫：“欧洲战事已完全结束，应该迅速将欧洲部队调往远东地区。”

斯大林：“很好，安东诺夫同志，马上给朱可夫同志发电。”

斯大林停了一下，安东诺夫立刻做好了记录准备。

斯大林：“朱可夫元帅：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应迅速将下列部队调回国内，并做好远东作战的准备：在德国境内的第39集团军、第5集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第53集团军……”

2

1945年5月中旬，斯大林命令朱可夫来莫斯科，研究苏联对日作战问题。在会议结束时，斯大林说：“我们是否应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阅兵式，并邀请那些战功卓著的英雄们参加？”

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大家还当场提出了若干好建议。包括将在柏林第一个插在国会大厦的那面旗帜运到阅兵现场，举行隆重的迎接

胜利旗仪式，由当时将胜利旗插上国会大厦的那些苏联士兵负责掌旗和护旗等。

第二天，苏联报刊登出了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

为了庆祝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所取得的对德作战的胜利，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即胜利阅兵式……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阅兵总指挥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

6月20日，攻克柏林的英雄尼库利娜等人乘专机抵达首都中央机场。在这里，胜利旗受到莫斯科卫戍部队仪仗队的欢迎。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苏联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阅兵式在这里举行。

天上下着滂沱大雨，地上一片片的积水，无数面红旗在大雨中飘扬。雨水把红墙染成了绛紫色。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边站着朱可夫元帅。

上午9时57分，在一阵激昂的军号声中，朱可夫在斯伯斯基大门附近，骑上了高头大马，冒着雨向红场走去。街路和广场上空回荡着格林卡《光荣颂》雄壮的乐曲声。忽然，乐曲声停，一片寂静。阅兵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纵马上前，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向朱可夫报告，阅兵准备就绪。朱可夫挥手还礼。

接着，一排排胸佩军功章的受检部队官兵威武雄壮地迈着正步走过来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高举着军旗走在队列的前



阅兵首长朱可夫元帅



接受检阅的苏军官兵

面。来自 10 个方面军的 10 个混成团方阵都有掌旗手，打着 360 面苏军战旗，从列宁墓前走过。每一面旗都代表着一支战功突出的部队。朱可夫稳稳地坐在马背上，接受受检阅部队的敬礼。

在阅兵式接近尾声时，观礼台前走过一支特殊的、倒持 200 面德军旗帜的纵队。旗面几乎是在被雨打湿的条石路面上拖着。战士们走到列宁墓前依次向右转，把手中缴获的德军旗帜用力投掷到墓地底座前，首个被扔的旗帜是希特勒的元首旗。观礼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他说：“当年库图佐夫的部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他们将法国军队的军旗带回了莫斯科，在阅兵时，把这些军旗丢在亚历山大沙皇的脚下。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

3

6 月 15 日上午 9 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主持召开远东作战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别洛鲍罗多夫上将，尤马谢夫海军上将和总参谋部的一大批指挥军官。

身穿苏军大元帅服的斯大林坐在会议桌中央。

安东诺夫站在地图前面，正在讲解关于远东作战的军事部署。

安东诺夫：“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作战要点。他们的作战目的是，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确保新京（长春）

及图们以南和大连到新京以东的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

斯大林：“日本人的最主要目的是想坚持本土作战。他们怕我们一下子打到他们的家门口去，就像打柏林那样。这一次，我们不想这样做。”说着他把烟斗在桌子上敲了一下：“要先打垮他的王牌军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了一下通化：“这里是关东军最后的防守中心阵地。日军以本土为主战场，满洲和朝鲜为辅战场。他们要改变部署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利用这一空隙发动进攻。日本关东军现在的部署是总司令部设在新京，在通化设有作战司令部。总司令官是山田乙三大将，由他直接指挥的有第1和第3方面军、第4军、第34军、第2航空军。”

安东诺夫回到会议桌前，从皮包中取出一份文件，摊到桌子上，照文件宣读：

关东军的部署大致是：

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司令部设在牡丹江，负责指挥驻延吉的第3军和驻掖河的第5军。另外有3个师团，主要是担任满洲东部的防卫。

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司令部设在奉天，负责指挥驻新京的第30军和驻辽源的第44军。另外还有2个师团和一个坦克旅团，主要担负满洲西部的防卫。

第4方面军司令官上村干男中将，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主要指挥3个师团，担负满洲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卫。

第34军司令官栉渊宣一中将，司令部在北朝鲜的咸兴，在南朝鲜还有7个师团。

第2航空军司令官原田宇一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新京，战斗机大约有150架左右。

斯大林点了点头，望着华西列夫斯基：“我们的力量比他们要大得多。我想你在6月底之前应该赶到远东前线，立刻着手制订作战计划。我们的突击要出乎敌人的预料。部队要尽快做好进攻准备。”

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同志，您认为最早进攻的时间？”

斯大林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8”字后说：“最迟不能超过8月初。不能再晚了。”

华西列夫斯基：“我明白了，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至于时间问题，我看最多不能超过3个月。”

华西列夫斯基：“就是说，在今年年底之前，要结束对日战争。”

斯大林：“是的，我们有这个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至少要打一年。一年不是太长了吗？”

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同志，我向您保证，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消灭关东军。”

斯大林：“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王牌军，是日军中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困兽犹斗。我们决不能轻敌，一定要穷追猛打，直到彻底消灭他们。”

华西列夫斯基：“请放心，斯大林同志。我们远东军全体将士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必胜信心。”

斯大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很好，全世界人民都在盼望着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而且应该在我们手中结束。”

4

1945年7月10日凌晨，日本东京。三辆黑色轿车在两辆警车的护卫下，从陆军大本营开了出来，向东京机场急驶。

东京机场一片昏暗，只有飞机跑道上闪着夜航灯的点点亮光。停机坪上停着一架日本军用飞机。飞机一侧站着两排头戴钢盔的日本宪兵。车队一直驶到了飞机旁。

车门打开了，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元帅走下车来，身后是参谋次长河边中将、第一作战部部长宫崎中将、第二作战课课长天野少将等。

身穿笔挺陆军军服的梅津，用雪白的手帕揩了一下鼻下的仁丹胡，又把手套摘下来，在手心里抽了两下，对河边中将说：“明天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你代我出席。对于那些敢于在会上散布议和情绪的人，不必客气。可以直言相告，参谋总部的意见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河边中将：“是！”

梅津：“国内的事，就拜托给你了，请多多费心！”

河边用力地点了一下头：“请总长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去办。”

梅津又向左右看了一眼，扭头走入飞机，宫崎和天野紧跟在后面上了飞机。

飞机一直向西朝中国东北方向飞去。机舱内梅津手拄军刀，表情严肃，

端坐在沙发上，闭目静思良久。

机长：“总长阁下，飞机已经飞到满洲上空了。”

梅津：“是吗？请驾驶员降低一下高度。”

机身下边一片灯火辉煌，大连港内的日本军舰群若隐若现。飞机在大连上空转了一圈，对准跑道冲了下去。

大连满洲铁路总裁官邸是一座豪华的俄式建筑，此时在官邸门口迎接梅津的有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喜多诚一大将等。

1939年至1944年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面带微笑与将官们一一握手后，大步走进了会议室。

山田大将站在会议桌的一头主持会议。

山田：“梅津元帅不顾旅途的疲劳，从日本飞到满洲，亲临指导中国战场作战，令我们感动不已。诸位鼓掌，表示欢迎。”

梅津摆了摆手：“好了，好了，日本的命运都在诸位的身上，让我等共同努力吧！下面请冈村大将汇报中国战区的情况。”

冈村宁次一副冷冷的面孔：“中国派遣军修订的作战方案是这样的，以其主力控制华中、华北要地。在对付中国、苏联策划持久战的同时歼灭登陆的美军，以使日本本土决战顺利进行。在万不得已时，也要必须确保南京、北平和武汉等重要城市。”说着，他望了梅津一眼。见梅津没有反应，便又接着说下去，“目前经济困难颇多。军中粮秣好的可维持半年，不足的只能维持1个月。弹药多有不足，燃料也只有7万千升。”

梅津点了点头：“这一点，大本营是会充分考虑的，请放心好了。下面我们研究一下满洲防卫的问题，先请秦彦参谋长介绍一下苏联远东军的情况。”

秦彦中将：“根据最近得到的可靠情报，我对面之敌——苏联远东方面军，大体部署如下：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后贝加尔方面军有第17军、第36军、第39军、第53军、第6近卫坦克军、第12航空军、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近卫是苏军王牌部队的荣誉称号，其中第6坦克军、第39军、第53军是刚从对德战场调过来的。共有27个步兵师，摩托化步兵师2个，坦克师2个，骑兵师5个，伞兵师10个，还有9个炮兵师。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战前在伏龙芝红军大学任教，后来一直在前线任军事长官。

滨海集团军有红旗第1军、第5军、第25军、第35军、第9航空军。其中红旗第1军、第5军是从对德战场调过来的。共有步兵师31个，只有1个骑兵师。司令长官是麦列茨科夫元帅。他是和朱可夫同期的高级将领，此人有森林战、山地战的丰富经验。

远东方面军有红旗第2军、第15军、第16军、第10航空军。步兵师有11个。司令长官是普尔卡耶夫大将。

太平洋舰队有巡洋舰2艘，驱逐舰12艘，潜水艇78艘，其他舰船500艘，飞机1500架，1个海军陆战旅。司令长官是尤马谢夫海军大将。此人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6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舰队司令。

阿尔穆小舰队有8艘门特尔舰，11艘炮舰，52艘装甲舰，12艘扫雷艇。小舰队司令为安东诺夫少将。他参加过芬兰作战，还有陆上作战的经验。”

秦彦三郎：“我介绍完了。请梅津总长作指示！”

梅津：“满洲乃日本的再生之地，也是本土作战的一线阵地。守住了满洲，才能保证朝鲜和日本的安全。这就靠诸位多努力了。到7月要力争兵力达到90万人，武器也要自给自足，不知还有何困难？”

山田大将面带忧色：“兵源多有不足，且质量甚差。武器也不够，目前还缺少火炮约400门，掷弹筒4900多只，枪还少40万支。”

梅津：“这个问题主要是靠你们自己解决了。大本营的武器也是很困难哪！天皇陛下对满洲战事十分重视，对诸位抱有最大希望。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保卫满洲。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力争打退苏军的进犯，为保证我国本土之安全作出贡献。”

四 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1

1945年7月，离柏林30多英里的小城波茨坦。军警林立，全城戒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代号“终点”的秘密会议。

英、美两国代表团先期到达这里。

7月16日上午，杜鲁门和丘吉尔带着他们各自的部下，乘车前往柏林。浩浩荡荡的盟军最高首脑的车队，行驶在德国首都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混乱的大街上。

他们先来到总理府办公大楼。倒塌的楼房、废铁和钢筋混凝土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上。



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指着大楼的外观说：“这幢大楼真是很古怪！大概确定这座大楼建筑样式的人们构思，总想使任何一个走近大楼的人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魔鬼般阴森的感觉。”

丘吉尔：“这座大楼被毁以前看起来就阴森可怕。如果能把这座希特勒的堡垒缩小许多倍，其比例和建筑样式不变，那么它在某方面有点儿像座古墓。”

参观者被带到大楼的下面，这里有好几层地下室。其中一层是独立使用的

发电站。陪同的苏方军官介绍：“一旦需要，这个发电站可以保障整个大楼的用电。整个柏林可以处在黑暗中。但这里仍可灯火通明。”

办公大楼地下室一片混乱。

杜鲁门指着被炸塌的楼板和墙壁说：“这里中了不少炮弹、炸弹和榴弹。看来这座堡垒的警备队进行过疯狂的抵抗。”

丘吉尔：“如果希特勒堡垒这个混乱的地下室有照片的话，它们则会成为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最合适的插图。只需挑选一下，看看适合哪一部分。”

参观者来到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其外面是一块从山岩上凿下来的高约10米、直径约5~6米的圆托形巨石。由于自来水管被炸裂，室内几乎灌满了水。从避弹室一端到另一端的通道被乱七八糟的钢筋混凝土巨块堵塞了。人们只能串空走才能进去。

参观者还特意看了希特勒和其情妇爱娃自杀的房间和希特勒焚尸的地点。

丘吉尔：“这里是希特勒这个战争恶魔的最后藏身也是葬身之地。这个地下堡垒被摧毁的景象，象征着法西斯德国及其罪恶制度的彻底崩溃。”

杜鲁门：“如果要树立一个纪念物，作为对与希特勒主义有关的一切罪恶和仇视人类的东西进行诅咒的象征，那么，这个被摧毁的地下避弹室，确实可以充当这样的纪念物。”

2

7月17日下午5时10分，波茨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出席开幕式的人员：

俄国方面：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外长、葛罗米柯大使、古雪夫大使、诺维科、索波列夫和翻译巴甫洛夫。

英国方面：丘吉尔首相、艾登、艾德礼、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克拉克·克尔大使、威廉·斯特朗爵士和翻译伯尔斯少校。

美国方面：杜鲁门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李海上将、哈里曼大使、保莱大使、戴维斯大使、助理国务卿邓恩、本杰明·寇因和翻译查尔斯·波伦。

会议室是40尺宽60尺长的大房间。房间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桌，直径约12~14尺，环绕桌子有三国政府代表团主要代表坐的椅子。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戴维斯大使、李海上将坐在桌子一边，挨近杜鲁门的是翻译查尔斯·波伦。

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苏方翻译坐在杜鲁门右边。

丘吉尔坐在杜鲁门左边，挨着丘吉尔的是艾登、艾德礼。

早在5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格鲁就将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初稿起草完毕。当时，格鲁建议立即发布这份公告，以配合盟军在冲绳的作战。美国军方则坚持等到日本拒绝投降，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发表。杜鲁门则决定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布。

斯大林首先站起来：“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现在开幕。提议由杜鲁门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丘吉尔鼓掌：“同意。”

杜鲁门站起来：“谢谢！谢谢！”

杜鲁门：“我们应该首先确定会议提案。我的第一项提案就是成立一个外长会议。请外长会议研究和提出一些必须讨论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安排会议日程。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关系上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为了开展和平谈判和领土的处理而制定一些步骤和机构。没有这些，则目前存在的混乱局势将继续严重地危害欧洲和全世界。

“我们从上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所汲取的经验是，如果事前没有准



丘吉尔、杜鲁门、斯大林三巨头在波茨坦。

备，就不能使一个正式的和会成功。我们不应该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媾和方面所犯的错误。

“我提议，外长会议成员应由英、中、苏、美、法五国外长组成。这次会后，应尽快地召开这个外长会议。”

丘吉尔：“建议这个提案交给贝尔纳斯、艾登与莫洛托夫三位外长研究。”

斯大林：“同意。”

杜鲁门：“我的第二项提案是关于在初期阶段对德国的管制问题。下面请贝尔纳斯国务卿宣读对管制德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则的声明。这个文件的副本已交给斯大林与丘吉尔二位先生。”

贝尔纳斯站起来，宣读杜鲁门的声明：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铲除或控制德国全部可供军事生产的工业。

应使德国人感到他们在军事上的完全失败，他们不能逃避自食其果的责任。

一切纳粹机构应予摧毁。

一切策划和执行纳粹事业，卷入或产生暴行和战争罪行的战犯，必须予以逮捕并交付审讯。

杜鲁门：“我的另一项提案就是会议要发表一个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我的上述对已投降的德国管制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对即将战败的日本。不过要按日本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考虑。”

对于杜鲁门提出的会议提案，斯大林和丘吉尔均表同意。

杜鲁门：“我能出席这次会议，十分愉快。今天我被指定担任主席，不胜荣幸。我是抱着惶恐的心情来开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继承一个人的工作。而这个人的确是他人无法代替的。我知道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在这次对纳粹和日本的战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希望我能够获得同样的友谊和善意。”

丘吉尔：“我确信我和斯大林元帅都愿意继续我们同罗斯福总统的那种彼此关怀的感情。我极其希望而且相信，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必将日益增进。”

斯大林：“我代表苏联代表团全体人员表示，我们同丘吉尔首相具有同

样的心情和愿望。”

3

7月18日中午，丘吉尔同杜鲁门单独进餐。

丘吉尔：“现在胜利了，我常常想起战争初期大不列颠凄惨的处境。当我们独立抗敌的时候，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用去半数以上的国外投资。现在从战争中撑持起来，已负了30亿英镑的外债。所以有这笔债务，是因为不是通过租借办法而向印度、埃及和其他各地购买供应品造成的。这将使我们每年必须从事输出，而得不到任何足资补偿的输入，以充实我们的工资基金。”

杜鲁门：“我对大不列颠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深表同情。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们挺身而出，单独英勇抗敌和阁下在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极为钦佩。美国因英国在开始守住堡垒而欠了英国一笔巨债。如果你们像法国那样垮了下去，我们今天或许将在美国海岸跟德国人作战。这使我们有理由把这些事情看做超出于纯粹财政性质的问题。”

丘吉尔：“我告诉选民们，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而我们没有能力付钱；但是，我们无意于依靠任何国家来养活我们，无论我们双方在友谊上是多么亲密。”

杜鲁门：“我们在国内也有不少困难，但我们将尽全力援助我们亲密的盟友。”

这时，一位官员提醒杜鲁门：“应该即刻去看斯大林元帅。”

杜鲁门情意殷切地说：“这个午餐是我多年来最为愉快的一次。我十分殷切希望阁下跟罗斯福的关系可以在你我之间延续下去。欢迎我们建立个人之间的友谊和战友关系。”

4

7月18日晚7时，波茨坦丘吉尔寓所。丘吉尔首相邀斯大林共进晚餐。参加陪餐的只有双方的翻译伯尔斯和巴甫洛夫。

因为英国国内丘吉尔的保守党同艾德礼的工党进行的下院竞选正在高潮，两位盟友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竞选上。

斯大林：“据从英国共产党和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阁下的保守党在选举中占有优势，估计大约能获近 80 个席位的多数票。我们都期望阁下在选举中获胜。战后的大不列颠和国际形势都需要阁下的政府继续执政。来，我们共同预祝保守党获胜，干杯。”

丘吉尔同斯大林干了一杯红葡萄酒后忧心忡忡地说：“战争胜利了，选民们的思想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军人方面究竟会怎么选择，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因为在战争中我曾对军方一些人有所得罪。而军方目前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因此，虽然眼下暂时占优势，我也还是做两手准备。但愿我的选民们能再给我这个年迈首相一次报效国家的机会。”他眼中含着泪水，又同斯大林干了一杯。

斯大林：“战后的重建任务十分繁重，军人也会宁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再说，阁下是在战争初期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临危受命的。这 6 年中您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卓越的巨大贡献。我想英国公众总不会‘拉完磨，杀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抛弃您而另选他人的。”

丘吉尔轻轻地摇了摇头，无限感慨地说：“这些年，为了挑起战争和国民生存的这副重担，我这个年迈之人一直依靠着一种内心的‘飞行速度’来维持着平衡。我还有志于主持缔造大不列颠的未来……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对于实现我的美好愿望还有用处。但是，我还是不能抱乐观的态度。”

斯大林：“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钦佩之至。战后面临的国际国内事务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卓越政治家。何况我们正在这里共同商讨战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怎么可能中途换国家首脑呢？”

丘吉尔：“如果选举失败的话，就通常的情况来说，我也应该有几天工夫按常规把政府事务作一结束。也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一些时日。待议会开会时，再接受下院的解职。但是，眼下这个重要的首脑会议还没开完，亟须一位大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任何耽搁都将违反国家利益。因此，真的出现那样的情况，我将立即飞回伦敦，让新当选的首相来参加会议。”

斯大林：“但愿我们能自始至终把这次会议进行到底！来，让我们再次共同干杯，祝阁下在这次选举中吉祥如意！”

丘吉尔举杯：“谢谢大元帅，谢谢！”

5

7月19日下午1时，波茨坦丘吉尔寓所。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前来拜访。史汀生落座后，便神秘地把一张纸放在丘吉尔面前。上面写着：“孩子们生下来了。”

史汀生指着那张纸说：“这意思表示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原子弹已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了。”

丘吉尔欣喜若狂：“这真是一件特大喜讯。我们终于有了使日本人致命的东西！”

史汀生又把关于原子弹的详尽报告，交给丘吉尔。然后描绘说：“这个炸弹是在一个一百尺高的塔顶上起爆的，周围十里以内的任何人都得离开。爆炸的威力可怕得很。一股巨大的火焰和烟雾直冲到我们的可怜的地球表面的大气边缘。周围一里以内的东西完全遭到毁灭。”

丘吉尔手捧那份报告：“没有严肃的科学家敢于预言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子弹会毫无用处还是将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了。这里有了很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可能成为结束其他许多事情的简捷办法。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俄国人来帮助战胜日本了。一两次致命打击也许就可以结束战争。”

史汀生：“杜鲁门总统已在等候阁下跟他会谈。”

丘吉尔：“好啊，现在正是我们商谈这件大事的大好时机。”

7月19日下午2时，杜鲁门波茨坦寓所。杜鲁门和马歇尔、李海两个上将在座。史汀生将丘吉尔引进客厅。

丘吉尔：“向总统祝贺！向两位将军祝贺！美国科学家为人类和平作出了惊人的巨大贡献！真是大快人心啊！”

杜鲁门和马歇尔、李海站起来欢迎丘吉尔。

杜鲁门：“首相阁下，



丘吉尔听到原子弹试制成功后

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

丘吉尔：“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就。而且赶在了纳粹德国试制的前面。这是美国人的光荣！”

杜鲁门：“多亏诺贝尔奖获得者斯拉齐和爱因斯坦及时提出研制原子弹的建议，多亏罗斯福总统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策。”

丘吉尔：“据说这项研制工程在4年前就开始实施了。”

杜鲁门：“1938年8月3日，斯拉齐和爱因斯坦共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美国应该刻不容缓地研制原子弹。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果断拍板，对两位科学家的信作了肯定回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实施了代号‘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丘吉尔：“你们保密得真好。我对此一无所知，闻所未闻。”

杜鲁门：“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工程，直属罗斯福总统，任何人不得干预。除总统外只有陆军部史汀生部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工程最高负责人格罗夫斯知晓。连我这个副总统都不知道它的秘密。”

丘吉尔：“现在对总统阁下已经不是秘密，而是由您亲自主持了。可否向你的盟友透露一下研制过程？”

杜鲁门：“‘曼哈顿工程’总部设在华盛顿，总负责人是原子能科学家格罗夫斯将军。具体研制工作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组织实施。参加研制的人有费米泰勒等世界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最初，美国政府为这个工程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造出的原子弹供部队使用。二是要在德国人之前研制成功。在奥本海默领导下，科学家们通力合作，终于在7月初制成了3颗原子弹，代号分别是‘大男孩’、‘小男孩’和‘胖子’。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空军也开始了对B-29重型轰炸机的改装，又集中509大队千余官兵从事投掷原子弹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我穿过大西洋来波茨坦参加这次会议时，在墨西哥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原子弹爆炸准备工作正在秘密进行着。7月26日5时30分，一个比1000个太阳还亮的大火球在寒冷的沙漠上空升起。强光闪过后，有的人笑了，有的人哭了，大多数人都惊呆了。当晚，格罗夫斯将军发来电报：‘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书尚未写出。结果令人满意，已超出预料……’”

史汀生：“随后，我也收到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像哥哥一样健壮结实……’”

杜鲁门：“‘曼哈顿工程’从研制到成功已耗资 20 亿美元，并消耗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电力。现在看来，这个巨大代价是值得的。”

丘吉尔：“我们应该共同举杯来祝贺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成就。难道在这样的时刻总统还舍不得让大家享用您的美妙的香槟吗？”

杜鲁门：“赶快拿最好的香槟！”

在场的人共同举杯，每人喝干了一杯香槟酒，气氛极为热烈。

落座后，杜鲁门说：“我们现在拥有这一种战争武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扭转历史和世界的方向。”

丘吉尔：“其伟大意义、历史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

杜鲁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爆炸和大量的军队攻击日本本土。日本人肯定要以武士道精神拼命抵抗，到死方休。不仅对阵作战是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每一条壕沟里也是如此。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景象。那边有好几千日本军人硬是不肯投降，等他们的长官庄严地实行剖腹礼之后，就排成一队，用手榴弹毁灭自己。”

丘吉尔：“可想而知，若那样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需要丧失 100 万美军和 50 万英军的生命。如果我们把更多的人运到那边，损失还会更大。因为我们决心要同美国共患难。现在这一个可怖的梦境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在一、二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真是光明而美丽。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施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屠杀，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

杜鲁门：“有了这种特殊的武器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运用这个武器来对付日本。还不知道这个武器在用来对付敌人时，它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将产生什么后果。为了这个缘故，我国军事当局建议，我们还立足于继续进行原定作战计划—直捣日本的老巢。”

马歇尔：“在日本本土使日本人投降，日本人必然会像在太平洋各岛争夺战那样拼命抵抗。估计要至少牺牲 50 万美国军人的生命。美国空军已经准备好用寻常的空中轰炸对日本的城市和港口作大规模的袭击。这些城市和港口当然可以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遭到毁灭。但谁也不能说平民在生命财产上将遭到多少惨重的损失。”

丘吉尔：“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无止境的屠杀，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为了使遭受战争苦难的各国人民得到安抚，我们应该不惜付出几次爆炸的代价，来显示一种无比的威力。这在我们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后，不失为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当然，作最后决定的还主要在于拥有这个神圣武器的杜鲁门总统。”

杜鲁门：“现在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是跟斯大林谈些什么？怎么个谈法？斯大林曾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答应一等到在欧洲打败德国之后，苏军即进攻日本。为了兑现这个诺言，他们从5月初开始，就不断地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把俄国军队运到远东去。因此，斯大林至今还在同我们讨价还价。但是，他们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一个伟大的盟友，应该让他知道这个可以支配大局的伟大新事实。”

丘吉尔：“应该告诉他们，但还应该有所保留，不让他知道任何细节。”

杜鲁门：“究竟应该怎样告诉斯大林。是用书面还是口头？是在一个正式的特别会议上，还是在日常会谈中，还是在一次特别会议或日常会谈以后？”

丘吉尔：“我看还是采取后一种方法较为稳妥。但是，一定得告诉他。看一看他是什么表情，很可能把这个乔大叔吓一跳呢？这一定很有意思！”

7月23日下午5时，正式会议结束后，各国代表从圆桌旁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大家三三两两地站着。这时杜鲁门总统走到往门口走的斯大林身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大元帅阁下，我想告诉您一个消息。”

斯大林停下脚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什么消息？”

杜鲁门神秘地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原子弹。”说完，紧盯着斯大林的脸。

早已通过间谍搞到原子弹图纸并且随时掌握美国原子弹试验进度的斯大林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噢，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能够尽快使用它对付日本人。”说完，斯大林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听到一样，脸上毫无表情，转身走出了大厅。

斯大林走后，杜鲁门走到丘吉尔身边。

丘吉尔：“事情怎样？”

杜鲁门：“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而且态度非常令人费解。似乎根本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东西。”

丘吉尔：“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没有特别的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



杜鲁门即将向斯大林透露美国有了新式武器

事业上曾押上 400 万英镑的赌注。”

杜鲁门：“我想也许斯大林的情报机关不一定如此闭目塞听。”

果然，斯大林当时是一种表面姿态。他已听懂了杜鲁门的要挟。其实，从 1942 年开始，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就陆续收到有关德国和美国试制原子弹的情报。1943 年，斯大林就任命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为试制原子弹项目负责人，着手研制原子弹。杜鲁门向他透露消息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打电话给库尔恰托夫，简明扼要地指示：“立即加速我们的研制工作。”

6

7 月 23 日晚 8 时，丘吉尔在波茨坦寓所举行宴会，宴请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大元帅及各国高级指挥官。

杜鲁门坐在丘吉尔右边，斯大林坐在丘吉尔左边。

丘吉尔：“我提议为我们亲密的盟友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干杯！”然后又突然意味深长地提议：“为我们的反对党领袖举杯祝贺！附带说明不管是谁当选，都应该给予祝贺！”

英国代表、英国反对党领袖、丘吉尔的竞选对手艾德礼先生，也下意识

地同在场的人一起鼓掌。当时他同丘吉尔均已得到国内竞选的消息，而艾德礼似乎胸有成竹了。

接着斯大林站起来举杯：“我们的英勇的苏联红军，已经云集在远东，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对日宣战，就立即踏破在满洲已经很薄弱的日本前线。我提议，在击败日本法西斯之后，我们的下次盟国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宴会厅里响起一阵掌声。

为了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丘吉尔和杜鲁门时常调换座位。当杜鲁门总统坐到丘吉尔对面时，他便同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谈了起来。

丘吉尔：“盟国焦急地期待着苏联对日宣战，看来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元帅应该‘挥洒千军如卷席’了。”

斯大林自豪地吸了一口烟：“为了迅雷不及掩耳地击败曾称霸一方的关东军，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做好准备。受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限制，战斗部队和战争物资的运送不十分顺利。但是，请阁下放心，我们会尽快准备好的。”

这时使丘吉尔意想不到的一件奇怪事情发生了：只见斯大林手里拿着一张宴会的菜单到餐桌的四周请在座的宾客签名。当斯大林回到丘吉尔身旁时，丘吉尔风趣地说：“真没想到大元帅阁下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说着拿起笔在菜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名后两位盟友相视而笑。

丘吉尔见斯大林兴致勃勃，便站起来提议：“我以前曾提到过，苏联代表一向用极小的杯子喝酒，而大元帅本人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说着用盛红葡萄酒的大号玻璃杯为斯大林和自己各斟了一杯白兰地。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斯大林。斯大林竟然拿起杯，同丘吉尔一起喝干了。在座的宾客们不由得为他们的豪爽鼓起掌来。

7

7月26日，日本东京。由于遭到1000多架飞机的日夜轮番轰炸，东京在大火中已燃烧了10多天，整个城市上空黑烟滚滚，地上如同一个大火坑，路上到处是高大建筑物塌下来的废墟。

天皇裕仁坐在地下防空洞中，手里握着一支毛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皇后良子走过来一看，写的是长长的一竖，像是一根枯死的树枝。裕仁写着写着，突然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叹了口气：“朕有愧于国、有愧于民哪！”

良子在一旁陪着叹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裕仁站起来，向防空洞的门口走去。

侍卫长藤田急忙拦住他：“皇上，您不能出去……外边……”

裕仁不耐烦地：“知道，知道了！”继续朝门口走。

这时外相东乡急匆匆地走进来：启奏皇上，刚才臣从广播中听到了美、英、中三国的波茨坦公告。也就是对日本最后通牒。

天皇：“怎么没有苏联？”

东乡：“这一点，臣也不知，正在询问。公告内容共 13 条，中心是要求日本无条件……结束战争。”

裕仁脸上冷汗淋漓，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良子递过一条丝帕，裕仁用丝帕轻轻擦了擦。然后转身回到桌前坐下：“请念念公告重要条款。”

东乡站在那里念着《波茨坦公告》：

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波茨坦公告

1945 年 7 月 26 日于波茨坦发出。

一、吾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藉有西方调来的军队及空军，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而支持及鼓舞，对日作战，直到日本停止抵抗为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然现在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更加以吾人坚决之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破坏。

四、现应即早决定，日本是否仍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所统治？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吾人之条件，吾人绝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种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吾人坚信，若不将穷兵黩武之军国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不能产生。故决将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政权及势力，永远以扫除。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至日本制造战争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本公告中所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之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清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并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愿，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裕仁：“内阁是什么意见？”

东乡：“内阁认为，日本只有接受，方能结束战争。否则没有别的……”说到这，东乡看了天皇一眼，见他的眼睛紧闭着，脸色蜡黄。于是，他马上又改口说道：“三国宣言仅系一般的声明。至于其中的一些内容，仍有研究之余地。”

裕仁：“这么说，你们的意见是可以先听一听各方面的反映？”

东乡：“是的，臣是这么想的。”

裕仁：“那也好，可以请铃木首相先作决定。”

7月27日上午9时，由铃木首相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三国《波茨坦公告》的对策。

出席会议的有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安倍内相、木户内大臣、陆相阿南大将、海相米内大将、安井国务相。

军方出席会议的有：参谋总长梅津、陆军部司令东条、第一作战部部长宫崎等。

东乡外相第一个发言：“面对目前的形势，我们该努力予以结束战争。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陆相阿南大将气势汹汹地说：“现在结束战争，还为时太早。日本陆军，仍是世界上最强的陆军。而且我们已经做好了本土作战的准备。如此不战而降，对国民如何交代？”

东乡：“战争总要结束的。这个宣言是有条件的媾和，对日本是有利的。”

阿南：“我看不出，哪些方面对日本有利。总之只要是投降，对日本来说，就谈不上有利。”

梅津冷冷地说：“关东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美军要想在日本本土登陆，也非易事。只有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法结束战争。”

东乡向周围看了看，持反对意见的都是统帅部的主战人物，只好对铃木首相说：“如果现在拒绝，怕是会招致严重之后果。”

阿南问道：“会是何种后果呢？日本要打到最后一个人。再也不要想别的什么后果。那样只会动摇日本的军心。”

铃木：“我们可以暂不表态，也可以漠然置之。根据形势再作定夺。”

8

7月27日下午2时，东京铃木首相官邸。

东乡行色匆匆地赶到这里，不等通报，便闯进内室，急切地说：“铃木君，请看看美国在空中散发的传单，他们要投一种武力巨大的炸弹！”

铃木接过传单，双手拿在眼前，眼中冒着火：“要炸11个城市！”

东乡：“是给日本政府的警告，不然……就要轰炸……”

铃木拿着传单，急切地踱步，一时不知所措。

东乡：“铃木君，事关帝国命运，机不可失，你要三思而再三思啊！”

铃木故作镇定：“东乡君，不必动怒，坐下慢慢说。”

东乡无可奈何：“该说的都说了。你叫我出任外相，我就明确表态，我当这官，就是要结束战争，为皇上分忧。可现在还竟然……”他全身颤抖，几乎呜咽起来。

铃木：“当前日本国力尚在，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待到危亡之时，我会力主结束战争，决不会置国家命运于不顾的。”

东乡气急败坏：“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是最后机会了！”

铃木：“我也是左右为难啊，战，前途渺茫；和，军方掣肘。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东乡：“日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三国宣言和传单中所指的，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不是耸人听闻。美国试验的原子炸弹，其毁灭力之大，乃前所未闻。近几天，美国轰炸我本土的飞机，已达 3000 架。如此下去，到日本的国力殆尽，千百万生灵涂炭时再作无条件投降，于国于民那是什么下场啊！”

铃木坐在那儿，呆若木鸡。

五 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崎

1

7月28日上午8时，波茨坦，杜鲁门临时寓所。

在座的有史汀生、马歇尔、阿诺德。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正在向杜鲁门汇报日本对最后通牒的反应。

史汀生：“昨晚，日本首相铃木会见记者时发言谈话：‘共同声明不过是《开罗宣言》的老调重弹。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途。’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看来已没有考虑余地了。”

杜鲁门：“如果8月3日前日本没有宣布投降，就按计划投原子弹。”

马歇尔：“原子弹的杀伤力大，在投掷前可否预先警告日本，限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动员目标内的平民进行疏散。这样既可以显示我们美国的人道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平民伤亡；又可以排除日后人们的责骂，使美国不负道义上的责任。”

史汀生：“马歇尔参谋长的建议，我看可以考虑。”

阿诺德：“出于减少平民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

伤亡的考虑，事先通知日本也是应该的。但是，这样做风险很大。一是原子弹在前期试验中曾有过多种故障隐患。如果投掷的原子弹万一出现哑弹，而被日方缴获，则原子弹的秘密会暴露无遗。日本会利用它来制造核弹。日本为换取苏联出面向盟国斡旋体面结束战争，也有可能将缴获的原子弹赠送给苏联，那样美国的核垄断将被打破。二是预先警告会使日本有充分准备，甚至会主动寻找攻击搭载原子弹的美军航母。如果在攻击或击落过程中发生核爆炸，不仅不会伤及日本本土，反而会危及执行此次核轰炸任务的美国整个航母战斗群。三是生性残忍、从不把生命当回事的日本人，在得到预先警告后，很有可能会把盟军战俘送到重要目标地区当人质向盟国要挟，进而迫使我们放弃原子弹打击计划。基于上述考虑还是不预先警告为稳妥。”

马歇尔、史汀生：“有道理！有道理！”

杜鲁门：“那就按预定计划执行吧。”

决定向日本空投原子弹后，首要的是选定轰炸目标。与会者选择了17个目标：东京、京都、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广岛、小仓、福冈、长崎、新、佐世保等。最后，会议定下了三条原则：1. 目标大小必须是方圆超过3英里的中等以上市区，且有重要目标。2. 要能够被原子弹的冲击波有效破坏。3. 8月以前不大可能被空军轰炸。

史汀生：“按照总统关于原子弹应尽可能投在靠近码头等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军需生产中心的指示，陆军参谋部准备了被作为轰炸目标的四个城市名单。依次为广岛、小仓、新和长崎。选择的顺序是依照这些城市的军事重要性的大小而定的。但是轰炸时的气候因素也得考虑进去。”

阿诺德：“主持研制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曾同我说，最好的目标是京都。这个城市在战争中一直没有受到损伤。他认为摧毁这个日本的‘精神文化中心’更能让日本政府和国民品尝一下原子弹的味道，从而达到在



从未在战场领过兵的五星上将马歇尔

精神上摧毁他们的目的。我考虑京都又是整个日本的军事活动中心，把京都作为投弹目标比较合适。”

马歇尔：“京都既是日本军事活动中心，也是日本文化和宗教圣地，名胜古迹很多。还是保留这个古都吧！”

史汀生：“在研究投弹目标时，格罗夫斯将军也曾提出向京都投弹。当时就被我否决了。我认为破坏日本的文化中心是错误的。这就像如果日本人把美国的林肯纪念堂当做打击目标的话，必定会被美国人所痛恨。所以我看保留京都，把广岛、小仓、新、长崎列为重点目标为好。”

杜鲁门：“就按照史汀生部长意见作决定吧。会后立即下达作战命令。授命陆军战略空军司令斯波茨将军，于8月3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的条件下，尽快投掷第一颗原子弹。”

2

7月29日上午8时，太平洋提安尼岛，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基地。

战略空军司令斯波茨将军在基地会议室同一些高级将领、科研人员、参谋副官和执行投弹任务的几位飞行员商讨投掷原子弹准备事宜。

战略空军参谋长：“整个行动将动用7架B—29超级空中堡垒。1架执行投弹任务，3架用于气象观测，1架在硫磺岛待命，2架运送测量仪器和观测人员。执行投弹任务的是‘埃诺拉·盖伊号’。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这位（用手指坐在对面的年轻飞行员）保罗·蒂贝茨。”

保罗·蒂贝茨上校站起来，向首长行举手礼后坐下。

参谋长继续介绍：“保罗·蒂贝茨是509混合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他曾多次参加对德轰炸，战功显著。最近又参加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飞行技术高超，空中实战经验丰富。”

斯波茨：“保罗·蒂贝茨队长，你这次被选中执行投弹任务，很光荣，很特殊，很艰巨，很复杂。你有把握完成任务吗？”

保罗·蒂贝茨站起来：“报告司令员，我有完全的把握完成投弹任务！”

斯波茨：“好！祝你成功！”

这时，从隔壁收报室过来一位空军军官，拿着新接收的电报，向斯波茨敬礼：“报告司令长官，总参谋部急电！”

斯波茨：“念！”

空军军官：

指令：

美国陆军战略空军部司令斯波茨将军：

（一）第 20 航空队 509 混合大队应于 1945 年 8 月 3 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情况下，立即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殊炸弹：广岛、小仓、新、长崎。为带领陆军部派遣的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的科学人员进行观察和记录炸弹的爆炸效力，应另外派飞机随同运载特种炸弹的飞机飞行。观察机应离开炸弹爆炸点数英里距离之外。

（二）在本部准备就绪时，即运载投掷于上述目标的特殊炸弹。关于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轰炸目标，另候命令。

（三）一切发布有关对日使用的武器的情报都由美国陆军部长和总统掌握。非经事先特别批准，司令官不得就这个问题发布公报或透露消息。任何新闻报道都将送到陆军部作特别检查。

（四）上述的指令是奉美国陆军部长和参谋长指示并经他们的批准而发布的。希望由你亲自将这个指令的副本送交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各一份，供他们参考。

代理参谋总长

参谋团将军

T·T·汉迪（签字）

斯波茨：“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第 509 混合大队立即进入投弹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对各项准备的最后检查，务于 8 月 2 日 24 时前进行完毕！”

3

8 月 6 日凌晨 2 时 45 分，载着重 5 吨的导弹“小男孩”的“埃诺拉·盖伊号”从提安尼岛机场腾空而起，朝日本方向飞去。

飞机在飞过硫磺岛时，收到了来自气象观测部门的气象情报，广岛上空



原子弹“小男孩”

能见度良好，小仓不良。

保罗·蒂贝茨把飞行高度保持在 10000 米左右，飞临广岛。此时正是日本时间 8 时过一点儿。

透过一层薄雾，投弹点开始重叠在瞄准镜的交叉线上。

8 时 15 分，“小男孩”炸弹在 9600 米左右的高度脱离飞机，向广岛坠落下去。紧接着在观测机上也投下了带有降落伞的观测仪器。

43 秒钟后，“小男孩”爆炸了！

霎时，第一道冲击波啪啦啪啦地击中飞机，飞机剧烈震动。向下看，整个广岛完全是黑色的烟尘，炸弹和冲击波掀起了满天的残砖碎石。还有巨大的蘑菇云像一片片翻滚滚动燃烧的火与浓烟。

8 月 6 日，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沿海的广岛，天气晴朗，炎热且湿度较大。

早晨 7 时零 9 分，日本陆军第二总指挥部的雷达发现了美军 509 大队的 3 架气象侦察机正在飞近广岛上空。拉响了全市的防空警报。7 时 31 分，美机飞离后警报随即解除。

这一次毫无危险的突袭使日本防空人员产生了麻痹思想。当 8 时 15 分雷达发现了 3 架 B-29 飞机在广岛上空约 9500 米处飞行时，他们并没有拉响警报。

值班的播音员接到报告说发现 3 架敌机，但他没有马上抓住话筒，而是先看了一会儿值班记录才向全市广播：“军事指挥部宣布 3 架敌机……”剩下的话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播完了。

此时，“小男孩”从“埃诺拉·盖伊号”飞机上往下降落。43 秒钟后在广岛上空 580 米处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蓝白色火花。几秒钟后，无比巨大的热浪笼罩了整个城市。核爆炸中心投影点附近的温度急剧上升到 $3000^{\circ}\text{C} \sim 4000^{\circ}\text{C}$ 。无比猛烈的旋风横扫全城，火势到处蔓延，势不可挡。裹着黑色蘑菇云的鹅卵石大小的黑雨点从天而降。

热浪袭击之后核弹开始爆炸，其威力以每秒 3.2 公里的速度从爆炸中心向四周扩散，其爆炸力达到 12.5 千吨 TNT，几乎一举把广岛夷为平地。全市 7.6 万幢建筑物中仅有 600 栋未受破坏，4.8 万幢遭到了彻底摧毁。当天死亡人数

为 10 万人，到 1945 年底死亡人数增加到 14 万人。

4

8 月 6 日中午 12 时，美国“奥古斯大号”军舰。杜鲁门从波茨坦回国途中，正同海员们共进午餐。

白宫地图室官员弗兰克·格雷姆上尉递给杜鲁门一封电报：

陆军部长呈

大型炸弹于 8 月 6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8 时 15 分投于广岛。初步报告指明，轰炸完全成功。这次成功甚至比前次试验更加显著。

杜鲁门无比激动，立即给国务卿贝尔纳斯打电话：“瘦子在广岛投弹成功了！”正在用餐的海员们霎时欢呼起来！

杜鲁门转身对周围的一群海员说：“原子弹投弹成功，这是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现在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了！”

海员们举杯互相祝贺，整个军舰一片欢腾！

几分钟后，格雷姆上尉又送来第二封电报。

杜鲁门示意叫格雷姆宣读。杜鲁门和海员们洗耳静听。

接到下述关于曼哈顿的情报：广岛的轰炸灼然可见，盖在 052315A 点上的云量只有十分之一，没有敌机反击，没有高射炮火。飞机在投弹以后情况正常。轰炸结果在各方面都获得显著成功。可看到的效果比任何一次试验来得大。

电报宣读后，杜鲁门向餐厅中的全体人员讲话：“今天早晨，我国战略空军向日本广岛投掷一颗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爆炸的威力比一吨 TNT（三硝基甲苯）大二万倍。日本人已经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这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式武器的应用，我军将减少几十万人的伤亡，太平洋战争将很快结束了！”

舰上的海员们又是一片欢呼！

5

8月9日上午9时,美国空军少校查尔斯·斯威尼驾驶载有两颗钚弹两颗“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车”号 B-29 轰炸机,从提安尼岛起飞。

第一投弹目标是小仓,第二目标是长崎。

B-29 轰炸机接近小仓上空时,气象观察机显示,小仓上空可进行目视投弹。飞到小仓上空时,发现小仓上空乌云密布,地面能见度极低。轰炸机在小仓上空来回飞了三圈,寻找能目视轰炸的云缝,但没有成功。

查尔斯·斯威尼看了看储油表,表针指向较低。他担心汽油不够,便决定放弃小仓,转到第二目标长崎。这时,正好接到“日本截击航空兵可能有战斗机升空拦截”的无线电报告,斯威尼来不及同基地联系,最后决定轰炸长崎。

飞机到达长崎时,见该城市上空也布满了乌云。经仔细观察,在密集的云层中发现了一处宽大的云缝。于是,他果断地将两颗“胖子”从 8800 米的高空扔了下去。时为 8 月 9 日 10 时 58 分。

这次轰炸,长崎市内绝大多数建筑物被摧毁,有 3.5 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6 万人重伤。格罗夫斯在事后听到伤亡人数时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原来,美国方面估计的是两颗原子弹同时爆炸的死亡数字,而事实上只爆炸了一颗。

当时日本长崎的防空报告准确地记录了这一情况:

本日 10 时 50 分 B—29 两架,入侵长崎市上空。10 时 58 分投下附有降落伞的新型炸弹两个。



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巨大蘑菇云



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一片废墟

6

8月9日上午9时20分，东京，铃木首相官邸。正在召开“六巨头”会议。

六巨头为：首相铃木、陆相阿南大将、海相米内大将、参谋总长梅津元帅、军令部总长丰田大将、外务相东乡。

铃木：“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死伤12万多人，还在警告我们要继续在其他城市投弹。今早，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大批苏军已源源不断突击满洲，重创我关东军精锐部队。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应有何种应急对策？我的结论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即结束战争。看诸位的意见如何？”

会上一片寂静，都低着头不肯表态。

东乡：“我认为首相的结论非常正确。当务之急是承认战败的现实，尽快结束战争。无论如何不能再犹豫，再延误下去了。”

米内：“我同意首相和外相的意见。继续战争不可能有任何收效。所以，我们必须丢开面子，尽早投降，立刻考虑如何才能把国家保存得最好，考虑如何保存国民的生命财产。”

阿南气急败坏地：“我们还有足够的兵力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反败为胜，扭转战局也不是不可能的。”



日本前首相铃木贯太郎

室，交给铃木。

铃木当众宣读：

今日上午 10 时零 58 分，美军又在长崎上空投下两颗原子弹。
长崎已变成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

六巨头大为惊恐，一个个面面相觑，神情木然。

东乡：“军方能向我们展示反败为胜的保证吗？”

阿南：“只要坚持决战到底，总有胜利的希望！”

东乡：“你能阻止敌军登陆吗？”

梅津：“要是运气，我们能在侵略者踏上国土时，把他们击退。我敢说我们凭现有的军力能把入侵的敌人大部分歼灭。”

东乡：“到大军压境的这种时刻，还指着运气能行吗？就是第一次打退了敌人，敌人还会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你能阻挡得了吗？”

这时，一个军官拿着一份电报走进会议

六 苏联对日宣战与苏军重创关东军

1

1945年8月6日下午2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

斯大林同最高统帅部的元帅和将军们听取总参谋部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关东军的实力现状、防卫情况和苏联远东军部署情况汇报。

斯大林：“进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的战役即将开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战役。我军面对的敌人是号称王牌军‘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天的会议主要听取日本关东军实力现状、防卫情况和我远东军部署情况的汇报。首先，由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汇报日本关东军的情况。”

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我方近几个月的详细侦察，目前已将日本关东军的历史和现状全部掌握。并已针对敌人的实力和防卫情况作出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我详细汇报一下日本关东军的情况：

日本关东军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建立的一支精锐部队。日本获胜后，为保护南满铁路，专门成立了一支南满守备队，另外还留驻一个师团，两部兵力约2万人。当时，日本当局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洲”。所以，这支部队称为“关东军”。

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

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为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增加到5个师团。1937年7个师团。1938年9个师团。1939年11个师团。1940年达到12个师团。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1942年10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二航空军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三分之一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总兵力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军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以上便是日本关东军的实力现状。

斯大林：“看来，目前日本关东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已比过去大大削弱了。但是，困兽犹斗。我们切不可有轻敌情绪。一定要下大决心，用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在短时间内消灭日本关东军。下面，由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汇报我远东军部署情况。”

在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型作战地图前，安东诺夫大将讲述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和苏联远东军部署情况：

从5月初到8月初，三个月时间从9000—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陆续

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 136000 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展开了 11 个合成集团军、2 个战役集群、1 个坦克集团军、3 个航空集团军和 3 个防空集团军、4 个独立航空军，总兵力 157.77 万人、26137 门火炮、5556 辆坦克、3446 架飞机，以及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所有军队的调运，都是用演习的命令下达的，已全部调到进攻出发位置。边防部队仍然在按原计划巡逻，当地驻军部队也在正常休假。

这时，莫洛托夫走了进来。他快步走到斯大林跟前：“斯大林同志，我们刚刚听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声明，今天上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噢，这么快就开始了！”

莫洛托夫：“据可靠情报，这颗原子弹威力极大，杀伤力极强。广岛全市 7.6 万幢建筑中，仅有 600 幢未受损坏，死亡人数约为 10 万人。”

斯大林显得有一点吃惊：“这个广岛市几分钟之内全毁掉了！”

莫洛托夫：“杜鲁门的声明很强硬。他说：‘我们现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人在任何城市上的一切生产事业。我们将破坏他们的造船厂、工厂和交通运输。我们将彻底粉碎日本的作战能力。’还说如果日本近日不无条件投降，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广岛。”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斯大林：“日本人有什么反应吗？”

莫洛托夫：“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什么反应。也就是说，他们仍要把战争进行下去。”

斯大林站了起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就是坐失良机。”他说着走到了地图的前面，没有看地图，而是问华西列夫斯基：“有两天时间的准备够了吗？”

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同志，两天足够了。”

斯大林：“两天之后，远东的气象

如何？”

华西列夫斯基：“远东第一方面军进攻的方向上有大雨，其他方向上一切正常。”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进攻的时间定在8月9日零时。安东诺夫同志那就下达命令吧。”

斯大林对站起来准备退席的华西列夫斯基和与会者说：“我们必须开始行动，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延误，一直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2

8月8日晚8时，苏军远东总部。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站在一个巨大的沙盘前面，全神贯注地思索着。

伊凡诺夫上将走了过来：“司令员同志，到今天晚上8点钟，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舰队全部进入出发地域。”

“很好，从目前的情况看，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们仍按一号方案，隐蔽地发起进攻。”

华西列夫斯基走到窗户跟前，只见天空中乌云翻滚：“看样子今夜有暴风雨？”伊凡诺夫：

“根据气象报告，今天和明天，整个远东地区都有大暴雨。这对我们的行动非常不利。”

华西列夫斯基十分焦虑地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请接总参谋部安东诺夫大将。”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

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总长，我是华西列夫斯基。今夜远东的天气发生了变化，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河水上涨，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安东诺夫：“斯大林同志刚才来电话，也是问到天气情况。我想先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华西列夫斯基：“我们的意见是按原计划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起进攻。”

安东诺夫：“很好，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按时发起进攻，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西列夫斯基：“我明白了。”

华西列夫斯基放下电话，对伊凡诺夫说：“通知各方面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进攻时间不变。这是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3

8月8日晚11时30分，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办公室。

一位外交官员引导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走了进来。

佐藤像往常被召见一样，面带微笑向莫洛托夫行鞠躬礼：“日本帝国大使佐藤应约特拜访外交人民委员阁下。”

莫洛托夫从沙发上站起来，没有同佐藤握手，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表情非常严肃地说：“佐藤大使，现在，我代表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日本政府，自1945年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宣战。”

毫无思想准备的佐藤，面对突如其来的“对日宣战”一下子傻了眼。他有气无力地说：“日本同苏联是……是有条约的，而且，这一条约的时间还……”

莫洛托夫对佐藤提出的问题未予理睬，立刻把一份外交文件交给那位苏联外交官员：“请向大使宣读苏联政府的声明。”

外交官拿起文件高声宣读起来：

……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以后，日本为主张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日本已拒绝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提出的日本武装兵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因而，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关于调停远东战争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考虑日本拒绝投降，联合国家向苏联政府提议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以便缩短结束战争的时期与减少牺牲，尽早实现全面和平。苏联政府履行本国对联合国家的义务，已接受联合国家的提议，参加本年7月26日联合国家的宣言。苏联政府认为：本国政府的上述方针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国民今后免受新的牺牲与苦难，使日本国民得以避免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蒙受的危險

与破坏的唯一途径。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1945年8月8日

佐藤木然地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他拿出手帕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说：“日本对苏联决意采取的战争做法，表示遗憾。这在两国关系上是一种片面的毁约行为。而且苏联把对日本宣战说成是‘为了拯救日本国民的苦难’，这……这一点，也是没有道理的……”

莫洛托夫立即驳斥：“因为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依赖苏联居于英美之间进行调停的要求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苏联政府根据同英美的同盟条约，向日本宣战！”

佐藤：“实在遗憾！”

莫洛托夫：“这一宣战是尽可能地结束战争，把人类从战争的惨祸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手段，也是日本人免遭德国投降后所经历的那种危险和破坏的唯一手段。”

佐藤：“假如说要解救日本人于危险和破坏之中，不进行战争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冷冰冰地说：“请从总体上理解这一含义。您可以将苏联政府的宣言报告日本政府。”

佐藤又追问：“所谓自8月9日起为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那就意味着8月8日晚是和平状态。自8月9日起为战争状态吗？”

莫洛托夫：“是这样的。不过请放心，苏联政府对大使不会侮辱的。”

佐藤深深叹了口气，无奈地从外交官手里接过文件，拿起皮包，低着头走出了苏联外交委员会。

4

8月8日午夜，雨越下越大，雷声隆隆，苏军士兵趴在没膝的泥水中，等待进攻的信号。

8月9日零时，在一片暴雨和雷电的轰鸣声中，一支侦察部队越过了中苏



苏军向大兴安岭日军发起强攻

边境，消失在茫茫大漠和原始森林之中……

在辽阔无垠的夜空中，顿时充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线电呼叫……

零时 10 分，总攻击的时间到了。万炮轰鸣震撼大地，5500 辆坦克同时向日军阵地冲了过去，上千架装满炸弹的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卫下，冒着暴雨强行起飞了。密集的机群飞过边境，朝着吉林、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城市和重要军事目标飞去……

在后贝加尔方向，由普利耶夫上将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团，高举着战刀，一路冲杀，所向无敌。对面的日军骑兵师和步兵师，刚一交手，便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在赤峰方向进攻的第 17 集团军，一昼夜开进了 70 公里，到达了额古诺尔湖边。

在大兴安岭方向，克拉夫钦克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在 150 公里宽的地面上向前推进攻击。集团军的前面是一支强大的先遣部队，一路上边打边走，势不可挡。

苏联远东军团的几路大军，强渡了额



围歼日本关东军的苏军坦克群

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同一时间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在 5000 多公里的正面战场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冒着暴风雨，在泥泞中作战，大部队大面积进军之隐蔽和神奇，攻击突破敌军驻军、要塞之神速，如神兵从天而降。许多在睡梦中的日本边境守备队和驻军的官兵，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连摸枪都来不及，只好束手投降，当了俘虏。不少地方日军整连、整营、整团被解除武装。

5

8 月 9 日 0 时 20 分，长春关东军总司令部作战室。

参谋长秦彦三郎从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拿起电话，传来值班参谋铃木中佐的紧急报告：“第 5 军情报参谋前田中佐电话称，苏军突然袭击虎头正面监视哨，进攻满洲领土，后面有强大后续部队！”

紧接着数台电话陆续响起：

“北部边境线出现大批苏军作战部队！”

“西部边境出现大批苏军坦克……”

“东部苏军大部队越过乌苏里江！”

“苏军轰炸机群轰炸佳木斯！”

“牡丹江驻军遭到轰炸……”

秦彦三郎赶紧给在外地的山田总司令官打电话：“报告山田总司令，满洲西、北、东边境相继出现苏军部队突袭。佳木斯、牡丹江等地驻军遭到轰炸！”

话筒里传来山田总司令气急败坏的声音：“立即向东京大本营报告！立即命令各方面军、各关东军直属部队，进入战争状态，迎头反击敌人，并准备全面开战！”

秦彦三郎下令：“立即派侦察机到大连接山田司令官！”

8 月 9 日凌晨 2 时。长春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接待来访的 74 岁的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

张景惠惊慌失措地问：“苏俄已经同帝国宣战。请问阁下，皇军准备如何应对这场大战？”

秦彦三郎：“山田司令官不在，还不知道这仗怎么打？总理阁下的意见

如何？”

张景惠沉思片刻后说：“皇军如能拒老毛子于国门之外，最好不过。”

秦彦三郎不肯说软话：“不用您操心，皇军当然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

张景惠深深鞠一躬说：“这就好。如果战争打到国内，希望参谋长转告司令官阁下，不要在新京作战。”

秦彦三郎将大眼一瞪问：“这又是为什么？”

张景惠：“鄙人蒙贵国推为总理大臣。14年来别无成就，只有这新京还算可以拿给国内同胞看看，自不愿毁于战火。希望参谋长千万玉成。”

秦彦三郎：“老总理言之有理，本人十分同情。一定转告山田司令官。”

张景惠起身告别：“皇军若能保护新京，老朽生死难忘。参谋长要在中国当了俘虏，本人一定报告蒋委员长特别优待。”

秦彦三郎拱手：“还请老总理多多关照！”

6

8月9日凌晨2时15分，东京日本陆军大本营。

堀少佐头戴耳机，正在监听莫斯科的广播：“下面广播苏联对日战争宣言……”听了几句之后，他站起来，跑到值班室，对正在睡觉的松本副官喊道：“松本君，快醒一醒，有重要情报，重要情报……”

松本躺在床上没有动：“出什么事了，天还没有亮……”

“苏联对日本宣战了！”

松本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快，快点把报告拿来。”

“我马上就去写，我这就去。”堀少佐又跑回了监听室。

河边参谋次长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看了一下手表，伸了一个懒腰，拿起了话筒：“哪里？我是河边，有什么事情？”

耳机里传来了松本的声音：“报告次长，根据第6课堀少佐的报告，监听到莫斯科的广播，苏联已经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这……你没有听错吗？”

“绝对没有听错！”

“好吧，我知道了。”河边有气无力地回答。

8点钟，梅津总长来到了河边次长的办公室，河边立刻迎了上去：“报告

总长，苏联已经对日宣战！”

“已经知道了。”梅津走到办公桌前，无可奈何地坐到太师椅上。

河边：“总长，您有什么指示？”

梅津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他心里很明白，像河边这样夸夸其谈，什么用也不顶。主要是要看首相和天皇的态度，当然最重要的是天皇。

梅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副长者的口气：“事已如此，不必惊慌不安。可静观事态之发展，再作打算。”

河边又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陆相阿南大将的办公室。

陆相阿南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胸有成竹地对河边说：“不必报告了。说说如何应付眼下的危机局势？”

河边双腿立正：“无论如何不能考虑和平与投降问题。只有靠军队奋战到底了！必要时，陆军可以接收政府！至于满洲可以先抵抗后放弃……”

阿南：“很好，很好！阁下的意见代表了参谋本部全体人员的意志！立即通知，召开最高战争会议。”

河边：“我马上下达通知。陆相，在会上您可要坚持打下去呀！”

阿南：“我将坚持到最后！如不听我的意见，我就辞职到满洲去，带领部队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条枪！”

7

8月9日凌晨5时35分，东京，裕仁天皇后宫生物实验苗圃。

裕仁和皇后在长满各种稀奇植物的苗圃中踱步。皇后挽着面色苍白、体态有些虚弱的裕仁，慢慢地在小径中走着，在感兴趣的植物前欣赏着、品评着。一位苗圃管理官员在后边紧紧跟随，随时准备向裕仁夫妇介绍植物生长情况。

突然，裕仁发现路边一条蚯蚓全身缠着一条已被人踩死大半截的蚯蚓慢慢爬行。他下意识地蹲下身来仔细地观察好一阵，动情地对苗圃管理官员说：“是谁这么残忍一脚把蚯蚓踩死了！看这只活着的小生物还恋恋不舍地抱着自己的同伴，有多可怜！快点拿铁铲来！”

苗圃管理官员招呼一位园工拿来了一把铁铲，裕仁接过来，亲自在附近地上挖了个坑，又用铁铲将那两条蚯蚓下边的土挖下来，连同蚯蚓一起放在坑里，然后小心地将挖出的土添到坑里，又用脚轻轻踩了几下：“蚯蚓生

命力很强，也许那大截蚯蚓在地下还能复活。”

苗圃管理官员：“皇上是生物学专家，特别是对腔肠动物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那条蚯蚓百分之百能复活的。”他看着蹲在地上的天皇慢慢地站起来，两眼中饱含着热泪，赶紧知趣地退到一边去了。



天皇裕仁夫妇金婚照

皇后见状急忙搀扶着天皇安慰说：“看你像个孩子！一条本来就埋在地下土里的虫子，踩死了也没什么，不值得如此动情的。”

裕仁狠狠地看了皇后一眼：“虫子，也是有生命的动物啊！”

裕仁说完神态木然地继续向前走着，半天没说话。突然，他站住了，双手狠狠地捂着脸：“朕愧对于国、愧对于民哪！好端端的广岛变成一片废墟！十多人死于一旦呀！在中途岛，为国捐躯的有数万人！菲律宾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官兵死伤……在本土几乎所有城市都遭到轮番轰炸……愧对于国，愧对于民……朕推卸不了战争罪责呀！朕应该受到惩罚呀！”

皇后：“皇上，为了挽救国家、挽救大和民族、挽救日本国民，请下诏接受三国最后通牒吧！”

裕仁又抬头看了皇后一眼：“可是军部那些死硬派手中还握有上百万军队！”他说着无可奈何地跺脚。“他们急眼了，后果……”

这时，侍从长藤田老远走了过来：“陛下，东乡有要事求见。”

裕仁看了藤田一眼：“叫他稍候一下，朕马上去。”说着转身朝御文库走去。

东乡在御文库着急地踱来踱去，见天皇来了，马上凑上去，一躬腰说道：“启奏皇上，臣有要事呈奏。”

“那就快说吧。”

东乡：“外务省刚刚收到佐藤大使电报，莫洛托夫午夜召见他，向他宣

读了苏联政府声明，从8月9日凌晨起苏联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天皇一听，脸色立时沉了下来，身子朝后一仰，东乡手疾眼快赶紧上前扶住天皇，将天皇扶到椅子上坐下来。这时内大臣木户快步走进室内，对刚刚坐下的天皇说：“陛下，刚接到关东军总部电报，苏军从零点起，分三路突进到满洲境内，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已突进100~200公里！”

裕仁：“这样……这样的话，苏联已对我宣战，苏日交战已经开始。目前急需研究收拾战局之策，你赶紧与首相充分恳谈，拿出可行的应急办法来。”

木户当即奏答：“臣已与首相约定，马上晤面，即刻就与之磋商。”

裕仁：“好吧，那就快去吧。”

8

8月9日清晨，中国山城重庆。

大街上许多报童喊着：“号外，号外，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在东北重创日本关东军……”紧接着，一些商铺和市民点燃了鞭炮……

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宋美龄站在收音机前，两人正在收听关于苏联出兵东北的广播新闻。

蒋介石：“刚刚打败希特勒的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日本就会招架不住，很快会投降的。可是，中苏友好协议还没有正式签字。万一斯大林不讲信义赖在东北不走……也令人担忧。”

宋美龄：“不会吧？中国和苏联都是同盟国。总得于情于理过得去，还能明目张胆地取日本而代之？那不也成了侵略者了吗？”

蒋介石：“据可靠情报，允许外蒙独立，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达成了默契！”

宋美龄：“丘吉尔那老滑头不好说。而罗斯福总统，决不会做出卖中国的事情。”

蒋介石叹了口气：“斯大林这个人的胃口是很大的。子文同他几次交涉外蒙问题，他一口咬定外蒙非独立不可，态度非常强硬，甚至威胁不同意外蒙独立，就不出兵远东。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他们沉不住气了，怕美国独占日本，才不得不提前出兵。谁知道老毛子打败关东军后会提出什么要求？”

宋美龄：“不管怎样，苏联对日宣战总是得人心的好事。应该给斯大林

发电报以示祝贺。”

蒋介石：“好，应该写个东西，马上发出去！”

宋美龄立即叫来侍卫官，让他去请陈布雷先生。

不一会儿，穿着黑色长袍的陈布雷走了进来。

蒋介石：“布雷，叫你来，是要马上起草一封电报。”

陈布雷：“是不是苏联对日宣战问题。”

蒋介石：“要给斯大林发一个电报，你马上起草，要多说几句奉承话，越快越好。”

9

8月9日清晨，中国延安枣园。毛泽东披着衣服从窑门里走出来，在院内慢慢地散步。

这时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拿着一份报纸走进院来：“主席，今早新华社从广播中收听到的重要消息，苏联于今日凌晨对日宣战，苏军已分三路越过国境，挺进我国东北。”说着把一份号外快报递给了毛泽东。“这是《解放日报》发的号外。”

毛泽东接过报纸：“好家伙，80个师，5500辆坦克，3000架战机，在5000公里战线上攻向日本关东军，真乃排山倒海、迅雷不及掩耳啊！”



毛泽东与朱德策划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这时朱德总司令笑呵呵地走进院里：“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令人鼓舞啊！这下小日本鬼子快完蛋了！”

毛泽东：“朱老总，我们是不是立即给斯大林同志发一个电报，以示祝贺？”

朱德：“我看可以，应该赶快表个态。”

叶剑英：“估计蒋介石肯定要发电报。我们应赶在他前边发出去。”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一齐进了窑洞。

毛泽东坐在桌前，拿出笔来，略加思索，便刷刷很快写完了电报稿。朱德和叶剑英在旁边看着。朱德操着四川口音念道：

斯大林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苏联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德

1945年8月9日

毛泽东：“请剑英安排以加急电稿发出，越快越好！”

叶剑英拿着电报稿，快步走了出去。

朱德：“我看还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对日寇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毛泽东：“要的，要的，要利用苏军参战的大好时机，对日寇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我们的解放区。这个声明，还是以我们两人名义发表为好。”

朱德：“可以，可以，也要赶快发出。”

毛泽东：“我马上起草，题目就叫‘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朱德：“这个声明应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发出才好。”

毛泽东：“好的好的，务必明天见报。”

10

8月9日早6时，大连机场。天下着大雨，一架日本军用运输机和两架小型战斗机停在机场一侧。

两辆黑色轿车从雨中驶进机场，停在飞机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从汽车上走了下来，旁若无人地急忙登上了飞机。几个随从高级将领和副官也相继登上飞机。

飞机起飞了，山田闭着眼睛正襟危坐，身体一动也不动。随从将领和副官一律规规矩矩呈立正姿势坐着，也都一动不动。机舱里的气氛非常沉闷。

飞机摇晃一下，开始徐徐下降。

飞行员：“报告山田司令官，飞机已到达新京上空。”

山田头不抬，眼不睁：“和机场联系一下，立即降落。”

飞行员连声向机场呼叫，好一会儿听不到回音。

山田严厉命令：“降下去！”

刚刚遭到轰炸的新京机场一片混乱，跑道上到处都是弹坑，爆炸的浓烟还没散去。日本第二航空司令原田宇一郎中将，正在机场紧张地指挥准备迎战苏军空袭。一些空军军官和飞行员在机场里神色匆匆地跑来跑去。

山田座机从云雾中钻了出来。机场指挥塔上的导航员：“报告原田长官，一架运输机没经允许正在降落！”

原田中将抬头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山田司令官回来了！快让开跑道……”

一些地勤人员一阵手忙脚乱，很快把跑道清理出来。

山田座机在伤痕累累的跑道上连连颠了一段距离，停住了。

山田从机舱里第一个走出来，原田中将和军官们纷纷敬礼。山田举起右手晃了一下，装出平静从容的样子，走出了机场。

山田的汽车在马路上疾驶。

只见路上日本军车发了疯似的横冲直撞。一群群日本侨民拖儿带女，一窝蜂地涌向车站和机场。

关东军司令部周围很多日军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楼顶上也架上了



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山田乙三

机枪。

下了汽车的山田，急匆匆走进二楼会议室。室内会议桌旁已坐满了日本高级军官。见山田进屋，军官们站起来，向山田敬礼。

气喘吁吁的山田坐下后，参谋长秦彦三郎立即汇报紧急军情：“今天清晨，苏联军分三路突然入侵满洲。其后贝加尔方面目前正向张家口方向进犯，其中一股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翻过了大兴安岭，进入了中满平原。另一路，远东第1方面

军也已穿过了原始森林，进犯绥芬河一带。远东第2方面军也已渡过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佳木斯进犯。各师团正在顽强抵抗之中。”

笔直而坐的与会人员一个个板着脸，两眼直视，只等山田指示。

山田：“对苏军突然袭击，不可惊慌，要沉着镇定，要用武士道精神勇敢面对。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本营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必胜信心。只要坚持战斗，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秦彦三郎：“我们在长白山一带修筑有坚固的工事，固若金汤。就是胆怯的军人也至少可守一年。”

山田：“参谋长所言极是。我们在通化、临江、沈阳等地储存了足够的物资，也可以用上一年。”

众军官一齐高喊：“誓死为天皇效忠！”

山田看了看第3方面军司令后宫大将，说：“根据当前形势，要改变一下战略部署。大本营新的部署是：44军107师和117师向新京后撤，由30军指挥，保卫新京。”

后宫大将：“现在部队后撤，可能会遭到敌人的追击。而且沿途会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

山田点了点头：“我也知道，这样对我们不利。但目前我欲与敌持久作战，只有集中兵力，待敌来攻，所以只有后撤。这样留下的部队就要面对敌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兵力。”

山田：“后宫大将，您应把力量放到沈阳方向，108师、136师和130师都由44军指挥，在沈阳的西北、西南占领防御阵地。”

后宫：“我马上就返回沈阳。进行部署。”

山田脸色阴沉地说：“这可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一定要顶住敌人。”他把戴着白手套的拳头，重重地向桌子上一砸。“首先是阻止敌人前进，然后消灭他们。”

这时，地位仅次于山田的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突然提出：“关于120万侨民的撤退问题，不知大本营有什么考虑？”

山田：“可以让他们向国内后撤。但是不能影响军队的行动。第一步可以先撤到通化。我已通告满洲国政府，叫大陆铁路司令部拨出10列火车。”

秦彦三郎：“侨民也应和军队一起，从事作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身成仁，无论如何不能留给敌人。”

这时，山田乙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下面我宣布大本营第1378号命令。”到会的日本高级军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全都立正。

山田大声宣读：

命令关东军：

一、大本营之企图，期望完成对美之主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之野心，重新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苏军，以捍卫国体，保全皇土。

二、关东军总司令官将主作战指向苏联，随时击破来攻之敌，保卫朝鲜。

散会后，秦彦三郎走到山田身边：“司令官回来之前，张景惠曾来司令部，我代表您接见了。”

山田乙三蜷缩在沙发上，疲乏地打着哈欠：“他有什么事？”

秦彦三郎：“他希望不要在新京打仗，让他把一个完整的长春交给蒋介石将功折罪！”

山田乙三像上了弹簧一般从沙发上蹦起，杀气腾腾地说：“八格牙路！还没打仗，他就想失败以后的事了。这老家伙实在可恨，格杀勿论！”

秦彦三郎细声细气地劝道：“我看斯大林胃口不小，我们不一定打得过。张景惠还说，我们若在中国当俘虏，他凭老关系可以运动蒋介石，对我们手

下留情。”

山田乙三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跌回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叹口气说：“这样也好，我们把关东军司令部迁出新京。”

秦彦三郎：“迁到哪里？”

山田乙三似乎早有考虑：“迁到通化。那里位置适中，可以控制全局。你去见张景惠，相机而动。”

七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

1

8月9日，上午8时。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

杜鲁门总统紧急召见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身穿褪了色的卡其布军装，头戴一顶旧军帽，手里拿着他那个玉米芯做的烟斗，来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

杜鲁门把这位风尘仆仆的将军迎到沙发上坐下，兴致勃勃地说：“日本这几天就要被迫无条件投降。盟军也即将在日本登陆。将军不仅要指挥盟军向日本本土进攻，而且要在占领日本后负起管理日本的责任。决定让您出任美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和盟军最高统帅，统管日本投降事宜，并作为驻日总督。”

麦克阿瑟歪着头听了总统的话，脸上流下两行热泪：“感谢总统对我的信任。我将全力完成国家的重托。”

杜鲁门：“我认为苏联这样提前紧急出兵远东，斯大林是想和我们一起占领日本。这一点您想过吗？”

麦克阿瑟胸有成竹地：“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有一个俄国兵踏上日本国土，我就立刻下令，把他们统统打出去。”

杜鲁门：“我们应该尽快地使日本投降，好让美国军队赶在苏联军队的前面进入日本。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已经下令继续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

麦克阿瑟：“我相信日本很快就会投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杜鲁门（左）与麦克阿瑟

情要做。”

杜鲁门：“您说的
是什么事情？”

麦克阿瑟显得有些
激动：“我这几天，常
常想起威恩莱特将军。
在日本投降之前，我们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说到这麦克阿瑟
眼圈红了，深情地说：

“1942年1月，我和
威恩莱特中将在菲律宾

巴丹岛克列几多要塞共同指挥作战。日军第7军把要塞围得水泄不通，我连连向罗斯福总统发电，请求紧急增援。每次回电都是援兵正在途中。最后没等着援兵，等来的是总统的一道命令，要我将指挥权交给副司令威恩莱特中将。那天夜晚，我丢下威恩莱特和5000名士兵，带着老婆和3岁的儿子乘鱼雷艇离开了巴丹岛。威恩莱特带着5000名士兵死守了许多天，最后全部成为日军的俘虏。在送往集中营途中，日本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日本人不给战俘任何食物和水，还肆意残杀战俘。许多士兵饿死、渴死、累死或被杀……威恩莱特总算活了下来。”

麦克阿瑟抽了一口玉米芯烟斗，面带懊悔的神色对杜鲁门总统说：“我一直心中有愧，对不起威恩莱特和一起浴血奋战的5000名手足士兵。在那个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们，哪怕成为日军的俘虏。”

杜鲁门：“我的将军，你不要太感情用事，这是战争。它不但关系到你一个人，关系到整个美国。当时罗斯福总统的决定是对的。我们需要你来指挥对日作战，在美军中没有一个人对亚洲的了解能够超过你。这是国家的需要。你不必为此不安。”

麦克阿瑟用哀求的口气说：“如果要向日本继续扔原子弹，一定要先搞清楚威恩莱特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要营救威恩莱特。”

杜鲁门：“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的情报十分准确。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内，绝对没有盟军俘虏。对威恩莱特被关什么地方，一旦得到情报，我会马上命

令营救他。”

2

8月9日午夜。天皇地下防空洞。

11点30分裕仁天皇来到会议室。臣下们起立向天皇鞠躬，军人们的配刀发起清脆刺耳的叮当声。天皇吃力地坐上御座，对铃木说：“请首相谈谈大家对《波茨坦公告》提出最后通牒的意见。”

铃木：“我们六人有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两种意见：我和外相、海相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即结束战争。陆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坚持决战到底。针锋相对、相持不下，讨论三个钟头，无法统一，诚惶诚恐。只好奉请陛下圣断。”

裕仁：“已经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请双方敞开思想详陈己见。”

东乡站起来对天皇鞠了一躬：“目前满洲战场在百万苏军攻击下，我关东军严重受挫，节节败退。本土已有两个城市遭受原子弹轰炸。死伤人数约有21万。由于盟军的轰炸，全国城市有300万间房屋倒塌，有2,000万人无家可归。我们不能再执迷不悟了。我的意见是，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唯一的条件是天皇的地位不能改变。”

米内：“我完全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

阿南声色俱厉地咆哮：“我坚决反对外相的意见！除同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决不同意投降。不投降，我们就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他的双颊流满了眼泪，声嘶力竭。“我们还有350万军队，10000架飞机，3300艘军舰，我们还有军力在日本本土最后决战。即使我们战败，我一亿国民也是为名誉而死，我们日本民族的事业也名垂青史。所以，我们应该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梅津站立起来大声喊叫：“完全同意陆

坚决反对投降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相意见！在千百万英勇将士为天皇捐躯，几十万国民遭受原子劫难的时候，在我们仍有足够的实力同敌人决战的时候，无条件投降是不可想象的，是我们的耻辱！”

铃木示意老资格的皇族平沼议长发言。

平沼：“请问梅津参谋总长，眼下敌机连日连夜地轰炸，已经投下两颗杀伤无比巨大的原子弹。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国陆海空三军正在向日本本土推进，刚刚战胜德国的上百万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创我关东军。梅总参谋长阁下是否还有防御之信心？”

梅津：“空袭并不可怕，扔原子弹也未必那么可怕。主要是我们防空效果不好。不管美苏有多少军队袭来，最后还是要在本土决战。只要全体军民奋勇保卫本土，我们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丰田：“我也同意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意见。目前，不但陆军战力不乏，海空军也还有一定的战力，前线的将兵还充满着特攻精神，固不能期其必胜，然未必失败。为什么要不战而降呢？”

丰田讲完后，铃木缓慢站起来说：“我们已经反复讨论了好几个钟头，依然没有结论。目前时局已相当严重，在这日本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仰请天皇陛下圣断。”

铃木说着离席，步履蹒跚地向天皇走去，走到天皇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内阁会议情况令人异常惶恐，我想请求陛下的指示。”

与会者的眼光一齐投向天皇。天皇此时脸色苍白，两腮有点红肿，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他冲铃木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左右。对铃木说：“您可以回到座位上去。”待铃木坐定后，他下意识地稍稍向前探了探身子，站了起来，语调平静地说：

“我赞成首相、外相和海相的意见。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至于说本土决战，连决战的师团的武装都不充分，飞机的增产也没能按计划进行，各项装备计划总是不能落实。这样能打得赢吗？”

这时有人伏在桌上哭泣起来。

“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忠的人，想到在遥远的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的生命

和家庭的臣民，我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 1895 年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以图将来国家之复兴。”天皇说到这里，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涌了出来……

天皇下达圣断时，正是 10 日凌晨 2 点 30 分。

这时与会者都相继站了起来，阿南和梅津已是泪流满面，铃木和东乡也是掩面而泣，满场是一片呜咽之声。

天皇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内大臣的搀扶下，缓慢地离开会议室。

天皇走后，会议室的呜咽一下子变成了满屋人号啕大哭。

铃木将内阁书记官长迫水叫到跟前，两个人把早已起草好的并经天皇过目的《日本请降照会》从头到尾斟酌一遍后，对大家说：“应该把天皇陛下圣断变成本次会议的一致决议。现在，我宣布下列议案：

日本天皇切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俾天下生灵得免于因战争之持续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之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处于中立地位之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俾对诸敌国得以恢复和平。不幸此等为促致和平之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之旨意，希望因战争而造成之不可言状的痛苦能尽速终结计，乃作出下列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以及后来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至高统治之特权的要求。”

铃木宣读接受无条件投降议案后，与会者依次签字。

阿南不情愿地签完字后，气势汹汹地对铃木说：“《照会》不提‘战败’，而提‘促进和平’；不提‘投降’，而提‘休战’。还可以接受。但如果不确定保全皇室，陆军将继续进行战争。”

3

8月10日上午7时30分，华盛顿，白宫。

美国总统杜鲁门主持高级会议。讨论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等。

史汀生：“日本提出保留天皇制，是切合实际的，可以理解。天皇制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根本国体，为了尊重全日本国民的历史习惯和国家感情，应该满足日本的这个要求。再者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日军投降，盟国需要裕仁的帮助，类似这样来利用天皇，省得我们在中国全境和新荷兰群岛碰上几十个硫磺岛和冲绳岛，作无谓的牺牲。”

贝尔纳斯：“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盟国，而不是战败国日本。既然是无条件投降，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条件。为了保持盟国的绝对尊严，应严格按照宣布的最后通牒条款执行。”

福莱斯特：“我们可以在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这种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杜鲁门：“《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就是要求日本承认战败，放下武器，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向盟国投降就达到了公告的意图和目的了。如果天皇能保证盟国《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投降条款的实现，可以同意日本保留天皇制。但是，保留天皇制并不等于保留天皇裕仁。裕仁是否还当天皇，那就看他是否犯有策划战争的罪责了。”

贝尔纳斯：“同意总统的意见。国务院是否可以起草对日本答复的电文？”

杜鲁门：“那就请国务卿起草一个可以表达这个意图的复文，征求英、苏、中三国的意见。”

4

8月10日中午12时2分。东京，铃木首相办公室，全体内阁成员正在一起收听旧金山电台广播盟国对日本电报答复：

我们收到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电报。电报提出了公告应不适合任何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权要求。对

此，我们的立场是：

从投降之日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该司令将采取他认为贯彻投降条款应有之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需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为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迅速登上盟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公告》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愿望建立。

盟国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波茨坦公告》中所指的目标实现为止。

铃木用眼睛扫了一圈，看了看每个阁员：“现在大家讨论是否可以接受盟国复文中的条件？”

东乡稍加思索：“难得的是盟国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关于保留天皇的要求。尽管申明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力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但原则上并没有损害天皇的地位。还允许日本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能保住皇室，保住了皇权，一切希望就没有破灭。”

梅津和丰田同时打断东乡的发言：“最主要的是天皇的命运如何非常含混，没有明确。因此，不能接受。”

东乡：“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盟国的答复，不可能设想占压倒多数的忠诚的臣民不想维护我国的传统制度。另外，如果要求修改关于天皇的措词，还有可能引起盟国敌对天皇制的人要求废除皇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海内：“外相的意见很有道理，我看还是表示接受为好。”

阿南：“不保证天皇的绝对统治权，就坚决不能接受。就要决战到底！”

这时，老资格的皇族平沼一改往日主张接受公告的态度：“天皇是日本全体国民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得不到确实保证，就决不接受！”

内务相和法务相也相继表态赞成阿南和平沼的意见。

这样，反对接受投降的意见占了多数。

一直保持沉默的铃木只好表态：“如果盟国强迫我们解除武器，又不明确保留天皇的统治权，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战争。”

东乡没想到一直主张结束战争的首相突然改变了主意，甚为吃惊。他央求铃木：“既然盟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达，我们最好等收到正式答复再行讨论吧？”

铃木站起来：“还得天皇作最后决定。”说完便快步走出会议室。

东乡紧紧跟随并大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提出解除武装问题？难道首相不知道天皇要结束战争吗？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有关皇室的存亡吗？如果你坚持这种态度，我可要单独上奏天皇！”

5

8月10日晚9时30分，东京，内大臣府。

木户正在同来访的铃木首相谈话。

木户：“今天内阁会议后，东乡外相丧失了信心，向我表示了将辞职的意向。他特别对首相在结束战争问题上总是左右摇摆，出尔反尔，颇有想法。”

铃木：“其实我内心里完全赞成外相的意见。天皇也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握有陆军大权的阿南、梅津、丰田等主战派，从盟军的答复中找到了继续战争的充分借口，更加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令我十分担心这些人会做出极端的举动来。再说，原来支持东乡主张结束战争的平沼君，也因保留天皇地位问题，改变了态度。为此，他在内阁会议前特意屈尊到寓邸陈述。恳请我勇敢站出来护卫国体。我想我个人意见左右不了局势，最终还得天皇圣断。因此，在内阁会议上就……”

木户：“我不想贬低那些渴望护卫国体的论点。经过仔细研究后，外相向我保证，对盟国照会中有争论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假如在目前阶段我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千千万万无辜日本人民就会死于轰炸和饥饿。你对陆军方面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实现和平，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四五人被暗害，但这也是值得的。咱们还是毫不动摇地执行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政策吧！”

铃木：“天皇究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态度是否也有所改变？”

木户：“收听盟国照会后，天皇对我表示，这一条无关紧要。如果国民

不要天皇，你说要也没用，我认为让国民来处理这件事完全正确。其实天皇内心已经接受盟国的条件了。”

铃木高兴地说：“既然天皇有此圣意，咱们干吧！”

6

8月12日午夜。梅津元帅官邸。梅津独自一人在起居室心事重重地把手放在背后，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来回迅速地走着，不时望着前面，边沉思边摇头。

门轻轻地开了。元帅夫人慢慢地走到梅津跟前，仰着脸深情地说：“元帅，夜深了，总该歇息了吧！”

梅津回转身，用手拉住妻子：“广岛、长崎太惨了！两座美丽的城市成了一座废墟，20多万生命一瞬间遭到毁灭……战争……太残酷了！”

妻子：“天皇不是接受盟国条件了吗？那就听从皇命快点停战吧！”

梅津：“事到如今，就是日本接受停战，盟国也不会轻饶天皇和我们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停战就意味着束手就擒，逃脱不了战争责任，肯定受到审判，走上绞刑架。日本国民也要遭受战胜国奴役。所以，还不如孤注一掷，铤而走险，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梅津两手掩面：“国家和民族落得这等悲惨下场，我们这些人，在劫难逃啊！”

妻子：“局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听天由命吧！”

这时，侍从副官通报：“陆相秘书林大佐求见。”

梅津：“说客，不见！”

妻子：“林大佐是世交，既然来了，还是接见为好！”

梅津一时没言语，妻子示意侍从副官：“快请大佐进来说话。”

身着戎装的林大佐一进门立即向梅津立



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元帅梅津美治郎。

正敬礼：“卑职深夜求见元帅，请原谅！”

梅津示意坐下：“陆相派你来的？”

林大佐站起来再一次鞠躬：“卑职已经入睡，被陆相叫醒，只好遵命前来求见。”

梅津：“让你充当说客吧？”

林大佐：“正是。陆相认为您是他的坚定同盟者。他建议由元帅出面请畑俊六陆军元帅代表陆军高级军官向天皇说情。”

梅津在地板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对他说：“我的好友，您必须原谅我，我现在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

林大佐一时茫然若失：“元帅！这下陆相……他完了……”

梅津双手掩面猛然坐到沙发上：“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们都是同命相连，都……完了。”

7

8月13日上午8时，东京。铃木召开内阁会议继续讨论如何对待盟国的答复。

梅津：“上午8时天皇召见我和丰田总长，天皇担心主和派和主战派会出什么事情，希望我们作出决定前尽可能少流血。天皇问我：‘在和谈期间将采取什么空中行动？’我回答说：‘人若犯我，我再犯人’。天皇点头赞许。”

丰田：“我看天皇圣意已决，就是要结束战争。内阁会议应该统一思想，说服天皇改变主意，下决心血战到底！”

东乡：“贝尔纳斯的答复毫无疑问是代表几个盟国所提条件的最低标准。如果我们想重建日本，为人类的福利打算，我们就必须接受现在这个答复。”

梅津：“答复中说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盟国最高司令部，意思很明显，天皇已经失去国家统治权。”

阿南：“按答复的语义，实际上是说盟军最高司令具有统治国家的权力。我们接受了这个条款，就等于我们承认盟军最高司令是天皇之上的太上皇。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铃木大怒：“军方这样在语义上诡辩，是不是想故意用挑剔贝尔纳斯答复的办法来推翻大家为结束战争所作的努力？为什么不能按大家的理解去解

释它呢？”

铃木点名内务相和法务相发言。他们都支持陆相意见。

最后，内阁六成员中还是阿南、梅津和丰田三人反对投降。支持他们的还有内务相和法务相。

铃木：“我已下了决心，根据天皇的愿望在这个危急时刻结束战争。我开始研究盟国的答复时，觉得好像有几点不能接受。但仔细推敲，发现美国给我们提出这些条件并无恶意。他们并不想改变天皇的地位。我认为必须按天皇的意愿结束战争。所以我会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全部情况如实上奏，请天皇圣断。”

8

8月13日下午3时，美国，华盛顿，白宫旁高尔夫球场。美国总统杜鲁门同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打高尔夫球。

杜鲁门总统身穿紧身衣和马裤，双手握杆用力一挥，乳白色的高尔夫球在球场上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落到了几十米外离洞穴很近的草坪上。

贝尔纳斯见状摇了摇头。

这时，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走到总统跟前，凑趣地说：“总统阁下，您应该参加泛美高尔夫球大赛。在您的杆下，那只滚动的小球就像一只听话的小鸟。”说着他看了看即将输掉一局的贝尔纳斯：“很可惜，尊敬的国务卿先生，那只小球到了您手里，它就变成了一只顽皮的老鼠。”

三人欢声大笑。

杜鲁门再次挥杆，从容地将小球击进洞穴。然后缓步走到阳伞下，坐在一把藤椅上，呷了一口饮料：“哈里，你到这里来，不会是为了看我们打球吧？”

霍普金斯：“是的，总统阁下，我是来向您报告一个消息，威恩莱特将军有下落了。据中共在满洲的游击队提供的可靠情报，他现在被关押在中国满洲沈阳北部四平的一个监狱里，健康状况良好。”

杜鲁门：“太好了！威恩莱特将军及其部队当年被围困在巴丹。他率领美军坚持了三个月，最后弹尽粮绝才不得不向日军投降的。他是被敌国生俘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总统沉吟了片刻说：“哈里，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你向麦克阿瑟、尼米兹两位将军交代一下，一定要把威恩莱特将军营救出来。

总之，到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天，我不希望他还待在战败国的战俘营里。”

贝尔纳斯：“总统顾问会有很好的办法办成这件事的。相信我们很快会见到威恩莱特将军。”

杜鲁门：“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进攻情况如何？”

霍普金斯：“非常惊人的顺利。苏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各路苏军每天都能推进 80 公里到 100 公里。我想，按这个进军速度，他们很快就会占领整个满洲和千岛群岛。”

杜鲁门：“你告诉麦克阿瑟将军，美国军队应该抢先占领旅顺口、大连、烟台等海港城市。决不能让苏联人在太平洋找到不冻港。”

霍普金斯：“根据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进军速度，恐怕美军占领上述海港不太容易。现在麦克阿瑟将军正在准备在日本登陆。不准苏军抢占日本领土。”

杜鲁门：“日本方面还在犹豫什么？他们一定不清楚我们的难处。那个天皇制完全可以保留，只是我们不能公开这样宣布。因为是无条件投降，你与日本特使会晤时应努力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使战后的远东成为共产主义的天下，那将是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

霍普金斯：“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势力正在借机扩大。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杜鲁门：“对于中共军队为我们提供的消息我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在中国再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战后世界的平衡和均势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一个强大的苏联，再加上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那将多么可怕啊！”

霍普金斯：“总统阁下，蒋介石的军队是强大的。通过给他有力的援助，他们应该能够控制国家的局势。遗憾的是，蒋的政府和军队太腐败了，给他们的军援几乎都装进了个人腰包。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垮掉的。”

杜鲁门：“哎，对那个蒋委员长，我实在没敢抱太大希望。可眼下的中国，他还能维持局面。不然的话，罗斯福总统就会抛掉他了。”

贝尔纳斯：“哈里，你不想也来击几杆吗？也许，你能把顽皮的老鼠变成听话的小鸟的。”

霍普金斯笑了笑：“很抱歉，打扰了你们的雅兴。我告辞了。”说完离开了球场。

杜鲁门：“贝尔纳斯先生，你知道日本政府正在干什么吗？他们会无条

件投降吗？”

贝尔纳斯认真地回答：“我想会的，最近就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因为这是他们当前唯一的选择。”

杜鲁门：“会的。莫非等到俄国人把他们残剩的一点军队都消灭了，他们才肯投降吗？”

贝尔纳斯：“日本军界首脑们大都是极端好战分子。他们不惜杀身捐躯以效忠天皇。据可靠消息，军方正酝酿一场兵变，要杀掉投降派，逼迫天皇与盟军血战到底……”

杜鲁门：“如果那样，高兴的是俄国人。战后的日本应该是自由世界的战车，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你明白吗？”

贝尔纳斯：“在日本，天皇的威严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天皇颁布投降诏书，陆军那些极端分子是成不了气候的。”

杜鲁门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我希望这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9

8月14日上午8时，一架美国B-29飞机飞临东京上空。抵达市中心时，吐出一长串投掷物。接着这些投掷物一个接一个爆裂开来，天空中顿时飘满了雪花般的传单，街上的行人纷纷拣起传单传看着。

木户在皇宮院内拣了一份传单，草草看了后，拿着走进御文室面见天皇。天皇看了一眼传单，示意木户宣读：

“今天，美国飞机并不是向你们扔炸弹，投下的是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提出投降，而每个日本人都拥有权知道条件内容以及美国政府代表英国、中国和俄国对它所作的答复。你们的政府现在有了立刻结束战争的时机。”

木户：“传单下边摘引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和贝尔纳斯的答复。”

天皇听后，一时没有表态，在屋内来回踱步。

木户：“陛下，卑职担心这些传单落到对和谈一无所知的各部队手中，

可能会引起叛乱。”

天皇：“请铃木首相赶快进来说话。”

铃木正在前厅等候，木户引着他走进御文室。

天皇将传单交给铃木。铃木说：“卑职已经看到了。如今市面上流言四起，人心大乱。再者，军界少壮派军官反谈判情绪甚高，已有迹象表明兵变随时都可能发生。如再起内乱，手足相残，局势将越发不可收拾。”

天皇：“首相的意见如何。”

铃木：“要请两个参谋总长签章，不会很顺利，会耽搁时间。可否请陛下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用自己的最高权力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天皇：“也只好这样了。”然后吩咐木户：“上午 10 时 30 分召开紧急御前会议，通知所有内阁成员和三军首脑务必参加。”

10

8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15 分。东京，天皇寓所地下防空洞会议室。

内阁成员和三军首脑陆续走进会议室。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多，室内桌子全被撤掉，换上长长两排椅子。与会者不安地并排坐在椅子上等待着。

10 时 30 分。天皇身着军装，戴白手套，在侍从武官长陪同下，步入会议室。全体与会者起立、敬礼。

天皇落座后，铃木开始上奏内阁会议情况。

铃木：“近两天召开数次内阁会议，但三位军方成员——梅津元帅、阿南陆相、丰田总长坚决反对接受贝尔纳斯照会，未能达成一致决定。现在，请三位直接向陛下陈述。”

天皇示意梅津发言。

梅津站起来向天皇敬礼：“陛下，我以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元帅身份，最后请求您答应继续进行战争。如果投降就意味着国体的结束。那么，全体国民就应该在最后决战中为国牺牲！”

丰田：“我赞成梅津元帅的意见。”

阿南站起来，情绪非常激动地说：“只有盟国答复保证天皇的地位和安全，才可以结束战争。切不可幻想用一时的屈辱来换取尊严国体的维护。我们尚未进行决战即行投降，这样的奇耻大辱在世界战史上没有先例。请想想，

自从开战以来，我大军拓疆略地，连战皆捷。而今 600 万精锐大军犹在，我们在决战中打胜的机会还是有的。继续打下去，至少也能在更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望陛下最后能给我们三个最忠于陛下的陆军统帅带领 300 多万官兵誓死为天皇、为大和民族效忠的机会。”阿南说着已泣不成声。

阿南落座后，天皇还在等待发言者，全场却没有一个与会者再站起来。全场气氛十分沉闷。

最后，天皇向大家点了点头：“如果再没有意见，我谈谈我的想法。朕希望大家都能同意我的最后结论。”

天皇说着深情地朝梅津、阿南、丰田三人望了望：“反对日本接受盟国目前答复的论点，这几天我仔细地听过了，也反复认真地想过了。但我的想法还是没有改变。我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局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再也无法继续进行战争了。”天皇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受天皇感染，一些与会者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天皇：“对盟国的答复，我同首相和外相反复研究了多次。得出结论认为它实际上承认我几天前发出的照会。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相信该照会的目的是要毁损国体。我完全清楚，要我忠勇海陆两军将士把武器交给敌人，眼看着国家被占领，自己还可能被指控为战犯，是多么不好受。”他声音哽咽，停了停，“多少将士阵亡，他们的家庭在受苦受难。广岛、长崎



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无条件投降

两个城市被炸成平地，几十万国民死于非命，我对此何等悲伤难过。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不能再让臣民受苦受害了。我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国民。如果继续战争，国家将成焦土，还要有千百万军民牺牲。我无法忍受。但是，无法忍受，也得忍受。”说着面对阿南：“阿南，我明白你特别不好受，但你得忍受。”阿南站起来含泪向天皇鞠躬。“当然，对于盟国的做法，我们还难以完全置信。但较之日本完全毁灭还略胜一筹。只要留下一点种子，今后就还有复兴的希望……”

这时有两个大臣控制不住自己，昏倒在地板上。木户招呼侍卫赶紧将他们扶起来，抬到会议室外。

天皇：“我希望你们全体，我的政府大臣，我的三军首脑，立刻同意接受盟国的答复。国民对局势一无所知，对我的决定势必感到突然。我准备全力以赴。如果对国民有利，我准备发表广播演说，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劝说陆海两军将士放下武器。我希望内阁立刻起草诏书，结束战争。”

与会者在悲痛中彼此紧紧靠在一起。铃木首相困难地站起来，走到天皇面前鞠躬行礼。天皇从座位上吃力地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地由侍从武官长扶着走出会议室。

11

8月14日下午6时，美国，华盛顿，白宫。杜鲁门总统正在听国务卿贝尔纳斯宣读驻华盛顿瑞士公使馆代办哈里逊先生传来的自东京发来的密码电报：

日本政府8月14日致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照会：

（一）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需的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的统辖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并发出盟军最高统帅为执行上述条件所必需的其他命令。

杜鲁门：“这场战争总算胜利结束了。请国务卿马上用电话通知驻英国大使贝文、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派到中国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并安排在华盛顿时间7点钟，四国首脑同时宣布这个消息。”

8月14日晚7时，美国，华盛顿，白宫。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总统夫人和大部分内阁成员在座。前国务卿科德文·赫尔也来参加宣布日本投降的盛会。

杜鲁门站在办公桌后面，宣读关于日本投降的声明：



为胜利而欢呼的杜鲁门的妻子和女儿

我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8月11日所发照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

为尽快举行投降书的正式签字仪式，我们也正在进行各种部署。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英、俄、中三国将派高级将领参加。

同时，盟国已下令盟国武装部队停止进攻。

战胜日本的胜利日要等到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宣布……

新闻记者们欢欣鼓舞地跑出总统办公室，向各自的报纸发消息。

杜鲁门总统和夫人走到白宫北面草坪上的喷水池旁。

人群聚集在大门外，当杜鲁门总统用丘吉尔的手势作了一个“V”字符号时，广场上立刻响起了无比巨大的欢呼声。

接着，杜鲁门总统走到走廊，用装置在那里的扩音器讲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

我们已赢得了战争。我希望德国和日本的人民能够在占领下复

兴起来。正像我在柏林所声明的，美国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各国的和平与幸福，过去是我们的战斗目标，今后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没有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取得过这样完整的胜利。也没一个国家具有像美国这样的军事力量，曾经对敌人这样宽大，对朋友这样有帮助。也许我们能够把基督的“要人们互相友爱”的教义变成现实。

12

8月14日午夜1时30分，陆相阿南的官邸。

阿南在起居书桌上写遗嘱。桌子旁铺好一床席子，挂着蚊帐。写好后，正在叠遗嘱时，其小舅子竹下进了屋。

阿南用谴责的口吻：“你来干什么？”

竹下：“我不放心，来看看你。”

阿南让竹下坐下来，拿来了一瓶酒，两人一边喝一边说些漫无边际的话。末了阿南随便地说：“我想今天晚上自杀。”

竹下望了望阿南：“你自杀也许是合适的。但不一定在今天晚上。你说呢？”

阿南如释重负：“我原以为你会劝我别这样干的。你同意了，我很高兴。”说着他把遗嘱给竹下看。遗嘱日期是8月14日。

阿南：“14日是家父逝世的纪念日子，21日是儿子阵亡的日子。究竟选哪一天，我思想上有斗争，21日太晚了。明天天皇要广播，我听了会受不了。”

竹下：“你喝了这么多酒，能够行切腹仪式吗？”

阿南：“我属剑道五段，我不会失败的。酒能让我的血流得更痛快，那就一定能死成。万一不行，还得请您帮助。”说着他脱掉衣服，用一条白棉布围住腹部。

这时井田中佐到来。阿南：“进来，



自杀前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我正在作死的准备，井田你同意吗？”

井田：“我想这样很好。陆相的榜样将消除陆军内的混乱。”说着他低下了头，“我很快会陪你走的。”

阿南伸过手去给了井田几个嘴巴：“我死就够了，你决不能死！”说完便长时间抱着井田大哭。接着阿南贴耳对井田说：“日本的前途靠你，你懂吗？”

井田：“懂，长官，我懂。”

阿南：“咱们喝点告别酒吧。”

三人正喝在兴头上，身上披着阿南将军服的林大佐走了进来：“将军，陆军省里有急事，请你马上去，咱们这就走。”

阿南一听很恼火，转身对林大佐说：“你吵吵嚷嚷什么！滚出去！”林大佐见势头不对，赶紧退了出去。

三人又饮了一会儿，阿南拿出两卷条幅给井田看。其中一幅签有“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字样。另一幅是首《和歌》。

这时竹下提醒说：“将军，天快亮了。”

阿南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我现在就走，永别了。”

井田向阿南鞠躬退出后，阿南再次请求竹下：“万一未能杀死自己，请赐给仁慈的一击。”

阿南叫竹下守在庭院门口，不准任何人入内。他特意换上天皇赐给他的衬衣，然后把床上的席子拉到走廊上，把遗言和在前一年阵亡的儿子的遗像摆好，面对皇宫方向，盘腿坐下。对晨光熹微的天空凝望了片刻后，用力把匕首深深插入腹部，一刀向左，一刀向上割了两刀。他端坐在那里，血流到地板上，把身旁的两卷条幅都浸透了。这时，他听见有人走近，大声问：“谁呀？”

进来的是他的秘书林大佐，见阿南已切腹，赶紧退出去。

竹下喊住林大佐：“去告诉我姐姐吧！”

竹下见阿南的身子稍向前倾，右手拿着匕首，血还一滴一滴往下流，左手在摸静脉管。便说：“要我帮助吗？”

阿南：“没有必要，你走吧！”

竹下刚欲退出，听见阿南的呻吟，又转回身：“很痛吗？”

阿南已失去知觉，没有回答。

竹下拿起匕首，朝阿南的颈背扎下去，然后把佩满勋章的外衣披在了阿南身上。

八 伪“满洲帝国”灭亡

1

1945年8月8日晚11时，长春，伪皇宫同德殿。伪满皇帝溥仪刚由人侍候着吃完晚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笛。

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瞻，连忙跑回自己屋里打上裹腿，随同溥仪去同德殿院子里的地下防空室，正遇到李贵人（玉琴）由楼上下来。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三个人一同走出同德殿，直奔防空地下室。这是近几天日本人给溥仪在皇宫里建的御用地下室，非常结实，上面铺着3米厚的钢骨水泥，地上还堆起了两座小土山，即使炸弹直接落到上面，里面的人也可很安全。

溥仪他们刚到防空地下室门口，就看到南边较远的地方闪起了一片火光，接着传来了不太响的爆炸声，又听到头顶上有螺旋桨声。溥仪早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打战。走到地下台阶，身体几乎瘫倒下来。坐下后好半天喘着粗气。一直到防空警报解除，没说一句话。



身穿元帅服登基的伪满皇帝溥仪

2

1945年8月9日下午3时，长春，伪皇宫同德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见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东军高级参谋、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在座。

山田乙三：“陛下，向你报告一件重大军情。苏联已于昨日向日本宣战了，但我90万关东军对此早有十足准备，已在满洲大地布下天罗地网，必将前来进犯的苏军或一网打尽，或驱逐回苏联境内，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溥仪：“吾国土将面临战争局面，还请阁下之关东军能保护我帝国政府和吾皇亲国戚之安全。”

秦彦三郎：“请陛下放心，天皇早有命令，要我们保护陛下的安全，并且要护送陛下去日本本土。”

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头：“感谢天皇保佑。”

山田乙三：“天皇决定关东军退守南满，满洲国都要迁到通化。以奉天、吉林、延吉这一道线为抵抗线。皇军早就在那里修了无数地下工事。山连山、山套山，堪称地下长城，固若金汤。一旦美军在日本登陆，天皇也要来通化呢。务请陛下于今天动身。”

溥仪：“司令官阁下，事情来得太突然，太紧迫，今天迁都绝对不行。皇室文件、物品极多，不能说搬就搬。希望能至少给我三天时间做准备。”

山田乙三看了秦彦三郎一眼：“那好吧，你们马上做准备。11日晚9点以前务必动身。”

山田同秦彦退出后，吉冈安直恶狠狠地对溥仪说：“陛下如果不快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杀害！”

溥仪战战兢兢地说：“朕听从山田司令官的安排。”

3

8月10日上午9时，长春，伪皇宫同德殿。

溥仪从昨晚就开始收拾金银细软，清理文件。他亲自监督将珍贵的文物装箱，共有57只大木箱备用。他销毁了部分文件和14年来所写的一些日记，以及在不同场合拍摄的家庭录像。电影胶片和日记燃烧起来非常缓慢，到中



溥仪与皇后婉容

午时，只处理了三分之一。

溥仪在气急败坏地收拾东西的同时，嘴上叨咕着最担心的事。他对周围的人说：“我最害怕的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日本关东军。担心日本人倒台之前会将我杀人灭口。”

侄子安慰他说：“你跟日本人相处了14年，给他们干了不少事。他们不会轻易对你下手。不是说天皇还让你到日本去吗？”

溥仪只是若有所思地摇头不已。

溥仪有一个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小心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这使溥仪大为烦恼。

侄子安慰他说：“只不过是红药水，不是真的血。”

溥仪忧心忡忡地说：“这些年一直把神课当成自己同菩萨和祖宗之间沟通灵感的工具，恰恰在这时候被染红了一片！怎能不使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呢？”

此时，溥仪的随侍中只有皇室卫队长李国维和随侍严桐江两人，指挥着收拾东西。整个皇宫里一片狼藉，混乱得很，不能带走的东西满地都是，最后57个大箱子全装得满满的，堆在房间里。整整忙活了一整天和一晚上，直到深夜总算收拾完毕。伪皇宫内的车队已经没有司机了。运送行李的卡车和装卸工都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当夜将东西装上车送往长春火车站。

4

8月11日下午5时，溥仪及其家人、侍从一行，随身带着简单行装，没有汽车送行，只好步行前往火车站。

走进车站一看，简直是逃难的收容所。一家子一家子的日本人，在站台上横躺竖卧，都是老弱妇孺，不知要逃往何地。

由那位日本御用挂、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引导，溥仪一行穿过人群，上了最后一节日本人为溥仪一家人准备的御用车厢。

这位被日本人扶植起来、在皇宫里待了 14 年的傀儡皇帝，就这样逃出了他的老巢。

8 月 14 日下午 2 时，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到达终点站——临江县大栗子。

临江县紧挨着鸭绿江，对岸就是朝鲜。大栗子这个小镇离县城二三十里地，也是紧挨着江边。大栗子有个铁矿，铁矿公司里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大多是日本人，都带着家属，这就形成了一个日本人的小镇子。由车站往北三里多路，是一块群山合抱的小平原，排列着一幢幢住宅，这是大栗子铁矿公司所在地。最北边一幢日式平房是铁矿经理的住宅，房主不知何处去了，这里就安排成了溥仪的临时“行宫”，其余皇室的随行官员都住进宿舍。

溥仪同皇后、贵人们都在屋子里不出来，多半是睡觉。官员和随侍们，有人吸鸦片，有的打麻将消磨时间。毓瞻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也办了一些生活上的事，如买副食，领一些面粉和油等，让家属们做油炸食物，准备充当干粮。

5

8 月 15 日下午 2 时，吉冈安直垂头丧气地来到溥仪房间，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颁发了《停战诏书》，宣布了日本投降。

溥仪一听，脸色大变，立即跪地向东边磕头。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他知道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他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杀他灭口，因此磕头祷告起来。

8 月 15 日晚 8 时，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陪同下来到溥仪的房间。

山田向溥仪敬礼：“报告陛下，昨日天皇陛下颁发了《停战诏书》，宣布了日本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予保证。”

溥仪立即双膝跪下磕头：“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山田、吉冈

也随溥仪跪下磕了一阵头。

这时，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大臣走了进来。

山田乙三：“陛下，奉天皇圣旨，大满洲帝国皇帝从此退位。”说完示意张景惠将早已拟好的《退位诏书》交给溥仪。

张景惠垂头丧气地对溥仪说：“事到如今，满洲帝国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宣布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

溥仪像个木偶似的打开《退位诏书》照着念：“奉天承运，朕自登基以来，提携友邦，国运隆盛，日臻隆治……”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

溥仪念完《退位诏书》，眼含热泪弯下腰对大家说：“本人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大义，现在退位。希望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有幸长生在世，还能有再见的机会吧。”

山田说：“天皇已传旨，将陛下护送到日本去。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

张景惠：“陛下，臣已从政府剩余经费中拨出三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陛下在日本的生活费用。”

山田：“不过，在现在的形势下，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以后，要听苏军的了。”

溥仪：“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家属、亲属都要同天皇和你们这些日本朋友在一起。”

山田等态度冷漠地退了出去。

从前御前会议结束时，总理张景惠率领各伪大臣起立，向溥仪敬礼，溥仪起身退回便殿。这次就不同以往了。溥仪读完《退位诏书》，不再是皇帝了，张景惠以下官员们免去了敬礼。但溥仪没有立即退走，他知道张景惠这帮人要回长春，便走过来含泪同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6

8月16日下午2时，吉冈安直来见溥仪。他通知溥仪：“天皇决定陛下马上去日本，已准备好了飞机，明早起飞。”

接着又告诉溥仪，要从大栗子沟先到通化坐飞机。通化的机场小，飞机也小，一架飞机最多载10个人，一家人得分乘两架飞机走。

溥仪一听早已六神无主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吉冈说完立即走了。

溥仪稍镇静下来后，立即找来弟弟溥杰、妹妹、妹夫商量，一家人如何分批乘机。商量结果是，随溥仪乘一架飞机的有溥杰、两个妹夫、妻弟润麒、吉冈等一行9人；皇后、贵人、两个妹妹及弟妹嗟哦同其他人分乘另两架飞机。

8月17日清早，三批人先后坐火车抵达通化。下了火车即直奔飞机场。溥仪等9人乘稍大的飞机第一个起飞，随后两架小飞机才启动。其中一架飞机是单翼民用飞机。启动时得用一根一端有个皮套的很长的绳子套在螺旋桨尖端，两个人用力一拽，冒出一团黑烟，引擎才能发动。

登机前，被通知说，三架飞机先飞到沈阳，然后换大型飞机去日本。

7

8月16日上午9时载着溥仪、吉冈、溥仪弟弟溥杰和一个医生、一个随侍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因另一架载着溥仪家属的飞机未到，溥仪在机场休息室等候。

忽然，机场上空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只见一架架标着红五星的苏军飞机陆续着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陆续走下飞机，立即把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

这时，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男人，向苏军最高指挥官普里图拉将军报告：“将军阁下，我是俄罗斯移民，现在是机场的卫队长。我向您报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仆从正在机场候机厅里。”

普里图拉将军带着一个中佐和三个士兵来到机场休息室，对溥仪等人详细盘问后，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

普里图拉将军走到大厅中央，大声说：“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诸位投降。”坐在苏联将军对面沙发上的溥仪，一时不知所措。

苏联将军客气地对溥仪说：“请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

吉冈安直提出要求：“我们要到日本去。”

苏联将军：“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普里图拉将军：“你们带武器了吗？请交给我们代为保管。”

伪满洲国的部长们不敢违抗，一个个把手枪交了出来。溥仪最后一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相当精致的袖珍手枪。他在手里摆弄了片刻，便扔到武器堆里。

溥仪神经质地扯着夹克衫的纽扣，好久才用惊慌的语调问他能否保全性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平静下来，开始仔细地回答普里图拉将军提出的问题。他一一介绍

了每位内阁成员，说出了政府文件的藏匿之处和沈阳卫戍部队的人数，还介绍了日军司令部和伪军的最新情况。在他的帮助下，苏军发现了日军遗留的细菌武器库。

第二天，苏联将军将溥仪一行引上了一架大型飞机，被送往位于赤塔的苏联远东第1方面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苏军正式向溥仪出示了逮捕令。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一个多月后，日本把清朝这位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挟持到东北。次年3月，日本以伪满洲国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号大同，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

至此，1932年诞生，在日本关东军的卵翼下生存了13年的满洲国，随着日本投降和溥仪这个傀儡皇帝的倒台，彻底灭亡了。



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空降兵逮捕

九 中苏会谈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 1945 年 2 月，蒋介石接到驻美大使魏道明的密电：在没有中国首脑参加的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两国为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斯大林强硬态度下妥协屈服。订立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其基本条件：1. 承认外蒙独立。2. 大连开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3.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

6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得到总统指令，会见蒋介石和时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通报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密约的内容。

1945 年 6 月 30 日下午 3 时，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等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

当天晚上 6 时 30 分，双方举行了初步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和翻译巴甫洛夫。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宋子文、蒋经国、胡世泽、中国驻苏大使傅秉章。

宋子文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表示：“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中国革命欲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因此，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斯大林回答说：“从前沙俄政府企图瓜分中国，现在，在俄国掌权的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新人。我相信，双方一定能够互相理解，达成一致。”

2

1945年7月2日，莫斯科时间晚上8时，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双方代表陆续进场，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却站了起来。他今晚的态度很不友好，摆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且表情粗鲁，举止下流。

斯大林一脸严肃地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你看过这个吗？如果你看过，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要在罗斯福总统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

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原来是《雅尔塔协定》。上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

宋子文说：“我知道大概的内容。杜鲁门总统告诉过我。赫尔利先生已于6月15日将协定全文转交给了蒋总统。我这次到莫斯科来，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说完后，身为四大国之一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料到了斯大林会来这么一手，也就毫不客气地拿出5月28日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交给斯大林，不卑不亢地说道：“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总统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原来，杜鲁门派霍普金斯于5月26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协定：宋子文将于7月到达莫斯科，由苏联政府直接将《雅尔塔协定》

的内容告诉宋子文。然后，赫尔利在重庆将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斯大林没料到宋子文也敢来这一手，便摆出一副主宰一切的架势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吧。”

宋子文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先回避外蒙古问题：“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



谈判中盛气凌人、蛮横霸道的斯大林。

暂时搁置起来。”

斯大林一听火了，立即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反驳宋子文：“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宋子文见斯大林的态度如此强硬，顿感情况不妙。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将嘴里的话说了出来：“中国任何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

斯大林：“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否则，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经过 10 年、15 年东山再起？”

见宋子文没有马上表态，斯大林继续往下说：“所以，苏联必须保卫外蒙古。这不仅对外蒙古有利，而且对中国也有利。”

宋子文也不肯示弱，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

接着，斯大林使出杀手锏：“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如果重庆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

可是，宋子文根本不理睬斯大林这一套。他说：“我本人无权决定这个问题。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之前，我不能同意。”

3

7月7日晚11时，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入主题：“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

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维持”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解释，并说道：“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如果一个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

斯大林大声嚷道：“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对日作战，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

斯大林一脸的不高兴：“你不能做主，那你来干什么？”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断宋子文的话，问道：“什么叫高度自治？”

“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和大连的协定。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你最好把它们收下。”

鉴于宋子文当晚的态度，斯大林意识到再僵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但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还忘不了说一句威胁的话：“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



谈判中据理力争、毫不让步的宋子文。

4

8月13日上午9时，莫斯科，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下榻的宾馆。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在紧张地协商中苏会谈事宜。

经过几轮谈判，在涉及外蒙独立、苏联使用旅顺、大连港、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因双方有严重分歧，谈判陷入僵局，搁置了下来。这次是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后，宋子文与蒋经国又一次去苏联同苏方谈判。宋子文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认为外蒙独立已大势所趋。他不愿承担卖国的骂名，遂辞去外交部长职务。谈判成员中增加了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王世杰：“蒋总统在电报中指示，要坚持在外蒙的边界线、旅顺海军基地内中苏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和中国担任大连港务长三个问题上，取得明确协议，否则停止谈判。根据斯大林在前几次谈判中的强硬态度，恐怕难以实现。”

宋子文：“停止谈判说起来容易。但后果难以设想。苏联远东军已经进入我国东北，日本关东军节节败退。如果不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他们翻了脸，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蒋经国：“我想总统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日本已经提出了投降的要求，再拿外蒙来做交易，有这个必要吗？”

宋子文：“这是斯大林在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早就算计和策划好了的，并已得到美国的承诺。你要不谈，没有一个东西来约束他，他就可能随心所欲。不要说我们，就连美英两国也得让他三分。”

王世杰：“还是应该给蒋总统说明，须有一个东西来约束斯大林。不然，苏联红军打败关东军后，再进尔侵入华北，那就更麻烦了。”

宋子文：“我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不要说斯大林借机侵入华北，就是苏联红军待在东北不走，你又有什么办法？如果他们再同毛泽东勾结起来，共产党就可能在中国得势。到那时候可就悔之不及了。”

蒋经国：“看来也只有这样。我们再给总统拍个电报，争取能再谈下去。然后见机行事。”

5

8月13日下午2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接见蒋经国。

蒋经国：“父亲打电话给我，指示我以私人身份来看望您，谈谈外蒙的问题。”

斯大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呢？”

蒋经国：“你们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国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外蒙这样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

给俄国。”

斯大林：“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你要明白，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介石的特使蒋经国

蒋经国：“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老实告诉你，我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外蒙古这个地方的。”

斯大林引蒋经国走到一张摆放着地图的大桌前，指着地图上的外蒙区域说：“如果某种军事力量从蒙古侵犯苏联，那么距蒙古边界只有6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就会被轻而易举地切断。那样苏联西部和东部就被一分为二，苏联就完了。如果将来第三国在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那么只要从外蒙古发射一枚导弹，莫斯科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时间。外蒙古应当是苏联的安全屏障。”

蒋经国：“你用不着担心军事问题。苏联已经对日本宣战，那么日本溃败后就不可能再起来，也就没有力量去攻占外蒙，并把它变成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们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在30年内，中国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进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摇头说：“你这话说得不对。你说日本被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日本人我了解，他们不可能永久放下战刀。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它就会动手的。”

蒋经国：“为什么呢？”

斯大林：“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像日本这样信奉武士道、菊花和刀的民族，更不会消灭，是一定会以武力崛起的。”

蒋经国：“德国投降了，你们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斯大林：“当然也要起来的。”

蒋经国：“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

斯大林：“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5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们来管，又怎样的呢？”

斯大林：“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接着很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们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商谈可以，但必须拿这个东西做根据！”

蒋经国一时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很正经地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说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进步都要快。”

蒋经国一时没有再搭话，内心却想：斯大林说的是“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国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着，斯大林又问蒋经国：“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反问：“是不是美国？”

斯大林：“当然！美国是苏联的主要对手。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坚持外蒙独立。”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非但没有在蒙古“现状”问题上让斯大林接受中国的解释，却使外蒙古独立成了中苏谈判的基本立场。

接下去对大连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管理和使用大连港作为军港；对中东铁路问题，斯大林坚持中东铁路是苏联建的应归建设者所有。经过谈判，他最后同意铁路运输以军用物资为限，由苏联警察保护铁路。在谈到中共问题时，苏联保证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蒋经国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元老和党政要员戴季陶、吴稚晖、孙科、陈诚等聚议，商议结果是“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会后，蒋介石给宋子文发了如下电报：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 20 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满铁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 20 年。

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蒋介石在电报中告诉宋子文，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在投票结束后，他将宣布外蒙古独立。

既然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斯大林也就同意在其他问题上达成相应的协议。

8 月 14 日，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代表中苏双方政府

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 中苏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为制止日本再度侵略，规定如他日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有效期 30 年。

2. 苏联对华三项声明：（1）苏联声明予中国以道义、军需及其他物质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2）苏联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主权及行政之完整。（3）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3. 外蒙问题：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其独立。苏方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4. 关于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中东及南满铁路干线，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管，以 30 年为期，期满无偿还给中国。此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除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不运输苏联军队。共有共管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与中苏共管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筑之铁路辅助线为限，其他支线与附属事业归中国政府所有。

5. 关于大连：中国宣布大连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为 30 年。

6. 关于旅顺，作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据地。民政归中国管辖，设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处理有关共同使用问题，有效期 30 年。

7

8 月 14 日，下午 2 时，中国延安，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正在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联合苏联红军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和准备接受日本军队投降问题。

叶剑英：“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8 月 10 日和 11 日，朱老总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先后发出第一号和第二号向日寇大反攻命令。要求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斯坦公告》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在第二号命令中明确要求冀热辽军区司

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率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同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发出最后通牒，限所属日军在48小时内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指定地点分别集中，听候处理。而蒋介石从8月10日起，却给我军连续发布三道命令，指责我限令敌伪军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的行为’，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并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军收编。据可靠情报，近几天蒋介石正紧张调动军队，准备抢占各大都市和接受各地日军投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股逆流，我们于昨日已由新华社发表了主席亲自起草的声明和给蒋介石的电报，揭露了他的阴谋，驳斥了他的反动谬论，坚决拒绝了他的命令。”

毛泽东：“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百万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和在华日本侵略军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我们解放区的军民，8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六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而蒋介石躲在峨眉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来抢夺胜利果实了。”

刘少奇：“而且这位委员长气势好凶呢！两三天之内连续给我们下了三道命令！真是急不可耐地张着血盆大口啊！”

朱德：“我这个在蒋委员长属下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已成了‘唐突和非法行动’的罪魁祸首，拒绝了他的命令，造了他的反。恐怕要把这个委员长气炸肺了！”

毛泽东：“抗战初期，为了团结和促进蒋介石一致抗日，红军接受蒋介石的改编，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受他们的节制。可是，现在孙悟空已经钻出了如来佛的手心。我们可以放手大闹天宫了！”

任弼时：“他命令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我们处在抗日前线，他们远在大后方，远水不解近渴嘛。”

毛泽东：“抗战胜利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一批大桃子，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都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津蒲、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还有东北，我们的抗日联军在东北抗击和牵制了大批日军。这一批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浇灌

起来的。究竟能不能落到人民手里，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必争’。叫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拿着一份电讯稿走进来，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电报后，对毛泽东说：“主席，新华社刚刚收到苏联塔斯社发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毛泽东：“请宣读一下大家听听。”

接着，周恩来宣读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

毛泽东听后火冒三丈，拍案而起：“不可容忍！不可容忍！简直是卖国丧权！”说着双手叉腰在室内气愤地走来走去：“我们绝对不承认！中国人民绝对不承认！宋子文、王世杰和蒋家父子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

周恩来：“雅尔塔会议后，宋子文同斯大林断断续续谈了几个月，在外蒙独立问题上反反复复，一直不答应。而苏联出兵东北，他们便马上做了让步。很明显他们是在同苏联做交易，另有所图嘛！”

刘少奇：“没想到十轮谈判结果是收回来两个海港和一条铁路，却丧失了外蒙那么大块国土！蒋介石他们也不是不会算账，现在看来这个当年上海交易所的买办，是想得到比外蒙更多的好处。”

朱德：“对蒋介石我们是深知其人。可没想到苏联老大哥这么不够意思。一个堂堂社会主义国家怎能借机抢占邻国领土！？怎能同国民党反动派结成同盟！？我还指望这位老大哥援助咱们武器弹药，好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最后一战。结果人家一枪一炮没给咱们，今后还要交给蒋介石。真是指望破鞋扎了脚啊！”

任弼时：“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却遭到赔款又割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了，我们将要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东三省的主权，却又被迫允许比东三省大得多的外蒙独立！在近代史上中国始终扮演着被割地赔款的屈辱角色！难道我们总也不能有属于自己国家的真正胜利吗？”

朱德：“党中央应该发表公开声明，坚决不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刘少奇：“不宜发表公开声明，只能通过共产国际表明我们的态度。这个条约不仅仅是国民党一方的问题，是斯大林主持签订的双方正式签字的东西。现在苏军正在东北同关东军作战，还要依靠他们打败日本。我们只能同苏联携手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我们不仅现在要依靠苏联，今后还要依靠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因此，我的意见对这个条约眼下只能忍气吞声。”

毛泽东已经冷静下来，在来回踱步中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刘少奇发言后，他重新坐下来，眉头紧锁，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看来，我们这位老大哥不但嘴馋，而且胃口大着呢！但终归还是老大哥嘛！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一边倒呢！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而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眼下就得算大账，我们的目的不但要东三省，还要华北、华东，要整个全中国。外蒙这块地方版图是不算小，但比我们的总体目标还是小得多呢！从抗战开始起，我们的老大哥援助的武器、物资，确实都给了蒋介石。但也是为了抗日嘛！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得罪我们老大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毛泽东说着又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同蒋介石赛跑，要拿出跑百米的速度向前冲，我们华北、华中的部队赶紧完成战略调动。还要继续派部队开赴东北，要刻不容缓地开展对日寇全面大反攻，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十 日本无条件投降

1

1945年8月15日11时45分，东京，日本广播协会大楼。第八播音室里挤满了来自内阁、情报局、宫内省和陆军的证人。广播协会会长把标有“正本”字样的录音唱片当众从保险箱里取出来，交给日本最有名的广播员和田信贤。

11时55分，和田信贤紧张地坐在麦克风前，两眼盯着时钟的分针与时针。

中午12时整，和田信贤开始广播：“这次广播极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玉音。”

在奏过国歌《君之代》后，稍停了一下，便传出天皇的声音：

告我忠臣良民。察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联合宣言各项条件。

帝国臣民康宁，万邦共荣



天皇裕仁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共乐，此乃皇祖皇宗遗范，朕时刻铭记在心。朕曾向英美宣战，乃出于帝国自存，求东亚之安定。但迄今交战已近四载，战局之发展于日本不利，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更有甚者，敌已动用新式残酷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涂炭，其破坏力殊难估计。若执意再战，不独日本民族终灭之，人类文明亦将毁灭。若如斯，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朕对曾与帝国紧密提携解放东亚之东亚诸盟邦表示最深切之遗憾。每念及战死沙场之官兵及其他以身殉职者，每念及死于非命及其遗族，朕日夜痛心，凄然涕下。对伤者、战争受害者、无家可归者、丧失生计者之福利，朕深为转念。帝国今后之苦难自不堪言，朕深知尔臣民之哀情。然者，时运之所趋，朕为和平计，不堪忍者亦忍之，不堪受者亦受之。

朕聊以自慰者，以尔臣民之赤诚使帝国国体得以保持，使朕与忠良臣民得以永世相处。尔等切勿悲伤冲动，勿使事态更形复杂；同胞切勿互相排挤，致使混乱，误入迷途，丧失对世界之信心。世世代代举国一致，坚信我神州不灭，帝国任重而道远。尔臣民共竭尽全力，建设未来。广开公正之道理，培养高尚精神，努力奋斗，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

播完天皇裕仁的录音后，昏暗的礼堂里，穿着整洁军服、戴着白手套、佩戴勋章和军刀的300多名高级军官还在悄然肃立着。他们一个个低垂着头，紧闭双目，任泪水在脸颊上流淌着。

梅津缓缓地解下腰间的指挥刀，抚了抚鲨鱼皮刀鞘，然后将刀放到地上。300多名将佐跟着卸下了军刀。紧接着一声锐利的哭号突起，引发了一片巨大的跺脚捶胸、号啕大哭的声浪……

2

8月15日中午，东京。

东京街头巷尾一片寂静。商铺门前，广场中间，人行道上，到处是站着

或跪着的听众，一个个抽搐着脸哭泣着……

皇宫御文库内，天皇裕仁也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自己通过广播传出的声音。

在宫内省，内大臣木户听着广播百感交集，为自己努力的停战得以实现而洋洋自得，眼中闪着激动的泪花。

在东京的一个区里，“神风”队创始人大西多陇治郎海军中将，在家里自杀未遂。他已把肚子切开，还在胸部戳了几刀，但神志仍然清醒。他抓住借给他刀的朋友几玉的手说：“我要对你说的话都写在遗嘱上了，遗嘱放在书桌上。还有一封给我妻子的信，她在乡下。”

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在冈村宁次带领下，中午 12 时整集合在广场上，按平时遥拜的队形聆听天皇“玉音”广播。从司令官到士兵，每个人都如木桩似的站在空阔的广场上，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表情似乎很平静，但天皇每一句话，都使他们震惊、绝望。直到广播结束，一个个还目光呆滞地站在烈日下。

在中国长春，关东军司令部里，山田乙三和关东军高级将领、副官、侍卫官 100 多人跪着听天皇的广播，一片片悲伤的哭泣声甚至压过天皇的声音。有些军官听着听着便拔出战刀，剖腹自杀。办公楼内、司令部大院里、军营中，随处可见倒在血泊中的自杀者。

3

8 月 15 日中午 12 时，美国，华盛顿，白宫红厅。美国军政要员环绕着大厅中央的落地收音机，一个个或坐或立地谈笑风生，洋溢着一派胜利的喜庆气氛。

杜鲁门总统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心情极佳地大口大口地吸着巴西雪茄，惬意地品尝着法国葡萄酒。

当收音机里传出天皇裕仁悲怆的声音时，所有在场的官员都停止了交谈，开始静静地收听……

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播音结束后，紧接着播出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电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晚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这时，杜鲁门总统站起来，高举起酒杯，无比豪迈地说：“德日意战争

贩子发动的战争，历时六年，现在按照我们的意志结束了！战后的新世纪开始了！诸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世纪揭开序幕，干杯！”

大厅内响起一片欢快的掌声和欢呼声。

8月15日下午1时，在太平洋上位于日本沿海的美国第三舰队旗舰“密苏里”号上，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上将，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声叫了一声“好！”接着拍了身边所有人的肩膀，并下令立即升旗。于是每个军舰都打出了自己最大的军旗。然后，甲板上的海军官兵们互相拥抱，大声欢笑，不约而同地在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中跳起了舞……



美国士兵们庆祝战胜日本法西斯

4

8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延安。

新华通讯社新闻台从路透社、合众社收译到十万火急电报：“日本投降了！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场的副社长吴文焘飞步出窑，赶往社长博古的住处。博古不在。吴文焘顺手捻亮桌上的煤油灯，摇动挂在墙上皮盒子里的电话机，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主席，这里是新华社，有重要新闻报告：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兴奋地说：“那好啊，日本投降了！有新情况请随时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正在召开会议。会议室里的人们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兴奋地欢呼跳跃起来。毛泽东当即挥笔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不多时，延安的清涼山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人们奔走相告，呼喊：“日

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整个延安沸腾了。

入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漫卷，街面的墙壁上刷满“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标语。男女老幼会聚街头和集会场所。东西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唢呐声拧绞在一起。十余支秧歌队一路狂扭，在新市场的十字街口掀起欢乐的高潮。市民们点燃用柴火棍扎起的火炬，汇集进了焰火的洪流。

在当天的群众集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用无比激动的声音宣告：“我们中国和日本 50 年的血海深仇，今天清算了。我们胜利了！”

8 月 15 日下午 2 时，中国，重庆。

大街上狂欢声、锣鼓声、喇叭声、口笛声、鼓掌声、车铃声、脸盆声混成一片，翻滚的人潮在口号声和爆竹的硝烟中漫涌。许多不相识的人，相拥在一起。

满载着工人、学生、童子军、新闻记者和市民的车辆在拥挤的马路上缓缓蠕动。一个扎着一双大翅膀的和平女神站在彩车上挥舞火炬和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探照灯光与游行的火炬交相辉映。

8 月 15 日下午 2 时，中国，上海。

高楼大厦、商场悬挂着巨幅“日本投降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标语。大街小巷飘荡着男女老幼的欢声笑语。

自动组织起来的工人、学生、商人的游行队伍一个连着一个，持续不断。



重庆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刚刚被秋雨清洗过的南京路上，许多人手持长串响鞭沿街奔跑，火花和余烬飞洒，硫黄气味弥漫空中。在拥挤的人群中，有许多是从课堂上直接跑来的还夹着书本的学生。

人行道上茶馆免费用茶，酒店免费饮酒，冷饮店有冰淇淋奉送。卖水果的小贩高喊：“胜利果实不要钱，免费供应！”20元一份的报纸卖到1000元，顷刻销售一空。

各大电影院、剧院临街的银幕轮番打出“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字幕，广场上的许多观众把帽子和手帕向上抛舞……

8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南京。

8年前的12月，30万中国同胞的鲜血洗去了六朝古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死气沉沉的鬼城，如今这座城市复活了。

在中山陵前的广场上，会聚了几万市民，欢呼跳舞，许多学生站在高处大声宣讲新四军散发的传单，大声疾呼：“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惩办战争罪犯！”一呼百应，广场上响起了一浪高一浪的口号声。

在宣武湖周围，彩旗彩灯高悬，在湖面上映照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图画。

持续不断的游行队伍，打着“向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讨还血债”、“审判谷寿夫，绞死谷寿夫”的标语，抬着丑化日本侵略者的巨幅漫画……

5

8月15日晚8时，东京，皇宫御文库，天皇起居室。天皇裕仁、内大臣木户和首相铃木在座。

铃木：“陛下发表投降诏书后，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帅、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等十多名高级将领相继自决。在中国上海、吉林、天津、台湾等地的安藤利吉大将、中村次喜藏中将、人见秀三中将等，也以自杀方式结束了生命。刚刚接到陆军省报告，陆相阿南已在府上自杀，现将其遗书献上。”

天皇接过遗书展阅：“身沐主隆恩，终生未得报。今日辞帝阙，无言可奉告，以一死奉谢大罪。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天皇阅后，眼中满含泪水，站起来缓慢地来回踱步：“这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朕有愧于国，有愧于臣民哪！”

铃木：“时局发展险象丛生，极其复杂多变，本人力不从心，实难驾驭内阁成员同心同德挽救国家。近日竟两次麻烦陛下圣断，实感羞愧。现在有必要选出强有力的新首相组成新内阁。请陛下准予内阁总辞职才好。”说完向天皇深深鞠躬。

天皇：“在当前我国面临战败投降之极端困难时期，铃木首相及内阁成员临危受命，还是尽力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朕希望暂缓辞职，同朕一起共赴国难。”

铃木：“感谢陛下对本届内阁的高度信任。但全体内阁成员总辞职是大家的共同决定。望陛下恩准。”

天皇深深叹了口气：“既然如此，朕也不勉为其难了。”说着面向木户：“这还得请内大臣帮助朕挑选新首相人选。”

木户站起来向天皇鞠了一躬：“臣已同首相和几位亲王作了商讨。认为接替铃木首相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东久迩宫亲王。”

东久迩宫是裕仁的叔叔、朝彦亲王的第九个儿子，其妃子是明仁天皇的第九个女儿。

从1921年起他就组织起“天皇党羽集团”。在其后的25年中，日本的每一项阴谋事件几乎都与他有关。现下日本陆军将领都主张他以首相身份兼任陆相。

天皇：“我也考虑过让我的德高望重的叔父出来帮助朕收拾时局。但怕老人家不肯就任。”

铃木：“本内阁辞职前，我曾拜访东久迩宫亲王。他说政治曾使他父亲倾家荡产。他在陆军大学当少尉学生时，曾拒绝明治天皇请他出席晚会的邀请；他曾与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吵过嘴；他是靠了一位陆军元帅的劝解才保留皇族地位的。现在他依然想当一个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但是，东久亲王是一位爱国心很强的人，如果陛下真诚执意请他出山，还是可以就任的。”

木户：“今晚7时，我又派一位使者去向东久亲王致意。他对使者说，请转告木户内大臣，我一点也不想接受首相职务。不过，在目前危急的情况下，我愿意考虑一下。”

天皇高兴地说：“既然老人家表示了这样的意向。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先请内大臣向他通报朕的重托之意，然后我亲自同他谈谈。”

6

8月16日上午8时，东久迩宫亲王官邸。东久正在接待内大臣木户拜访。

木户：“天皇先让我传达临危重托之意。最近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迅速派出一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联络官前往马尼拉听取他关于正式受降和美军进占日本事宜的具体指示。所以有必要尽早成立新内阁。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同美国人打交道，任何耽搁都会引起盟国的怀疑，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昨晚的未遂政变更使得有必要挑选一位受陆军尊敬的人出任首相。如果您不接受这个职务，就会给圣上造成极大的焦虑。”

东久迩宫：“天皇的亲自挑选，使我几乎无法拒绝。在这种局势下，我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幸福。如果我对国家有用，我将欣然接受这个职务。”

当日下午4时，东久迩宫亲王来到天皇临时寓所拜谒裕仁天皇，呈上经与内相酝酿好的新内阁成员名单：东久迩宫以首相兼陆相，外相重光葵，海相米内光政，藏相津岛寿一，副首相近卫文磨，国务相兼书记长官绪方竹虎。

裕仁天皇：“命卿组织内阁，唯需特别尊重宪法，依据诏书，维持军方之统治秩序，努力收拾全局。”

东久迩宫：“当此史无前例国难当头之际，为了冲破重重困境，作为日本国民，又身为深受天皇陛下、国家人民给予特殊待遇的皇族成员之一，对此严正之义务，自当尽瘁以赴。”

接着由裕仁天皇主持了首相亲任仪式。

7

8月16日上午9时，南京，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

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正在给冈村司令官宣读重庆8月15日凌晨发来的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

从即日起，通令所有在华日军停止一切作战行动，但要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中央军，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同时，尽快派代表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的命令。

冈村听罢，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声泪俱下地说：“大日本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为我们多次战败的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不甘心！不甘心哪！”

这时，另一位副官拿来一份电报：“总司令长官，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来急电，命令我军就地放下武器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洽降！”

冈村暴跳如雷地命令副官：“八格牙路！撕掉！马上撕掉！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皇军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是我们的最大的仇敌！已有170万皇军和友军被他们歼灭了。我们非但不向他们投降，而且对他们绝对要有最低限度的自卫武力。命令各部队，遇到共军进犯我们驻地，要按蒋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进行自卫反击！”

小林浅三郎：“冈村司令官，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向蒋介石的国军投降了。应该立即给蒋总司令复电并尽快组成代表团晋见中国陆军何总司令。”

冈村：“好，好！请马上起草电稿，明日即发出。”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8

8月16日上午10时，苏联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苏联远东司令部作战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参加的人员有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远东第1方面军麦列茨科夫元帅、远东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元帅、太平洋舰队司令尤马谢夫上将、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等。

远东军参谋长站在远东地图前汇报各条战线战役发展情况：“后贝加尔方面，已攻克赤峰、扎兰屯、多伦、康德、张北，从南面向长春、沈阳发展

进攻。远东第1方面军攻占勃利、静安、图们，已解放牡丹江平原的大部地区，从北面向长春发展进攻。远东第2方面军攻占了四站城，正沿牡丹江西进，逼近哈尔滨。太平洋第二舰队在朝鲜、千岛群岛与日军争夺港口和滩头阵地。目前战役态势对苏军有利，日军苦心经营多年的近四十公里纵深的防御堡垒大部被摧毁或突破，日军已无险可守。继续进攻定可势如破竹。但由于后勤保障的困难，加之连日暴雨，道路泥泞，公路桥梁大部被毁，继续向前大踏步推进将遇到很大困难。”

华西列夫斯基走到远东地图前，严肃地说：“今天，接到了我们的对手关东军山田司令官打来的电报。他的意思是谨依圣旨，立即停战。他希望双方同时尽快下达停战命令，他们随后派人来同我们协商有关停战的具体办法。我认为，这是山田的拖延战术。他只是把我们当做一个平等的对手，通篇没有一个投降的字眼。他说了那么多废话。其实有一个词就够了，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马利诺夫斯基：“我完全同意总司令官的论断。目前我军虽进展很快，但关东军主力还没有消灭，山田乙三不会老老实实投降。”

麦列茨科夫：“山田乙三不投降，就用我们的坦克、军舰逼他投降！”

这时，华西列夫斯基拿出斯大林刚刚打来的电报：“英明统帅斯大林同志来电，命令我们果决地进攻，进攻，再进攻，彻底消灭日本军队中的这支



远东苏军指挥集体，左起：克拉夫琴科、奇斯佳科夫、麦列茨科夫、诺维科夫、马利诺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

有生力量。现在，我命令各方面军，迅速组成和加强以轻型坦克为主导的先遣队。将剩余的粮食、弹药首先补充给他们，将其余坦克里的油料抽出来，集中给他们使用。务必在日军无条件投降前，再往前推进 100—200 公里。”

最后，华西列夫斯基用激昂的语调说：“同志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胜利结束了。这是黎明前的最后一战，这是不朽的一战。这一战由我们在座的诸位来指挥完成，的确是一件光荣而又伟大的壮举。希望我们能把二次大战的最后一个句号，画得既圆满又漂亮。”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9

8 月 17 日上午 8 时，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会议室里，挤满了中将以上的高级军官。这是日本关东军投降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场上凝结着一种悲戚忧愤的气氛。

山田乙三首先宣读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打来的电报。电文明确指令关东军一切部队务必在 8 月 20 日 12 时以前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等待苏军受降。

山田读完电报，清水规矩中将便手握刀柄，杀气腾腾地站起来。“投降？只有敌人懂得它。我从来没学过这个词，也不会解释。日本国的词典里，根本没有这个词。天皇传位 3000 年来，也从未听说过。谁言投降，我就先杀掉谁。”

有几位将军随声附和着：“我们唯愿效忠天皇，战死疆场，也不言‘投降’二字。”

瘦小的山田司令官平和地摆了摆手：“坐下。”

他背剪着双手，来回走动：“在战争中途自行放下武器，这是天皇军队的最大耻辱，难道我不懂得？面对殉国的几百万英灵，我却在苟延余生，难道我寝食能安？”

秦彦三郎：“作为军人，我们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

山田：“尔等善战，深为感谢。我们皇军无敌的战斗力和威望，连敌人也表示敬畏。今后无论生何巨变，我们都要坚持这种自尊和自信，誓斩丑类，万死不辞。”

清水中将站起来，横眉怒目号叫：“清水不才，决不投降！”

山田猛喝一声：“不要说了，谁敢违诏，请先杀我。”说完，将手枪用力拍在桌面上。

清水慢慢坐了下去，头垂得很低，粗短的脖子涨得紫红。

山田和缓地说：“好了，诸位先回去。明天，我将派秦彦参谋长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协商停战事宜。”

10

8月16日晚8时，东京，首相官邸。东久迩宫亲王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赴马尼拉洽降特使团人选。参加者有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大本营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等。

东久迩宫当众宣读麦克阿瑟催逼派洽降代表团的电报：

已命令日本政府速派有权限之代表人赴马尼拉之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以日本国天皇、政府、大本营名义，接受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须之各项要求，一行之飞机应于1945年8月17日东京时间8点至11点中间，飞离九州的位多呷控岸线。但未见回音，显系日本当局故意稽延行程，违抗命令。兹警告日本政府以后对联合国军总部命令，不容稍事迟缓，应即从命。否则将严惩不贷。

东久迩宫：“电报口气十分严厉，此事已是十万火急。如果延误后果不堪设想。今日必须确定洽降团人选。”他说着两眼望着梅津美治郎：“派去马尼拉的日本特使团团团长应由陆军方面派出。”

梅津大声说：“我决不去马尼拉！”

土肥原贤二笑吟吟对梅津说：“平心而论，这项差事非公莫属。”

梅津苦笑道：“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前往马尼拉协助麦克阿瑟受降。他能放过我这个签订《何梅协定》的当事人！我看土肥原阁下才能超群，担任此职最合适不过了。”

土肥原贤二急忙摆手：“论起和中国人的账，你还能比过我这个曾任哈尔滨、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建立满洲国的‘东方劳伦斯’？”

这时，前陆军大臣杉山元帅走了进来喊道：“首相已看中梅津阁下，总长不要推辞了吧！”

梅津：“到马尼拉是洽降，又不是去谈判签订投降书，派个能代表军方的军官去就行。我看由河边君代劳吧！”

河边听了直接上司梅津的话，正欲站起来推辞，却听首相东久迩宫说：“既然总长提议河边副总长出头，我看就定下来吧。”

在座的与会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一致同意由河边虎四郎担任洽降特使团团长。河边只好服从了这个硬性的决定。最后议定其他几位团员：陆军方面为参谋本部第一课长天野大佐、第二课长松田中佐、第六课长山本少佐；陆军省军事课南中佐、军务课高企中佐；海军方面为吉田大佐、寺井中佐、横山少佐，连同陆海军翻译人员共 16 人组成了洽降特使团。

11

8 月 18 日下午 5 时，东京，天皇寓所内宫。

天皇裕仁和内弟竹田宫恒德亲王跪坐在榻榻米上，正用竹器品茶。

竹田系明治天皇第六个女儿所生。二战期间为参谋本部成员，曾任裕仁天皇的联络官，专门负责与西贡的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联系，是皇族中最有能力者。竹田今日奉诏进宫，惶恐莫名，面对跪坐的天皇满面忧戚之色，久久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品茶。

终于，竹田忍受不住沉默的煎熬，开口问话：“陛下，如今国务繁乱，召见臣下，有何训教？”

裕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悲怆地说：“朕实无能。一场圣战，竟至惨败如斯。上无颜对列祖列宗，下无面对国民众生。朕苦心孤诣，竭尽所能，然终无力扭转乾坤，挽回败局。整日处于悔恨哀绝之中。”

竹田：“战争遭败原因甚多。陛下决断停战乃英明之举。当务之急，乃是引导国民顺应时势，渡过难关。”

裕仁点点头：“正是为此，朕才苟延残喘、甘为马牛。近日，盟军便将进驻本土，百万大军，亦将交出兵械。神国的命运将掌握在他人手中。朕等须仰人鼻息、观人颜色而行事。这等耻羞，朕自忖尚能容忍。只是今后国不成国，民不为民矣！百万将士为圣战捐躯，已令朕无法言谢。倘若此后子民

再受欺凌之苦，朕实不知该如何行事才好？”

竹田宽解着说：“吾国上下，皆以陛下为精神之支柱。只要天皇安在，即便再有千难万苦，想来尚能苦撑苦熬。陛下全心为民，甘受其辱，国民皆能体谅，自不会怨责皇上。况且事情或许并非如圣上担忧的那样。美国向以人道、人权之思想治理国家，恐对我国之子民亦不会横生暴端，曲意凌辱……”

裕仁强抑泪水，将杯中茶一饮而尽，叹息着说：“眼下只有如此了，愿皇天佑我。朕必以有生之力，庇我国民。”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竹田贤弟，朕虽以广播方式发出停战诏书，然各路大军接到停战令恐在数日之后。有的虽已接到，恐囿于当地的战况欲罢不能。勉强再战，徒增死伤。朕最忧虑的是满洲之军队。虽元气大损，但精华未失，重将尚在。日后振国兴邦有赖于他们。目前他们面对苏军四面合围之优势兵力，陷入和战两难之境地。如强撑硬抗，必遭歼灭；束手缴械，他们恐辱朕之荣面而又不为。”

竹田：“现在最怕的是一些高级将佐要尽愚忠干出种种蠢事，给陛下帮倒忙。像关东军第5军军长清水规矩就是条莽汉，真不知会闯出什么祸。他同我私交甚笃，倒是很听我的话。”

裕仁：“朕想派你去一趟长春，讲清屈辱求生，以待来日的道理。务必说服他们立即放下武器，与苏军达成停战条款。不管对方的条件如何苛刻，都应接受……只求让朕之子民安全返回本土。不知卿是否愿为朕分忧。”

竹田泪流满面，哽咽着说：“陛下放心，臣明日就前往满洲。一定将陛下之苦心告之关东军将士，尽全力让我子民返回本土。”

裕仁松了一口气说：“铃木内阁已经解散，东久迩宫亲王正在组阁。临行前，有些事情，你可与他商量一下。另有一事，希望你能顺便办一下。满洲国皇帝溥仪，今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如无不妥，你可同机将他带回。昨日得知，美国的威恩莱特将军已被盟军的侦察部队劫走。我不愿让溥仪落到他们的手里……”

竹田立起深鞠一躬：“谨遵圣旨。”

12

8月19日上午8时，长春，关东军司令部。

裕仁天皇特使竹田亲王被山田司令官等从机场接到司令部后，即召集关东军高级将领开会，传达天皇御旨。

还想活动竹田再作垂死挣扎的喜多诚一马上向竹田提问：“亲王殿下，圣上的诏书是不是假的？我看不像是真的。”

竹田立即批驳：“这是什么话，陛下的诏书怎能是假的？”

清水规矩：“听说陛下是被逼而为，身不由己？”

身体粗壮的竹田猛然站起：“我受命之日，陛下亲口对我讲：‘近日之内，盟军便将进驻日本本土。我百万大军亦将交出武器，弃甲为民。自此，神国的命运将掌握在他人手中。朕等须仰人鼻息，观人颜色行事。这等羞耻，朕自忖尚能容忍。只是今后国不成国，民不为民矣！百万将士为圣战捐躯，已令朕无法言谢，倘要此后子民再受欺凌，朕实不知该如何行事才好！’”

竹田传达天皇的一席话，使在座的一些关东军将领低头而泣。

接着竹田又说：“陛下对关东军目前的处境极为理解，又很担心。让我告诉你们：他知道‘你们处于战和两难的境地，如强撑硬抗，必遭歼灭；束手缴械，你们恐辱朕之荣面而又不为’。特别让我向你们讲清屈辱求生、以待来日的道理，要你们‘不管对方的条件如何苛刻，都应接受，只求让朕之子民安全返回本土’！”

山田乙三泣不成声，向皇宫方向遥拜鞠躬：“天皇陛下，请放心。我决定率关东军将士投降！”

清水规矩对老朋友竹田亲王说：“我的部下早就想遵旨行事了。只怪我冥顽不化！我这就派人打着白旗，向苏联远东军第1装甲兵司令麦西莫夫将军洽降。”

竹田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立即要通了驻在哈尔滨的关东军第1方面军的电话。通过该方面军接通了山田乙三派遣的与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谈判投降事宜的秦彦三郎。在电话中传达了裕仁天皇的停战御旨：可以接受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立即无条件停战。希望苏方提供便利，使日军官兵和日侨尽快回国。

十一 二战最后一役——虎头要塞攻坚战

1

1945年8月8日，下午3时。苏联东部边境伊曼市，苏联远东第一方面集团军临时指挥部。

麦列茨科夫元帅同所属各师旅高级指挥官，围在铺着作战地图的长桌前，听取集团军参谋长介绍中国东北东宁境内虎头要塞的情况：

虎头，是坐落在完达山余脉虎头山上的一个边陲小镇，与我们所在的伊曼市隔江相望，恰好位于我国远东中心城市伯力与主要军港海参崴之间。距西伯利亚铁路咽喉——伊曼大桥不足20公里。虎头，又是我远东军进入中国腹地的捷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虎头要塞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

1933年日军侵占虎头后，在此驻扎重兵。1934年开始秘密修建地下要塞，以作为攻苏的战略基地。为了将



东宁虎头要塞正门

它建成“北满第一永久要塞”，日军耗资数亿，强征中国劳工 17 万多人，共用时 10 年。地下工程于 1939 年基本建成，整个要塞工事到 1944 年才告完成。

虎头要塞范围广阔，规模宏大。要塞建在山的顶部，结构为三纵三横，与其他地下要塞构筑有互相连通的地下工事、野战工事。地下要塞 7 万平方米，长度约 2 公里，均为钢筋水泥结构。基地下要塞南起边脸子山，北至虎北山，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形成正面宽 12 公里，纵深长 6 公里的山地要塞守备区。其中心要塞区主要集中在猛虎山、虎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等五个标高在 100 至 150 米的丘陵上，形成了以猛虎山为中心枢纽的地下要塞群。五大要塞中，猛虎山为主要阵地，虎东山、虎北山为其两翼前沿阵地，呈南北两线护卫阵势，虎西山、虎啸山两大阵地为依托，从背后支撑和护卫猛虎山主阵地，构成了三道防线。

虎头要塞的地下工事直通各山头阵地，隧道宽高各 3—4 米，长达 8 公里。地下要塞五脏俱全，成直角走向的几个大曲廊联络地下深处的指挥所、通讯室、发电所、军官和士兵休息室、医务所、伙房、浴池、厕所、蓄水井、弹药库、通气洞等。工事顶部全部由钢筋水泥浇注，厚达 3 米。工事上面自然植被茂密，不见一点人工痕迹。通往山顶地面工事的通道有观察所、地堡、军犬宿、竖井、排气口、射击口等，便于出入、观察和发射火力。

要塞仓库中储备的粮食、被服、弹药、燃料，足可供养超过 10000 名士兵持续作战三个月。各要塞的火力配备，除步兵常规武器外，还装备了各种远射程炮和高射炮。

1939 年 3 月，关东军在这里建立了“第四国境守备队”。为一个旅的编制，人数最多时达 13 万人。几任司令官均为少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力陆续撤走。现在实际上所剩日军守备队不足 1500 人。但是，日本关东军对外扬言，虎头要塞之坚固，守备兵力与火力配备之雄厚，远胜过法国的马其诺要塞，将其夸耀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可坚持六个月不怕围困的坚固要塞”。

麦列茨科夫：“攻击虎头要塞恐怕是我军进入中国东北首当其冲的一场硬仗。决不能有丝毫轻敌思想。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和作战准备。要预料到敌人必定要垂死挣扎，凭借坚固的要塞，进行疯狂的顽抗。因此，各攻击部队要立即针对要塞的情况，在兵力、火力配备上，在武器弹药和后勤补给上，在陆海空部队配合上，作出周密的安排部署和必要的调整。务必在今晚零点前一切部署完毕。攻坚战打响以后，务求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

以最小的伤亡拿下这个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虎头要塞。”

2

8月9日凌晨，远东战役开始。苏军第35集团军向虎头要塞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苏军近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对虎头要塞及两翼阵地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轰炸，摧毁了日军前沿阵地，重创了地面工事。同时，苏军第57边防总队官兵乘坐汽艇和小船，渡过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乌苏里江支流），袭击日军哨所。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260名日军，占领了所有的江边哨所。尔后，苏军主力兵分三路渡乌苏里江：一路在距虎林县城东南60公里的倒木沟、东林子一带横渡松阿察河；一路在距虎头北面约30公里的小木河、阿布沁河口一带横渡乌苏里江；一路直插虎头西南的黄泥河、月牙一带，切断了虎头通往虎林的交通线。南北两路对虎头要塞形成了两翼策应的阵势。11时左右，从月牙、黄泥河方面迂回的苏军进入了日军虎啸山阵地前沿的飞机场附近，并很快攻占了虎啸山麓。

8月10日，18时许，苏军以坦克开路，从3个方向向虎头要塞发起了第一次总攻。

日军守备队虽不足1500人，但火力很强。日军动用了所有的武器、人力拼命向苏军反击。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日军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敢死队与苏军血拼，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当苏军逼近日军工事时，日军突然冲出工事与苏军短兵相接，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由于日军出其不备，攻上来的苏军又较为分散，苏军攻击一时未能奏效，第一次总攻失利。

3

8月11日晨，苏军开始了第二次总攻。战至15时，边脸子山和虎西山巅先后插上了苏军红旗。虎头镇被苏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占领。虎东山阵地被苏军一个连包围。至此，日军已被压缩到主阵地中猛虎山的制高点附近。

8月12日上午，苏军炮兵对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炮击后，苏军两个连队约400人从虎头台攻入了日军的851兵营。从莺谷出动的苏军攻入了日军的506兵营。天黑时，苏军又有2个连队包围了临江台。日军在猛烈

的攻击面前弃阵而逃，龟缩到虎东山工事中去。

8月13日晨，攻入851兵营的苏军从莺谷方面调来8门野炮，向猛虎山以及见北台轰击。苏军步兵开始向西猛虎山阵地迫近。8时左右，苏军的一个连攻克了西猛虎山，乘势又向中猛虎山进军，一举占领了中猛虎山一带绝大部分日军阵地。

9时许，守卫虎北山的日军组织了敢死队，赶来与苏军的两个连队展开激战，夺回了西猛虎山周围的阵地。苏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再次冲杀上去，双方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这时，驻守在中猛虎山、虎北山的日军倾巢出动。又从苏军手中夺回了所失阵地。

8月14日晨，日军又以一个连的兵力在野炮的掩护下，快速地冲向西猛虎山顶，拔掉苏军的红旗，夺得了两挺机枪，收回了西猛虎山阵地。7时左右，苏军集中两个连的兵力，击退日军，重新夺回了西猛虎山阵地。10时许，100余名苏军包围了虎北山分哨所。一场激战后，日军弃阵而逃。下午，虎东山105名日军被苏军的一个营包围。日军化整为零，组成若干突击队于深夜丢弃虎东山阵地突出包围圈。

4

8月15日中午时分，在中猛虎山日军第十五国境守备队司令部里，日军官兵收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广播。但是守备司令官大木正大尉拒不相信：“关掉收音机！哪里是陛下的广播，分明是削弱我军战斗力的谋略性广播。”苏军飞机向日军阵地抛撒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但要塞的日军认为这是苏军的欺骗，继续抗击苏军。

8月16日，苏军与日军争夺猛虎山阵地的战斗更加激烈。进驻虎头街北的苏军集中重炮猛烈轰击猛虎山阵地。日军损失惨重，有的中队死伤过半。避居在工事中的日本侨民死伤更重。而苏军却愈战愈勇，有两个连的兵力径直向日军重炮阵地冲去，一举摧毁了这个永备火力点。苏军的另一个连队还迂回到了日军的背后。日军见背腹受敌，钻入地下。苏军用汽车、装甲车从江边运来了大量毒气筒和鼓风机，利用地下工事露在地表的换气孔、烟囱等通孔向洞中鼓吹毒气。龟缩在洞中的日军不少人因中毒窒息而死，少数头戴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苟延残喘地死守在洞口。这一天日军守备队的步兵、炮



利用天然岩层构筑的要塞火炮掩蔽部

兵队的本部、工兵队、陆军医院的兵力大部被歼灭，守备队司令官大木正也死于乱军之中。

8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告关东军全部向苏军投降，东北全境解放。但在虎头要塞，激烈的战争并没停止。苏军出动了多辆中型战车、自行火炮、火箭炮

继续扫荡日军，逼近要塞洞口，直接用火炮轰击地下要塞中的残敌。

8月18日，为了给要塞中的日军和日本平民一条生路，苏军对虎头要塞的日军下达了最后通牒，敦促日军投降，并向日军派出劝降军使。可是丧心病狂的日军竟用机枪射杀了军使。苏军遂调集“喀秋莎”火箭炮、重型自行火炮等大炮，于8月19日向猛虎山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傍晚时分，日军地面工事全部被炸毁，各出入口几乎全部被掩埋。苏军将炸药、汽油从竖井口投入地下要塞，日军或被炸死或窒息而死。中、东猛虎山日军全部被歼。8月21日，西猛虎山亦被占领。但是，在虎啸山地下要塞还残存着不明战况的70余名日军。8月24日，这股日军利用傍晚暮色作掩护，将修复的速射炮运抵平顶山顶，对准苏军迫击炮阵地连发三炮。但因炮对镜损坏，未击中目标。苏军的炮火随后向平顶山轰击起来，接着便对平顶山实施包围，日军又退缩回要塞里。

5

8月26日，上午10时左右，一辆绿色苏联军车来到山脚下，一个戴参谋肩章的日本军官扛着白旗从车上走下来。这是苏军从已被解除武装的关东军

第3军司令部调来的情报参谋河野真夫中佐。苏军让其向仍在地下要塞顽抗的日军传达天皇投降诏书，命令他们投降。

河野真夫走入要塞的一个入口处，挥动白旗对坑道内的日军高喊：“我是第3军司令部的河野参谋，带来了关东军的命令……15日天皇下了终战诏书，战争已经结束了。请诸位忍泪尽早停止战斗！你们打出白旗，炮击就会立即停止！”

直到下午3时30分，日军虎头守备队仅剩的53名官兵，打出白旗走出坑道，向苏军投降。由于昼夜持续作战，日军官兵一直都没有洗过脸，当 they 从阵地里走出来时，浑身漆黑，只有眼珠没有污垢。这支关东军的精锐部队败得竟如此凄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场帷幕终于在虎头要塞落下了。这次战役整整使二战结束的时间拖后了11天。日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0多名日军官兵及日本侨民（日本守备队为1387人），除53人生还外，全部葬身于虎头要塞中。参加虎头要塞攻坚战的苏军先后投入两万余人，也付出了1000余名官兵的生命。

十二 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屠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8月17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停止战斗行动。但有些地方的日本侵略军仍然没有放下屠刀，在仓皇逃命之时，竟然继续疯狂屠杀中国居民。

在黑龙江省昂昂溪南嫩江西岸，有个村庄叫三家子屯。当时属景星县头站区（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日本宣布投降一个月后的一天，几个日本兵闯进了三家子屯。他们声称没有饭吃了，要用两只步枪和三百发子弹换些钱。村民给了他们钱后，日本兵却只交出了枪，说什么也不给子弹。双方发生了冲突。冲突中，几个日本兵被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走了。

这两个逃跑的日本兵正好遇上了从王爷庙（内蒙古乌兰浩特）来的近400个没有完全解除武装的日本兵。于是，日军对三家子屯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三家子屯的幸存者陶永富老人回忆说：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日下午3点多钟。日本兵害怕开枪暴露目标，先后杀了83人，就开了一枪。剩下的全是用刀砍。全屯只有3个幸存者。

2

与三家子屯隔嫩江相对的是申地房子（现属黑龙江省泰来县，又称申家窑）。也有日本兵到这个屯子要吃的东西。老百姓没有给，并拒绝他们进村。日军记下了仇。

血洗三家子屯后，他们就过了江，对申地房子也进行了大屠杀。麻荣春是申地房子屠杀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农历八月十九的晚上，听说三家子屯让日本鬼子血洗了，全村人准备天一亮就跑。没想到，后半夜，忽然听见屯子里乱了起来，从窗户一看，外面全是日本兵。结果，这个屯又有 80 多人被屠杀，全屯仅有 3 个幸存者。

三家屯子和申地房屯合计有 160 多人被日军杀害。

据 86 岁的事件亲历者王郁文老人回忆，当时王郁文的父亲去申家窑请医生，可是一去不返。他听说日本人血洗了申家窑，便去申家窑找父亲。途中遇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身上已经中了数刀。屯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王郁文进到屯子里一看，发现屯子里到处是死人，一座大房子里，死人堆得有一米多高。

3

距离申地房子不远的大平房村，也同三家子屯和申地房子屯一样，遭到日寇屠杀。当时荷枪实弹的 100 多日本兵从东、北、西三面包抄过来。进村后对中国人是见一个杀一个，远的开枪射击，近的用刺刀挑死。一名有身孕的妇女藏进草垛也被日军搜出来剖腹。大平房村的老弱病残几乎全被杀死。人们只能向南面逃，但过树林子便是滔滔大凌河。正值汛期水深湍急，无法渡河。人们只好躲在树林里，被日军发现后被用机枪扫射而死。这批日寇在血洗大平房之后，将全村房屋全部烧毁。据统计，大平房村被血腥屠杀 84 人，被烧毁房屋 246 间。

4

三家子屯幸免于难的陶永富带着伤去临屯找人救助。这时天已经亮了，远远看见有一队铁甲车开过来。他认出了这是苏联红军，就摘下帽子摇晃。苏联红军将他扶上车，给他包扎，并问了屯子的情况。原来，这股日军是拒不缴械的死硬分子，这些红军正在追缴他们，听到枪响就向这个方向追来了。

陶永富为红军领路到了嫩江边时，日本强盗已经血洗了申地房子。苏联红军从望远镜里能看到这些鬼子，有的正抽烟，有的在擦刀，有的在休息。

苏联红军官兵立即用无线电与上级联系，请求支援渡江设备。同时向日军开炮轰击。

随后，4 辆卡车运送的一连苏联红军官兵，从西边朱家坎（今龙江县城）方向开来。红军开始渡江向嫩江对岸发起进攻。一阵炮击后，有约 30 名日军假装投降。苏军放松了戒备，由坦克开路，步兵跟着前进。行进至申地房子屯前大道时，忽然，大队日本兵从一道土壕后面蹿出来了。

原来，这些日本兵的子弹已经不多了，又害怕开枪暴露目标，他们是想等红军靠近了用刺刀展开白刃战。日本兵嗷嗷怪叫着，端着刺刀冲了上来。苏联红军猝不及防，重兵器用不上，只能与日本兵肉搏。许多红军用的是冲锋枪，没有上刺刀，只能用枪托拼杀，



被日军屠杀的村民尸体堆积在河滩上



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战斗十分惨烈。

后来，大兴、富拉尔基、昂昂溪的红军援军赶到，将日本兵团团包围，才将这批杀红了眼的日寇消灭。此战，歼敌 300 多人，战斗中有 20 多个日本兵冲出了包围圈，向东逃走，后来在泰康被消灭。

这次战斗，苏军少尉级以上军官 13 名，上士以下士兵 111 名，共 124 人英勇牺牲，血染中国大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献出生命的一批苏联红军官兵。

据幸存者陶永富、麻荣春、王郁文回忆，申地房子战斗的时间应该是农历八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历的 9 月 25 日。这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一个多月，距 9 月 2 日日本投降签字也已经有 20 多天了，比苏军攻克东宁虎头要塞的 8 月 28 日晚了将近一个月。

十三 接受日本投降

1

8月19日上午10时，延安，瓦窑堡，八路军总部。

朱德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镜，手握铅笔，神情专注地修改着一份文稿。

此时，窑洞外传来了爽朗的笑声，紧接着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军长陈毅走了进来。

陈毅快步走近朱德，伸出双手：“朱老总，你好啊！”

朱德放下笔，站了起来：“你是人未到声先到嘛，快坐。”

陈毅看着桌上的文稿：“老兄，你这是做啥子呢？”

朱德：“我在审阅修改发给美、英、苏三国的说帖文稿。小日本投降了，可蒋介石三番五次电令，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他命令日本人只准同他的中央政府交涉。这样，日本军队即便陷入我军的重围，也不敢言降。所以，主席提出以八路军总部名义给美、英、苏三国大使发一说帖。剑英他们早上交给我的。”

叶剑英：“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表明中国有两个战场。国民党政府及统帅部不能代表我党领导的解放了的沦陷区和抗日力量。二是，我军不仅有权接受被其包围的日伪军投降，而且应派出代表参加各盟国接受日本政府的投降。三是，鉴于抗战已经结束，美国应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

陈毅：“好嘛，我们的老总和总参谋长又在向美英苏三国发布命令了。就是得给他们点脸色看！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接受日本军队投降。”

朱德：“我的陈老总，近几天你们在华东打得很热闹呀，一股脑儿夺取了五六十个城市，桃子抢得不少嘛！”

陈毅：“我们是按照你老总和总参的命令行事嘛！但和伯承、小平、向前、荣臻他们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哟！”

朱德：“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大后方，而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都在抗日最前线。我们就近向日军大规模地展开受降非常方便，而蒋介石他们鞭长莫及嘛！”

2

1945年8月19日下午2时，日本东久新内阁派往马尼拉面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以梅津的副手、陆军副总参谋长河边虎四郎中将为首的代表团乘车来到羽田机场。

16人的代表团分乘两架小飞机在东京湾上空转了几分钟后，在木更津机场着陆。机场上停着两架弹痕累累，涂上白颜色并画了绿色大十字，代号“贝蒂”的三菱轰炸机。

代表们登机后，飞行员打开密封的命令：目的地伊江岛。两架“贝蒂”一同南飞。

“贝蒂”飞临九州上空时，一队美军标志的飞机迎面飞过来。日机发出暗号“巴丹”。对方回答：“我们是‘巴丹’的守卫，跟我们来。”

到达南太平洋伊江岛时，在伯奇机场登陆。

日本代表们步出飞机，好多美国海陆军官人员涌上来，把他们围住，抢拍照片。

在机场上休息片刻，换了一架四引擎C-54型美国飞机。天黑时，C-54飞抵马尼拉尼科尔斯机场。河边将军率领代表团成员穿过停机坪，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翻译科长西德尼·马希比尔上校跟前。早在战前就认识马希比尔的冈崎伸开双手向马希比尔走来，后者右手挥拳，把大拇指朝上，作为非正式的行礼。

然后，马希比尔陪着日本代表团在机场门口会见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此时，数千名士兵、居民和新闻记者围上来观看、拍照。

河边同威洛比同乘一辆轿车前往马尼拉市区。街道两旁挤满了好奇的人

群，不少人对日本人仍怀有敌意，冲车队高喊：“八格牙路！”

下车时，日本人目不旁视，笔直地望着前面，规规矩矩地走向下榻的马尼拉饭店附近的罗萨里奥公寓。

8月19日晚7时，马尼拉市政厅。日本代表团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就座，对面坐的是美国军官。河边面对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而坐。

萨瑟兰宣读麦克阿瑟第一号总命令：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指示，现将各地日本投降事宜指定如下：

1. 中国、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的日军由蒋介石总司令受降。

2. 满洲、萨哈林南部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由俄军司令官受降。

3. 东南亚、北纬16度以南的印度支那和从缅甸至所罗门群岛由英国蒙巴顿勋爵或由澳大利亚的司令官受降。

4. 日本、菲律宾以及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由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受降。

5. 太平洋的其他地区由美国尼米兹海军上将受降。

6. 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

7. 命令日本代表详细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人肉鱼雷”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交付盟军最高司令部。

8月20日上午，在马尼拉市政府大厅继续举行会议。

萨瑟兰将军交给河边一份要由天皇裕仁发表的投降文件草案。

河边没接住落在桌上。他小心谨慎地捡了起来，然后郑重地交给他的助手、纽约大学毕业的大竹雄少尉：“牙克塞！（译出来）”

大竹拿起文件从头翻译：“我，日本天皇裕仁……”大竹脸上变得苍白。

河边一边听，一边盘着双手，闭着眼睛，听到天皇自称“我”，而不是“朕”时，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听到“奥瓦里（完）”，他便在桌子上一拍说：“希马依！（完蛋）”

马希比尔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明白，给天皇写那样不加虚饰的词句是

很大的污辱。他当即用日语说：“最高司令并不是有意在日本人心中贬低天皇。各位不要介意文件中的某些措辞。你们可以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以习惯用的结尾，自己起草。”说完，他向旁边的威洛比将军作了解释，威洛比点头同意。

这时，冈崎用英语说：“威洛比将军，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真的无法向阁下解释究竟有多重要。”

接着，萨瑟兰将军对河边说：“麦帅决定进驻日本本土的第一站是横滨，要在那里建立一个临时司令部。要求在8月30日前，受命你们代表团经办，保留新大饭店供盟军使用和向盟军司令部官员提供经厚木到横滨的运输工具。”

河边听后立即语塞，面露难色，望了望身边的代表们，然后站起来向萨瑟兰将军鞠了一躬：“将军，对盟军司令部首先进驻横滨，我认为可以。但令人忧虑的是，到横滨须在厚木机场着陆。就目前形势来说，对盟军的安全不敢保证。”

萨瑟兰：“难道机场上的神风队飞行员还敢对盟军造次吗？”

河边擦了擦前额的汗珠：“厚木机场驻有上千名曾经拒绝投降的神风敢死队员，在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当天，他们曾聚众哗变，拥进皇宫广场，杀死了帝国警卫队司令官，放火烧了铃木首相的官邸。现在，这帮人的情绪不一定稳定下来。何况，机场附近还驻有25万名荷枪实弹的陆海军士兵，恐怕……”

萨瑟兰苦笑了一声：“这厚木机场的情况，我们已经认真讨论过，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坚持要在那里着陆。命令已下达，坚决不能改变。至于安全问题，请代表团转告日本政府，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加以保证。”

河边无可奈何地：“是，是！我们一定保证盟军司令部着陆的绝对安全。”

3

8月20日下午1时，一架苏联运输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越过嫩江平原和黑龙江，向北飞去。

机舱里，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坐在第三排，手拄战刀，正闭目养神。在他后面坐着苏军航空兵少将达维耶夫。

作为日本关东军降使的秦彦三郎神情甚为疲惫，原本梳理得很齐整的黑鬓，显得有些枯乱、灰白。一路上他始终双眼紧闭，一言不发。

飞行近两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苏联的加利阔沃机场。

当夜，在机场附近的一所兵营里，苏、日两国军方开始了停战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有：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第1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诺维科夫一级空军元帅，太平洋舰队司令尤马谢夫上将，西特维科夫大将以及司令部参谋人员。

日方只有秦彦中将和两名参谋人员。

双方在长方形会议桌前坐定后，秦彦中将站起，将日方拟订的投降条款恭敬地捧送给坐在正中的华西列夫斯基。

华西列夫斯基接过文件，淡然地搁在一边，先声夺人地问道：“请问秦彦将军，我们在牡丹江和掖河的日军阵地，发现了大批被屠杀的贵军的眷属，据说是你下的命令，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们怕家眷落入贵军之手，故而自愿尽忠。”秦彦有些慌乱，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华西列夫斯基咄咄逼人地：“自愿？为何自愿却是被人为地屠戮，连老人妻儿都不放过，这是自愿所能搪塞的吗？”

秦彦屈服地垂下了头：“是本官下达的命令，与其受贵军凌辱，不如死于自己人的刀下。”

“我们何时何地凌辱过俘虏、军眷？你是根据什么来判定我们会凌辱他们呢？”

“是的，这完全是鄙人对贵军的曲意理解。”

华西列夫斯基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先前报来的投降条款已经看过，我无法给你更多的时间，20日20点前，是最后的期限。在这之前，你们要放下所有的武器，停止一切抵抗，并在阵地前竖起白旗，等待我军接收。如届时有违抗者，我们将视为拒降，无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

秦彦连连点头称是。

华西列夫斯基满意地瞥了左右一眼，授意工作人员拿出苏方拟订的日军投降条款，对秦彦说：“上述条件，你既然已经答应，就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吧！”

秦彦接过文件，粗粗扫读了几眼，费力地吞下一口唾沫，恳请说：“我

希望在上述条件中补充三点，一是在表明保证我将士、眷属及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还应标明送返回国的时间。二是千岛群岛守军不属关东军管辖，我无权代表其投降。三是为使我军将佐人格不受污辱，可否准其佩戴军衔和战刀。”

“不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断然否决。“败军之将，佩戴军衔何用？手持战刀，岂不是还要杀人吧？”

秦彦苦笑着坚持说：“将佐佩戴军衔，可以管束部队，不致使他们变成乌合之众，乱生祸端。佩挂军刀，只是一种威仪的象征。欲想杀人，不用军刀，照样可使人毙命。”

华西列夫斯基：“你说的有些道理。好，在部队接收整训之前，可以允许你们的军官佩戴军衔和战刀。另外，你要求的战俘和侨眷回归日期，我可以原则上同意，待双方进一步协商后再最后确定。但重要战犯不在上述条款之内。关于千岛守军投降问题，既然你不能代表，我军将视情况自行解决。”

秦彦用颤抖的手指，在投降书上签上了名字。

4

8月21日，中国湖南芷江。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城内家家户户高挂中国国旗，大书醒目“V”字的“胜利之门”彩楼矗立在城门口和要道上。连日来城内聚集的数百辆军用吉普军和其他军车使这个小镇沸腾起来。沿机场到城内“中国陆总”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调来的新6军士兵，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城内一群群军民挤满街头巷尾，要亲眼看看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的下场。

上午11时15分，3架银灰色盟国野马式战斗机押送一架机翼下涂着两个“红膏药”的双引擎飞机抵达芷江机场。一架盟军战斗机顽皮地向日机冲去，然后又拉开，地面上响起一片开心的嘲笑声。

11时20分，日机驶进保护严密的停机坪。“中国陆总”陈应庆少校前往接待。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身穿黄色夏季日本陆军制服，佩少将领章，低头立于机旁，向陈少校立正：“可否下机？”陈答：“全部下机。”

今井一行8人遂依次下机，规规矩矩地并排立在舷梯旁边，接受陈少校



今井武夫在阅读投降条款

逐个查阅名单和证件。日方代表共有 8 人，其中有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少佐参谋前川冈雄、译员木村辰男、甲川正治、机长空军少佐松原喜八、驾驶员空军上尉久保善多、通讯官空军上尉小八童正里。由宪兵检查随带行装后，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武夫等人个个神志忧伤，默然无语，举止呆板，任人拍照。上万名群众挥起拳头如排山倒海似的向日机涌去。“打死日本鬼子！”“砍日本鬼子的头！”“剮日本鬼子的肉！”“抽日本鬼子的筋！”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声，震撼了机场，震撼了雪峰山岳。

14 时 30 分，吓得战战兢兢的今井率前川及译员木村，在陈少校引导下坐上挂着白旗的两辆吉普车，到万寿宫晋见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

会见厅正面墙上缀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中间嵌一个金色大“V”字。在中山先生遗像下面离高墙两公尺处，横放条桌，上覆白布。桌后居中坐着萧毅肃，其左边坐着陆总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及新 6 军高级官员，右边坐着身穿全新哗叽制服的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波特勒将军。其他中美军官和中外记者百余人另坐在大厅两侧。

洽降会开始前，萧毅肃中将站起来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已经从云南昆明迁来芷江，这里就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接着，一位国民党军官走到会场另一端拿起话筒：“立刻把日本代表带进来！只准 4 个人，那个参谋长、两个参谋和那个翻译。”停了一会儿，又说：

“不准他们带武器！”

不一会儿，门口传进“来了，来了”的声音，萧将军传令：“带他们进来！”

今井等4人鱼贯而入，走到桌前，面对主席台深深鞠躬。萧将军冷漠地说：“请坐。”今井等人小心翼翼地坐在为他们指定的桌旁。

萧将军首先介绍：“本人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今天我全权代表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你们。”

然后分别介绍了冷欣中将与美国波特勒将军。随后以命令的口气说：“现在请日方代表说明身份，并递出身份证明书。”

今井简单介绍自己身份后说：“鄙人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做联络工作，无权作决定，无权在文件上签字。日本政府遵照天皇圣谕，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已派代表去马尼拉接洽停战事宜，驻华派遣军由鄙人代表前来接洽停战。”

萧毅肃中将极不耐烦地打断今井的话：“你怎么答非所问？我问你有没有带来身份证明书？”

今井刚欲解释，波特勒将军挥手制止：“对不起，等英文译完后再说。”

今井抬头看了看萧将军的脸色后，才将代表身份的特别命令呈了上去。

萧将军看完后说：“你带没带来电报上所指定的表册？”

今井：“只带来一份地图，但近日东三省军队向华北调动的详细情况还没有在地图上标明。至于台湾和越南的情况，因不属冈村将军管辖的地区，没有在地图上注明。”

今井说完，命令桥岛芳雄呈交了驻华派遣军的图籍表册、无线电联络时间及呼号波长表。

接着，萧将军向今井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将正本交今井收讫。今井用毛笔在领受证上签名，加盖图章。

萧毅肃询问：“第一号命令中规定，日军只准向蒋主席的政府军投降，除此之外，不得随便交出武器，日军遵守与否？”

今井紧皱眉头：“中将阁下，目前在华北、华东等地区，中共部队正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有些部队遵照冈村司令命令，拒绝向他们投降，受到了极大伤亡。而有的则不得不向中共部队……”

萧毅肃：“我已再三申明，日军只准向我们国军投降。麦克阿瑟将军也向日本政府及大本营下达了同样命令。因此，除受命于何总司令者外，其他

人如要接收，可一律视为土匪，给予坚决回击。”

今井鞠躬施礼：“鄙人将向冈村传达萧将军之命令。”

5

8月22日，长春，日本关东军东城演习场。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率领97名将领、1500余名校佐，在这里举行投降仪式。

上午9时许，日军将佐在演习场上集结完毕。他们身着崭新的呢料军装，手戴雪白手套，足蹬擦得锃亮的高筒马靴，腰挂战刀，按照编制和军衔的高低，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垂头肃立、一动不动，等待受降。

片刻，苏远东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诺维科夫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乘坐8辆吉普车，缓缓驶进了演习场，在正中的阅兵台前下了车。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首先走上阅兵台，宣布受降开始。会场上的日军迅速整齐地脱帽。

在激越、悠扬的苏联国歌声中，苏联国旗徐徐升起。



日本关东军一部等待受降

升旗仪式结束后，山田乙三走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面前，将关东军的编制、武器、人员名单和序列表册呈送上去。

华西列夫斯基走上阅兵台，发表讲话：“现在，我代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接受日本关东军投降。日军接到命令后，不管所处何位置，遇到何情况，都必须立即放下手中的武器，原地待命，等待苏军进行整编、接收。在苏军接收部队到达之前，日军应按照原编制序列由原司令官管束。任何人不得擅自离部队驻地，不得损坏武器、装备，不得滋扰平民，如有违者，严惩不贷。”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日军将士们，你们的战争是彻底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你们缺乏战斗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也不是因为你们武器装备的落后和战术、技术上的错误。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们进行的战争是破坏人类进步、毁灭人类和平的法西斯战争。作为参加这场战争的大多数官兵，你们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除罪大恶极的战争策划者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外，你们都将获得释放。你们同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团聚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希望你们能深刻地反思这场战争，永远不再拿起武器。……”

华西列夫斯基走下阅兵台后，广场上的日军一个个抱头痛哭。



放下武器的日本关东军

中午1时，练兵场上42面军旗被堆集在一起，在《君之代》国歌声中被浇上汽油，引火点燃。山田大将以下几百名将佐，泣咽着向火焚的军旗敬礼。

焚旗仪式中，枪声不断，惨呼不止，有20多名将军拔枪自杀，倒在了血泊之中。

山田大将丝毫不为所动地肃立在那里，茫然地凝视着化为灰烬的军旗。

此前，在8月18日傍晚，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的空降兵就占领了哈尔滨机场和市内重要建筑物。苏军进入沈阳后，5000多名日军缴械投降。8月20日，关东军第5军司令官清水，带领5名将军到牡丹江苏联红军第1集团军指挥部，向苏军投降。8月22日，日本关东军第4军4.3万人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

近半个月的满洲战役，关东军被击毙8万余人，59.4万人向苏军投降，其中有将官148人。苏军共缴获坦克600辆，飞机861架，火炮、汽车等不计其数。

从1905年建军，具有40年历史的日本关东军从此消亡。

6

8月28日上午9时，南京。冈村宁次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同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宴请中国陆总副参谋长冷欣中将。

冈村举杯：“欢迎冷欣将军代表蒋主席前来南京筹备受降典礼。我们早就盼望国军来受降了。前几天接到苏北新四军指挥部的通牒，命令皇军派代表前往天长接受投降，我断然拒绝。这几天皇军在华北、华中前线仍与八路军、新四军遭遇。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进行抵抗。”

冷欣放下酒杯，站起来向冈村宁次敬礼：“我代表蒋主席感谢您。蒋主席要我到南京，一是筹备受降典礼。二是代表他向坚守岗位的皇军慰问。如果没有皇军的大力支持，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太原早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冈村：“我们皇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同蒋主席和国军合作到底。”

冷欣：“向贵总司令送交何总司令备忘录7件。其实施程度如何，请提出书面报告。”

冈村：“此事已责成今井少将负责，将由该员向贵官及何应钦将军提出书面详报。”

冷欣当场向冈村交付备忘录，冈村阅签后说：“请转告何总司令尽快派出优良国军进驻华北和平汉、津浦两路北段。此乃当务之急。”

冷欣：“将立即向何总司令报告。但要求贵官命令所属部队坚守岗位，继续维持当地治安。”

冈村：“鉴于天皇已下达诏书，战争业已结束。虽尚未签降，而日军投降实际上业已形成。不宜过久地担负同中共接触地区的防守任务。希望尽快派部队接防。”

冷欣：“请放心，何总司令已决定新6军从8月30日开始向南京空运。”

7

8月28日晚8时，东京，皇宫御文库。天皇同新任首相东久迩宫亲王、内大臣木户在议事。

裕仁：“美英中苏四国政府已决定于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麦克阿瑟将军定于30日到达横滨。现在，必须马上决定代表我受降的人选，这是我们面临的头等大事。朕考虑了数日拿不定主意，还得请亲王和内大臣综合朝野呼声提出意见。”

木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自愿承担这一差事。”

裕仁：“在此国难当头之时，难道就没有一个内阁成员挺身而出？”

木户：“东久迩宫亲王刚就任首相，最能代表我国政府和天皇，但因同圣上是近亲，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其次的人选是副首相近卫文磨亲王，但近卫亲王回避了这个痛苦考验，坚决拒绝承担这个任务。眼下呼声最高的是重光葵外长。他在这以前曾两次出任外相，也就是在东条内阁后期以及随后的小矶内阁时期任过外相。他是一位抱有坚定的和平观点的大臣，在其任职12个月期间，曾尽最大努力为早日结束战争做准备。现在看来，他的努力对于加速和平的恢复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又是现任外相。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合适人选。”

裕仁：“重光葵君他愿意替朕承担这一职责吗？”

木户：“我和东久迩宫亲王在近两天内分别同他谈过。他是一位非常忠于陛下的大臣。他表示在此紧要关头能出任首席代表，是忠君报国的最好机会，是最大的荣幸。”

东久迩宫亲王：“重光君确实同那些厌恶和回避这个难堪使命的人不同。他认为此项工作虽然痛苦，但却是非常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他表示，决心要使这个国耻成为走向和平国家这个目标的复兴历程的出发点。我看可以钦命重光葵担当此任。”

裕仁：“难得重光葵君如此顾全大局，那就定下来吧。至于副代表从军方挑选，看谁合适？”

木户：“军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梅津总长，现在他是大本营的唯一首长。但他是一位只下命令而不提请求的军人。他直到最后还反对结束战争行动。我同东久迩宫亲王同他提起此事时，他竟气得脸色发白。他说如果强迫他当代表，他就立即剖腹自杀以示抗议。”

东久迩宫亲王：“我看梅津总长也是最忠于陛下的人，如果圣上能亲自出面劝导，他最后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

裕仁深深叹了口气：“对梅津确实是勉为其难哪！但军方也只有他最有资格担当此任。再说，他出面代表政府受降，对陆军一些至今思想有抵触的军官们也是一种示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只好朕亲自召见，当面委托了。”

东久迩宫亲王：“两位首席代表定下来，其余随员我同内大臣负责，从外务省和陆军部、海军部选定吧！”

裕仁：“最后定下名单之后，立即告四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

8

8月30日下午2时许，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乘飞机赴日本横滨，机首配有“巴丹”标记的C-54专机翱翔在镰仓大铜佛的上空，越过美丽的富士山，向厚木机场盘旋而下。

从机舱内可以望见机场内林立的防空炮位，盟军最高统帅的座机完全暴露在高射炮的射程之内。

随机的随从们都屏住呼吸，胆战心惊地望着地下那些对准上空的炮位。而麦克阿瑟却平心静气地坐在那里，同他的军职秘书邦纳·费勒斯准将谈话：“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要分散统治权力，赋予妇女选举权。”

费勒斯：“那样日本男人会不高兴的。”

麦克阿瑟：“我不管，我要使日本军方名誉扫地。妇女不要战争。”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日本军乐队立即奏起迎宾曲。麦克阿瑟口叼玉米芯烟斗步出机舱，他在舷梯上停了一两秒钟，抽了几口烟，像旅游者那样举目四望，天空碧蓝，点缀着朵朵白云，阳光晒在机场上，混凝土跑道和停机坪由于暴热而闪烁着微光。

麦克阿瑟自言自语：“这就是结局。”

机场上停着另外几架美国飞机，地面上少数武装的盟军看起来是一支小得吓人的部队，人数不多的军官等待着欢迎麦克阿瑟。

当天中午率第 11 空降师大部队接管机场的艾克尔伯格将军上前同麦克阿瑟握手。

麦克阿瑟平静地说：“噢！鲍勃，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条路好像是走到了终点。”

艾克尔伯格将军将麦克阿瑟领到停机坪上一大串破旧的车辆前，登上一辆美国林肯牌汽车。其他随从军官也相继在其他破旧汽车里找到了各自的座位。然后，由一辆行驶时发出惊人爆裂声的红色消防车引路向横滨驶去。

从厚木机场到横滨 15 英里的车行道的两侧，有两个师团约 3 万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站成长行，背朝着麦克阿瑟的军队，以示致敬。他们这是在严格按保卫天皇的方式来保卫盟军最高统帅。

横滨市内商店都关上了门，百叶窗都拉了下来。马路上没有任何机动车行驶，许多人行道上杳无人迹。

麦克阿瑟车队沿着空旷的大街来到新大饭店。这座饭店是一幢宏伟的建筑物，是在原有房子毁于 1923 年地震之后建造起来的。它是在大轰炸中少数几个未遭破坏的建筑物之一。

饭店经理和几十名工作人员几乎匍匐在门口两旁，迎接盟军最高统帅入住。

麦克阿瑟下车后，立即被经理引到事先为他选定的豪华套房。

麦克阿瑟刚坐下，几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日本女人便涌进屋里，有的端茶，有的递烟，有的拉麦克阿瑟的手，有的竟然要给他按摩。麦克阿瑟猛地将手中的烟斗一挥，厉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谁叫你们来的？”

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柔声用英语回答：“我们是‘游兴会’的，自愿来服侍盟国将军！”

麦克阿瑟：“你们有多少人？”

美女：“80 多人。”

“滚！”麦克阿瑟大发雷霆。“游兴会”美女们一个个吓得哆嗦着退了出去。

麦克阿瑟坐下来对聚集在他房间里的军官们说：“弟兄们，这是军事史上最大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军队，要看管住 19 个全副武装的师，还有 7000 万疯子。况且，日本国内尚有 300 万武装部队没有放下武器。只要走错一步，历史上的悲剧就会重演。”

9

8 月 31 日晚 6 时，横滨新大饭店餐厅。麦克阿瑟等正在吃晚餐。副官进来报告：“威恩莱特将军已经到了饭店，正在大厅等候接见。”

麦克阿瑟马上站起来走向大厅。老态龙钟的威恩莱特站在大厅里。他双眼深陷，两颊凹进，头鬓雪白，皮肤像旧鞋皮面一样。他的有褶痕的又宽又大的军服，挂在他那瘦得皮包骨的身上，步履艰难，拄着手杖。

麦克阿瑟上前拥抱这位在日本监牢受难三年的幸存者。威恩莱特勉强笑了笑，试图说话却一时发不出音来。

麦克阿瑟百感交集：“得啦，瘦皮猴！”说着，将双手搭在威恩莱特的肩上。

威恩莱特哽咽地：“将军。”

麦克阿瑟深情地：“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两位将军在沙发上紧挨着坐下来。

威恩莱特眼含泪水，用微弱的声音说：“当年我放弃科雷吉多，为您和美利坚丢了脸……”

麦克阿瑟：“吉姆啊，你千万别这么说！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迫不得已嘛！”



在横滨麦克阿瑟与威恩莱特将军重逢

威恩莱特：“我总感到羞愧难当，痛不欲生。”

麦克阿瑟：“现在我们胜利了，你也回来了。我们该好好庆贺一番呢！”

威恩莱特用双手紧握麦克阿瑟的手：“胜利了，你首先安排营救我……可我再也不能领兵打仗了！”

麦克阿瑟：“吉姆，你放心，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威恩莱特那瘦削的脸上流露出无比敬仰和无限感激的表情：“将军，我现在是想再能指挥一支部队。”

麦克阿瑟：“吉姆，你什么时候要你原来的部队，它什么时候就是你的。”

10

9月2日，东京湾。一列又一列的灰色战舰，有重型的，也有轻型的，以庄严雄伟的阵式停泊在这里。



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国第三舰队旗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

战舰上方，是彩旗的海洋，海面上洋溢着一种浓厚的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在密密麻麻的战舰群中，屹立着高于其他舰只的四万五千吨的战舰——“密苏里”号旗舰。这艘曾在硫磺岛、冲绳岛登陆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舰灰色的舰身被油漆一新，16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旗杆上一面曾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开战那天挂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的国旗在迎风飘扬。一排排身穿雪白耀眼制服的美国水兵聚集在舷侧栏杆里面。整个“密苏里”号上任何能立住脚的地方都站

满了人，有的水兵和记者甚至爬到桅杆、烟囱和炮塔上。各国代表和将领穿着整齐的制服，佩戴着五颜六色的勋章和绶带，把甲板映衬得光彩夺目。

7时30分左右，各国记者乘坐一艘驱逐舰首先来到“密苏里”号。

8时15分，“尼古拉斯”号驱逐舰把联合国代表团50名海军将领、50名陆军将领送上“密苏里”号。其中有美国史迪威将军、刚从中国四平监狱和马来西亚日本集中营解救出来的美国威恩莱特将军和英国珀西瓦尔将军，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8时20分，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将军陪着他的上司、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及其一行登上他的旗舰“密苏里”号。这时，主桅杆上升起尼米兹的蓝色五星将旗，扩音器里响起了《海军进行曲》。

8时43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随从人员乘“布坎南”号驱逐舰到达。麦克阿瑟将军的红色五星将旗在军乐声中冉冉升起，与尼米兹的蓝色五星将旗并排飘扬，显得格外醒目壮观。麦克阿瑟将军等登上“密苏里”号后，同迎接他的尼米兹和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将军握手致意，并被引进哈尔西的指挥舱中休息。

8时55分，早已等在附近的载有11名日本代表的“兰斯多恩”号驱逐舰接到信号后开了过来。

美国海军上校希比尔引导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日本外相重光葵首先登上“密苏里”号舷梯。15年前，在上海，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弹炸断，他用假腿走路十分艰难，每走一步都要呻吟一下，使跟在他后面的日本代表也都唉声叹气。当11名日本代表依次登上战舰右舷梯的走廊甲板后，被指定排成了三个短排，站在盟国高级将领们的对面，中间隔着一张铺有绿毡布的大餐桌，桌上放着两份白色的用英、日两种文字印制的投降书。

9时整，随着一声“全体立正！”舰上立即肃静下来。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牧师的祈祷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这时，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从舰舱中走上甲板。尼米兹站在徐永昌将军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位置；哈尔西列入海军将领组，立于首位。

麦克阿瑟神情庄重，气宇轩昂地走到桌子对面的一排麦克风前，并让威恩莱特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作为荣誉代表站在他身旁。然后，他开始致辞：

参战大国的代表们，我们今天聚集于此，缔结一项庄重协定，

以使和平得以恢复。不同的理想和观念的冲突已在世界各战场上有了最后的决定。所以，不用我们来讨论与辩论。我们在这里代表多数人民，所以也不要我们前来以猜疑、恶意以及仇恨的精神相见。不如说我们要，胜利者与失败者，都要上升至更崇高的尊严，只有它才符合我们行将从事的神圣目的，使我们所有人民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们在这里要正式承担的职责。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美好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讲到这里，麦克阿瑟直视着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要在这里提出和接受日本帝国武装部队投降的条件条款，都载于面前的投降文件中。现在我以盟军最高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总司令的代表在指定的位置签署投降文书。”

重光葵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旁坐下，慌乱地摘下礼帽和手套，不小心把手杖掉在地上。他顾不得捡手杖，赶忙拿起签字桌上的投降书仔细阅读，只见投降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不列颠帝国之各国政府首脑，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而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之参加宣言条款，并根据日本国政府、天皇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又述四国以后之为联合国。

余等这个布告宣称，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任何地方所有的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所支配下的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余等兹命令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臣民，即刻停止敌对行动，保存所有船舶及军用财产，且防止损毁，并服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及其指示，对日本国政府之各机关所课之一切要求，应予以应诺。

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于任何地方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由日本国支配下的一切军队指挥官，速即发布其本身或其支配下的一切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余等兹对所有官厅、陆军及海军的职员，命令其遵守且施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此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由其自己发出，或根据其委任发出的一切布告及指示，且命令该等职员除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委任，与解除其任务以外，均须留于各自原有地位，且应继续行使各个的非战斗任务。

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实施发表该宣言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及其他特派联合国代表下达之一切命令，且实施一切措置。

余等命令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刻解放在日本支配下的所有盟国战俘及被拘留者，给其以保护照顾和帮助，把他们送往指定之地点。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取认为适当措置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

1945年9月2日午前9时04分，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并根据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的命令且以其名义：

重光葵

根据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且以其名义：

梅津美治郎

重光葵看完投降书，向麦克阿瑟请示道：“麦克阿瑟元帅阁下，请问我和梅津参谋总长都以‘奉日本天皇之命令，以日本天皇的名义’签署文件，不知可否？”

麦克阿瑟断然回答：“不行！梅津美治郎必须代表日本大本营签署投降书！”

重光葵右手拿着笔，在投降书上来回摆晃，迟迟疑疑地好像不知道在哪里下笔。

哈尔西将军愤怒地说：“快签！他妈的！快签！”

麦克阿瑟转身命令他的参谋长：“萨特兰，告诉他在什么地方签字。”

在萨特兰指点下，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了字。

接着，代表日军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昂首挺胸地走到桌子前，连坐也没坐，就弯着身子草草地签了字。



日方代表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

临到麦克阿瑟以盟军总司令身份签字了。

他眉头舒展呼出一口长气，踌躇满志地高声宣布：“盟军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同日本作战的国家签字！”

麦克阿瑟回身对旁边的威恩莱特和珀西瓦尔说：“该我们签字了，请陪我完成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

两位在日本集中营受尽折磨，形销骨立的将军受宠若惊，眼含热泪，陪麦克阿瑟走到签字桌旁。

麦克阿瑟昂然坐到签字桌前，伸手从玻璃笔架上取下第一支派克金笔，挥笔在降书上写下“DOUG”（道格），然后把派克笔高高举起，高声宣布：“这支笔赠给美国将军威恩莱特。”威恩莱特伸出干柴一样的双手，泪流满面地接过了金笔。

麦克阿瑟从玻璃架上取下第二支派克金笔，挥笔写下“AS”（拉斯），又举笔站起，朗声宣布：“这支派克笔送给亲爱的英国将军珀西瓦尔！”然后把笔递给站在身后的珀西瓦尔将军，激动万分的珀西瓦尔毕恭毕敬的双手接过了笔，捧在双手中。

麦克阿瑟从玻璃架上取下第三支笔，龙飞凤舞地写下“MacArthur”（麦克阿瑟）。高声宣布：“这支笔赠给杜鲁门总统！”

接着，麦克阿瑟又先后用两支笔签署了他的官衔。当众宣布：“我决定把第四支笔赠给我的母校——西点军校。把第五支笔留给自己，赠给我的妻子。”

麦克阿瑟签完字后，高声宣布：“下面请各盟国代表签字！”

尼米兹将军代表美国，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布鲁斯·弗雷泽爵士海军上将代表英国，杰列维扬科中将代表苏联，托马斯·布莱梅将军代表澳大利亚，穆尔戈斯洛夫上校代表加拿大，雅加·勒克莱尔将军代表法国，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代表荷兰，艾西特爵士空军中将代表新西兰陆续签了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宣布：“现在，世界已恢复和平，让我们为上帝永远保佑它而祈祷。受降仪式到此结束。”

此时，近 2000 架美军飞机从天际轰隆隆飞了过来，在“密苏里”号上空掠过，形成一幅雄伟壮观的空中画面。“密苏里”号和周围的军舰上发出一片震耳的欢呼声，千万只彩色气球和和平鸽一齐飞上高空。

接着，麦克阿瑟就地向美国国民发表广播演讲：

各位同胞：今天，巨炮已经寂然停止了它们的怒吼！最大的悲剧告終了。我们获得了伟大胜利。天空中已再没有死神的降临，海



麦克阿瑟在投降书上签字

洋只能用于通商。人们只要是在有太阳照耀的地方，都可挺胸阔步。
全世界都为祥瑞的和平所笼罩，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11

9月8日，麦克阿瑟将军动身去东京。

上午8时，麦克阿瑟的车队从横滨出发了。一路上到处是战争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城镇变成了一座座巨大的废墟，很少见到一所完整的建筑。街道上到处是碎砖、烧得黑糊糊无法分辨的东西和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弹坑，空中弥漫着一种焦糊的气味。田野里一片荒芜，一块块整齐的田地长满了蓬乱的荒草，路上偶尔见到几个匆匆赶路的人，多是穿着破旧军服、满脸憔悴的刚被遣返的日军老兵。

麦克阿瑟的车队直接驶进坐落在东京繁华地段的美国大使馆。第11空降师的一支仪仗队在院内排成检阅队形等候检阅。在军乐伴奏下，麦克阿瑟下了汽车，健步走上遭到轰炸的办公大楼的台阶。他转身对第11空降师师长艾奇伯尔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吧！”

早已准备好升旗的士兵，迅速将1941年12月7日在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那面国旗展开，乐队奏起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国旗慢慢地升到旗杆的顶端。

在场的一大群美国军官的眼睛都湿润了。麦克阿瑟紧盯着国旗，眼眶里闪现着晶莹的光芒。

12

9月9日，曾经惨遭日军屠杀的六朝古都南京。

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南京城街头巷尾，人人喜形于色，到处呈现一派喜庆欢乐的景象。

从黄浦路口到中央军校大礼堂门前，沿着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竖立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边，并排站着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着哗叽制服、戴白手套、手持冲锋枪的新6军士兵。

黄浦路口有一座用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胜利和平”4个金色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大字。中央军校大门外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其下方悬挂一块红布横幅，上面写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闪闪发光的金字。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礼堂内的圆柱和廊柱上，都绕以蓝白红三色布条，并环插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和联合国旗。面对正门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国民党旗、国旗。大厅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水银吊灯。受降席和投降席后方各站立8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受降席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将领观礼席，就座的有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王樊功、李明扬、杜聿明、张治中、郑洞国、廖耀湘、冷欣、谷正纲、马崇六等战区长官，还有美国陆军少将麦克鲁、准将柏德尔、海军少将迈斯、柏勒列，英国海斯中将，法军上校沙尔，以及美、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官员。总计有中国陆军将级军官99人，海空军军官35人，盟军代表7人，国民党文职人员51人，国民党其他军官85人。受降席左侧为记者席，有中国记者52人，外国记者36人。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的4个巨型水银吊灯突然大放光芒。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由观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会场。紧跟入场的是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上将、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

8时50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在门外被卸下军刀的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將及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



日军投降仪式完毕，冈村宁次等垂头丧气地离开会场。

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本代表都剃了光头，脸色十分难看。走到受降席前排成一个横队，冈村居中，齐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示答，令冈村等人在投降席就座。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陆军总司令、受降主官何应钦宣布：“受国民政府委任，由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高级军政人员组成受降团，今天在这里接受日军投降。受降仪式现在开始！”

9时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冈村令小林浅三郎呈送。小林恭敬地走到何应钦面前，肃立鞠躬，双手向何应钦捧呈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

权证书和相关文件。何应钦一一检视后将其放在桌上，小林遂退回原位。

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本各一份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肃立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在一侧代其置砚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恭书“冈村宁次”四字，然后在其上衣右上方口袋内取出小型方章，轻蘸红色印泥，盖于名下，由于颤抖，把章盖歪了。小林再次走到何应钦面前，双手呈上降书。何应钦接过降书，经审视后一一签名盖章，将其中一份降书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冈村恭立敬领。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时09分。

9时10分，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交付给冈村宁次。冈村略为展阅即签署命令受领证，交由小林呈送何应钦。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8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结束。

何应钦即席发表讲话：

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月9日上午9时15分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13

9月9日下午2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秘密召见冈村宁次。

2时整，冈村宁次在小林浅三郎和今井武夫陪同下晋见何应钦。

何应钦在门口迎接冈村宁次一行。落座后，何应钦微笑着对冈村说：“签字仪式让阁下受委屈了。但在全中国和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这样做。这几年我们虽处于敌对情况，但我们是老朋友了。相信阁下能够充分理解鄙人的心情。一定请阁下谅解才好。”

冈村：“蒋主席对日本实行以德报怨的宽容政策，实在令吾等感动不已。请总司令转达鄙人与日本同人的感激心情。”说着站起来向何应钦鞠了一躬。

何应钦赶紧站起来恭敬地回了一礼：“实际上在中国战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冈村：“从总体上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是战败了，吾乃是败军之将，受此宽待，感人肺腑。”

何应钦：“按蒋主席第一号命令，从9月10日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阁下任总联络长官，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冈村又站起来鞠躬：“感谢蒋主席的格外关照和信任。鄙人一定在何总司令领导下，尽职尽责，以不辜负蒋主席的厚爱之情。”

何应钦：“蒋主席说对日战争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还要请贵军给予协助。”

冈村宁次：“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我们驻中国部队还有120万，装备齐全，趁现在尚未遣散，用来对付共产党还能起一定作用。我们军队连同有技术专长的侨民共有300万人。这么多人

一下子回到日本，不要说安置就业很难，就连吃饭也成大问题。与其回国无法生活，还不如在中国暂住一段时间，还可以替你们做事，希望中国采纳这个建议。”

何应钦：“阁下的建议同蒋主席不谋而合。美国人想独占中国，我们接受他们的美援，拒绝他们的大批军队。现在全部接收 120 万日军目标太大，影响不好。蒋主席的意思是以内部征用的名义，将航空、通信、情报、侦察、炮兵、工兵、汽车、后勤等方面的技术骨干留下来为我们服务。”

冈村宁次：“我们将按照蒋主席的指示办理，不日可将留用人员名册呈送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何应钦：“大约能有多少人？”

冈村宁次看了看小林浅三郎和今井武夫：“恐怕不下 15 万人吧。”小林和今井点头。

何应钦：“好吧，请快些作出安排。”

秘密会见结束后，何应钦设宴招待了冈村宁次一行。

14

9 月 11 日下午 1 时，日本东京，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私宅。

东条英机身穿短运动衫和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坐在桌前的摇椅里。

他一根一根地吸烟，书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他的手无目的地翻弄着桌上他自己的著作《战阵训》。突然，听到住所外边人声嘈杂起来。此时其夫人慌忙进屋来：“不好了，宅院门前已经被许多人围住了，有些人已拥进花园！”

东条英机沉着地站了起来：“请马上带着下女离开吧！”

夫人：“请多多关照自己，请多多关照自己！”说完带着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东条英机

下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走进街对面的一幢房子的花园里。

不一会儿，30多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包围了东条的住宅。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整个宅院被围得水泄不通。接着有两辆美式吉普车在门前停下。盟军总司令部保罗·克劳斯中校手执逮捕令按了两下门铃。

日本卫兵打开院门后，宪兵和记者一拥而入。此时楼门紧闭，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站在窗前的东条英机大声问：“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

克劳斯通过翻译说：“你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

东条英机：“你们有拘票吗？我要看拘票。”

克劳斯中校用手晃了晃逮捕令：“请把门打开，这里有文件。”

东条英机强硬地：“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满脸怒火地对翻译说：“告诉这个狗杂种，别再耽误时间，赶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东条英机：“请稍等一等，请我准备一下。”这时二楼的窗户“哐”的一声关上了。

东条英机进屋后，赶忙冲洗了一下身体，穿上崭新的军服。然后，取出已准备好的手枪，推弹上膛，对准了心脏部位的墨水标记。死亡的恐怖，使这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浑身颤抖起来。他长叹一声，闭眼咬牙猛扣扳机。时为下午4时17分。

听到从楼上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克劳斯领着宪兵向楼上跑去。克劳斯撞开楼门，与《纽约时报》记者乔治·琼斯同时冲进了房间。只见东条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染红了大半个白衬衫，眼鼻嘴挤在一起，痛苦地呻吟抽搐。右手还拿着一支0.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克劳斯：“不许开枪！”只听“当啷”一声，手枪落到地上。东条英机身不由己地歪倒在椅子上，左脑流血如注，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他向跟进来的一个日本警官要水喝，一杯水几口就喝下去了。

一名美国记者问：“你为什么自杀？”

东条吃力地说：“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我对不起天皇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

美国记者：“据医生检查你在心脏部位画了标记，这说明你早已做了自

杀准备。”

东条：“是的，但自杀有时是会失败的。真遗憾，若事前有一点消息，时间充足，是不会不成功的。”

记者：“你是职业军人，又在胸口上做了标记，为什么自杀会失败？”

东条：“……也许年岁大了，标记的地方皮肤下垂，子弹打偏了。”东条说这话时，眼皮下垂，显得很不自然。

日本记者长谷川凑上来恭恭敬敬地问：“大将，你有什么遗言？”

东条痛苦地咧着嘴说：“请对麦帅说：我自杀是为了不愿受辱！”

拥进来的记者们争相拍照。不一会儿来了辆救护车，东条被送往医院救治。

由于流血过多，需要大量输血。一位美国军官主动要求为东条输血，一连输了两次。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给战犯输血？”军官回答：“我要使这个战争狂人活下去，通过法庭审判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让他安安稳稳地死去，那就太便宜他了。至少，我要向他清算因他挑起的太平洋战争，而使我在新几内亚岛上吃了17个月苦这笔账。”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派美国第8军军长艾克尔伯格来到医院，指示院方将东条英机救活，使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院方竭尽全力，用尽方法，终于使东条英机脱离了险境。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15

9月15日午夜，东京商业区第一大厦，盟军总司令部。

麦克阿瑟同参谋长萨瑟兰讨论如何对待日本天皇问题。

麦克阿瑟：“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对天皇的处理和对天皇制的态度。这

是我们在占领之初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萨瑟兰：“应该很快拿出一个正确稳妥的意见，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决定。英国人，特别是苏联人，强烈要求处死天皇裕仁，废除天皇制度。斯大林元帅在接见参议员克劳斯·佩珀时说我们对日本的占领过于软弱。美国国内报纸和电台正掀起一场反对保留天皇制的激烈运动，得到许多美国公众的响应。这真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

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我已经得到总统授予在日本处理一切的绝对权力。只要下一道命令，就会置天皇于死地。”

萨瑟兰：“在盟国最初开列的战犯名单上，天皇裕仁列在首位。整个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天皇是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对战争的进行有着重要的、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逮捕他、审判他，乃至把他送上绞刑架，都不为过。”

麦克阿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皇一个人，而是将近亿万日本民众。而天皇同他的全体臣民有着神圣的血肉联系。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日



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

本的文明是一种 20 世纪的文明。但是，实际上它却更近似一个封建社会。神权政体在西方世界已彻底声名狼藉，而它依然存在于日本。在日本民众中认为天皇是神，普通的日本国民甚至不敢抬头仰望他。同时，支持天皇政权的是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一批掌握经济命脉的家族。所以，我们不能听从国内外舆论，凭感情用事，而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萨瑟兰：“将军的意思是……”

麦克阿瑟：“罗斯福总统生前早就指出，应巧妙地利用天皇的威望来统治日本。虽然我们用水战争打败了日本人，但我打算运

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来赢得他们。我认为不能把天皇同东条、梅津那些人等同起来。必须保护天皇政体以及天皇本人，使他不受任何伤害，尤其是精神上的伤害。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广大日本民众的心，才能保证对日本的改造以和平的方式实施。把天皇作为战犯逮捕、审判或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到那时我们至少要增加 100 万占领军和几十万行政官员。”

萨瑟兰：“看来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英明正确。保护了一位天皇，争取了日本民众，稳定了社会秩序，可以省去 100 万占领军和几十万行政官员，我们何乐而不为？”

麦克阿瑟：“所以，赶紧起草报告给华盛顿，力陈保留天皇制和保护天皇本人的种种好处，坚决反对和抵制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同时，起草尊重和保护天皇的命令，对天皇的待遇不能有任何降低之处，凡是一位君主所应得到的礼遇都要给他。”

萨瑟兰：“有些参谋人员认为，我们到东京后，天皇一直没有动静。强烈要求把天皇召到司令部来进行传讯，以显示我们的权势，看来这个建议不能采纳了。”

麦克阿瑟：“如此做法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而使天皇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殉道者了。不能这样做。我将等待，到时候天皇会自动来拜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的忍耐而不是西方的仓促更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16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东京，盟军总司令部。

萨瑟兰参谋长来到麦克阿瑟办公室报告：“将军，刚刚接到电话，天皇裕仁求见总司令。”

麦克阿瑟胸有成竹地笑着说：“怎么样，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回电话，我随时恭候他。噢，还是在大使馆接见为好，通知使馆人员，对天皇采取尊敬而热情的态度。”

上午 9 时，天皇裕仁乘坐他的戴姆勒·奔驰牌轿车来到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天皇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显得十分恭敬虔诚。陪同天皇前来的是天皇侍从长藤田敬德。

麦克阿瑟在使馆门口热情地迎接这位日本君主。天皇先对麦帅弯腰鞠躬，麦帅双手合一回礼。双方握手后，两人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

天皇面对这位美国太上皇显得心神不宁，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座后一时说不出话来。

为了缓解天皇的紧张，麦克阿瑟递给他一支美国香烟。天皇受宠若惊地慌忙起身接烟。当麦克阿瑟给他点烟时，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接着麦克阿瑟叫翻译留下来，把其他人都打发出去了。

情绪稍平静下来之后，麦克阿瑟首先开口对天皇说：“我已了解陛下在结束战争问题上起了决定作用，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天皇未想到掌握日本命运的这位将军对自己这么评价。心里稍稍平静了些，说：“结束战争并不是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世界形势逼迫不得不这样做的。再说我也是借用贵国在长崎、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使日本人受到巨大冲击的机会，在和平派推动下才决定停战的。”

麦克阿瑟：“天皇陛下，既然你能行使权力结束战争，为什么不能阻止开战？”

一听这句话，天皇额头渗出层层汗珠，手足无措地说：“当时如果我反对开战，我会被军方关进疯人院，杀我的头！”

麦克阿瑟厉声说：“你是要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军方吗？”

天皇低下了头，声音很低地说：“麦克阿瑟将军，我对日本发动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负有全部责任。我是作为对我国人民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和所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

麦克阿瑟严肃地问：“你真是要承担战争责任吗？”

天皇抬起头胆怯地望了望麦克阿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表示一下我的态度。我早有思想准备，盟国无论怎么处置我都没关系，我都接受，绞死我也没关系。”

麦克阿瑟：“那请你回答，你对战争的责任到底内心是怎么想的呢？”

天皇又抬头望了望这位对他具有生杀大权的太上皇，然后表情委屈地说：“人们似乎认为我们完全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实际上应该说因为过分地用立宪制处理政事，而成了现在的状况。战争过程中，我



麦克阿瑟将军接见日本天皇裕仁

不得不听取了军方希望天皇再坚持一下的要求……”

麦克阿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要进行认真调查认证。但是，在盟国对此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你还是日本天皇，你对日本社会的稳定负有直接责任。希望你能自觉地履行对国家和国民的责任，好自为之。”

裕仁受宠若惊地说：“请放心，只要能给阁下帮忙，我愿意随时驱车来美国驻日大使馆，也可以派内大臣或侍从长来拜会阁下。”

麦克阿瑟：“希望陛下记住一点，你是人不是神。今后要从天上来人间，以人的身份生活，说不定更能得到臣民的爱戴。”

裕仁连忙鞠躬赔笑：“将军所说乃至理名言。我不仅不是神，而且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全是过去一些人胡说害了我。”

麦克阿瑟：“本人奉命进驻日本之目的，绝不是为惩办哪一个人，而是为把 7000 万日本人民引向自由幸福的康庄大道。因此就有必要惩办日本战犯。天皇陛下最了解日本和各界要人，希望能经常听到陛下的各种意见。”

裕仁陪着笑脸说：“敝人幸甚！日本幸甚！”

麦克阿瑟：“今后我将和陛下保持联系。”

临别时，麦克阿瑟亲自将裕仁送到门口，并找来记者与裕仁合影留念。

麦克阿瑟送走天皇后，麦克阿瑟夫人从里间出来，用轻快的语调说：“噢，我看见他了。亚瑟和我都在红帷幕后偷看着呢！”

麦克阿瑟：“没想到这位天皇能这样勇敢地承担一种暗示死刑的责任，使我深受感动。他由于生身血统而成为君主。但那一刻我知道面对我的是凭本身的品质足以成为日本第一绅士的人。”

麦克阿瑟的儿子亚瑟问：“那么，爸爸你准备怎样处置这位天皇？”

麦克阿瑟神秘地望了望儿子和妻子：“前几天杜鲁门总统签发了美国远东委员会关于‘日本天皇裕仁的个人处理问题’的文件。其中明确说明‘麦克阿瑟对天皇有完全的处置权’。我已经把天皇裕仁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上勾掉了。”

妻子：“那盟国能认可吗？”

麦克阿瑟：“我是当今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盟国管不着我，对他们的反对可以置之不理。任何一个人如登上日本领土，我都将以武力驱逐之。斯大林在东京的代表叫德列夫杨科，曾向我提出他们要占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我对这位将军说：‘如果有一个苏联士兵未经我的许可，踏上日本领土，我将把俄国使团包括你本人在内一齐投入监狱。’他听了我的话，瞪着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胆怯地说：‘老天爷呀，我相信你会这样做的。’转身离开了。你看，他们想不认可行吗？”

妻子：“那杜鲁门总统最后能批准吗？”

麦克阿瑟眉飞色舞地说：“是他授予我对天皇个人的处置权，总统说话总得算数吧！”

亚瑟：“那就是说，天皇裕仁还继续当他的天皇吗？”

麦克阿瑟：“就是啊，为了顺利实行占领统治，我不仅让他继续当天皇，还要利用天皇并通过他的政府来治理日本呢。”

17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

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割让日本后，饱受日本51年摧残的台湾省人民苦不堪言，受尽了亡国奴的屈辱。当此台湾回归祖国之际，台湾人民扬眉吐气，欢声笑语，

隆重庆祝抗战胜利这一盛大节日的到来。

中山堂中高悬“和平永奠”四个大字和孙中山画像以及“V”形胜利标志。

上午8时55分，中国受降代表，身着上将服的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台北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及70军、62军将领、台湾省府官员在主席台就座。

8时57分，陈汉平少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总务长官须田一三、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右少将进入投降席，排成一行向主席台行礼后入座。

9时整，鸣炮，仪式开始。葛敬恩中将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开始！”

陈仪首先宣布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后，由中方本部参谋长柯远芬把蒋主席第一号命令及受领证交安藤利吉签收。日本方由谏山春树向陈仪呈上降书，陈仪检验无误后，命日方人员退回原位。

接着陈仪当场发表广播讲话：

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省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将军受领，即遵照办理！此次受降典礼，经于中华



台湾占领军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向陈仪将军递交投降书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 10 时在台北中山堂举行，顷已顺利完成。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交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执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

现在台湾业已光复。我们应当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并感谢协助我们光复台湾的同盟国家，而应由衷的铭记不忘的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陈仪讲话后，将受降书通过葛敬恩交给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过受降书，匆匆扫视一遍后，用毛笔签名。

当签了字的受降书文本呈交给陈仪后，葛敬恩宣布受降典礼结束。

当日下午 3 时，台湾各界同胞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光复大会。台北 30 万人不分男女老幼，皆盛装而出，欢呼歌舞。第二天，全市学联举行台北学生庆祝光复大游行。从日寇铁蹄下重见光明的台湾同胞，连续三天三夜进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沉浸在狂欢之中。

1946 年 1 月 13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公告庄严宣布：

台湾人民（包括民族及土著高山族）原系中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的人民，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中国国籍。

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10 月 25 日为“台湾光复节”。

18

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关于越南境内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属中国受降地区的命令，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国云南省开远县城，第 1 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蒋介石一纸电令：“兹派该司令官卢汉为受降官，指挥所属第 52 军、第 60 军、第 93 军，暂编第 19 师、暂编第 93 师负责接收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8 月 23 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致电第 1 方面军司令部，



国民党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

训令接收解除敌军武装的要点。

1945年9月14日，卢汉上将率参谋长、各处人员和滇南空军司令宁明阶、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等乘飞机到达越南河内市嘉林机场。驻越各国侨民首领、越南临时政府主席胡志明和越政府代表、各界人士代表近千人列队机场，迎候中国接收军队将领。河内市区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滇军。一时间鼓乐喧天，鞭炮齐鸣，更加烘托了抗日胜利的喜庆气氛。

与此同时，60军184师、60军95师已先后抵达河内市区。52军、93军和暂编19师、23师等部，分别由中国滇桂边区经越南凉山、同登、宣光、老街等地各路挺进，随即进驻海防、南定、清化、义安、顺化、岷岗港等城市。暂编93师也进驻了老挝的龙蟠城、永珍一带。中国军队按计划完成了越北地区的布防，控制住了全部日军。

9月28日，上午，越南河内原法国总督府、现中国第1方面军司令部大礼堂。中国战区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在这里举行。

河内大街小巷一派欢庆的节日气氛。路口要道搭设了许多插着五色彩旗的彩色牌坊。身着新式军装的中国士兵荷枪实弹，在街头布哨，许多市民手拿彩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

原为法国总督府的三层法式大厦，张灯结彩，楼顶上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国国旗高高飘扬，两旁塔形建筑 and 一排排圆柱上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大礼堂正中悬挂孙中山画像和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9时30分，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中国第1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上将和盟军受降将领及600多名代表进入会场。

受降席正中坐着卢汉将军，其左右分坐着参谋长马瑛、副参谋长尹健勋。

受降席左边为盟军代表席，坐着美国代表、第1集团军司令官嘉里格少将和英军代表。

受降席右边为来宾席，坐着越南临时政府和越盟的官员。

上午10时整，日本驻河内部队司令官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川国直服师

团长、酒井干诚参谋长和两个师团、一个独立旅代表，由中国第1方面军司令部第三处处长杨家杰引入受降礼堂，面向受降席垂首站立。

卢汉司令官根据日军在南京签署的投降书，宣读令河内日军投降的文书，并交给土桥勇逸签字。土桥勇逸签字后，卢汉令其退回原位。

这时，卢汉司令官猛然站起，发表《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布告》：

本司令官奉盟军最高统帅命令，统帅中国军队接受越南境内日本侵略军之投降，解除其武装，并遣散之。中国军人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

凡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一切行政之监督、军事之管理，均归本司令官负责。各级行政机构一仍旧惯，互相发挥效能，保证和平，维持秩序。凡现有行政人员，亦应各就岗位，安心服务，努力工作。本司令官将依其权力，督率全体人员，以期完成所负的使命，达到共同之目的。

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完全遣回、和平秩序尚未获得保障之前，本司令官掌握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最高权力。如有必要，决不惜使用此最高权力，以期盟军目的之能达到，本司令官任务之能完成。凡居住境内之军民人等，其各一体知照。

河内受降典礼后，中国第60军开赴义顺地区，解除夫炎、越曾以南至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的武装。第93军开赴南河区，令越池、北宁、甘阳至太平、清代、和平间的日军投降。第52军开赴海防区，解除太原、北宁、太平之线日军之武装。第53军接管各地日军的物资装备。

紧接着，滇军着手成立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设立广安、南定、顺化等集中营，所有日军战俘和侨民都被分别遣送进集中营监管。又在河内成立“越北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所”，让土桥任所长，负责日军人员清点，协助中方遣返等。

滇军又成立了3个接收组，分赴河内市区、海防、里良江、谅山、顺化、歧港等地区接收日军人员、武器，清点所获战利品，总计有：

人员：日军战俘30027人、日侨1320人，共31347人；马匹：2535匹；武器：各种枪45792支（挺）、火炮882门、炮弹143043发，另有刀剑等其

他武器若干；盟国战俘 4831 人，其中法籍 4404 人、印度战俘 140 人，盟国战俘全部立即遣送回国与家人团聚。

滇军还成立了一个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根据美军、英军和法国代表要求，审查并扣押了 189 名日军战犯。其中有土桥勇逸、川国直服、春日馨等将校级军官和 140 多名宪兵。

1946 年 5 月 1 日，滇军派出 16 辆卡车，将全部战犯押运到南宁、梧州两地，再由广州行营航运到广州，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19

10 月 6 日下午 2 时，东京近郊琦玉县越谷猎鸭场。麦克阿瑟同天皇裕仁和新任外交大臣吉田茂进行套鸭叉鸭游戏。

麦克阿瑟脚蹬长筒水靴，手执套网，隐身在苇丛中，全神贯注地望着水塘。

天皇裕仁和吉田茂及天皇侍卫长藤田敬德三人，同样是一身猎装，站在麦克阿瑟身后，不时发出指导性口令。水面上一群野鸭飞落下来，一只经过训练的家鸭混在野鸭中间，逼引它们向麦克阿瑟隐身的河汊缓缓游过来。

天皇发出一声鸣哨：“准备好，野鸭一飞就套。”

一只野鸭刚刚飞出苇丛，麦克阿瑟一网套去，因距离量得不准，套杆打在鸭身上，鸭一声嘶叫，翅膀一伸，飞上了天空。

天皇指点说：“套鸭和套马相似，最重要的是估准距离，出手快……”

猎鸭池塘里，陪同猎鸭者的木杆和丝网不时在水边起落，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此起彼伏。

傍晚，苇塘边生起了一堆堆篝火。兴致勃勃的麦克阿瑟将网到的 3 只野鸭，挂在了篝火上方，被烤的野鸭散发了一股浓浓的香味。

烤熟后，麦克阿瑟先给儿子亚瑟一只鸭翅膀，然后同天皇、吉田茂喝着日本米酒，边吃边喝，谈笑风生。

酒过三巡之后，麦克阿瑟问吉田茂：“吉田外相，你对近日盟军发布的《管理日本方针要点》、五大改革令、取消内大臣府及逮捕东条、小叽 50 名战犯等，有何看法？”

吉田茂对麦克阿瑟的突然发问毫无准备，一时语塞。

麦克阿瑟：“请不必顾虑，如实说说你的想法。”

吉田茂：“我认为这些法令和命令都完全正确，符合当前日本国情，深得民众拥护。这说明将军真是英明伟大。”

天皇：“我对将军发布的这些法令、命令更是从心里往外拥护。”

吉田茂：“天皇对将军发布的这些指令评价很高，已命令内阁逐条逐目认真领会，亲自督促我们原原本本地照办。”

麦克阿瑟慢慢地将烟丝装进烟斗，从容地点着，郑重地对天皇说：“陛下，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天皇慌忙点点头：“将军请吩咐。”

麦克阿瑟：“目前工厂罢工实在太多了。这对生产的恢复、城市的交通、社会的治安都非常不利。我希望你能到一些工厂去看看工人们，做一做安抚工作。”

天皇受宠若惊：“将军对我如此信任，我感到十分荣幸！”

麦克阿瑟：“相信陛下出面劝阻，一定能有好的效果。”

天皇：“将军重托，一定尽力而为。”

麦克阿瑟站起来说：“我们确实想摧毁作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确实想惩罚它过去的战争罪行。然而我们也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日本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的。盟总的职责并非如何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想，我们现在同西方的德国人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妨同他们来一个竞赛，看谁跑得更快！”

天皇：“我们日本政府和人民愿同盟军齐心协力重建日本。”

从猎鸭场回到美国大使馆的当晚，麦克阿瑟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申诉了将天皇裕仁从战犯名单中勾销并保留天皇制的理由。电文如下：

接到指令后，对天皇的犯罪行为，秘密地尽可能地进行了调查。结果，在过去的10年中，并未发现天皇参与决定日本政治的特别明显的证据。停战之前，天皇的国事行为，几乎全由大臣及枢密顾问等人负责。如果把天皇定为战犯，对天皇起诉，将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其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为此，至少需要建立100万军队和数十万行政官员的战时补充体制。

杜鲁门总统接到电报后，细细地看了好几遍，又默默地想了一个晚上。

最后，他也认为保留天皇制，保护天皇，对美国占领日本有利，对把日本变为亚洲的反共桥头堡有利。他决定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

20

1945年10月25日，青岛市汇泉广场。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在这里举行。

这一天格外晴朗。汇泉广场已装扮一新，在广场北部中心，搭起了受降台，台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台上前部中央有长桌一张，桌上摆放着降书10份，及水笔、毛笔、墨盒等文具。桌后有座椅2把，是受降官的主座。主座后面有32把座椅分列两排，以备参加仪式的中、美高级军官使用。台上左右两侧备有特别来宾席。台下前方有一桌，供摆放日军投降代表呈献的战刀，左前方为新闻记者席，右前方为日军投降代表立候之处。会场中央设有后高前低的梯次式看台。

受降台左前方排列坦克40余辆、卡车及通讯车200余辆。受降台右前方排列榴弹炮40门、战防炮15门、装甲车200余辆。军乐队居中，左右两侧各有步兵3队。

上午11时，军乐队奏乐，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师长谢勃尔少将乘车来到会场，下车相偕走上受降台就位。

出席受降典礼的还有中方高级军官10人，美方高级军官10人。特别来宾国民党青岛市长李先良及各局局长，市党部主任委员葛之覃及各委员，亦相偕入席。日军投降代表、第5独立混成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等11人，乘美军汽车来到会场。下车后，由美宪兵引导来到受降台前伫候。

11时30分，受降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乐声止，长野荣二解下所佩战刀，双手端刀，走上受降台，向受降官鞠躬呈献。其他10名日本军官在台下解下所佩战刀，依次鞠躬呈献，由美国宪兵接过，摆放在桌上。长野荣二献刀时神情黯然，签字时手颤不已，貌似恭谨，内蕴愤懑。其他10人，有的垂头丧气，呆若木鸡；有的故作镇静，神情沮丧；有的表情抵触，神态桀骜……致使献刀时，未能依次列队。献刀完毕，长野荣二在10份降书上一一签字，陈宝仓中将、谢勃尔少将亦在降书上签字。

签字完毕，长野荣二手捧降书，恭谨退下。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军乐队奏美海军陆战队赞美曲。至此典礼完毕，时已下午1时。长野荣二等11人，

由美国宪兵引导走出会场，乘美军汽车返回驻所。

典礼举行时，有美空军飞机 6 个中队在青岛市上空飞行。每中队有 3 个小队，每小队由 3 架飞机组成，另外还有指挥机 3 架。它们时而在汇泉湾、太平山上空盘旋；时而低空飞行，掠过会场。

参加受降典礼的记者，除中方 10 余人，还有美海军陆战情报部的 10 余人，美联社记者约翰逊，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哈斯特。

受降典礼后，继而进行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军事设施等和调查搜集战犯罪证、逮捕战犯。共逮捕战犯 36 人，解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事法庭。

21

1945 年 12 月 23 日，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召见冈村宁次。

蒋介石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冈村。双方在沙发上落座后，蒋介石说：“冈村将军，我们是昔日的敌手，今日的朋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可以直接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方便。”

冈村：“深感厚情，生活很好。听说国共两党在重庆会谈，已达成协议。不知日后国共关系如何？”

蒋介石：“国共和谈毫无意义。天无二日，你们日本还不是一个天皇吗？反正国共两党只能有一个在台上，谁胜谁负还不知道。”说到这里朝冈村埋怨说：“共产党今日如此猖獗，还是你们日本人帮的忙啊！”

冈村一愕：“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大日本的头号敌人！我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确定的方针是灭共爱民，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扫荡，两次成功地端掉了八路军老窝。蒋先生怎么说我们帮了共产党的忙呢？”

蒋介石摇摇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我们在江西对共产党发动五次围剿，最后一次共军败得很惨。湘江一役，8 万共军损失 4 万。共军到了陕北不毛之地，几乎濒于灭绝。你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共军到了华北、华中，像吃了发酵粉，八年工夫发展到近百万军队。这不是你们日本人帮的忙吗？”

蒋介石见冈村语塞，便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今后我们剿共任务很重，美国人只能给点钱给点枪炮。目前我们困难很多，特别缺乏像您这样的军事家。”

冈村露出笑容，接过话茬：“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我当您的参谋？”

蒋介石：“同何总司令商定，聘请将军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

冈村站起来感激地说：“谢谢蒋主席的信任，鄙人将竭尽全力为国军效劳。”

蒋介石：“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把将军列为第一号战犯，驻南京的中外记者时常到国防部查询将军行踪。我们都没有理他们。我们有责任保护将军。最近何总司令为将军选定了鼓楼以西一所独门独院的住宅。将军近日就可以搬进去，国军派军队保护。”

冈村再次站起来，向蒋介石深深鞠躬施礼：“谢谢蒋主席与何总司令的格外关照。”

十四 中国军队未能进驻日本领土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于9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设盟军总司令部于日本东京，由美国全权统一办理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同时苏、英、中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也应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

其实，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已确定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占领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实行分割或划分占领区。”8月11日，美国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

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随后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虽然四国都被称为占领国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3000人，而中国只派了少量军队。美国对苏联很戒备，一开始就没有邀请苏联派兵参加。

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以及邻近各岛屿、北纬三十八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投降，这样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国商定的结果，盟军总司令部设在东京。中、美、英开始准备分别派出武装部队进驻日本。美方还宣布

了盟国占领军的规模，美国为 12 个师 20 万人（含朝鲜半岛 2 个师 3 万人），中、英、苏各派一个师。

在确定盟国占领区的划分时，最初计划是：拥有发达基础设施的日本主要大岛本州的中心区域，必须控制在美国手中；工业相当发达的九州可交由英国军队占领；属于落后农业区的四国岛安排中国军队驻扎；苏联则在北海道和日本本州北部驻军。但这项计划的实施有一个前提，即他国军队不能立即进驻日本，而要等美军逐步撤出后再去接管。

2

急于扬眉吐气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很快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率先赴日熟悉情况。8 月 28 日，美军先遣部队也到达厚木机场。30 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

10 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 5 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将军统领的新一军去。

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只想派出一支 5000 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

最后，蒋介石决定由曾在越南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荣誉二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师长戴坚，少将军衔。该师建制完整，兵员充足，有精良的美式装备，是当时较为理想的赴日部队。该师于 1946 年 2 月得到命令后，立即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到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 1.7 米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了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

1946 年 3 月 13 日，美国国务院通过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向国民政府建议：中国可以先选派少数先遣部队赴日。

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建议，在 4 月 1 日派出陆军中将朱世明率领驻日本代

表团第一批成员 12 名、军人 4 名，以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抵达日本进行考察。

3

1946 年 5 月，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国民党上校参谋廖季威同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等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到日本后，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当时第六十七师编制为 1.45 万人，有歩兵团三个、炮兵团一个、运输团一个，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一个。驻扎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团指挥。

离日之前，戴坚援引美国“租借法案”与美方谈判，以目前中国外汇困难为由，要求盟军总部支付中国占领军费用。麦克阿瑟答应自 1946 年 6 月底至 1949 年 6 月底，从



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将军

美国援华经费中，调拨中国驻日占领军所需装备和补给。

6 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

6 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从上海龙华机场乘空军飞机直达日本羽田机场，而后由陆路转赴先遣队驻地名古屋。

日本当地政府对先遣队的到来侍应恭谨。为了给即将抵达日本的第六十七师设营布防，先遣队在名古屋全面部署和接收了占领军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

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正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并因内战打乱了原来的驻日占领军计划。

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要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并命令其攻击部队于6月26日前秘密完成包围之势。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农历七月初一，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出发正式进驻日本。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应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依然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去信确认，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

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求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且驻扎上海机场的驻日占领军已经接到命令，将投入到反共战场。而驻扎上海的六十七师也已奉命开往苏鲁豫解放区。

第六十七师到苏中之后，被收编到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所辖的第六十五师和六十九师。1946年7月6日14时，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

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原第六十七师到达海安、如皋一带不久，就遭到我野战军的重创。

在六十七师无法到达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机构有办公厅，下设四个组、七个处。此外还有宪兵40人，代表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的麻布。团长最初为朱世明，后改由商震担任，最后由何世礼担任，副团长是沈觐鼎，时称首席顾问。

遗憾的是，由于内战，中国最终没能实现作为战胜国，派出军队进驻日本领土的计划。

十五 苏军撤出中国东北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即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三个月撤完。

按规定，到 1945 年 12 月初苏联就应该全部撤军，苏方却一再拖延撤军日期。蒋介石不止一次地提醒苏联按照约定尽快撤军。先是派蒋经国到东北与苏军商议撤军事宜，后又派宋美龄为代表到长春慰问苏军，实际是对苏军委婉地下逐客令。

苏军不但不买账，还向国民政府提出东北“经济合作”计划。宣称日本



行驶在哈尔滨街道上的苏军坦克

在中国经营的工矿企业，应为苏军的战利品；日伪合办的工矿企业，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计划全面占有日本的在华资产。

未经国民政府允许，苏军每占领一个城市后，就开始对这里的工矿企业全面接收，并把最好的最重要的设备拆卸运往苏联，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11月24日，苏方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党东北行营递交清单，要求共同经营东北的154所工矿企业。这些企业占全东北重工业的80%以上。

2

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即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目，如满洲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管理人员抓起来，严加看管。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有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作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



苏军正在拆卸工厂的机器设备

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签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苏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3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进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军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同关东军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的。所有被苏



被苏军拆卸一空的厂房



苏军在等待将拆卸的机器设备运往苏联

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手，严禁外人进入。

日本战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

然后分海(大连)

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个工厂后，便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拆毁。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 80 名，工人及日俘共 8000 名，经 40 余日才拆运完毕。整个拆运一直到 1946 年 3 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

另外，奉天(沈阳)飞机制造厂、哈尔滨军械飞机厂等东北所有飞机制造业的飞机制造机件也均被苏军洗劫一空。

据国民党党史库藏资料、东北工业会和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资料，以及鲍莱调查团统计资料，苏军拆运工矿设备所造成的损失达 8.95 亿美元；东北工侨估算损失为 12.36 亿美元。但占东北工矿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在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 20 亿美元。

这样，历史记下了苏军这支解放中国东北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物产的掠夺者。

4

由于苏军的经济掠夺，东北矿业严重萎缩。1946年1月初，由于抚顺煤矿产量下降，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出现供煤不足。担任此路中方理事长的张嘉璈和时任该路苏方理事长的加尔商定，由中方派张莘夫前往抚顺，整理并接收煤矿，以接济东北的铁路商运。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和助理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籍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从长春赴抚顺。到达沈阳后，马里意以先去安顿为借口独自前往抚顺，让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候消息。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莘夫可以去抚顺。当天下午，张莘夫等乘坐苏军专车到达抚顺。

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苏方无法反对。张莘夫等到达抚顺，下车后即被苏军安排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居住，由苏军4人监视。次日，随行路警枪支被缴去，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天，张莘夫设法通知了中方，但只说了几句话，电话就被切断。

1月16日晚8时，苏军军官会同当地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申述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速返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车离开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时，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上车将张等人拖下杀害。

张莘夫等人被杀后，驻东北行营的国民党接收人员长时间得不到张莘夫等人的确切消息。1月29日，国民政府驻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颜平向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提出书面质询，苏方迟迟不予答复。2月9日，董颜平又面晤特罗增科，要求苏联方面尽快给予答复。

次日，苏方书面答复称张莘夫及其随员8人，系于1月16日21时在抚顺返沈阳途中经李石寨车站，被土匪拖下，押至车站以南一公里处枪决。至此，张莘夫被杀的消息才得到确认。

张莘夫的被杀，激起了更大的民愤，成了加速苏军撤出中国东北的关键事件。

5

苏联红军在“打劫”的同时，对地方百姓也是颇多侵扰，抢劫、偷盗，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时有发生。苏军政治部也曾像模像样整顿过军纪，还派

纠察队上街维持治安，对严重违纪的就地枪决。这样也无济于事。一些苏军将领很为难地说：“有些奸污中国妇女的士兵，胸前挂了好几颗勋章，有的攻克柏林也是有功的，难道还能强奸妇女就把他们枪毙了吗？”

苏军官方纵容官兵暴行的结果，导致了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共松江区副司令员卢冬生，在一次制止苏军士兵抢劫的过程中被苏军枪杀。

卢冬生是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红军，曾救过陈赓的命，还同贺龙一起开辟过洪湖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冬生与刘亚楼一起去苏联学习军事。1945年10月以苏军少校的身份回到东北。就在当年12月的一个夜晚，卢冬生乘马车外出，没有穿苏军军装。他坐马车走在哈尔滨大街上，遇到几个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他立即跳下马车，用一口熟练的俄语询问那几个士兵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那几个苏军士兵吓得低头躲在一旁。然而就在卢冬生上了马车，走出没几步时，那几个士兵怕被告发，突然从背后开枪，当场把卢冬生打死在马车上，然后逃之夭夭。

6

张莘夫事件发生不久，英、美、苏三国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全国舆论大哗。这时，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被杀害的消息又在民间广泛传开。紧接着在哈尔滨又发生了苏军枪杀老红军卢冬生的事件，这更加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民愤。

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和“卢冬生事件”为导火线，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

2月16日，流亡重庆的东北旅渝同乡会在青年馆举行集会，讨论张莘夫和卢冬生被杀事件和收复东北问题。会后2000人举行游行，请求政府采取强硬的外交措施，收复东北。

22日，重庆26所大、中、小学的2万多名学生和职工，组成“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队”游行示威，队伍中既有中央大学附小的学生，也有年迈的大学教授。同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暨助教会举行会议，就“张卢事件”和东北问题发表四条通电，教授会要求苏联迅即撤退东北驻军，将东北主权交予中国政府。

23日，重庆12所学校继续举行反苏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国民政府后，国



国际调查团查看被苏军拆卸的厂房

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见游行学生。吴表示国民政府将不惜任何牺牲，收回东北主权，并希望学生“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游行队伍在行进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时，学生们抬出俄文标语，要求立即撤兵，要求国民政府为张莘夫和卢冬生烈士申冤。

重庆爆发的反苏示威游行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北平、上海、南京、青岛、汉口、

杭州、贵阳、哈尔滨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2月25日，蒋介石表示，“盼望全国民众，信任政府，对于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

在学生游行的推动下，2月26日，上海各界民众2万多人在复兴公园成立了“上海市各界东北主权维护会”，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彻查张莘夫和卢冬生惨案。

由张莘夫和卢冬生事件引发的全国性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对中苏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英、美等国也强烈谴责苏联拆运东北工矿企业设备的行径。

2月24日，沈阳苏军司令高夫堂为了替苏军的罪行辩解，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机器设备，系根据苏、美、英三国的共同协定。两日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否认这一说法，并严正声明“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配备之任何解释。”3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表示“断难承认”苏联政府将“中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

在国内不断爆发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借机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斯大林不得不下令苏军加紧破坏和劫掠东北的工矿设备，并准备自东北撤退。

1949年3月10日夜间，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

十六 中国同港英当局的交涉与让步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军。蒋介石于是打算趁此良机收回香港。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几次要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应在亚洲战场上拖住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为了鼓励蒋介石配合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的政策，罗斯福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进行一次旨在废除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重新缔造一个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同时，罗斯福也建议英国效法美国，为早日结束二战，适当废除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有效地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事力量，共同对付日德法西斯势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认为，可以利用美国现实外交政策谋求二战后收回香港主权。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龄姐弟的建议，把战后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希望，寄托于与美国重新缔约的谈判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政府影响下，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英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不得不责成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于1942年10月28日前来重庆，与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换约代表团举行谈判。然而，薛穆由于有首相丘吉尔的幕后撑腰，只是虚意应付，不肯就香港归属问题妥协，使中英新约谈判陷入困境。

此后，随着战争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1942年11月3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公开宣称：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清算大英帝国。如果说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领土，那么九龙和租界也自然是归我大英帝国所有。我们绝不会在这个关键性大事上作

任何妥协和退步。在英国人的威胁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渐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回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谈归还香港和九龙问题。

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就文件，主张战后接收香港，收复九龙租借地。并建议组建一支精兵沿九广铁路进发，先行占据港九，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同英国交涉。

8月15日晚，蒋介石召见四川省主席张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讨论接收香港、越南的方针。决定对香港不与英国竞争先后，免惹恶感。

8月16日，英国政府先发制人，向中方提交照会，通报英国政府正安排军队重占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治。

第二天，蒋介石得知“英军舰已驶到香港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后，即加快了军事部署，命令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三军从梧州向香港进军，先行接收九龙和香港，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方针。

3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减轻美军的压力，美国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同时美国也想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并取而代之，1945年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

8月18日，上午9时，美国华盛顿，白宫，杜鲁门总统办公室。



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

杜鲁门正在看国务卿贝尔纳斯呈上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发来的急电：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英国舰队已向香港进发，其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接管香港。我估计香港的日本指挥官可能会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因此，特请总统指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最高指挥部指示驻香港的日军司令藤田频太郎，应在英国海军司令官哈可尔少将到达后，向英军投降。

杜鲁门阅过电报后，对贝尔纳斯说：“蒋介石和艾德礼，一个是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一个是盟国的领袖。两个人都说香港的日本军队应向自己投降。一个确实有理有据，一个是最重要的盟国。战后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不该得罪。你说如何是好？”

贝尔纳斯：“史迪威说蒋介石从里到外都像个花生米，充其量是个失掉中国民众支持的封建军阀，说不定哪一天被中国共产党轰下台。他不能同我们的重要盟国大英帝国首相相提并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支持英国。”

杜鲁门：“对。赶紧通知麦克阿瑟，‘为了顺利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过来。’给麦帅发报后，请将此决定分别通知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英国首相艾德礼。”

4

1945年8月20日上午9时，重庆，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世杰部长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商谈归还香港和九龙问题。

王世杰：“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关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的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投降的第一号受降令，香港属中国战区。特向大使交涉，在日本战败之后，英国政府将香港及九龙租借地交由中国政府收回。为此，中方要求与英国直接谈判，商订专约，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薛穆：“部长的意思是，香港日军由中国受降，并从大不列颠王国手中接管香港和九龙？”

王世杰：“正是这样。早在1842年老牌英国殖民者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

定《南京条约》，割去香港和九龙，已经 100 多年。1941 年太平洋战争后，又被日本侵略者占据了 4 年又 8 个月。现在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中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手里恢复这块神圣的国土。”

薛穆：“请部长阁下注意，香港是英国的海外领地。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不受地区限制，向香港日军受降！”

王世杰：“中国民众，特别是香港民众，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中国和英国既是反法西斯盟邦，这个问题一定会圆满解决。”

薛穆摆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面孔说：“丘吉尔首相早就说过：英国的殖民地，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谁也不能迫使英国放弃香港。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哪怕是一小片英国领土，我们誓死不归还香港！”

王世杰：“中国方面尽管在 1942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谈判中作出种种让步，但从未放弃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的计划。那时英方曾表示愿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交还问题。现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交还问题应该提到日程。”

薛穆搔搔满头白发，强词夺理说：“战后世界形势大为改观，香港军事方面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中国方面没必要急于收回。”

王世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谋求世界永久和平，对香港这样可能导致国际摩擦的因素应予废除。中英对此问题应有合理之调整。至于九龙问题，既然英国已与中国订立新约，宣布废除在华一切特权，九龙就应该立即归还中国。日前，各国租借地均已交还。唯独九龙不还，实属无理。当年英国租借九龙说是捍卫香港。太平洋战事证明此说并无意义。现在战事结束。实为重议此问题之适当时机。”

薛穆被驳得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5

8 月 20 日下午 2 时，重庆，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宋子文、张群、张治中、陈诚、王世杰、蒋经国等文武官员商讨收复香港的对策。

蒋介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减轻美军的压力，美国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在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但遭到丘吉尔拒绝。丘吉尔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现在丘吉尔已经下台。新首相艾德



英国前首相艾德礼

礼可能要比丘吉尔通情达理。正好乘本战区向日本受降之际，一举收回香港和九龙。为此，已经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而英国却拒绝麦克阿瑟的受降令。今天上午，王部长同英国大使薛穆交涉中，又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哪些应急之策来对付英国当局。请大家献计献策。”

王世杰：“薛穆大使是一个丘吉尔式的顽固派、死硬分子，极端蛮横无理。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仍不肯退让一步。我看直接同英国当局谈判已无可能。

还是尽早别图良策。”

张群：“目前收回香港时机成熟，且国际舆论在我们一边。应及时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想尽一切办法促成香港回归。我意还是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最好谋求委员长同英国新首相艾德礼直接对话。或许是个出路。”

这时值班副官进来交给王世杰一封电报。

王世杰阅后气愤地说：“艾德礼同丘吉尔是一丘之貉。他竟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更可恶的是，英国首相艾德礼已于8月13日命令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行动，英国派出一个师的陆军兵力前往香港。先下手为强，英国要用武力抢占香港！”

何应钦：“既然英国派军队来抢占，我们也应该针锋相对，立即命令张发奎将军率新一军和十三军就近假道广九线捷足入据港九。我看英军绝不敢动用武力同我们争夺。这样我们再与英方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租借地为限度。”

宋子文：“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抢先进占香港。那要承担制造新的国际争端的责任。建议委员长立即向杜鲁门总统发电，请求支持我们收复香港。得道多助，也许杜鲁门会主持公道，说服英国将香港九龙交回我国。”

蒋介石：“收复香港问题，非常复杂难办。我们必须极具慎重的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解决。绝不能采取武力抢占的鲁莽行动。那样会破坏盟国之间的

关系，不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我赞成子文的意见，马上起草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以我的名义尽快发出。”

当天下午3时，杜鲁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

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英国派军队来港，则可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杜鲁门：“这个蒋委员长，真是不识时务。请给他回电：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

蒋介石看到杜鲁门的回电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授降仪式。”

6

8月20日晚7时，重庆，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蒋介石：“今天我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接见阁下，明确向贵国通报关于香港日军投降的委托受降方案。这是一个我国顾全国际大局作出让步后的方案，并同杜鲁门总统沟通后制定的。我外长王世杰已事先通知阁下。这个方案已无商量余地，必须贯彻！”

薛穆：“本大使已向王世杰外长



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签约仪式上



英国第 21 任香港总督杨慕琦

申明：香港的主权属于英国，受降权当然属于英国，无须经过中国的授权。英国这一立场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英新条约的影响。英国不能接受这种有损英国权威的解决办法。现在本大使代表英国政府正式答复中国政府：英国不能接受中方提出的关于英国军队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代表在英国的属地上接受投降的建议。英国欢迎中美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但受降将由英国军官执行，中美代表可以证人资格在日军降书上签字。”

蒋介石怒不可遏：“本战区统帅不能同意英国的立场。我正告大使阁下，香港并不在英国受降区内，而明确划在中国战区内。作为这个战区的最高统帅，我有履行和遵守盟国签订协议的义务。授权英军在香港受降，纯系出于维护盟国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则既不符合盟国协议精神，也与战区最高统帅的职责不符。从今日起，我授权给哈可尔少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

薛穆站起来，摆出殖民大国使者的姿态说：“对不起，大英帝国拒绝接受！”说罢扬长而去。

为了找回面子，愤怒的蒋介石电告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他的一位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政府面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考虑到中国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在最后事实上重占香港的情况下，表示让步，同意以委托方式受降。

8月20日深夜，哈可尔少将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作为出席香港日军受降仪式的代表，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中国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重返香港复任，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十七 中国同澳葡当局的交涉与让步

1

从 16 世纪下半叶（明代）开始，葡萄牙就以租居者的身份在中国澳门半岛南部一带居住贸易。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强占澳门，并同清政府签订《和好通商条约》，攫取了澳门的永居权和管理权。此后，葡萄牙不断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澳门原租居地以外的中国领土。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开始为收回澳门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民国时期，收回澳门的斗争更加深入，出现了几次全国性的高潮。在斗争中，中国人民表现出收回澳门的坚强决心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中国政府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回澳门，但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其统治，而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尽管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中也有人积极主张收回澳门，但决策者总以时机尚未成熟把它搁置起来。

1928 年 6 月 8 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结束了南京、北京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7 月 7 日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的宣言。外交部长王正廷于 7 月 10 日照会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声明 1887



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

年中葡条约期满废止，请葡国定期派官员前来重订新约，并通知在新约尚未订立以前，暂行适用上述之《临时办法》。

葡使毕安祺照复外交部：“葡政府不能承认所言 1887 年 12 月 1 日之前中葡条约已归失效，即宣布之临时条例亦不能默认。但中葡两国友谊素睦，葡政府准备与中国开始磋商，根据平等及互尊主权之意见，以修改现约。葡政府愿与中国缔结新约。”9 月 4 日，毕安祺南下到达上海。中国外交部官员与毕安祺在上海初步交换意见。

1928 年 12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在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该约仅涉及通商关税和两国人民在对方领土应受该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没有关于澳门的任何规定。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收回澳门，而是听任葡萄牙继续统治下去。

2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 年 8 月 31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关于收回澳门的方案”，并电告中国驻葡萄牙公使张谦，向葡萄牙政府表示我国要将澳门收回来之决心。与此同时澳门同胞和广州中山县各界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并派代表在澳门共商反葡大计。

在胜利情绪的激励下，张发奎所率的第二方面军内部有一些爱国官兵纷纷要求乘机收回香港和澳门。如果按照当时的军事实力来说，国民党军队已经抵达香港新界的北部地区，完全有力量迅速攻占九龙并一举将整个香港和澳门收回。

1945 年 9 月，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前往伦敦出席苏、美、英、中、法五强外长会议，协商起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约。9 月 23 日，他在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会面时表示：“他希望中国能收回澳门。委员长曾指示他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顾维钧告诉王世杰，前些时候他曾和中国驻葡公使张谦谈论过这个问题。



准备接收港澳的张发奎将军

中国驻葡公使张谦对澳门问题的态度很积极。他将主张收回澳门的电报发回国内。然后去伦敦说服王世杰支持收回澳门。9月26日这份电报又由外交部发往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处转王世杰。

电文称：

中国急欲收回澳门，原因为：1、治外法权取消后，外人在我全境内可以旅行、居住、经商，葡方无再保留澳门之必要。2、澳门虽与一般租借地有别，但有碍中国主权统一。3、法国现已交还广州湾，葡交还澳门不应再缓。4、中日战争期间，澳门曾为日方使用，致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仰根据以上理由与葡方交涉。



中国驻葡公使张谦

王张会见后，9月28日，王世杰复电外交部，称已将关于澳门问题的处理意见面告张谦，详情由张另电外交部。同一天，张谦致外交部的电报转达

王的指示要点如下：（1）向葡施压，派员会同查点敌产；（2）暂缓向葡提出接收敌物资；（3）收回澳门问题待王部长返国后再详加考虑。这表明，张谦的伦敦之行收效不大。实际上王世杰将他的意见搁置起来，也未按蒋介石的指示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对澳门问题，刚上任不久的王世杰无意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

当年10月1日，外交部向蒋介石报告称：“澳门与香港有唇齿相依之势，中国要以武力侵占澳门，葡以英国为后盾，决难拱手相让，必指控我于联合国机构，

中国纵有收回澳门之充分理由，至是陷于理屈地位。”外交部的报告不仅轻易放弃了收回澳门主权之良机，而且由于惧怕英澳同盟竟错用了“侵占”二字。这说明，由新任部长王世杰主持的外交部，有意把收回澳门的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3

愤怒的爱国将领眼看依靠中国政府收回澳门的希望很难实现，便自动采取了强硬措施。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第159师师长刘绍武和中山县长张惠长，在张发奎的暗中支持下，发起了反对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的行动。国民党军队先是通过国民党在澳门的支部采取一些宣传活动，散布舆论，对葡萄牙殖民者长期占据澳门的行为表示不满。然后又发动居住在澳门的中国公民进行游行和集会活动，营造出了一定的声势。

澳葡当局眼看事态有扩大的可能，惊慌不已，连忙采取应急措施。严禁居民进行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集会和有关宣传活动。另外，澳葡当局还派遣军队将关闸强行封锁起来，并且打着维护澳门治安的幌子，严格限制中国内地的民众进入澳门。

澳葡当局这种企图继续维持其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的措施，立即遭到了中国人民的谴责和反对。当时中国的广州地方政府利用抗战刚刚胜利后人民要求惩办日本战犯的愿望，以此时仍然有日本战犯躲在澳门为理由，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向澳葡当局声明中国军队有权自由进入澳门对隐藏的日本战犯进行搜捕。

澳葡当局明白国民党军队一旦进入澳门对日本战犯进行搜捕，那就必然会连带危及到葡萄牙人400年来对澳门的殖民统治，便对广东地方政府的要求予以拒绝，并禁止内地人民进入澳门，严厉取缔澳门的反葡运动，禁止一切集会。

葡萄牙当局的这些措施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更大愤慨。到了11月份，张发奎下达命令，立即派驻扎在中山县的64军159师师长刘绍武带兵由石岐一带迅速进驻前山，将粤澳边界全部封锁起来。同时还下令断绝中国内地对澳门的食物供应。

为了给澳葡当局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国民党进驻湾仔和前山一带的部队

还特别选择在夜间举行军事演习。演习时大炮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云霄。

4

眼看一场收回澳门的战斗迫在眉睫。澳葡当局自知根本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于是在惊慌之际，立即改变了原先的强硬态度。向国民党军队在广州的行营致信，表示愿意接受广州地方政府提出的条件，将日本战犯以及汉奸从澳门引渡给中国政府，查封其财产，并且将居住在澳门的所有日本人全部驱逐出澳门。除此之外，澳葡当局还表示：1. 中国军队和民众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澳门。2. 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以及肃查委员专门办理引渡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案件。3. 允许中国方面的所有党团在澳门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活动。4. 居住在澳门的中国公民享有游行示威和集会的绝对自由。在提出了上述条件之后，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还连忙派遣人员专门向中国方面表示道歉。

针对澳葡当局采取的这些妥协方法，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广州行营在12月下旬将布置在前山边境的武装封锁予以撤回。

1946年2月5日，国民党159师师长刘绍武率领一个警卫连进入澳门慰问同胞。这是中国军队自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之后，数百年间第一次来到澳门。因此成千上万的澳门同胞在澳门的边界上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在澳门同胞爱国热情的强烈感染下，刘绍武师长在澳门各界举行的盛大集会上，激动地重申了中国方面应尽快收回澳门的愿望。他说：“澳门由于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受制外人，同胞痛苦有如水深火热。现在战争已经胜利，中国已为五强之一。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中国领土必须完整，澳门必须迅速回收，才可永付同胞之愿望。”刘绍武的演讲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可是，国民党当局竟然又一次放弃了收回澳门的好机会。国民党中央政府在答复各省参政会要求收回澳门的建议时，作出了这样的批语：

关于收回澳门，参政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
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尽管广大军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国民党政府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全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

十八 日本“和平宪法”的诞生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意识形态上，日本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 20 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唯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更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为了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1949 年 6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随后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主张。此政策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当年 9 月 22 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政策》的精神，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 月 10 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 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 月 4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销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

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46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SW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发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

1946年1月末，美国占领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

1946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

1947年3月，美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

美国在战后发布的上述一些文件和法规，为制订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基本法律依据。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曾经有过一部宪法，即1889年由明治天皇“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它是一部带有浓烈神权色彩的专制宪法。

《明治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规定甚少，规定，“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由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

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有关军令不经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之后实施。《明治宪法》的确定，把军权推到最高地位，使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1945年9月，盟国占领日本后，负责占领日本事务的盟国远东委员会和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东京总部下达命令，要求东京留守内阁做修改宪法准备，随即逐步对日本进行了改造。建设现代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计，树立现代营养和卫生观念，废除纳妾，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还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民主改造，借以消除日本社会中的封建色彩，清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赖以发动战争的土壤。其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日本制定一部符合近代西方君主国家模式的新宪法。

1945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共同拟定了SWM55/3号文件，决定先把天皇制和裕仁天皇个人分开，然后考虑新宪法问题。

随即《明治宪法》的修改工作开始。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修改工作。这个委员会由著名政界领袖组成，主席是内阁成员松本静治博士。在委员会开始运转的同时，各种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就以社论、信件乃至对委员会成员访问的形式提出来。修宪成了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报纸上甚至在家庭中讨论和辩论的焦点。

当年12月4日，吉田茂将“修宪草案”提交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该“草案”基本保留了“明治宪法”原本体系，在个别词句上对旧宪法进行了某些修改，如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将“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但天皇依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和民族精神的造化者，实际是旧宪法的翻版。美国人形容“修宪草案”是“普鲁士君主立宪的父亲和英国大陆法的母亲产生的奇怪的混血儿”。而现政府继续推行“国体护持”方针，搞所谓“一亿总忏悔”，实际上是将日本人重新聚集在天皇麾下，架空占领政策。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3

麦克阿瑟看了日本内阁的“修选草案”后，怒气冲天。立即予以退回，决定剥夺日本人起草新宪法的权利。他下令由盟军总部民政局单独起草宪法。麦克阿瑟将一张纸条交给局长惠特尼。上面写了三条意见：一是天皇仅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二是放弃交战权；三是铲除封建制度。这实际就是形成新宪法三原则的基础。

惠特尼立刻着手日本新宪法的起草。他召集以青年军官为主的 25 名美国人（包括一名女性）组成新宪法起草班子。这些人的专业背景不相同，唯独没有立法专家，只有两人有律师经历。班子成员有着明显特点：年轻、崇尚进步。他们中最小的只有 22 岁。



盟军总部民政局长盖迪斯

这个起草班子的负责人是民政局长盖迪斯。盖迪斯 1907 年生于纽约犹太人家庭。盖迪斯的导师是法兰克福学派（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撑）的著名学者。其追求进步的思维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人的人生道路。1945 年他从欧洲来到日本，协助惠特尼工作。

宪法起草这样的工作，即便是专家，也得花上不少时间。但这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不分昼夜奋战，仅用 7 天就完成草案。盖迪斯是民政局中最不妥协的人物，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明治以来被视为忠君教育的“法典”——“教育敕语”被废止。皇

权意识形态被彻底切断，日本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因此盖迪斯被称为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者。而团队中唯一的女性碧特·史洛塔，在新宪法中增加了一些与女权相关的内容。

1946 年 2 月 13 日，新宪法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久，吉田茂上台，务实而保守的吉田茂为了早日从美军占领下独立，尽快与美国“和谈”，选择了服从。

1947 年 1 月 24 日中午，前日本首相、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来到麦克阿瑟办公室。见币原有点局促不安和欲言又止，麦克阿瑟问其原因。



日本前首相币原喜重郎

币原提出新宪法的条款中，应当加入“非战条款”。要用宪法手段禁止日本有任何军事建制，不论任何形式的军事建制。币原认为，这样会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旧军方将被剥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二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都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币原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战备上了。国家所剩的资源都应在用于扶持经济。”币原的意见得到麦克阿瑟肯定。于是，在《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中有了如下的表述：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有了这一条款，《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作“和平宪法”。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也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最终，日本新宪法中浓缩了三个原则：尊重人权、民主主义、放弃交战权（和平主义）。日本学者撰文指出：“和平宪法”是日本总结战争教训之后向世界作出的“公约”。

十九 叛国投敌者——汉奸的可耻下场

1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各界民众强烈呼吁惩处当年叛国投敌的汉奸。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上旬通过了《处置汉奸条例草案》，下令各地对汉奸进行大搜捕。

逮捕汉奸是一份肥差事，不仅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大发横财。当时，对于由谁主管颇有一番争执。初期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是，其他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事权难以统一。为了调解内部矛盾，更好地执行逮捕汉奸之任务，蒋介石发布手令，内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这样，国民政府就将逮捕汉奸之权完全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军统。随之，军统局成立了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会。

9月26日，军统南京区以宪兵南京司令部与警察厅名义，逮捕了伪南京政府实业部长梅志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经理总监部长岑德广、伪海军部长凌霄、伪社会福利部长彭军、伪宣传部次长郭秀峰等23名大汉奸。另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名义逮捕了汉奸陈昌祖、葛世平等24人。

9月30日，军统派飞机把伪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8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行动总指挥的周佛海和新任浙江

省专员的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护押到重庆，后又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

10月3日，将8月25日乘日本飞机秘密逃往日本的汪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6人引渡回国。

军统还伪造蒋介石手令，请已故大汉奸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及诸民谊以“赴重庆商谈善后事宜”的方式，加以诱捕。

紧接着，将国民党军统局收押在北平炮局的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伪常务委员会兼建设总署督办王荫泰、伪常务委员兼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等大汉奸以及周作人、王漠等人，用飞机押解南京。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

2

1945年10月21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成殿对周佛海进行首次公审。

周佛海在叛离重庆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当过副主任。伙同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后，担任过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即与军统局戴笠取得联系，反正的时间较早。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任命他为国民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

上午10时整，周佛海在法警及宪兵的押解下，进入法庭，站在被告栏内，其扶在栏杆上的两只手颤抖不已。

南京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还有著名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喜麟坐在审判台上。

审判开庭后，首先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用了近5个半小时。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



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



在法庭上受审的周佛海

认为，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表功的辩词，说得滔滔不绝。此前在重庆时，周已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提审当天他便递交了这份《自白书》。

周在《自白书》中宣称：他们的叛逃和组织政府，既“不会影响抗战的阵营”，也“不会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倒反使敌人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言”。他还大谈其自首和协

助国军作战的功绩，说他在抗战后期设置电台与重庆联络，向重庆秘送情报，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国民党中央工作人员，诛锄奸伪以及“保卫大上海”。因此，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辩论到最后，检察官陈绳祖突然站起来，举起几张纸，高声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可以证明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京沪杭行动总指挥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

11月2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再度公审。周佛海不得不供认“离开重庆是根本的错误，当时看错了，牺牲了祖宗和子孙的名誉，真所谓错误的牺牲。”但仍竭力抵赖其罪行，甚至公然声称他是“和平的抗日者”。

11月7日上午11时，南京高等法院的“特定第346号特种刑事判决书”，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将周佛海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周佛海被判死刑后，其妻杨淑慧一面向最高法院抗告，一面通过周佛海从前的密友，时为国民党要人的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陈方、洪兰友等人，向蒋介石进言，请求赦免对周佛海的死刑判决。

1947年1月20日，杨淑慧的抗告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杨淑慧顾不得礼节，连夜闯进了蒋介石机要秘书陈方的家。

杨淑慧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对陈方说：“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能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把蒋先生的亲笔

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果然，正月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召见她。杨淑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见到蒋介石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吃了定心丸，轻轻地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此后，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司法院及国民党有关当局，对于周佛海的特赦问题，进行了多方商讨。其特赦令经蒋介石亲笔修改，于3月26日由蒋介石签署发表。自此，周佛海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3

1946年3月23日晚8时30分，上海绍兴路158号，伪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正在家中大宴宾客。

在全国4000多个汉奸先后锒铛入狱后，唯独这个大汉奸仍置身法外，依然游荡在上海的各娱乐场所，逍遥自在，其乐悠悠。因为他1943年就投靠重庆当局加入了军统，更因他在日本投降前夕，曾奉蒋介石委派充当“和平使者”去东京活动，阴谋同日本单独媾和。虽然因日本政府和军方意见分歧而不了了之，但在蒋介石那里成了“有功之臣”。不久前，蒋介石曾以军统局名义发给其奖金8万元法币。

今天缪斌大宴宾客的目的，就是庆幸逃脱汉奸罪名，炫耀自己成为受奖励的有功之臣。席间他拿出“经奉委座之嘉勉”字样的嘉奖令自吹自擂：“我为伪政府的副院长，实为重庆的地下干部，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今晚请客的钱就是委员长给我的！”

这个大汉奸万万没想到，正在他得意忘形地大宴宾客之时，他正面临着厄运降临。

当日晚9时，蒋委员长办公室，一阵匆匆的脚步声，戴笠出现在门口：“委

员长，东京盟军总司令部来电。”

“什么事？”蒋介石合上《曾文正公全集》。

“麦帅来电查问缪斌东渡的事。”

“麦帅是怎么知道的？”蒋介石一怔。

“据说是从日本内阁档案里发现的。”戴笠随之念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电报。

美军占领日本后，着手接收日本战时内阁的档案，发现了名为“佐藤事件”的文件。经查问，“佐藤”正是缪斌。于是将此事报告国内。美国政府认为，按照开罗会议决定，任何一个盟国不得单独对日媾和。蒋介石此举明显违背了开罗会议决定，所以麦克阿瑟下令查究。

“如何向麦帅回答，请委员长明示。”戴笠催问。

蒋介石沉思了一阵：“告诉麦帅，就说中央根本不知缪斌东渡之事。”

戴笠正要退出，又被喊住：“缪斌身在自由中，恐给人以口实，让麦帅知道了更生麻烦，应予逮捕。”

一天深夜 12 时，一队武装军统特工直达缪公馆，逮捕了缪斌。当晚缪斌被关进了“楚园”。他一人“楚园”便对群奸说：“雨农的手下不明内情把我误捉来了。反正我有奉命工作的护身符，可以高枕无忧。”

1946 年 4 月 3 日，江苏省高等法院首次公审缪斌。下午 2 时半，庭长石美瑜，推事陆家瑞、余樾，书记官朱鸣球，检察官李曙东入庭各就各位。为缪斌辩护的律师解树强、张竺、李福生在辩护席内坐定。

缪斌由法警挟护出庭，身穿夹裤夹袍，脚蹬铮亮的黑皮鞋。



日本首相东久迩宫（右）接见蒋介石的特使缪斌（左）

庭长问过年龄、籍贯，又问职业。缪斌头一扬：“一向是搞政治的，民国八年加入国民党，从未开除过党籍。前年8月加入军统，受过委员长嘉奖。”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列举其10年来通谋敌国的累累汉奸罪状。读毕，庭长问：“检察官依据《惩治汉奸条例》第二项第一款、第十三款提起公诉，被告有何话说？”

“当然要说话。”缪斌打开随带的文件包说，“本人曾撰有《我的对日工作》一册。借此机会，公布我奉命对日策反经过之种种秘闻。”

他从口气到神态，俨然演说家，读中带讲：

“去年秋天，我从日本友人处得知，为集中力量对付美英进攻，日本政府想从中国战场脱身，通过与蒋介石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我便派儿子去重庆，向戴笠报告，自荐充当‘和平使者’出使日本。经戴笠请示委员长同意，我带着委员长手令，并和谈的6项条件，于去年3月中旬，在小矶国照派来的专使陪同下，自上海乘日军飞机直达东京。在东京访问了老友天皇堂兄东久，拜会了小矶国昭首相。没想到由于日本政府内部分歧很大，和谈便告终止……”

法庭之上，被告公然大谈蒋介石通谋敌国，庭长再三喝止，缪斌如同未闻，一口气谈完，末了说：“所有上述各事，进行前后及过程中，不只迭次向中央请求报告，且有委员长手令，从日本和谈回来后，委员长还给予嘉奖记功，发给奖金8万元整。”说着，把蒋介石手令出示。

石美瑜庭长略一扫视：“此绝非委员长手迹，不可足信。”

缪斌：“原件恐在军统局。再有，嘉奖令在何总司令处，法庭可以调查。”

“被告所说调查，本庭认为不必了。因军统局已有来文。”庭长取了一纸，琅琅开读：“查缪斌叛国通敌，劣迹昭然。虽为本局运用，略有贡献。而于日寇节节失败之时，未免投机取巧，希脱法网。仍请依惩治汉奸条例，予以检举惩办。”

“最近，戴局长死了，没有人为我说话了。但委员长知道我的情况。”缪斌气急败坏，大声吼叫，“我要向委员长申诉！”

检察官紧接着说：“被告自辩各点，均无证据，显系狡辩，危言耸听，企图为自己开脱。要求法庭依起诉书所列罪状，予以严惩。”

4月8日下午2时10分继续开庭。石美瑜庭长按惯例问过年龄、籍贯后，环视全场：“今日对被告缪斌判决。”接着以朗诵速度开读：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

(35 年度特字第 295 号)

公诉人：本院检察官。

被告：缪斌，男，年 44 岁，无锡人，业政界，住上海绍兴路 158 号。

选任辩护人：解树强、张竺、李福生。

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判决如左：

主文：

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缪斌，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处决的第一个大汉奸。

4

1946 年 4 月 4 日，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开庭审讯大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早在 1907 年即加入同盟会。1917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 年夏返回广东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后，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1 年 7 月，他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 年因支持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3 年后，经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同汪精卫是情同手足的好友。在汪精卫决意叛国通敌成立伪政权之时，他坚决反对，苦劝汪数次。汪仍一意孤行。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在私邸与陈公博密谈。陈力劝不宜离开重庆，坚决反对汪分裂抗日阵营。一旁作陪的汪妻陈璧君讽刺陈：“你反对，那你就做你蒋介石的官去！”陈意识到汪受妻子左右，断难醒悟。

汪精卫到上海后，陈又于 1939 年冬从香港赶赴上海，苦劝汪悬崖勒马，仍无济于事。

1940 年 3 月 14 日，陈公博应汪召又一次赴上海。他见汪执意已决，只好听从汪的意志行事。他对汪说：“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的精神想扭转乾坤。你既已决定牺牲自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



汪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

3月20日，汪精卫任命陈公博为汪伪立法院长。5月陈担任专使代表汪赴日晤见天皇、首相和日本军政首长。10月伪上海市长被暗杀，汪即任命陈为上海市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于日本后，由陈继任了汪的所有遗留职务。其实陈公博是被汪精卫一步步拉下水，越陷越深，而成为大汉奸的。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

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二十一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陈等人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千人成了阶下囚。

公审这天下午，法庭宣布开庭后，检察官韩焘起立宣读起诉书，当着座无虚席的旁听民众，公布了陈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状：1. 缔结密约，丧权辱国。2. 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 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 认贼作父，宣布参战。5. 抽集壮丁，为敌服务。6. 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 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 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 官场贪污，政以贿成。10. 收编伪军，祸国殃民。检察官韩焘当庭要求对陈公博从重处刑，作昭叛国者炯戒。

在诉讼期间，陈公博撰写了全文3万字的自白书。在自白书的末尾称：“请法院随便公正判刑，我决定不再申诉。”

1946年4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汉奸陈公博死刑。

陈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天我被判处了死刑，当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动了一下。但随后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视死如归的精神，甚至觉得



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公博

我对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结束了这一生的。”

1946年6月3日上午8时半，检察官在监狱临时法庭宣读了陈公博的死刑执行令。

死刑命令执行前，陈要求死前先去见同被关在狱中的陈璧君。两人见面后，陈璧君放声号啕大哭说：“当初你是激烈反对汪先生建立南京政权的。后来你是舍命陪君子，被我拉下水……”

陈公博泪流满面地说：“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说完即转身赴刑场。

5

1946年5月13日，由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对汪伪喉舌、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提起公诉。

林柏生，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24年担任当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汪精卫的秘书。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深得汪的赏识。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林柏生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



汉奸林柏生（右三）被押上法庭

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后，被陈公博派任伪安徽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1945年8月25日，同陈公博一起逃往日本。当年10月3日，又同陈公博一起被引渡回国。

5月31日上午9时，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在法庭上，林柏生一一承认了在伪政权中所任的职务，却以种种诡辩推卸他的汉奸罪行。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其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等罪证109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林柏生被执行死刑。

6

1946年4月15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审理诸民谊汉奸案。诸民谊乃汪伪政权第4号人物，曾任汪伪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等职。

1945年10月中旬，诸民谊与陈璧君及其子女从广州乘机赴南京。一下

飞机便被押上囚车送往看守所。1946年2月18日诸民谊被押送到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当日下午2时开庭。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

诸民谊被押到法庭时，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戴一顶黑色帽子，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

诸民谊站在被告席后，检察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了诸民谊在汪伪政权中的种种罪行。

诸民谊在当庭申诉中，竟然对大汉奸汪精卫大加吹捧，称汪是一个“仁人君子”。



汪伪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诸民谊

而对汪精卫的投敌卖国罪行作了一番掩饰。他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汪伪政权的成立是和平抗日，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元气。充分暴露了其顽固不化的汉奸嘴脸。法庭最后判处诸民谊死刑。

在受审前，诸民谊让其老婆陈舜贞多方奔走争取同情，力图保住活命。判决后，蒋介石竟发出了对诸案从轻处理的手谕，但在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下，于1946年8月23日，诸民谊仍被执行死刑。

7

1946年4月16日，设在苏州的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在汪伪时期追随其夫汪精卫干尽坏事的汪伪第一夫人、伪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富商家庭，曾是孙中山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对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非常钦佩。1912年初，在上海与汪精卫结婚。婚后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支持汪卖国投敌，帮助汪干了不少卖国勾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璧君在广州被国民党军统逮捕，收监在南京看守所。

开审这天，陈璧君着意打扮了一番。在法庭上她态度傲慢，拒不认罪，同检察官进行针锋相对的舌战。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僚政治，大声揭

露蒋在抗战时期暗中同日寇勾结的卖国行为，大骂蒋介石对其夫君掘墓焚尸的残忍暴行。同时把自己和汪精卫美化成爱国英雄，为自己的汉奸行为极力辩护。

检察官问：“汪逆与日媾和，你赞成吗？”陈璧君答：“汪先生的主张，我绝对赞成。”

检察官问：“中央在南京决定抗战大计，汪逆也参与决策，为什么会变了呢？”陈璧君答：“蒋介石明里言战，暗里也在乞和，同意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足可佐证。”

检察官问：“汪逆欲与日媾和，为何不向中央建议，而私自逃离重庆呢？”

陈璧君答：“蒋介石屈从英美压力，又害怕打不过日本，出尔反尔，时而言战，时而谋和。汪先生认为不足与谋。汪先生成立南京政权全是我的主张。因为蒋介石不讲信用，叫天下最大的王八蛋戴笠到越南去刺杀汪先生。我一怒之下才叫汪先生组织政府。如问谁是罪魁祸首，那应该是我呀！我是主谋！”

4月22日下午，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蒋介石她不敢杀我呢！其实我有被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

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已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



夫唱妇随的汪精卫与陈璧君

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

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即将判刑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支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信中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表示拒绝。她提笔给宋庆龄、何香凝写了回信：

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后，一直在监狱里待了13年。1959年6月17日，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

8

1946年5月13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成殿开庭审理汪伪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浙江省省长、大汉奸梅思平。

早在1938年8月，梅思平就在上海和日本“同盟同舍”上海局局长松本重治进行5次密谈。商定了汪精卫建立伪政权的条件和步骤，是汪伪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的直接策划者。随后又与日本特工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还当过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工业部长、实业部长。

5月9日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9月14日上午10时，梅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被处决。这是继缪斌和陈公博之后第三个被处极刑的大汉奸。

丁默村原为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并驾齐驱。1938年8月第三处被撤并，他仅在“军委会”中挂了个少将参议空衔。气恼之下，他组织了以大特务李士群为首的特工组织。

1939年底，国民党“中统”为了暗杀丁默村，派出女间谍郑频如，将丁诱至预先已埋伏好杀手的上海戈登路西伯利亚皮货店。不料被丁看出破绽，乘车逃脱。后郑频如被丁杀害。

1947年7月5日，丁默村这个民族罪人被判处死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被执行枪决。

9

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具有双重国籍的女汉奸川岛芳子死刑。

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出身清朝没落皇族，系清朝末年肃亲王的第14位女儿，满文名为爱新觉罗·显玕。其父在她6岁时，将她送给日本友人川岛流速养育，取名川岛芳子。

1927年川岛芳子回到中国，与同为



身着男装的川岛芳子

日本扶植的满蒙独立军司令马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结婚。1930年10月她只身前往上海，第二天就与丈夫离婚。不久，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助理武官、上海陆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佐同居，从此，开始参与情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于同年10月上旬，赶赴奉天（沈阳）投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麾下。她受命把被日本软禁在天津的溥仪和妻子婉容护送到东北，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条件。喜好着男装的川岛芳子还参与谋划并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此后，她向坂垣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带兵，“荡平满洲叛逆”。坂垣与本庄繁便将原军阀张宗昌旧部3000人交给她，改名“安国军”，她自任“安国军”司令，改名金壁辉。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宪兵在北平将其逮捕。



身着日本军服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长着一副漂亮脸蛋，又爱穿男装，被称为“绝代妖姬”。受审这天，她穿着一身漂亮衣装，显得异常优雅、潇洒。

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活动，认识不少记者及“弃暗投明”的司法人员。在被告席上她不时左顾右盼后望，向熟识者送去媚笑以及飞吻，激起旁听者的不满嘘声。

答辩过程中，川岛芳子大耍“妖惑”。当问及与哪些人有过联络时，她竟说：“某某人与我同居过。还有某某人，他们爱我的美色。不过名人太多，不能说出他们的姓名，这是隐私。”

法庭庭长宣读了对川岛芳子的判决书。

判决书称：1. 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2. 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策划并挑起了“上海事变”。3. 被告参与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

场的条件。4. 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日军入侵热河时，曾指挥安国军 3000 多人参加作战。

1948 年 3 月 25 日，对川岛芳子执行枪决。

据当时媒体透露，在对川岛芳子行刑时，选择在黎明前看不清人的晨光中执行。处刑后，把死者面部搞得血肉模糊，沾满泥土，使人难以辨认。

川岛芳子一向是短发，审讯和判决时仍为短发。但记者拍的照片上死者的头发长度却达到脖子中央。当年 4 月初，媒体就曝出“替身”的消息。报上称：替身叫刘凤玲，患晚期肺癌，被 10 条金子买做替身。3 月 24 日晚，刘被送进监狱。25 日晨，在监狱里将川岛芳子与她对换。川岛芳子从监狱小门逃出，被行刑者段姓等三人护送到四平，后成为段姓男子的非婚伴侣。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春郊区新立城匿居，直到 1978 年病死。



川岛芳子被处决后的场景

二十 东京审判

1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

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州最高法院院长韦伯爵士为东京法庭审判长，任命美国大律师约瑟夫·季楠为首席检察官（检察长）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向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发出通知。要求各国尽快派出参加东京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提出甲级和

乙丙级战犯名单。还特别讲明，如果届时不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将如期举行单独审判。

严惩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早在1942年就成立了调查战争罪证的机构，1943年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1945年12月成立战争罪犯委员会，专门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韦伯爵士

负责处理战犯问题。

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总部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选派去东京参加审判的司法人员。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组成比较整齐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阵容。

派往东京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两个最重人选，结果选定 42 岁的梅汝璈博士为中国法官，他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选定向哲浚为中国派驻东京法庭的检察官，他当时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为加强法官、检察官力量，中国政府又派法律专家倪征燠为首席顾问。上海著名律师鄂森、桂裕为顾问，精通日语的吴学义、周锡卿为翻译，法律专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和历史学家刘子健为梅汝璈和向哲浚的秘书助理。后来，又增加了张培基、高文彬、刘继盛等翻译。

中国参加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人员于 1946 年春来到了东京。

2

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各国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最为关注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顺序。在任何国际场合，各国代表的座位排列顺序乃是关系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荣誉的大事。

军事法庭的庭长，已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由哪国法官坐，十分令人关注。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各国法官各执一词，展开了争论。诸同盟国中，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严重的国家，但国力最弱。弱国无外交。其他国家本来都轻视中国，尤其是英国、荷兰都试图将座次排在中国前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法官梅汝璈义正词严，当仁不让。他说：“要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要请示中国政府。”

梅汝璈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梅汝璈接着说：“我认为，法庭

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说到这里他略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人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梅汝璈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庭长韦伯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璈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代。一旦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替换我呀。”这个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

面对满场笑声，韦伯不失风趣地说：“梅先生真会说话，是法官又是幽默大师。”他看了看表，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而梅汝璈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那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官未曾再作争辩，座次问题似已解决了。但庭长韦伯仍未最后拍板。

等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11名法官着装整齐准备出场。殊不料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既然我的按受降签字国排列座次的建议在同人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韦伯就英国排在第二位作解释道：“因为美英法官对美英法律程序熟识一些。他们居中坐在一起纯粹是为了庭审上的便利着想。”然后他提高了声音，以显示下面这句话的重要，



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企图压梅汝璈就范：“这本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

梅汝璈莞尔一笑：“尊敬的庭长先生，有一点必须明白。这是国际法庭，不是美英法庭。我看不出有美英法官居中的必要！”

“如果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于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韦伯用话施加压力。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是为打败日本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它应有的席位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断乎难以接受！”

梅汝璈义正理直地坚持，使韦伯的口气软了下来：“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今晚可以开个会再作一番商讨。”

梅汝璈摇头拒绝：“预演虽是临时性和非正式的，但已有许多记者与摄影师在场，一见报岂非既成事实？唯一的方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不然，我只有公开声明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他说着又一次脱下了法官袍。

韦伯无以应对，只得同意就梅汝璈的接受降签字顺序排座进行表决。诚如梅汝璈所料的获得顺利通过。

1946年5月3日上午，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开庭前韦伯向法官们宣布：最高统帅部已经同意，我们以后行列和席位的顺序，就照昨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团成员，前排中央为审判长韦伯，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天预演时的次序进行排列。

随着法庭执行官朗声高唱“全体起立，法官入座”，庭长韦伯在前，10名法官依次随后，梅汝璈紧跟着美国法官，落落大方地坐在了庭长左边的第二把交椅上。

中国法官梅汝璈以其机敏与胆略，在谈笑风生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折服了对手，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座次。这是中国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赢得的一次胜利。

3

1946年5月1日，东京市合谷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室。

澳大利亚法官、审判长威廉·韦伯爵士，美国检察官、检察长季楠共同召集全体法官、检察官联席会议。议题是讨论对几名主要战犯的主审工作进行分工问题。

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穿崭新的法官服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中间。他右边是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著名律师韦伯爵士，左边是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

韦伯：“从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8人被宣布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后，前陆军大臣荒真夫等11人，黎本宫等52人，前首相近卫文磨和內大臣木户幸一等9人也都相继被指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共指定了110名前日本领导人为甲级嫌疑犯。其中除前首相近卫文磨、前厚生大臣小泉亲彦、前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前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自杀身亡和日本天皇裕仁被盟军总部从战犯名单中勾销外，其余均被盟军一一拘捕，收审在东京巢鸭监狱。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本法庭要进行审判的嫌疑犯。由于人数较多，需分批进行。今天要讨论法庭第一批起诉的28名甲级嫌疑犯中，尤以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大川周明和广田弘毅这几名被告最难对付。为此，法庭拟将这几名战犯的主审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请各位各抒己见。”

美国法官克莱墨尔抢先发言：“我们美国只承担对偷袭珍珠港有罪责的东条英机的主审……”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表示：“庭长先生，我们也只能追究残酷迫害战俘的木村兵太郎……”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说：“我们要清算坂垣征四郎先后两次进攻苏联的罪行。”

季楠检察长：“我提醒各位，还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广田弘毅、大川周明等罪犯，特别是那个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可是相当难对付的！”

此刻众法官、检察官们都面面相觑，面露难色，会场一时沉默起来。

季楠检察长见状，担心地摇了摇头。

韦伯审判长扫视了全场后，便向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征询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审判长、检察长！”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同时站起来，向韦伯和季楠各交了一份申请书。

梅汝璈情真意切地说：“为了伸张正义、昭示公理，我们特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郑重提出，要求担当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的主审法官和检察官！”

“怎么？”季楠检察官伸手接过申请书：“你们中国法官要担当这7名甲级战犯的主审？”

梅汝璈和向哲浚同时点了点头。

季楠检察长：“这可是一起伸张正义、严惩国际战犯的重大案件！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查得清清楚楚，罪证也必须千真万确啊！”

梅汝璈态度十分坚决地说：“审判长、检察长！我们深知案件的巨大和罪犯的狡诈。但作为一个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国家的法官，我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坚信：这帮战争元凶，既在法律的掌握之中，他们就必然逃脱不了正义和公道的严厉制裁！”

韦伯听了，不由赞叹道：“真了不起！”看了季楠一眼：“既然中国法官自告奋勇，就将这7名战犯的主审和起诉，交给他们吧！”

4

5月2日上午9时，东京巢鸭监狱。盟军最高统帅部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

奉季楠检察长命令，挑选几十名膀大腰粗的美国宪兵，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等 26 名甲级战犯从牢房中提出，列队带到监狱尽头的一间大办公室内。

战犯们站好队形，坎瓦兹中校清点完毕后，向季楠检察长立正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批逮捕起诉日本战犯 28 名，因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两名被告尚在押解途中，今天实到被告 26 名。”

季楠检察长大步走向讲台，威风凛凛地庄严宣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业已将你们列为甲级战犯提起公诉，并已决定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庭审判。决定起诉的 28 名被告是：

东条英机，1931 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1940 年 7 月任陆军大臣兼满洲事务局总裁，1941 年 10 月任内阁首相，并先后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参谋总长等职。是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元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等战犯和法西斯头子。

平沼骐一郎，1939 年任总理大臣，1941 年任无任所大臣，1945 年任枢密院院长。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

广田弘毅，1936 年到 1937 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 年任内阁参议，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小矶国昭，1939年至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任总理大臣。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最积极的推行者之一。

荒木贞夫，1931年至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8年至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集团公认的“思想家”和反苏战争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土肥原贤二，1931年至1940年任沈阳警备司令官、高级指挥官，1941年任航空总监，1940年至1943年任军事参议官，1944年任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的日本第7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任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法西斯间谍头子，是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坂垣征四郎，1934年至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年至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至1941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年至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主要干将。

梅津美治郎，1936年至1938年任陆军省次官，1939年至1944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45年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

畑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至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年至1944年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积极推行者。

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次官，1945年任侵略缅甸日军司令官，是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干将。

松井石根，1931年至1932年任参谋本部谍报处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年至1938年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938年至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4年起任“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2年至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年至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曾积极参加了侵略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罪恶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老牌首领之一。

武藤章，1939年至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高级指挥官。是东条侵略计划的积极推行者。

佐藤贤了，1942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是东条英机的高级军事顾问。

永野修身，1930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至1937年任海军大臣，1937年起任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年至1944年任海军参谋总长，1944年任御前海军事务参议官。积极参与了对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活动。

冈敬纯，1940年至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次官，1944年起任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是太平洋战争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岛田繁太郎，1935年至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年至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起任军事参议官和海军参谋长，是积极参与和推行侵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松冈洋右，1935年至1939年任南满铁道会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员，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任外务大臣，是日本侵略扩张外交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主要组织者。

大岛浩，1936年至1938年任驻柏林武官，1939年至1945年任驻柏林大使。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的积极执行者。

白鸟敏夫，1936年至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年至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

重光葵，1931年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至1936年任外务省次官，1936年至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至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年至1943年任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大使，1943年至1945年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1年至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4月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贺屋兴宣，1937年至1938年以及1941年至1944年任大藏大臣，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铃木贞一，1938年至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年至1943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1943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大政翼选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外侵略扩张活动。

星野直树，1934年至1936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次长，1937年至1940年

任内阁总务局局长，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企划院总裁，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副总理大臣，1944年12月任日本大藏省顾问。是统治、奴役、掠夺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1926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东亚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吹侵华，是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的倡导者。

木户幸一，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后任宫内大臣兼天皇枢密顾问。对起用东条任首相扩大侵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外务省参事官当场把季楠讲话译成日文，战犯们听了，一个个脸上顿时惊恐万状，额头沁出冷汗。

检察院官员按被告顺序叫号点名，将起诉书副本分别交给被告本人。

这时，只听“扑腾”一声，只见法西斯评论家、战犯大川周明突然昏倒在地，口吐白沫，痉挛不止。

坎瓦兹中校立即过来，指挥维持秩序的美国宪兵将大川周明抬走抢救。

季楠检察长将手一挥，坎瓦兹中校带领宪兵将25名各自拿着自己那份起诉书的被告再次排成两列，押回牢房。

5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大厅。法庭第一次开庭。

上午10时，澳大利亚法官、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将军、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大律师、法国法官柏奈尔学士、荷兰法官罗村教授、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律师、印度法官巴尔博士、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教授身着崭新的法袍，迎着11国国旗鱼贯而入预备会议室。

接着美国第8军军长艾克尔伯格中将和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同时出现在来宾席上。然后，辩护律师团入庭坐到辩护席上。

11时15分，美国检察官、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季楠、中国检察官向哲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

浚、英国检察官科姆斯—卡尔、苏联检察官高隆斯基、澳大利亚检察官曼菲斯尔德、加拿大检察官诺兰、荷兰检察官穆尔德尔、新西兰检察官奎廉、印度检察官梅农、菲律宾检察官罗伯茨 11 名检察官进入审判厅，在辩护团对面检察官席入座。

11 时 30 分，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率领美国宪兵押解 28 名被告从右边入口处进场，依次坐到了法官对面的被告席上。

11 时 40 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当厅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开始，将审理上诉于本法庭的任何案件！”

厅内全体人员肃立，将目光一齐投向正中的法官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率领 10 名法官精神抖擞地分别坐在正中的审判席上。

韦伯庭长大步走到麦克风前，庄重宣读开庭词：“今天集合在这个法庭之前，我们既无恐惧，也无所仗恃，更不敢有感情上的偏私。因为我们曾签署共同宣言，必须遵守法理，进行公平审判。

“像这次重要的刑事诉讼，在世界上空前未有。因为这次被控告出厅受审的各被告，都不是平凡人物，不是县长、州长之类的小小地方官员。而是包括了以前的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及王公大臣。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曾扭转日本的国运……

“这次审判的最大任务，就是在事实与法理两者之间，保持虚心、坦诚、公正的态度……本法庭所拟定的条例，就是督促我们进行公正而迅速的审判。因此，我们对于各被告，将以尽量大的努力做到公正迅速的审判为宗旨……”

开庭词宣读完毕，韦伯庭长宣布：“现在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向本庭提起公诉！”

检察长季楠从公诉席上站起身来，朗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宣布，当庭公布起诉书！”

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拿着一大摞文件，站在麦克风前，以标准的英语朗

读长达 42 页的起诉书。

日本外务省两名参事官，把美塔大尉的起诉原文当庭译成日语。

控告全体被告，在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或同盟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

6

在法庭庭审第一阶段，中国审判人员就面对了极其复杂的情况，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那时美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蓄意袒护日本战犯。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法庭上捣乱，他们认为除了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要判处死刑外，其他都应从宽发落。

在美国人支持下，日本辩护律师更借机把水搅混。胡说东条英机等战犯都本着“老子”思想行事，不会干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事。

这使东条英机等战犯态度极为嚣张，甚至公开宣称：“你们中国人要给日本战犯嫌疑者定罪吗？请拿出证据来！若没有铁打的证据，就只能是嫌疑者，定不成罪犯！”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朋友，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待了近 12 年。在这期间，我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跟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好朋友，能做坑害中国的事吗？我在中国往往是奉命行事。中国如果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我松井石根甘心情愿接受远东国际法庭处罚！”

至于中国方面重点检举的战犯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更为顽固不化，拒不认罪。土肥原的辩护律师、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课长爱泽城，将土肥原说成是忠厚老实。坂垣征四郎的辩护律师、当年陆军省次官山胁，称坂垣任陆军大臣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人无不良之举。

面对日本战犯的公开挑衅，中国司法人员义愤填膺，但又苦于没有足够

的证据制服这些法西斯恶魔。一时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

梅汝璈和向哲浚把中国司法人员召集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一次次开会商量对策。他们分头到盟军总部、日本图书馆、日本外务省翻阅报刊资料、查阅档案材料，还从苏联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关档案中，发现了纳粹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日本侵占南京的秘密电报，得到了日本侵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可靠证据。

接着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33岁的裘劭恒向法庭提出回国进行实地调查的要求，得到东京法庭庭长韦伯、检察长季楠和梅汝璈、向哲浚的支持，并派莫罗上校和裘劭恒一起离开日本，到中国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带回了8件宣誓证词，带回了英国证人皮特·罗伦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美籍金陵大学教授贝斯蒂和中国证人伍长德、许传音等，找到了制服松井石根等罪犯的有力证据。

为了找到土肥原和坂垣的罪证，中方审判人员到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的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拟出发言材料。他们除了准备材料，还经常在一起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有时还在住所内做法庭上的控诉演习。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他们在人称上采用了特殊的暗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我方审判人员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这就为制服和判裁那些侵略中国的恶魔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7

1946年6月3日，法庭进入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对第一个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20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继续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

“九一八”事变真相也随之揭开。



当年“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张作霖专列。

田中揭露
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坂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

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32年任伪“满洲帝国”执政。两年后，又扶持溥仪当了伪“满洲帝国”皇帝。

8月初，在初审坂垣征四郎时，国际检察官打出一张王牌，让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举证日本侵略者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溥仪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人选。

一天，向哲浚陪检察长季楠去苏联代表团宿舍访问溥仪。溥仪紧紧握着向哲浚的手，痛哭失声。向哲浚看溥仪确有悔罪之心，也有眷恋祖国之念，便动员他出庭作证，溥仪点头答应。

8月16日庭审时，当季楠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溥仪谈到当年与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同时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法庭作证



在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季楠办公室前（右三溥仪、右四季楠、左一裘劭恒）

他指认了被告席上的坂垣。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情绪再次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8

1947年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进入个人辩护阶段。

土肥原贤二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4月升为将官。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日本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



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土肥原贤二。

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对于其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建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亦派他对中国其他地区采取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进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中校、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周密谋划，首先让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的老部下爱泽城充当第一证人。

爱泽城是土肥原的疯狂崇拜者，曾忠实地执行土肥原的指示，把张作霖离开北京时所乘蓝色列车车厢号码用电报密告日本特务机关，使张作霖被炸受重伤身亡。又奉土肥原之命参加爆炸柳条湖铁路路轨，促使“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

此刻，爱泽城站在证人台上，公然为土肥原涂脂抹粉，胡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负责搜集情报，纯属一般性业务机构，没搞其他秘密活动。爱泽城还吹捧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广交朋友。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宾客云集。他经常摆出山珍海味招待客人，又设茶道欣赏歌舞。他又是语言专家，精通 13 种语言，会说中国各地方言，对中国京剧颇有研究等等。说明土肥原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文明人士。

中国公诉人倪征燠拍案而起，他向法庭呈上一份 1935 年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报纸上登着日本军事使团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正是这个爱泽城。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即有谈虎色变之慨。”

中国公诉人倪征燠说：“这是土肥原和坂垣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最真实写照。”

美国律师瓦伦中校却不服输，气势汹汹地走上证人席，故意捣乱说：“审判长，‘谈虎色变’，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

中国公诉人倪征燠带着鄙夷的神情说：“‘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坂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俩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

变了，甚至几岁的中国小孩子只要一听到大人吓唬说：‘再哭，土肥原来了！’小孩子便止住哭声，使劲钻到父母怀中老实了！”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土肥原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

中国公诉人作如下揭露：原来，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指示悄悄来到天津，动用日本所有特务组织严密监视溥仪，发现他“确有复辟满清，逃往满洲之意”，便认为将溥仪挟持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却遭到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反对。

土肥原不顾日本外交系统的阻挠，在深夜到天津的静园会见溥仪，表现出异常的温文和恭顺，以富有诱惑力的言辞煽动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财产和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日本才不得已出兵。我们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当时溥仪犹豫不决：“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见溥仪已经受骗，便勾结日本浪人和匪徒，发动了天津“便衣队”的武装暴乱，再出动日军全城戒严。在混乱之中，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偷偷运出静园，再化装成日本军官，乘日本军车到英租界码头，乘日本汽船闯过天津军粮城驻军哨卡，偷渡白河，又在大沽港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最后到达了东北“满铁码头”营口。

为揭露土肥原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东京法庭再次传溥仪出庭作证。检察长季楠亲自讯问溥仪：“为什么在 1931 年满洲事变时离开 1924 年起就居住的天津？”

溥仪用扇子愤怒地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说：“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土肥原在天津玩弄阴谋，在我周围发生了很多可疑的事情，出现一系列威胁和恐怖行为。我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受不了土肥原和坂垣的威胁，不得已只好就范。”

接着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登上讲台，揭发土肥原在中国种植贩卖鸦片的罪行。指出土肥原吹嘘日本用刺刀、鸦片、特务三件“法宝”灭亡中国。他愤怒地控诉说：“土肥原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变成以鸦片通往军事侵占的途径。他从满洲建立伪政权开始，后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命令伪政府废除中国鸦片和麻醉品法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而大发横财。”

向哲浚用充足的证据证明，土肥原等日本侵略者拨款进行鸦片和其他麻醉品贸易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二是获取

大笔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使用。

中国检察官还控诉土肥原组织中国沦陷区的伪政权，血腥屠杀中国、马来亚、印尼等国的无辜百姓，虐待残害战俘的罪行。

面对法庭一件件有说服力的证据，土肥原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作为老牌间谍，他比别人更懂得，他上绞刑架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不承认两条路都同样通向断头台，而且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会暴露出更多的罪行。只好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

9

1947年10月9日，法庭最后一次庭审坂垣征四郎。

中国公诉人指控坂垣参与制造华北、内蒙伪政权和发动“七七事变”的罪行。坂垣便请他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出庭作证。山胁百般吹捧坂垣，胡说坂垣如何下力气整顿军队，又强烈主张撤退侵华日军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倪征燠不动声色地诘问山胁说：“你身为陆军省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认可的了？”

山胁不知是计，只得回答：“是。”

倪征燠接着提出：“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陆相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点头承认。倪征燠便有理有据指出：《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严格规定回国的日本军人对亲友谈话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



倪征燠罗列大量罪证后，

倪征燠（右二）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



“七七事变”的元凶坂垣征四郎

以不可辩驳的逻辑作出结论说：

“坂垣征四郎命令签发的侵华文件有力证明，坂垣指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他害怕罪行在日本广为人知，才指示你山胁下达了《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是证明坂垣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对此证人无法否认。日本律师弄巧成拙，煞费苦心寻找证人提出的证言，不仅没能开脱坂垣的罪责，反而成了证明坂垣有罪的反证。

最后，坂垣征四郎亲自向法庭提出长达 48 页的书面证词。反复强调“七七事变”后任陆相时，他曾主张撤退驻华日军以实现和平；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商讨订立三国公约时，他以陆军大臣之地位，反对日本同时对付英法两国；胡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任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故对太平洋战争和扩大侵华战争等毫无关系。

面对坂垣征四郎的猖狂挑战，倪征燮怀着民族义愤，与坂垣征四郎在法庭辩论 3 天。双方都有大批人员擂鼓助战，纷纷提供文件等证据，各自出谋划策，成为东京法庭上辩论最激烈的 3 天。

坂垣征四郎拿出他任陆相后的文件当庭宣读，手摇文件说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他主张撤军言和，因而他没有罪而有功！

倪征燮反问道：“日军侵占广州、汉口，发生在你任陆相之前还是之后？”裘劭恒、杨寿林、鄂森、吴学义等人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在一旁催促：“坂垣，快回答！”

审判长韦伯从心眼里喜欢中国年轻司法人员给坂垣施加心理压力。但迫于日本律师团抗议，不得不出面制止中国人的正义呐喊。他微微一笑，巧妙地利用庭长的合法权威质问坂垣征四郎：“被告坂垣，请你马上回答倪征燮法官的提问，到底攻占汉口、广州发生在你任陆军大臣前后，不得拖延！”

坂垣不禁心头慌乱起来，点头承认日军攻占汉口、广州发生在他任陆相之后。

倪征燮见初战告捷，更精神抖擞地乘胜追击：“那么，这是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征四郎在众目睽睽之下难以狡辩，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中国检察官又控诉坂垣征四郎在“七七事变”后，极力主张不仅攻占北平、天津和青岛，而且力主进兵山西和济南，指控他率领第5师团血洗山西阳高、天镇、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原平7个县城，屠杀1.6万无辜百姓。又制造宁武惨案，搜出男人就用铁丝穿透锁骨，搜出妇女则野蛮蹂躏，然后屠杀。仅一次就屠杀宁武县百姓4800人。

接着，倪征燠控诉坂垣征四郎勾结土肥原贤二在华北阴谋策动吴佩孚、唐绍仪建立华北伪政权。但吴佩孚拒不出任坂垣等组织的北平维持会长，唐绍仪也未就任伪政府首脑之职。

倪征燠满腔怒火地质问坂垣：“你派去搞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是不是扶持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贤二？”

坂垣征四郎白眼一翻，说：“关东军派土肥原到华北去建立伪政权，不是他自己主动去干的，而是同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协商后才去干的。”

倪征燠进一步追问坂垣：“日本为什么不仅在满洲，而且在华北也需要伪政权？”

坂垣回答：“因为需要一个巩固的，主要是纵深梯阶式的后方。”

倪征燠当众揭穿坂垣的谎言：“难道不把目标对准中国？”

倪征燠根据日本外务省机密文件中关于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机密会议决定，根据陆军省与关东军的来往密电，根据关东军的动员令等材料，历数坂垣的侵华罪行，坂垣惊慌失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

10

1948年4月16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韦伯庭长召集各国法官举行会议，讨论有关起草判决书工作的打算及具体分工。

韦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庭审工作已经结束。下一步转入起草判决书阶段。这一工作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审判工作的成败。今天就如何起草判决书，请各国法官发表自己的见解。”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首先发表他的见解：“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应按各个时期和各个战场起草。”

“对！”美国军事法官克莱墨尔将军赞成道，“是应该以各个时期和各

个战场起草最好！”

韦伯庭长：“对英、美两国法官的提议，其他法官先生们有什么意见？”

各国法官未有异议，一致赞同英、美两国法官的提议。

中国法官梅汝璈站起身来：“审判长，各位法官先生！我完全赞同英、美法官的提议。但是我有一个请求：日本对我国的武装侵略，最远可以从1874年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算起，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为止，历时达半个多世纪。这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的！”

“不错！”韦伯庭长点头道，“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的！”

梅汝璈继续说：“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继而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出动的陆军即有100万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野蛮的、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在这八年战乱中伤亡了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最为深重的灾难。为此，本法官代表中国人民，特向法庭提出请求：法庭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请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最大，蒙受经济损失也最为严重，判决书的中国部分理应由中国法官起草！”其他国法官异口同声：

“我们赞成对付公牛得抓其角，对付日本战犯，最好得靠中国法官！”

“好！”韦伯庭长当场宣布，“根据大多数法官的意见，本庭同意中国法官的请求，正式批准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梅汝璈回到他的办公室，赶忙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其他中国法官。倪征燮、向哲浚便立即和他商量起草事宜。

杨寿林、罗集谊、裘劭恒3人赶忙搬过几大堆审讯记录，从中挑选有关材料摆在桌上。

梅汝璈走过来，面对桌上堆积如山的审讯资料，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必须花费数倍的精力和代价，充实我们手中的判决书！”

倪征燮说：“只要能与国同心，我们情愿将这数万份庭审记录钻通。”

几天后，中国法官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开的各国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从法庭已经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法西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杀人更加惨绝人寰！对此种人类文明历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

予以揭露。”

“单独设立一章？”印度法官巴尔博士不解地问道，“是否有此必要？”

梅汝璈补充道：“我的这一请求，务必请各位同人能够予以理解赞同。”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说：“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完全应该在判决书中单独说明！”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也赞同道：“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暴行突出的事件，也是本法庭审理的重案之一，完全有这个必要！”

韦伯庭长望了望其他法官：“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这样定了！法庭同意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判决书中单独设一章加以说明。这项工作仍由中国法官负责。”

11

1948年4月2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厅。

各国法官秘密评议（量刑）对日本战犯是否处以死刑问题。

中国法官梅汝璈首先说：“杀人者必须偿命，欠债者必须还钱！我想，这不光是我们中国一国的法度。因此，我坚决要求法庭，依法对这些战犯处以死刑！”

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几位法官，各有各的主张：来自已经废除或部分废除了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法官，不可能轻易地赞成法庭适用死刑。

“我不同意！”印度法官巴尔博士的态度极为顽固，“我认为，世人都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我们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所以，全体战犯都应无罪开释！”

“不！不能将全体战犯都无罪开释！”美国法官克莱墨尔表示反对，“对于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大肆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法庭应坚持判以死刑！”

韦伯：“本法庭虽然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但却没有一个共同量刑的依据。再说，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也有所不同。可否考虑将这些战犯，统统流放到太平洋中某一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就像当年拿破仑战败被流放那样。这也算是对战犯的一种惩罚吧！”

“奇怪的惩罚！”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讥笑道，“这种惩罚，竟不同

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的戈林和赫斯等战犯的判决！”

梅汝璈据理力争：“各位法官先生，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所以坚持对日本战犯元凶使用死刑，是为了伸张正义。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本法庭自前年5月开庭公审以来，早已举世瞩目。不论是案情的庞大还是证据、证人的众多，均冠世界之首！然而，法庭最后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又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岂不贻笑大方？”

梅汝璈这一席话，语惊四座，众法官的争辩戛然而止。

韦伯：“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关于法庭最后量刑的争辩，其结果将由本庭下次例会进行投票表决裁定。”

1948年4月21日一早，梅汝璈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就法庭严惩日本战犯之事，再次和他磋商。

韦伯庭长坦然地：“法律最忌感情行事，你是国际上有声望的法学博士，可……”

“不！”梅汝璈激动地说，“审判长先生！我是个法官，不是作家、艺术家。我当然深知法律不同于艺术。法官的感情应绝对区别于作家、艺术家。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您应该理解一个母亲遭到侮辱时，作为儿子的心情，我不能对中华民族遭此奇耻大辱无动于衷！”

梅汝璈这一番发自肺腑的恳言，显然感动了韦伯庭长，他下意识地揉了一下眼睛。

梅汝璈更为激动地说：“侵华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30万个生灵！审判长，那是30万条生命！30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30多层高的大厦！30万人的鲜血，重达1200多吨啊！”

韦伯庭长此刻终于坐不住了，他一边听着，一边在室内徘徊起来。

“审判长先生！”梅汝璈此时神情严峻地说，“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我江东父老，无法告祭千百万冤死的亡灵，唯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什么！”韦伯庭长突然却步，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梅汝璈正色道：“当然，个人之颜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的这一最后请求！”

“好吧！”韦伯庭长终于松口，他最终还是被梅汝璈真挚的情感深深地

感动了，“我个人的意见可以收回，只是其他各国法官……”

“谢谢审判长！”梅汝璈态度坚定地说，“其他各国同人的工作，哪怕是磨破嘴皮，我们也要做到底！”

韦伯庭长望着梅汝璈匆忙离去的背影，不禁点头喃喃自语道：“这种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1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集各国法官开会，就法庭对日本战犯量刑进行争辩，最终进行投票表决。

计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人一张统一规格的纸片上画符号，同意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画上“√”，反对的则画上“×”。待整个法庭11名法官全部表决后，再由韦伯庭长专送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处。

韦伯庭长亲自唱票，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票。将11张票从信封中逐一抽出。

韦伯庭长：“1票反对，2票、3票……”

“5:5！”梅汝璈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头上也情不自禁地冒出汗来……全场寂然无声，人们都在等待着最关键的一票。

此刻，韦伯亲手从信封中抽出最后一件纸片。只见他习惯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轻轻地咳了一声，用笔画了一个√字。

韦伯庭长将11张纸片整理好，重新封存起来。他郑重宣布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量刑的争辩问题，现已经最后投票表决。其结果为：反对判处日本甲级战犯死刑的为5票，同意判处日本甲级战犯死刑的为6票！”

无比激动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急忙站起身来，眼含热泪地对各位同人说：“我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千百万冤死的亡灵谢谢各位法官先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将谢谢各位法官先生！”

13

1948年11月12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这是最后一

次开庭。在对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审讯后，将在今日宣布最终的判决。

8 时 30 分，韦伯庭长率领 10 名法官依次落座法官坐席。同时法官坐席对面的检察官席上，季楠检察长率 10 名检察官也依次落座。

审判厅两侧的盟国贵宾和普通听众两种旁听席上，挤满了贵宾和旁听者，楼上楼下上千个座位座无虚席。

两年前总数达到 130 多人的庞大的日、美律师辩护团，只剩下十几名日本律师和几名美国律师，稀稀拉拉地坐在辩护席上，一个个哭丧着脸孔，显得有些黯然无奈。

9 时整，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庄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 818 次审判，现在开庭！”

韦伯庭长下令：“将被告东条英机等 25 名日本甲级战犯押上历史审判台！”

审判大厅一侧通向休息室的门打开了，东条英机、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 25 名罪犯，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坎瓦兹中校率领的美国宪兵押进审判大厅的被告席内。

韦伯庭长宣布：“本庭在从 1946 年 5 月初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内，共开庭 818 次，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和被告人多次陈述、辩护人多次辩护，经过法庭多次审理，现在对 25 名被告的案件逐个进行宣判！”

接着，由主审法官分别对负责审理的被告依次宣读判决书。

待各主审法官将 25 名甲级战犯的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进入法庭最后一项程序：对各个被告宣判判处的徒刑。

这时，法庭执行官一声令下：“全体起立！”

审判长韦伯高声宣读：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 15 条第 4 款宣判如下：

土肥原贤二，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脸部突然抽动起来，身子向前移动一下，木然地对审判长鞠了个躬，蹒跚着走出法庭。

广田弘毅，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慢慢拿下耳机，脸色苍白，呆如木鸡。

板垣征四郎，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回头就走。

木村兵太郎，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脸上刹那间显出阴森的奸诈气，摆出武士道架势，昂首退出法庭。

松井石根，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听罢宣判，当场晕倒，被两个宪兵拖出法庭。

武藤章，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突然两脚后跟一并，“叭”地一个立正，然后一转身，用标准的军人步伐，正步走向被告席。

东条英机，根据判决为有罪的罪状，本法庭处以绞刑。

该犯听到被判绞刑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灰白，却故作镇静地说：“是绞刑吗？知道了，知道了……”

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处以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处以 20 年有期徒刑，自审问之日起。

重光葵，处以 7 年有期徒刑，自审问之日起。

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审问期间病死，被告大川周明患病精神失常无责任能力，故本法庭对以上三犯免予起诉！

宣判完毕，审判长韦伯：“本法庭的全部判决，将上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然后执行。”

最后，美塔大尉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 1946 年 5 月开始到 1948 年 11 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共开庭 818 次，举行内部会议 131 次，法庭记录 48400 页。检察方和辩护方双方提供证人 1194 人，另有 771 位证人向法庭提出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出示文件证据 4330 多件。这是人类历史上规



被判绞刑的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审判程序全部结束。现在宣布：闭——庭！”

整个宣判大厅里的人全部起立，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14

1948年11月22日上午9时，东京生命大楼六楼，盟军最高统帅部会议室。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召集11国驻日使节和军事代表团团长会议。

麦克阿瑟：“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甲级战犯审判后，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通过他们的律师，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11月19日，美日辩护团上书给我，代表各被告申请复审。既然有人对东京法庭判决提出反对意见，那就有必要征求各国代表的意见，看是否需要修正判决？”

美国代表希尼尔斯特、中国代表商震、菲律宾代表阿佛卡卡、苏联代表德勒比扬科、英国兼新西兰代表葛斯昆、加拿大代表诺曼6人，表示不必修正东京法庭的公正判决。

澳大利亚代表萧马主张减刑。荷兰代表阿加德提出减刑要求：把梅津美治郎和畑俊六，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从7年徒刑改为2年半，东乡茂德从20年改为10年，广田弘毅从绞刑改为无期徒刑。

印度代表查拉巴提出把绞刑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麦克阿瑟：“各国意见很不一致，本帅也不好个人作出决定。只好把日本甲级战犯的上诉状转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所以，对绞刑罪犯的执行将延期到部分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得出结论之后。”

12月中旬，接到麦克阿瑟的报告后，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日本战犯上诉，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将日本战犯移结美国，定于12月26日听取战犯的口头申辩。

美国最高法院此项决定一播发，立即激起世界各国舆论的严厉斥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立即发表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无权复查或修正对日本战犯之判决。代表11国之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倘须经过某一国法庭复审，则今后国际间之决定及行动，均可同样由一国单独变更或撤销。此种危险先例对于未来国际间之合作与相互信任，将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荷兰法官抗议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骇

异的错误，这是对各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的蔑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根据国际协议成立的，对它是否有权审判进行复查，就是无视美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协议及其对盟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而是把自己凌驾于组成国际军事法庭的其他主权国家之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楠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他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这两种职责之间的区别。”

英国政府也对美国的决定大为不满，授权其驻日本远东管制委员会代表谴责云：“美国最高法院之无理行径，乃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法律地位的打击。这一行动，显然把国际法庭当做美国法院的隶属，是各盟国所不能接受的。”

苏联《真理报》连续载文，斥责美国最高法院庇护战争罪犯，侵夺盟国权利。质问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审判，还是国际审判？是否要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战犯也拉到美国最高法院重审？

在日本，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干预。《朝日新闻》发表社评说：“东条英机等死刑之执行，实已时机成熟。美国对这些战犯的包庇，是为至适当时候，让他们对美国用来反对世界和平。”

一时间，美国最高法院成了众矢之的。

在世界舆论之下，美国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发表一项声明，重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反对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上诉：“最高法院无权重新审查美国与各盟国达成的关于惩罚罪犯的协定。最高法院的干涉，不仅会损害国际司法工作，而且会破坏旨在达成合作的其他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的工作。如果美国最高法院不拒绝日本首要战犯上诉的话，就可以预料，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将发生最不幸的影响。”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美国最高法院被迫退步。12月20日，宣布驳回日本战犯的上诉。其自我解脱的理由是：最高法院没有受理上诉的管辖权，对这些申诉人判刑的军事法庭，是由麦克阿瑟作为盟国的机构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法庭没有权力审查、批准或取消对这些申诉人所作出的判决。

至此，日本甲级战犯的上诉闹剧收场。

15

1948年12月22日午夜，东京巢鸭监狱内外灯火通明，四周布满盟国宪兵，警备森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兵队长、美军中校坎瓦兹带领行刑宪兵分别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



被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

井石根、坂垣征四郎、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7名被告宣布执行死刑的命令。

死刑由美军第八宪兵司令部菲力普上校执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楠率领向哲浚等十几名国际检察官，现场监刑。驻日盟军总部邀请盟方代表前来巢鸭监狱现场，监刑见证。中国方面代表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

“当——”1948年12月23日凌晨的第一声钟响，成了为这帮日本甲级战犯们敲响的丧钟！

从零时1分30秒开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依次被套上了绞索，至零时37分，这7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全部被绞死。

行刑完毕后，7名战犯的尸体被运抵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由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属下的5个日本人进行火化作业。棺材上没有标注名字，仅仅标上No.1到No.7的记号。上午8时10分开始点火，火化的过程是在美国宪兵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尸体火化后，骨灰被装到7个涂黑的盒子中，然后装上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离火葬场。根据盟军总部的要求，为了防止这7个人的骨灰日后成为日本右翼势力顶礼膜拜的“牌坊”，这些甲级战犯的骨灰被碾成粉末全部撒入太平洋。

二十一 上海审判

1

1946年1月24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

美军总部军事法庭在一幢监楼，开庭审判日本战犯。这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

法庭设在位于监狱五道铁门里的一个宽敞的大厅内。法庭正面设5个法官席，两侧坐记录员和翻译，记录员后的几十个座位是记者席。

法官对面，一面为检察官席，一面为辩护律师席。

法官以美国密德顿准将为首组成。检察官由韦斯德上校等二人担任，辩护律师由赫军斯中校和蓝文少校担任。

受审日本战犯共18人，分3排，每排6人站在被告席。

10时整，法庭宣布开庭。先后由记录员、翻译员、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分别起立宣誓。然后由检察官读起诉书。

被告是日军第34师参谋长镗木正隆少将、汉口宪兵队司令福本龟治大佐，以及其他少佐、准尉、曹长等18人。

首犯镗木正隆，于1938年8月入侵中国。在华期间，他指挥部下残杀中国军民，并于1944年12月在汉口制造杀害美国飞行员事件：1944年11月21日，美国一飞机在汉口被击毁，3名美国飞行员被日军捕获，受到百般折磨。12月16日，这三人又遭日军毒打，处以绞刑后焚化。

1945年6月，镗木调回日本任第55军参谋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作为战犯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2月11日上午，军事法庭又一次公开审讯日本战犯。2月18日的庭审，进入了高潮。原美国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也来提篮桥旁听。法庭特地为陈纳德设立了首席旁听席。

在历次开庭审理中，调查此案的美国蒙乃可少校、伯斯丁上尉及目睹美飞行员被害的中国平民杨德有、宋文通等人作了如实的陈述，控诉了日本战犯在汉口对美俘飞行员所作的种种非人暴行。

经法庭调查、辩论，并报经有关部门核准，4月初，美军法庭对18名日本战犯作出宣判：判处镗木正隆等5人死刑，判处大佐福本龟治无期徒刑，分别判处酒井定次少佐等3~15年有期徒刑。

4月22日上午8时，镗木等5名战犯，依次被押出牢房。美国宪兵分别把他们双手反绑，解到一个与绞刑房相近的房间内。由汉姆上尉用日语简要地宣读了他们的主要罪状，并宣布今天对他们执行绞刑。最后又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陈述。镗木等4人均摇头不语。只有军曹增井勉说：“我事先已把遗书写好，日期签的是4月20日，今天是4月22日。请求你们把遗书上的日期改一下。”

在当日处决的5名日本战犯中，只有增井勉信奉天主教。军事法庭请来了上海的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江柴拉士为其祷告。其他四人均信奉佛教，法庭请来了上海著名寺庙的僧人来为之诵经超度。

8时1刻左右，将镗木正隆陆军少将第一个押进绞刑房，先用绳子把其双脚扎牢，然后用黑布口袋，把头部套住，再用绞架上的绳索，把其颈部套住、扎紧，令镗木站在活动地板上。随着监刑官一声令下，轰然一声，闸门一推，活动地板向两侧分开，镗木就双脚悬空，整个身子被颈中的绳索死死地吊挂在房顶的绞架上，瞬息间窒息而死。尸体随着方孔，穿过三楼、二楼楼板由绳索吊入下面的停尸房。接着增井勉准尉、上等兵白川兴三郎、曹长增井昌三、增田耕一，相继入室就刑。

1946年4月19日深夜11时45分，日本战犯安藤利吉在面临审判前自杀身亡。

安藤利吉，是日本入侵台湾的“总督”，军阶为陆军大将。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大使馆副武官的身份出使过英国。1938年5月，充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第5师团师团长，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指挥官。他先后在徐州、青岛、广东、广西、福建一带施暴。

1941年11月出任日本台湾驻军司令官，1944年1月晋升为大将，同年兼任“台湾总督”。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台北市的受降仪式上，他代表日本驻台湾的16万日军官兵在投降书上签字。他在侵华战争中，在台湾以及在战俘集中营中犯有严重罪行。

受降后，中国方面发出拘捕令，把安藤利吉及其僚属共15人，于1946年4月15日，从台北押解上海，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入狱时，按常规对每人所携带物品作了严格检查。由于安藤事先作了谋划，把剧性毒药十分隐蔽地密藏在衣缝中，没有被察觉。他入狱数天，自感罪孽深重，与其被判处死刑，倒不如自我结束生命。一天晚上，他吞服了密藏的毒药，走完了他63岁的罪恶一生。

2

1946年9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前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进行庭审。

芝原平三郎原是日本浪人，是搞情报的老手。20世纪30年代，曾在杭州西子湖畔活动。他凭借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和上海话，广泛收罗社会渣滓为其搜集军事、政治、文化情报，发往日本特务机关。1941年4月，日军攻占宁波前夕，芝原平三郎用黄金、美钞，收买了镇海炮台国民党军官，在日军进攻宁波镇海时，要塞守军放下武器，使日军轻而易举登陆入侵。此后他卖力拼凑傀儡班底，先后建立“宁波商会筹委会”、“妇女会”等组织，为日军提供情报。还收买汉奸当向导，为日军进攻浙东一些城市带路。他杀害平民，奸淫妇女，无罪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抗战胜利后，芝原平三郎当年手下的汉奸蔡某在苏州被捕，供出了芝原匿居在上海的地址。芝原归案后，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上海军事法庭经过多次庭审，依据确凿证据，于1946年7月19日判处芝原平三郎死刑。

1946年11月12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上级密令，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检察官王家楣、翻译官王成声及一个班的宪兵，也于上午11时驱车来到提篮桥监狱。11时40分，将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监，到监狱刑场执行枪决。

石美瑜庭长扼要问清姓名、年龄、国籍、捕前职务、居住地等情况后，正言厉色地宣布对芝原执行枪决。

这时，芝原提出修书三封。经石美瑜同意后，令宪兵为芝原开铐。芝原就在法庭旁预先准备的方桌上铺好信纸，落笔书写。

第一封写给其妻子，大意为：今天我要执行了，望你照顾母亲和孩子。

第二封，写给日本的长官小仓和白川一雄。这两人此时还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其大意是：多蒙照顾，非常感谢，现在不能报答，引为遗憾。

第三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侈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

遗书写毕，芝原还向执法官提出，“贵国是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对婚丧之事十分隆重，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请允许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

石美瑜爽快地答应了芝原平三郎的这一特殊要求。马上命令法警取来芝原平三郎的3包衣物，让其当场更换衣服。芝原把身上的旧军服脱下，换上一套比较干净的草绿色的军服，穿上一双军用球鞋。

此时，时钟已指向12点10分，石美瑜命令已经换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按指纹。然后宪兵把芝原双手反铐，由两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左右两边各被一名宪兵按住，宪兵班长吴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后，举起“盒子炮”手枪，对准芝原的后脑，“啪——啪——”连发两枪，子弹从其后脑进去，经右眼及眉际间穿出，污血从弹孔中涌出，脸上一片血污。芝原“啪”的一声连人带行刑椅一起倒在地上。

3

1948年3月6日，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同何应钦商谈对冈村宁次的处理问题。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时间最久、罪行最大的战犯之一，早在日俄战争年代他就戴着少尉军衔踏上了中国领土。此后，充当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顾问，参与制造济南惨案，率兵侵占上海，在华北推行三光政策……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然而，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却因同蒋介石、何应钦的特殊关系，迟迟不得归案审理。

蒋介石与何应钦早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就结识了当时在该校当教官的冈村宁次。何应钦因为学习成绩好，得到冈村宁次的赏识。毕业时冈村宁次赠

与他一柄军刀。蒋、何返国后一直和冈村宁次有信件来往。抗战期间，1940年12月，汪伪政府成立以后，冈村宁次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驻扎在南京。蒋介石政府为了暗中和日方进行勾结，派冷欣在苏南与敌伪当局建立情报机构，交换情报，秘密同冈村保持联系。抗战胜利后，蒋任命冈村为总联络部长官，直接帮助蒋介石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充当蒋的高参，帮助蒋打内战。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地保护包庇冈村宁次。

何应钦：“昨天，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来一位美军上校叫桑普拉斯。他带着两名美军士兵来到国防部。说是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命前来拘捕冈村宁次。声称法庭审理战犯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宁次必须在4月份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从东京开始审理日本战犯后的一年中，他们曾给国防部打过多电报，已先后派人来过两次。看来这次他们似乎非要带走不可。不然他们就在这里等待下去。”

蒋介石：“如果交出冈村宁次，远东军事法庭必判他绞刑无疑。如果我们再不交出，唯恐担包庇战犯罪名。冈村将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最近帮助我们维持社会秩序，抵制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立了大功。担任国防部高级顾问后，多次为我们出谋划策操心费力。所以，无论如何得保护他躲过远东审判这个鬼门关。”

何应钦：“我们深知校长对冈村将军的深厚感情和保护他的苦心。昨天晚上国防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作了三条规定。校长看是否可行？第一，根据国际情况，冈村宁次以暂时不回国为安全。第二，拖到6月份以后甚至年底，待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后再送其回国。第三，对东京来的人佯称冈村宁次患开放性肺结核，等治愈后再送回国。”

蒋介石高兴得站起来：“好，好！此乃万全之计！赶紧会见那位桑普拉斯上校。你亲自出面，热情款待，赠与厚礼。再由国防部开一证明信叫他带上，让他高高兴兴地回东京交差。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后，那就由不得他们了。”

4

1948年8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商会礼堂开庭审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开庭前几天，何应钦派曹副官向冈村传话：1. 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总司令对冈村将军战后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2. 即将进行的上海审判是应付舆论，走走形式，毋庸挂意。3. 归国时机要等国际形势缓和再定。

上午9时，法庭庭长石美瑜同法官叶再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依次在审判席就座。

在宪兵引导下冈村宁次身着西装，带着明显的矜持和傲慢，一副满腹经纶的学者派头，走进法庭，坐到被告席上。

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宣读起诉书。

王家媚在调查冈村宁次罪行时，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政府部门都拒绝提供材料。他只好将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南京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一个旅团长8个人的罪行加在冈村身上，以连带罪进行起诉。

冈村宁次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对检察官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概不承认，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进行反驳。

冈村抗辩后，三位律师同检察官王家媚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了近一个小时。

中午休庭时，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书。

休庭后，法官们都到四川北路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正当大家为这个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大恶极的罪犯即将受到严惩而高兴的时候，饭店招待进来请石庭长接电话。

石美瑜庭长回来时，脸色变得很难看：“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

第二天，冈村宁次向法庭提出“因病要求保外就医”，军事法庭立即转呈国防部，很快就批下来，冈村宁次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



在被告席上受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予保外就医”。

5

1949年1月26日凌晨，石美瑜庭长突然接到国防部紧急通知：今日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四楼会议室开庭审判冈村宁次。石美瑜赶紧打电话通知了所有法官。

上午9时，法官们到齐之后，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感到莫名其妙。只有老法官陆起因为即将退休，此案是他参与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特意穿了授衔时的那套上校新军服，精神抖擞地坐在那里。相反，庭长石美瑜却是强打精神，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威风。

由于是秘密审判，审判厅内来宾和听众很少。由法官例行公事似的念了一遍判决书，就休庭了。

吃过午饭，石美瑜庭长召集法官研究定刑。

主审法官张体坤首先说：“冈村宁次罪大恶极，早该判死刑了，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他我们也无法向国人交代。”

石美瑜和其他法官一致赞成他的意见。

正当石美瑜要提笔写判决书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副官突然闯进来，在石庭长耳边说了一阵，石美瑜很不情愿地跟着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10分钟，石美瑜回来，他满脸不悦地说：“告诉你们一个新情况，南京国防部来了5个人在隔壁，是来监视我们审判的。他们说，蒋总统、李代总统认为冈村宁次战后协助国军剿共和遣俘有功，让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

石美瑜说着将手中拿着的两份文件展示给法官们看。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命令，一份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命令，内容一样：“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判无罪！”

法官们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承办法官张体坤说：“那判决书怎么办？”

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是抄写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决书原本。主文只有6个字：“冈村宁次无罪”。上面盖有国防部长徐永昌的大印。

法官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气愤、痛苦、屈辱、困惑使他们有口难言。

石美瑜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就请诸位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字吧！”

4位法官依然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肯作声，谁也不提笔。

石美瑜叹息说：“你们不肯签字，我也不能强迫。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隔壁房间里国防部那5个人，就是军法官。若是我们不签字，他们将立即接办此案，宣布重新审理，结果还是一样。”

老法官陆起无比气愤地说：“那就让他们去审判好了！还让我们签字干啥？”

石美瑜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南京来的人带了两包东西，由我们选择。一包是5副冰冷的手铐。我们如果不签字，立即逮捕。这幢楼地下室就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另一包是给我们每人加发的三个月薪金。如果签字，就能得到这笔钱。”

张体坤：“我们成傀儡了，拿了钱，释放了大战犯。老百姓知道了，我们要遗臭万年，这名我不能签！”

房间里一时死一般的沉静。

石美瑜的眼光在法官们的脸上流动，最后停留在老法官陆起脸上：“陆法官，你年纪大，资历深，就带头签个字吧。”

陆起痛苦地说：“如果一定要签，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要在评议本上写上保留意见。”

石美瑜说：“写上保留意见当然可以。”

于是，陆起颤抖着手签上了名字，接着其他3位法官苦笑着摇摇头也签了字。

石美瑜脸色铁青，含着羞愧的泪水，咬着牙一声不吭地签了字。

当日下午4时，法庭对冈村宁次案件宣判。

审判厅里零零落落只坐了几十名听众和几名记者。

石美瑜宣读判决书：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主文：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本案被告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大屠杀，均系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去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军投降为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争罪犯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乃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之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核准另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罪之联络，自亦不能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诸人 署名签章

当听到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时，听众席上一片哗然，纷纷高呼，提出抗议、质问。

石美瑜无法回答，赶紧退回庭长室。

愤怒的记者不顾宪兵阻拦，紧追不放，一些人越过宪兵，跟着进入庭长室，当面抗议。

石美瑜只得支吾其词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公论。”

1949年1月29日，冈村宁次同先期释放的259名日本战犯一道，乘美国轮船“约翰·维克斯”号，秘密逃回日本。

二十二 广州审判

1

1946年2月1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成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华南地区及越南境内的日本战犯。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审判庭、检查处、书记处三个部门。审判庭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一人，军法审判官四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检查处由主任检察官一人，检察官一人组成，负责侦查及决定是否起诉。书记处由主任书记官一人，书记官若干人及翻译、副官等人员组成，负责审讯记录、编案、传票、行政事务等工作。三个部门比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各有独立职权。

从名称看，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属行营建制，但实际上它是由广东省高等法院（简称高等法院）、广东省高等检查处（简称检查处）、委员长广州行营三个单位抽调人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审判战犯的特别法庭。它的主要职位都由高等法院及高等检查处调派来的人员担任。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容许机关、团体、地方人民推派代表到庭陈述意见。对被告战犯还准其聘请律师辩护，没有聘请律师的则由法庭指定律师为其辩护。该庭对战犯的审判，是按国际公法、国际惯例、陆海空军刑法、特别刑法、刑法等法条，决定是否起诉和就起诉的案件依法审理，作出判决及执行。

2

1946年5月23日，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对华南头号日本战犯田中久一提起诉讼。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刘贤年，军法审判官廖国聘、叶芹生、徐宪安、关振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主任书记官黄炎球担任记录，翻译员曾广担任翻译，指定辩护律师薛祀光。

田中久一，曾任日军第23军军长，兼南支派遣军司令。1944年2月起，还兼任香港总督。任职期间，指挥日军在中国战区焚烧劫杀，肆虐东南，罪恶繁多，是罪不容诛的战犯。

田中久一于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向中国签署投降书后，并未被作为战犯看待，还被指定为日军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直到国民党政府公布惩处战犯的一系列法令，规定凡属一个战区以上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均得以战犯论处之后，才于1946年3月将之列为战犯，逮捕归案。

在审判期间，由于田中久一1944年任香港总督期间，曾指挥部属对因轰炸香港日军被俘的美军少校飞行员执行死刑，通过外交途径于1946年8月，把田中久一提解往上海美国军事法庭，与同案犯日军香港总督部参谋长福地春功、前日本香港军事法庭庭长久保口外等5名战犯一同受审。

1946年9月3日，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同案犯福地春功等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无罪）。这是田中久一第一次被判死刑，并经确定在案。

3

田中久一案经检查官与被告及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后，于1946年10月1日宣布辩论终结。10月17日，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宣判，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刘贤年在审判席上向战犯田中久一宣读死刑判决书。

1947年3月，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到国民政府第4578号代电，核准就地执行田中久一死刑判决。

1947年3月17日下午，田中久一被从战犯拘留所提到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由主任检察官蔡丽金验明正身，告知现在执行其死刑，问其有无遗言，随即赠给烟酒。



被押赴刑场的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吸了半支烟，喝了半杯酒后，由两名宪兵押着上车游街示众。没有捆绑，也没有在后背插上执行死刑的纸签。卡车顶上高悬白布横幅，上面墨书“枪决华南头号日本战犯、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参与审判田中久一的军法审判官、主任检察官、主任书记官、翻译员等全部另乘专车，到刑场监督行刑。

是日下午3时15分，行刑车队驶出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大门，缓慢向流花桥刑场（今广州体育馆附近）行进，沿途群众争相观看。

行刑车队抵达刑场时，刑场四周已布成警戒线，严密戒备。宪兵将田中久一押下卡车，命其跪下，由宪兵李明德用步枪行刑，四弹毕命。

行刑后即由主任检察官蔡丽金详细检视，证实确已死亡，作成行刑笔录，然后撤除警戒线，陈尸数小时示众。警戒线一撤，围观群众立即蜂拥而上，唾骂并争相踢打其尸。

4

广州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6年2月15日成立之日起，到1947年12月31日奉令结束之日止，共计拘留人犯961人，审理结案225人。其中判处死刑38人，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37人，不起诉的101人，无罪的39人，

非战犯（已遣返）694人，未结案及在审核中的42人。所有未结案件、人犯，及已结案正在服刑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犯人，均转解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继续办理。

在广州被判处及执行死刑的、属于日军高级将领的战犯，除田中久一中将外，还有近藤八中将、平野仪一少将等。在广州被判处及执行死刑的战犯，以日军特务机关及宪兵队的官兵占多数。他们有澳门正、副特务机关长王荣泽作、山下久美，广州、汕头、曲江的宪兵队官兵植野诚、田中寅义、李安、水马猛雄、铃木明、魁头宽二、贝冢泰南、木下樽裕、岸田加春、小桥伟志、山田恒义、安藤茂杵等人。

二十三 南京审判

1

1946年12月8日晚7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办公室。

梅汝璈法官正在整理审判材料，门铃响了起来。

梅汝璈前去开门：“请进！”

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

梅汝璈伸出右手，紧握卡本德的手：“欢迎您，上校先生。”

卡本德说：“谢谢！接到中国政府两次来电，请求盟军总部将战犯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公审。我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有什么个人见解？”

梅汝璈：“完全应该将这个罪犯引渡到我国受审。盟军总部早就答应我国政府的这一个合理要求。”

“是吗？”卡本德喝了口茶，笑而未作答复。

梅汝璈：“谷寿夫在1928年任日军第3师团长期间，入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32年，率领日军第6师团入侵华北，沿途纵容部下官兵抢劫居民家中衣物及红木家具，强迫中国妇女做慰安妇。1937年12月，他率部由杭州入侵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被害者30万人以上。他是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卡本德：“谷寿夫既已在东京巢鸭监狱监押，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梅汝璈：“根据国际法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乙、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也就是暴行实施的国家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望上校能体贴中国人民的情感和要求，说服盟军总部满足受害国人

民的合理要求。”

卡本德：“当然！问题是……贵国军事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正的审判？”

梅汝璈：“怎么？你怀疑……”

卡本德：“不，不！我是说至少要做出一副‘公平审判’的样子。”

梅汝璈：“这个请阁下放心。希望阁下为此多制造舆论。”

卡本德：“我将尽力而为。但能否引渡，还得盟军总部和麦帅最后决定。”

送走卡本德上校后，梅汝璈立即把在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助手和同人罗集筵、唐铭、裘劭恒找来，紧急商讨如何促使盟军总部早日引渡谷寿夫的问题。

梅汝璈：“谷寿夫是对当年南京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的战犯。我们必须想办法促使盟军总部同意引渡，使其尽快受到我国军事法庭审判。”

罗集筵：“据材料证实，谷寿夫的第6师团是当年最早攻陷南京的日本部队。曾驻扎在中华门至雨花台一带。这正是日军在南京施暴最烈的地区，兽军几乎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妇女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

唐铭：“不错！当时中华门一带正是兽军杀人最多，暴行最严重的地区。”

裘劭恒为难地：“可是，以卡德本所说的情况看，盟军总部对此态度不甚明朗。怕只怕夜长梦多。”

梅汝璈：“立即电告南京中国军事法庭，争取越快越好！”

罗集筵：“能否再有其他更快、更好的办法？”

唐铭听了不由眼睛一亮：“我们可以来一个舆论先行。既然卡本德上校有同意引渡的意向，我看可以向各报透漏他同梅汝璈法官谈话的内容。”

梅汝璈：“这个办法好！搞他个既成事实，让其无法反悔。”

于是委托唐铭立即撰文，连夜发稿。

次日清晨，东京街头，人们争相购买当日的报纸。

一份份中文、英文、日文报纸纷纷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印有通栏大标题的大块文章：

中央社东京五日专电，《华声报》特派记者唐铭报道：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日前会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时表示，同意将日本战犯谷寿夫近日内引渡给中国政府审

判。这一决定是根据国际法则中的有关规定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而作出的……

2

1946年8月底，正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从日本押来中国的时候，叶在增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南京，住进其兄叶在均的家里。叶在均是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其时，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是叶在均的学生，又是福州同乡，正好来找叶在均要人。叶在均就把五弟叶在增推荐给了他。从此叶在增成了南京军事法庭的试用军法官，先后参与了多起日本战犯案件的审理。不久，他受庭长石美瑜之命，接受了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件的审理任务。

当时南京军事法庭审理案件，是按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编排序号的，谷寿夫的案件是礼字号，正好归叶在增管。

一天，石美瑜对叶在增说：“在增，由东京押来的战犯谷寿夫的调查侦讯工作已经完毕，也把起诉书送过来了。我想叫你来办这个案子。”

叶在增一听，不免有点紧张，说道：“庭长，我年轻资浅，只怕担当不起如此重任。”

石美瑜说：“这是为国雪耻的大事，也是你自己造就成材的极好机会，你不应当推诿。”

叶在增说：“庭长，可我还从来没有独立办过案子。”石美瑜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办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后来不也闯过来了。”看看没有退路，叶在增只好挺胸立正说了声：“是！”

石美瑜说：“这就好，这就好！记住，一定要做到真确、翔实，使人无懈可击！”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浩浩荡荡杀进了中国的南京城，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星期之内，30万南京同胞死于非命，2万名妇女惨遭奸淫，商店财物被抢劫一空，街市被焚成废墟一片。南京人民的尸体填满了沟沟壑壑，南京人民的鲜血流成了第二条秦淮河、第二条长江……

南京大屠杀惨案主犯谷寿夫案件是举世瞩目的大案、要案，叶在增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始了艰苦细微的审理工作。他先后同助手们召开了20次调

查会，传讯了 1000 多名证人，取得了大量书信、日记、报纸、照片、影片等罪证资料。1947 年 1 月，又先后开挖了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处大屠杀现场，取得大量的直接证据。

3

1947 年 2 月 6 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 6 师团长谷寿夫。

南京中山东路 307 号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横幅。宫殿式的大礼堂红墙绿瓦，飞檐画栋，屋脊上蹲伏着 8 头形态生动的吻兽，高大的宝塔华盖似的挺立在礼堂门口。

审判席设在礼堂讲台上，以白布覆盖长桌，台下分设公诉席、律师席、证人席、翻译席和被告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有 2000 余人旁听。另有成千上万听众集于大礼堂外面，驻足聆听法庭审判。

下午 2 时，正式开庭。

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官叶再增、宋书同、葛召棠、李云庆落座后，庭长宣布：“带被告谷寿夫！”两名戴钢盔的宪兵将谷寿夫押上法庭。

谷寿夫身材矮胖，蓄着东洋小胡子，脚穿布鞋，头戴一顶灰色呢帽，穿黑色大衣。进入法庭时，脱下呢帽和大衣，向法官鞠躬后坐到被告席上。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刑警押上法庭

石美瑜庭长问过被告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由检察官陈光虞宣读起诉书。历诉被告纵容他的部队对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采取枪杀、砍头、劈脑、剖腹、挖心、剥皮、水溺、火烧、活埋、割男人生殖器、刺妇女阴户或肛门、用刺



谷寿夫在法庭上狡辩

刀挑起儿童玩耍、对妇女强奸后刺死等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大礼堂内外的听众有的号啕大哭，有的掩面而泣，有的指着谷寿夫破口大骂……

宣读完起诉书后，石美瑜命令谷寿夫提出答辩。

谷寿夫慢慢站立起来，竭力保持镇静自若，向庭长、检察官鞠了一躬：“恭听陈检察官所作的陈述，那些事实真是太残忍了。不过，凡

此种种我并不知道。”

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在拘留所预先写好的辩护词，声称：“我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向不参与。我于1937年率部参加对华战争，并与中岛、牛岛部队会攻南京。12月12日攻陷。自12月13日至21日驻在中华门一带，旋即离开南京向芜湖进兵。当时，中华门一带正值激战，居民迁一空，根本就没有屠杀对象。说我率部屠杀南京人民，这是没有的事情。”

这时，石美瑜庭长大喊一声：“将被杀人头颅骨搬上来！”

两个宪兵将一麻袋一麻袋从中华门附近挖出的头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堆堆的头骨堆满了长桌，使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怒狮狂吼！

这些死人头骨，是1947年1月下旬，石美瑜亲自指挥军事法庭检调人员及法医，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掩埋受害者遗骸的“万人冢”获得的。

谷寿夫见了，目瞪口呆地低下了头。

法医潘英才和检验员宋士豪宣读了鉴定书：“红十字会所埋的尸骨及中华门外屠杀的军民，大都为枪镣及铁器所击的情况属实。”

接着是当庭作证。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

义在下关与其他 1000 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 4 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 2000 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历述目睹的日军杀人、奸淫、放火、抢劫的暴行。许传音指出：“红十字会统计在中华门一带掩埋被害人尸体有 40000 余具。又先后挖掘了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处大屠杀现场。把被害人总数相加为 345337 人。”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南京战祸写真》的作者史迈士以及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贝德士，也到庭作证。史迈士和贝德士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用目睹的事实，控诉日军绑架安全区的中国男子，集体加以杀害；强拉安全区的金陵女子彻夜奸淫的暴行，并证实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撰写的《日军暴行纪实》，所述全系事实。

接着法庭出示了日军为炫耀武功自己拍摄的屠杀奸淫照片 15 张。谷寿夫看了照片，大惊失色，慌乱不能自持。

法庭又放映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05 分钟的历史影片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一束强烈的光束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一幕幕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出现了：

一阵枪声后，一大片尸体倒下了。刀光一闪，一颗头颅落地翻滚，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抽搐、战栗。被刺刀挑破肚子的孕妇，被刀刺死的婴儿，被轮奸致死浑身血污的少女。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暴行画面。



法庭庭长石美瑜、首席检察官陈光虞等检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的尸骨。

许多听众蒙上了眼睛，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有的双手捂住耳朵，害怕听见喇叭里那撕心裂肺的声响。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7日、8日继续公审、传证和辩论，又有80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大恨，走上法庭，面对面地责问谷寿夫。法庭还印发了英文《日本广宣报》上登载并大肆宣传过的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以后，有两个日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别出心裁地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火或我国南方儿童“劈甘蔗”一样。两个野兽般的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到达了100人的时候，他们便相邀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5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6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作为师团长的谷寿夫，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面对如山的种种铁证，谷寿夫理屈词穷，无言申辩。

4

1947年3月9日晚9时，负责看押谷寿夫的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少尉军官邢子健，刚欲上床睡觉。突然，接到国防部电话：“谷寿夫高烧42度，心跳加快，心力衰竭，出现濒死症状。快赶往市郊教会医院，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邢子健急速赶到医院抢救室，见医院院长、医生们和留守在医院的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原来经医院全力抢救，谷寿夫还是不治而亡。

邢子健仔细察看了谷寿夫的尸体。发现他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全无。确认谷寿夫已经死亡。邢子健监督着看守们把谷寿夫的尸体运到太平间。国防

部指示将谷寿夫尸体暂留在医院，待专家第二天来勘察尸体。

在回家的路上，邢子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谷寿夫垂危时不就近送往国立医院，却送到偏远郊区的教会医院？”想到此，邢子健不敢掉以轻心，立即返回教会医院。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见邢子健突然返回，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邢少尉，你怎么又回来了？”邢子健打了个哈哈：“我突然感到肚子痛，找医生看看。”毕尚清向邢子健敬了个礼说：“那好，你去看医生，我就先回去了。”

邢子健径直去了停放谷寿夫死尸的太平间。来到谷寿夫的尸体前，掀开白布，见谷寿夫仍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邢子健围着尸体走了几圈，然后不放心地摸了摸谷寿夫的尸体。这一摸，使邢子健大吃一惊。他发现死去多时的谷寿夫不但没有僵硬，尸体还是热的！其中一定有诈！警觉的邢子健立刻招来手下，把谷寿夫的尸体运走。然后，通知国防部马上派兵，暗中把教会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邢子健带人埋伏在太平间里。

半夜 12 时，医院门前出现几条黑影，扛着一样东西向太平间摸来。早有准备的邢子健一声令下：“开枪”，来人猝不及防，纷纷倒在檐下。原来，谷寿夫在日本被美国士兵逮捕时，其手下少佐河野满、上尉冈田次郎侥幸逃脱了。这二人不甘心其主子束手就擒，伙同长期效力于日本的韩籍女特务李长美等人，一路跟踪到南京，用重金收买了毕尚清。让他拿药丸给谷寿夫服下，使谷寿夫处于暂时假死状态。约定今晚 12 时带领敢死队，先杀害一名中国人，扛着尸体，企图在太平间把谷寿夫换走。没想到被警觉的邢子健识破。被移到他处的谷寿夫不到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各项体征趋于正常。南京国防部立即把谷寿夫送进了有重兵把守的南京陆军特种监狱。

3 月 10 日上午 9 时整，中国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丁象庵及日文翻译官黄文政、岑治蒿等登上审判席。石美瑜庭长庄严地站起来，用洪亮的声音宣读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

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非战斗人员及百姓，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5

1947 年 4 月 26 日，南京大街小巷贴满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战

犯谷寿夫死刑的布告。

上午 11 时，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服，戴着白手套的谷寿夫由军事法庭的法官验明正身，继由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死刑执行令。

陈光虞问道：“谷寿夫，你还有什么最后的陈述？”

谷寿夫拿出一只事先缝好的白绸小袋，递给陈光虞说：“袋中装有我的一绺头发和几片指甲，请求军事法庭寄给我在东京的亲属。身体发肤，要寄回祖国。”谷寿夫又从口袋里取出遗书和一首自己写的遗诗说：“我的遗书和这首诗，也请法庭转交我的亲属。”

法官让谷寿夫在笔录上签了字后，然后将谷寿夫押上了红色囚车。

囚车到了雨花台，面无人色浑身瘫软的谷寿夫，被迫面向中华门方向跪下。

12 时 35 分，一名行刑的宪兵上前几步，在谷寿夫身后举起了驳壳枪。两名架着谷寿夫的宪兵将手一松，清脆的枪声响了，谷寿夫仰脸倒地，气绝身亡。

“报仇了！报仇了！”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市民们点上香烛，焚烧纸钱，将一盅盅洋河酒抛洒在地上，祭奠告慰亡故 10 年的 30 万冤魂。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拉到中华门外处决

二十四 伯力审判

1

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对拘留在苏联的前日本陆军12名罪犯进行审判。

伯力军事法庭审理的是“前日本陆军军人12名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此案由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任审判长，苏联上校法官毕列伍夫斯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任审判官。巴真科中校任检察官。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任苏联国家公诉人。

提交伯力军事法庭审判的罪犯有日本关东军第15任即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中将、第5军军医处长左藤俊二少将等12人。他们被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作为战俘拘捕，押到伯力特别收容所关押。自1945年8月底到1949年12月的4年关押期间，苏联军事法庭从收缴的关东军文件中和通过对日军战俘的审讯，掌握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及731部队一些罪犯的罪行材料，还从中国东北三省档案库中取得大量细菌罪犯证据。可是，对俘虏和中国劳工进行细菌试验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阻挠，在东京审判中被秘密地掩盖起来，未予追究。

1947年1月，苏联驻日本代表团通过国际检察局同驻日盟军总部威洛比少将联系，强烈要求审判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由于提早逃回日本的石井四郎以不提交军事法庭受审为交换条件，投入驻日美军怀抱，为美军研制细菌武器，被麦克阿瑟断然拒绝。把审判细菌战犯的呼声压了下去。

1949年12月6日，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口东岸的伯力城，爆发了一场有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严厉审判侵略中国和远东的日本战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主持国际正义，组成了军事法庭，毅然决定单独进行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

伯力审判从1949年12月25日开始，历时5天，于1949年12月31日结束。对12名日本细菌战犯分别判处2~25年徒刑。

伯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日本战犯的严正审判，这次审判弥补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明显缺陷，以追究日本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鲜明特色载入战犯审判史册。

2

1949年12月25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

山田乙三，1881年生于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7年开始在侵华日军中供职，历任关东军第12师团长、第3军团长、日本远征军集群总司令。1939年晋升陆军大将。1944年7月接替梅津美治郎就任第15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帝国”大使。1945年9月6日关东军被苏军粉碎后成为苏联俘虏，后同关东军其他军官一起被送往苏联伯力特别收容所关押。

上午9时，正式开庭。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端然稳坐在审判席中央，上校法官毕列伍夫斯基、苏联国家公诉人、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检察官巴真科中校、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哥赫曼大尉、翻译茨菲洛夫，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柏洛夫，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军医上校克拉斯诺夫、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主任科萨列夫教授、兽医中校亚历山大洛夫、寄生物学家科兹洛福斯卡平等入分坐两旁。

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下令将山田乙三押上法庭。

首先由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宣读《起诉书》：

“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策划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日本关东军建立特种部

队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山田乙三，自 1944 年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 731 和第 100 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各该部队，多次听取各该部队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被告山田由亲身视察及由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细菌残杀成千入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

审判长要山田乙三交代自己的罪行，山田乙三说：“我首先承我从 1944 年到投降那天止，始终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直接领导过我所管辖的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细菌部队，为了供作战需要来研究细菌武器的最有效使用方法及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我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我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

苏联公诉人斯米尔诺夫指控山田乙三批准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山田乙三对此供认不讳，“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前任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我明知道对活人进行过实验，我在事实上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公诉人指控山田乙三在中国各地抓捕无辜百姓和俘虏，“特殊输送”到 731 部队做细菌试验。山田乙三供认：“把被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

公诉人指控：“1945 年重新启用石井四郎为 731 部队长，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山田乙三供认说：“第 731 部队是石井一手创立的，1945 年间他被任命为该部队长。任命石井为第 731 部队长，与当时必须加紧各细菌部队工作的任务有直接联系，并且是与必须执行陆军省发布的要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有关。”

苏联检察官巴真科中校质问：“1945 年日本的细菌武器加紧生产，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山田乙三供称：“那时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细菌武器加紧生产，是由于 1945 年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

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1945年春季，我便颁发了一道命令，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我个人认为在1945年间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是由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

在法庭做最后陈述时，山田乙三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幼年起就是在日本军队中生长和服务的，我历来受到的都是听从长官命令和恪守军人职责的教育。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我了解我应负罪过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并不去想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1949年12月30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严肃地宣布对山田乙三的判决书：“山田乙三从1944年至日本投降时止，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入命的行为。山田采取过措施，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能对细菌战有充分准备，使其生产能力能充分保证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因此，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山田乙三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山田乙三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战犯内，于1950年8月1日被交给中国政府。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山田乙三认罪态度良好，积极接受改造。1956年6月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

3

1949年12月26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判日军细菌战犯川岛清。

川岛清，1893年生于日本千叶郡山武县。是日军进行细菌试验和进行细菌战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他曾担任731部队生产部第一、第三、第四部长和总务部长。

法庭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川岛清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工会会员波维维克

律师各就各位。

开庭后，首先进行法庭调查。法庭传讯日军 731 部队直接从事细菌试验的卫生员古都出庭作证。此人事先经过苏联司法人员耐心教育，表示愿意当庭揭露 731 部队细菌生产部长指使他用活人进行染菌饮食实验的罪行。

古都在法庭作证说：“大约在 1943 年年初，731 部队第一部长命我准备了一公升水，又令加进糖拌成甜水，他把伤寒病菌投进甜水中去，再用普通水冲淡，第一部长命我们分给 50 个中国犯人喝。他选择其中几个人注射了防伤寒病菌。试验结果，没打防伤寒病菌的 40 多个人全被伤寒病菌折磨而死。第一部长又命我们把伤寒细菌注射到西瓜里去，分给 5 个中国人吃，这几个人也都被毒死。”

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厉声喝问：“这可恶的第一部长是谁？”

古都：“我。……我不敢说。”

审判长：“你揭发细菌战犯，是立功赎罪的表现，苏联法庭为你做主，你不要害怕，快说这个第一部长是谁？”

古都鼓足勇气说：“他就是川岛清。”

审判长：“川岛清？他说他只是个勤杂工。传川岛清出庭！”

川岛清被押上法庭。他低头站立，装出普通士兵的样子。

审判长大喝一声：“第一部长川岛清！”川岛清本能地立正敬礼“哈依”一声，随即发现失口，极力掩饰道：“我是勤杂工川岛清，不是第一部长！”

审判长威严地质问：“你的士兵古都已经把你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你还不招认吗？”古都为了立功赎罪，大着胆子说：“我是部长手下的卫生兵古都，你不认识我了吗？不是你命令我进行染菌饮食试验吗？不招认不行了。”

川岛清大吼一声“八格牙路”，就要抬腿踢他昔日的部下。审判长急忙命人带走古都。审判长厉声呵斥川岛清：“被告川岛清，你的勤杂兵外衣被揭掉了，还想顽固坚持到底吗？”

川岛清沉默了好一会儿，只得老实招认：“我是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第一部长。”

审判长令川岛清具体交代在 731 部队第一部工作的罪行。川岛清供认：“731 部队第一部罪孽最重，第一部所负的职能，是进行准备细菌战的各项主要研究工作。在实验室条件下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第一部担任的。731 部队用来拘禁受验者的监狱，也是归第一部管辖的。”川岛清供认 731 部队在哈

尔滨平房站的驻屯地，遵照关东军总司令的命令宣布为关东军特殊军事地区，在 8 公里半径的范围内，禁止外人居住和行走，飞机不准在它的上空飞行，火车经过这里时在前一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中国人只要踏进这个禁区，马上就被抓进去当实验品断送生命，人们便把平房这块神秘和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

审判长追问：“第一部在用活人进行实验时多半是实验什么传染病菌？在什么地方进行？”

川岛清：“主要是试验鼠疫。在安达车站附近特设的打靶场上进行。用来进行试验的人每次 15 个，从部队内部监狱运到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的柱子上。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易于找到打靶场起见，就在打靶场上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簇乌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飞到靶场上空时，投入 20 来枚炸弹。这些炸弹在离地 100 ~ 200 公尺高的空中全部爆炸，于是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等跳蚤爬到受试验的人身上后，再用飞机把他们运回平房站的内部监狱，观察他们的传染情况。此事由太田大佐负责。”

审判长：“你还有哪些罪行？”

川岛清：“1942 年春季，我兼任第一部长职务一个多月，就负责执行研究细菌武器的任务。除了在第一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还在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参加对活人进行实验的工作，参加过在安达用活人检验细菌飞机炸弹的效能的行动。”

审判长：“除了担任生产部第一部长，还担任过什么职务？”

川岛清：“我在 1941 年至 1943 年间还担任过 731 部队第三、四部长和总务部长。”

审判长：“你在这三个岗位都犯有哪些罪行？”

川岛清：“第三部长负责制造石井式陶瓷炸弹的弹壳。第四部长负责制造传染病细菌。生产部内装有培制细菌的各种良好设备和仪器。短短几天就可以制造和繁殖 30 公斤鼠疫菌，一个月就能培制出 300 公斤鼠疫菌，或 600 公斤炭疽热菌或 1000 公斤霍乱病菌。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在 1943 年 3 月 12 日下发的第 120 号文件，规定不仅所有有‘亲苏反日心理’的人都要作为‘特别输送’的对象被送进‘六十里地国境线’，即使被日本宪兵稍加怀疑为反对‘日本帝国’和与关东军对抗的中国人，也会被送进 731 部队作为试验品

被折磨死。”

川岛清还供认派远征队到中国内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42 年间，第 731 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 100 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 8 个人。根据石井将军的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 130 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内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我知道，该远征队任务顺利完成。此外，第 731 部队于 1940 年和 1941 年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该部队远征队在宁波地区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结果这些地区鼠疫流行，使许多人得传染病死去。”

川岛清在最后陈述时说：“来苏联以前，我对苏联曾抱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形的结果，当我在日本投降时被苏军俘虏到苏联以后，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原先的观点全属错误。我很清楚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我甘愿接受法庭对我判定的最严厉的处分。”

法庭认定川岛清担任过 731 部队各主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既参加过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又参加过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严重违反国际法规，犯有违犯人类罪。

伯力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川岛清 25 年徒刑。

4

1949 年 12 月 27 日上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梶塚隆二。

梶塚隆二，1888 年生于日本田尻町城。日本医学家兼细菌学家，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长。是日本推行细菌战的狂热分子。于 1939 年升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并晋升中将军衔。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梶塚隆二的辩护律师、公会会员山尼科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苏联公诉人斯米尔诺夫指控梶塚隆二是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法的

发起人之一，是石井四郎细菌战理论和实战的积极拥护和推动者。

梶塚供认：“我具体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从1931年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年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门，即731部队，主张调拨相当的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为731部队长。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期间，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即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细菌，研究传染病菌的虫类，研究各种很少研究的传染病，探求医治和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与方法。”

苏联公诉人谴责梶塚隆二美化731部队的行径，指出731部队根本不是搞什么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制造细菌促使日本进行毁灭人类的细菌战。

审判长令梶塚交代731部队和他的罪行。梶塚隆二说：“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731部队的任务和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4个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及规模都有具体规定。1941年8月，4个支队改为普通番号，分别改称673、162、543、643支队，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使用各种细菌武器，当时又把大连卫生研究所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名下，纳入第731部队的管辖之下，其主要任务是培植各类疫苗。”

审判长追问：“你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梶塚寻词择句、避重就轻地说：“关于细菌武器实验的结果及第731部队在1940年至1942年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民的情形，都是由第731部队长北野和石井向我口头报告的。1940年我直接参加过在毗邻苏联边疆的海林、林口、海拉尔、孙吴4处成立731部队4个支队，保证该部队及其各支队的种种设备和其他技术资料，及培养进行细菌战的人员等。”

审判长令梶塚交代与731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关系。梶塚发誓说：“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罪恶行动，只从石井和北野两人口中听过汇报，自己没有直接参加。”

接着法庭传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出庭作证。

山田乙三揭露：“早在1936年，当梶塚还担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长的时候，就积极协助成立特种秘密细菌部队以便准备细菌战。由于梶塚隆二的推荐、同意和赞助，石井四郎才得以担任731部队长。石井关于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恶思想，梶塚都曾表示同意。”山田认为石井部队就是在梶

塚积极参加下成立的，山田质问梶塚说：“任命石井为细菌战部队长的命令草案，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你拟定并上报，再由陆相签字发表的。梶塚将军不至于如此健忘吧？”

梶塚被揭露得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他与石井四郎关系极为密切：“石井从国外考察回来后，自 1931 年起，就在军医学院同事（包括我在内）及有威望有信仰的人物和日军参谋本部工作人员中间开始进行宣传鼓动，说日本必须准备做细菌战。……当时我个人很同意石井的思想和理由。”

山田乙三质问：“你是不熟悉 731 部队的秘密工作吗？”梶塚不得不承认：“我几乎熟悉 731 部队所进行的全部‘细菌工作’，很清楚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的事实。但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试验。”

审判长马上传 731 部队实验员濑越出庭作证。

濑越说：“‘冻伤研究’是属于梶塚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我们进行的‘冻伤研究’，都是按照梶塚的命令行事的，我们的上司吉村就经常向梶塚送去‘冻伤研究’的报告。”濑越质问：“我们 731 部队所做的罪恶试验，都是遵照梶塚将军的直接命令进行的。因而你不是简单知道 731 部队的‘秘密的秘密’，即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你乃是这种最残酷和最惨无人道的实验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山田乙三也作证说：“我来到关东军后，不是别人，正是梶塚在 1944 年 7 月末向我作过关于第 731 部队工作情形的详细报告，向我报告 731 部队正在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工作情况。梶塚曾实际领导过第 731 部队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方面的科学试验工作。你亲手建立了第 731 部队各支队，其直接任务就是要对苏联、中国进行细菌攻击。梶塚将军，你承认这些事实吗？”

在山田乙三、濑越两人对质与质问下，梶塚供认：“实际上，我领导过第 731 部队那种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的工作，而不管这种病菌将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第 731 部队所生产的是要用于对活人进行实验、用于战争的细菌武器。所以我促进过第 731 部队生产细菌武器。我对第 731 部队工作的具体领导，就是监督该部队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我给 731 部队长发出过一切有关上述问题的必要指令。我收到过第 731 部队长关于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问题的报告。此外，我作为细菌学专家，我对于上述问题贡献过各种意见。”

斯米尔诺夫郑重指出：“法庭知道，梶塚在供词中说，731 部队的所有工作都归他管辖，都是用活人做实验对象来进行的。这确实证明，对 731 部队中所干出的一切万恶罪行，梶塚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参加者，何况这种罪行都是按梶塚的命令所做出的呢？你必须交代指挥 731 部队用细菌为武器攻击中国和平居民的罪行！”

梶塚把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说成不过是一种试验：“这种武器对中国说来是进攻武器，但对日本说来，我却认为它不过是带试验性的武器。”

斯米尔诺夫指控说：“被告梶塚说对中国人民进行的细菌攻击是带试验性的行动，这种论调真是横蛮无耻。只是又一次说明梶塚乃是一个残酷无情仇视人类的恶魔，他直到现在还认为石井部队远征中国之举，不过是细菌侵略战以前的一种试验。事实证明，梶塚与关东军司令部其他高级军官不同。他可以毫无限制地洞悉第 731 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从 731 部队成立之日起，直到日本投降时止，梶塚始终是细菌战准备中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参加过关东军司令室内讨论在侵略战争中实际使用细菌武器问题的一切秘密军事会议，经常视察 731 部队。并且对该部队全部活动都了如指掌。关东军司令部正是经过梶塚来与 731 部队发生直接联络的。”

经过艰苦的审判，梶塚隆二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做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是一个医生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我因我犯过的种种罪恶而感到在各国人民面前犯有罪过。”

最后法庭宣判梶塚隆二犯有如下罪行：“梶塚隆二从 1931 年就主张使用细菌武器，他在 1936 年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科长时，曾促成过建立和编成专门细菌部队一举。而石井四郎就是由他推荐委任为该部队长的。从 1939 年起，梶塚接任关东军医务处长而直接领导过第 731 部队的工作，给它以制造细菌所必需的一切物品。梶塚经常到第 731 部队去视察，洞悉其全部工作，曾知道用细菌传染活人进行实验时所做出的残暴罪行，并赞许过这种罪行。”

伯力军事法庭 1949 年 12 月 30 日判处梶塚隆二有期徒刑 25 年。

1949年12月28日上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高桥隆笃。

高桥隆笃，1888年生于日本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日本化学兼生物学家，1931“九一八”事变后到长春宽城子建立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6年改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迁至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1941年改称第100部队。高桥隆笃1941年3月就任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医务处长，他以第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为基地，以牲畜为媒介进行细菌战，是日本利用牲畜进行细菌战的重要战犯。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长、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高桥隆笃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柏洛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首先允许被告做自我陈述。

在法庭上，高桥装出一副可怜相，声称自幼家境贫寒，只为替弟弟缴纳学费不得不领取陆军省发给的津贴费。毕业后到关东军服役。又声称自己是主张反对细菌战的。“但因为我只是细菌学专家，所以人们未曾理会过我的意见。”还说自己不是第100部队长，因而对细菌试验和细菌战没有“直接责任”。

为揭穿高桥隆笃的谎言，第100部队长若松被传来出庭作证。证明高桥隆笃自1941年3月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期，就管辖用以准备进行细菌战并从事细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即第100部队。高桥一上任就立刻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并得以增大了第100部队在培养兽类烈性传染病菌，如鼻疽菌、炭疽热菌以及培制谷类毒药和病菌方面的生产潜能。若松证明高桥隆笃直接发起，在第100部队内成立六分部，即细菌研究分部，大量生产为进行细菌战和从事军事破坏用的细菌，同时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若松还证明高桥在关东军各军团内都建立了第100部队支队网，这些支队也进行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其任务都是为在作战时和在进行细菌破坏活动时，直接实施细菌攻击。高桥曾亲自领导过细菌战武器研究工作，并为此建立过许多生产细菌和毒物的新分部，大大扩展了第100部队的生产能力。

在证人提供的大量事实面前，高桥隆笃不得不承认：“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100部队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斑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反华活动。”

苏联法官安东诺夫中校质问高桥隆笃：“什么时候、命令什么人去生产这些病菌？”高桥隆笃说：“1941年9月，我命令第100部队长若松大佐（后来升为兽医少将）开始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1944年3月，我又命令他开始生产牛瘟菌和斑驳病菌来代替锈菌。这是由于奉到帝国大本营参谋部给关东军总司令的训令，说要着手准备进行对苏联和中国的细菌战。”

安东诺夫法官：“用什么方法进行细菌战？”高桥隆笃回答：“我们所拟订的传染牲畜的办法，是要用飞机散播传染牛类的炭疽热和牛瘟，还预定要传染属于当地居民的游牧场上的牲口。对马匹是预定用飞机散布炭疽热菌的方法去传染。绵羊是预定用注射法传染羊痘，然后就散放出去。又打算把采购的那批牛用注射法染上牛瘟。凡是受到了传染的牛羊马匹都预定要散放出去，好让他们失落到作战地区内。”

法官安东诺夫质问第100部队制造细菌的能力。高桥隆笃供称：“我曾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这是我当时（1943年）所报告的数字。后来从1943年12月起，设备已开始运来而安置在第二部第六分部内，生产数量有所增加。”

法官命高桥隆笃交代，1944年派远征队到北兴安省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高桥供称：“我遵照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的指示参加了北征北兴安省的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要考察河流、蓄水池、牧场牲畜数量以及畜群季节迁移的条件。”

法官追问：“这次远征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高桥供称：“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曾对我说，在一旦对苏战争开始而日军退到大兴安岭一带进行防御战的时候，第100部队就应把北兴安省内所有的牲畜一概染上流行病，或尽可能将其消灭掉，以使敌军不能使用。至于说到马匹，因为马匹能够迅速移动，所以决定将其赶到兴安岭以东地区去。”

高桥在伯力法庭上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声称：“用活人进行试验是未经我批准进行的，我不能对此承担直接责任。”苏联国家公诉人反驳说：“日本宪兵机关把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者送进第100部队，被用来做罪恶的试验，高桥既是对第100部队实施领导的人，也应该负这种罪行的责任。高桥还领导过第100部队进行的军事破坏行动。该部队曾采办过大批牲畜，为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而用这些牲畜进行过从空中施放流行传染病的试验。为了研究在自然环境内细菌武器的效能，曾由高桥命令在安达站区域第731部队打靶场

上用牲畜来进行过试验。方法是从飞机上把细菌撒到草料上来传染牲畜。”

高桥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对于我所犯的那些罪行深表悔悟。我了解了这些罪行的全部深度和全部沉重性。但是今天我想请求法庭对我从轻处罚。我请法庭对我作出公道的判决，好使我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对人类有益的事业。”

法庭判决高桥隆笃所犯罪行如下：高桥在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曾是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的组织者之一，直接领导过第 100 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因而应该对用各种烈性传染病菌对被拘禁者进行的残忍传染实验负责。

伯力军事法庭 1949 年 12 月 30 日判处高桥隆笃有期徒刑 25 年。

6

1949 年 12 月 29 日，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佐藤俊二。

佐藤俊二，1896 年生于日本爱知郡丰桥城，医学博士、军医学院讲师和病理学专家。后任侵华日军两个细菌部队队长，关东军第 5 军团军医处长，少将军衔。

审判席上，以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为首的审判官、检察官、公诉人和苏联医学家、生物学家及佐藤俊二的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波尔霍维金诺夫各就各位。

开庭后，苏联公诉人指控：1940 年 12 月，佐藤俊二被任命为侵华日军驻广州的“波”字第 8604 部队长，长达 3 年之久，曾积极参加过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活动。1943 年 2 月，佐藤俊二被调到南京担任“荣”字第 1644 部队长，此部队亦称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设立的又一个细菌工厂。

佐藤俊二以为他领导的“波”字、“荣”字两个细菌部队的罪恶绝少为人所知。在审判中态度顽固，借口执行上级命令，推卸本人罪责。

苏联公诉人摆出重要证据，把他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起诉书中列在一起，认为他“是一个日本推行细菌战的领导者，是一个主持过各种细菌部队活动的人，是一个实现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的罪恶计划的人，是个准备过用细菌武器去歼灭和平军民的人”。

佐藤俊二受到严厉谴责，看到山田乙三等人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才不得不交代罪行：“我任‘荣’字部队长时，曾积极领导过本部队内研究和

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荣’字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大规模培养致命细菌。在利用全部设备时，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 10 公斤细菌；每年培养出 300 名细菌学专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苏联公诉人指控佐藤俊二率部对中国部队进行过细菌战，佐藤俊二矢口否认，法庭传证人三品出庭作证。三品曾在关东军司令部、13 军团司令部任职，1945 年 4 月任日军第 39 师团参谋长，军衔大佐。

三品揭露，在 1942 年的浙赣作战末期，为讨论在日军撤退时实施细菌作战，石井四郎曾带着两个军医官佐参加在第 13 军团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佐藤俊二就是石井四郎带来的两个官佐之一，三品作为 13 军团作战参谋与佐藤一起参加会议。石井四郎午饭后乘飞机返回南京，佐藤俊二被留下率领“荣”字部队防疫人员到 13 军团服务，带队向中国部队战线撒播鼠疫细菌。

三品当庭质问：“佐藤将军，不会不认识我吧？你对那次作战会议及撒播鼠疫细菌的事如此健忘？”佐藤俊二理屈词穷。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佐藤说：“从 1941 年起，我担任过两个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并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此外，我当第 5 军团军医处长时，也协助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所犯的罪恶是与医生职责相抵触的，是与医学道德相抵触的。这种罪行是反人类的，我的行为是反对世上一切善良东西的。此刻，我在法庭上完全忏悔我所犯过的罪恶。我很感谢辩护人。同时我应该说明，当我听到律师替我这样一个罪犯辩护时，我真是心中感觉惭愧。”

伯力军事法庭认定，佐藤俊二从 1941 年起任广州隐称“波”字部队的细菌部长，在 1943 年间又被任命为与此相同的南京“荣”字部队长。佐藤先后主持这两个部队时，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后来佐藤担任关东军第 5 军团军医处长时，又指导过第 731 部队第 643 支队，明知道该部队和该支队带有罪恶性质而协助过该部队和该支队制造细菌武器工作。

伯力军事法庭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判处佐藤俊二有期徒刑 20 年。

二十五 沈阳、太原审判

1

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140名在山西等地捕获的日本战犯，被监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0年7月19日，由苏联引渡苏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犯，还有由新中国政府在内地捕获的4名日本战犯，被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1113名战犯是东京（远东）审判、南京（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之外，比较次要的乙（B）级、丙（C）级战犯的一部分。其中一小部分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多数是在侵华战争中犯有一般罪行的次要战犯。

1956年4月2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押的日本战犯同时被召集到大礼堂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对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 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

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刑。

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的罪行合并论处。

(二) 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

(三) 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文字进行翻译。

(四) 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其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

(五) 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六) 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决定》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日本战犯的一贯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宏伟气魄，更体现了高瞻远瞩的长远目光。这个《决定》为我国审判日本战犯奠定了政治基石。

广播声落，场内人声沸腾，所有战犯同时起立鼓掌，一个个喜愧交集，以泪伴语，内心充满对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的感激之情。

2

1956年5月2日，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召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刚被最高人民法院任命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贾潜。

周恩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建了‘特别军事法庭’。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任命你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

贾潜：“对此项任命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周恩来：“中央考虑你在战争年代曾担任过滑县抗日民主政府承审（司法科长），冀鲁豫行署参议员和司法处长，晋察冀边区联合高等法院院长，华北人民高等法院审判长。建国后你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刑事审判庭庭长期间，工作很出色，你完全有条件胜任此项任命。”

贾潜：“让我第一次主持审理国际战争罪犯案，深感重担在肩，责任重大，心中没底。恳切建议中央另选法律权威人士担当此任。”

周恩来：“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你感觉责任重是好事。只有这样想，才能把事情办好。你又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国你就是有法律权威的人。你不主持让谁主持？”

贾潜：“既然组织上信任，我个人服从组织决定。”

周恩来：“需尽快组织一个审判班子，如副审判长、审判员等。你先考虑提出意见，经最高法院党组研究决定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几天后，贾潜提出了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名单，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副庭长袁光，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军法少将）。朱耀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王许生，时任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牛步东，时任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徐有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日本在押战犯

郝绍安，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殷建中，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张剑，时任解放军军事法庭审判员、军法上校。张向前，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杨显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3

1956年6月9日、10日，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至7月20日，共开庭四次，一共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其中以沈阳为主，审判36名日本战犯，太原审判了9名。

第一次，6月9日至6月19日，在沈阳开庭审判8人：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鹈野晋太郎、木原秀夫。

第二次，6月10日至6月19日，在太原开庭审判1人：富永顺太郎。

第三次，6月12日至6月20日，在太原开庭审判8人：城野宏、相乐圭、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

第四次，7月1日至7月20日，在沈阳开庭审判28人：武部六藏、古海忠之、斋藤美夫、中井久二、三宅秀野、横山光彦、杉原一策、佐古龙佑、原弘志、岐部与平、今吉均、宇津木孟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岛村三郎、鹿毛繁太、筑谷章造、吉房虎雄、柏叶勇一、藤原广之、上坪铁一、蜂须贺重雄。

特别军事法庭在审理中，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共为45名被告人指定了32名中国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人有权为自己辩护，并作最后陈述。

沈阳、太原两地审判，每次都有日军铁蹄所至的20多个省（市、区）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红十字会代表、解放军代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旁听。两地审判庭旁听席上，每天都轮流坐着代表1000多人，多数是日伪时期的过来人。他们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可悲下场，心里感受着敌人难受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4

1956年7月1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期间，曾传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伪满“大臣”、“省长”出庭作证。

溥仪于1946年8月16日至21日曾赴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他曾对押解他的苏军上校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发动战争的日本皇帝（裕仁）不是战犯，我倒成了战犯？他还是个真皇帝，我不过是个假皇帝！我还得引渡上中国法庭！”

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作证，右为日本战犯古海忠之。

溥仪这次在沈阳出庭，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他的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他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日本人省次长，各县的日本副县长都是由武部六藏直接指挥的。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实权的。这就形成了武部六藏对伪满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

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对武部六藏主持“火曜会”操纵伪满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和国务院次长古海忠之策划制定各种政策法规的罪行作证。

法庭审判显示，这些日本战犯在我国土地上反复进行“讨伐”“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成片的城镇和乡村，制造“无人区”和“无人带”，对中国的无辜百姓以枪杀、刀砍、水淹、活埋、火烧、放毒气等几十种灭绝人性的手段进行残杀。对被俘的中国抗日人员，除了使用酷刑迫害外，一批一批地当做“刺杀活靶”，供日本新兵进行“试胆训练”，甚至将被俘人员作为细菌实验的样本。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法庭提供的统计，那里关押的982名日本战犯（包括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36人），共杀害我被捕人员和无辜百姓949814人，并屯驱逐居民401万人，掠夺粮食3600多万吨、煤炭2.2多亿吨、钢铁2000万吨。在如山铁证面前，每一个受审日本战犯都承认罪行，甚至痛哭流涕地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

伪满总务厅次长王贤伟，对武部六藏主持“火曜会”，古海忠之策划、

制定各种镇压、屠杀、奴役、掠夺政策法规的罪行作证。

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东北物资的政策法令及重要措施的罪行作证。

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粮食的政策法令及重要措施以及实施“开拓”政策的罪行作证。

伪满滨江省长王子衡，对武部六藏召开省长会议推行粮食掠夺政策法规的罪行作证。

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劳务奴役政策法规的罪行作证。

伪满司法部大臣闫传绂，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镇压中国东北人民政策法规的罪行作证。

伪满厚生部大臣全名世，对武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罪行作证。

受审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4次垂头，2次流泪，供认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省长出庭作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真实”。他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人道主义态度感召下，启发我进行了反省，才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行。并且，我认识到自己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对我处以死刑。”

5

早在1955年末，周恩来总理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工作汇报时就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9日，在战犯们议罚论死的气氛中，战犯管理所奉命用广播器向他们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精神和全国人大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1956年6月19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查明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

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和不判死刑、无期徒刑的精神，对 45 名被告人进行最后宣判。

6 月 19 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一批在沈阳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军事案，判处铃木启久等 8 人以 13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

6 月 19 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批在太原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华北特务案，判处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 20 年。

6 月 20 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三批在太原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山西反革命案，判处城野宏等 8 人以 8 年至 18 年有期徒刑。

7 月 20 日，特别军事法庭第四批在沈阳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官吏案，判处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 28 人以 12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

沈阳、太原两批审判，各判两案，均为终审判决。全体受审战犯个个谢罪，无一赖罪，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

在审判时，面对证人的血泪控诉、在中国人民庄严起诉面前，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捶胸顿足，深深鞠躬，跪倒在地，对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深感死有余辜。没有一个否认侵略罪行的，没有一个要求减轻或免除惩处的。宽宏大量的历史判决，战犯们洗耳恭听，感动得匍匐在地，泣不成声。

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别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当过伪满滨江省肇州



在法庭上，日本战犯们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县委副书记。1939年他纠结同伙射杀抗日武装人员130多人，抓捕和平居民2393人，一次集体枪杀居民42人，将19人捆穿着铁丝投入松花江冰窟，制造血染江红的“三肇（肇源、肇州、肇东）惨案”，又亲手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在庭审时，他双膝跪地诚恳谢罪，承认自己是人面兽心的鬼子。他说：“我痛恨自己是一个已经没有资格活在人世的鬼子，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请求判处死刑。”在宣判时他听到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时，他说：“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当我走出法庭眼望不挂一丝浮云的蔚蓝天空，心想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民给予的。”这完全是发自肺腑的毫无虚假成分的真挚感情。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古海忠之在宣判后陈述说：“对我只判徒刑18年，这实在是想不到的宽大政策。我真不知道应该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说什么好，只有由衷地表示感激和致谢。”

在法庭宣布判决后，审判庭长向原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问道：“对判决有什么话要说？”

藤田茂说：“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战犯们一致表示：没有判决死刑和无期徒刑，是一个恩典；刑期自1945年战败被擒关押之时算起，一日抵一日，又是一个恩典；服刑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释放，更是一个恩典。

在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审判的同时，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于1956年6月21日、7月25日、8月21日分三批，对1017名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帮助他们回国。

日本战犯回国时，当年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有个日本战犯在临行前感慨地说：“中国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是尊重人权、体现人性，完全的中国人道主义的典范。

若颁发国际人权奖理当给中国！”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范例。日本战犯回国之后，以藤田茂为首的日本战犯于1956年在东京成立了“中



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痛哭悔罪

国归还者联络会”，由藤田茂任会长，制定了会章。会章第二条规定了该会的宗旨：“本会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犯有多种罪行的人，站在人道反省立场上反对战争，贡献于和平和中日友好为目的。”此后，中归联开展了许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否认侵略战争以及增进中日友好的活动，一时间成为中日之间沟通和友好的桥梁，对日本人民了解中国，对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总理曾于1972年亲自接见了中归联会长藤田茂。这些史实表明，日本战犯认罪，中国待己宽大，他们承认了这段侵略历史，就会为发动和参与那场罪恶的战争而痛悔，就会主动为中日永不再战，世代友好而努力。

二十六 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回国

1

在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审判的同时，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精神，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分批释放回国。

1950年7月18日，一辆特殊的国际列车从苏联边境驶向中国。列车上有969名日本战犯。他们都是1945年苏联攻打中国东北关东军以后俘虏的日本高级军官。经过审问，没有什么罪行的日本军官已经遣送回日本。苏联政府决定，将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无偿交给中国处置。

这些战犯都是乙等战犯和丙等战犯，他们在车上还不知道苏联把他们送往中国。因为苏联人骗他们说，可能把他们遣送回国。

这些人到了东北，被解放军押解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看到“战犯”二字后当场就大叫大闹起来。

这些人非常清楚，“战犯”与“战俘”不同。战俘迟早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法庭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之前，号称民主宽容的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都非常严厉地处置了几百名乙级或丙级日本战犯。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这些日本战犯的罪恶比起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日本军人的罪行要严重十倍。他们知道自己很难逃得一死。

刚进看守所，他们就扯下贴在墙上的《管理条例》，用脚踏踏，高唱日

本军歌。他们经常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对于政治课他们极为反感，拒绝参加。有些人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而是把所有罪恶都推给了战争。

2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苏联遣送来的这批日本战犯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作出了认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化的指示。根据指示要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实行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抚顺看守所是当年日本人建立的。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 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 1200 人左右。日本人在这里面摧残屠杀过大量的中国抗日勇士，手段极为残忍，令人发指。但是，变成战犯管理所后，这里成为保护、优待、改造日本战犯的场所。这些战犯已经被苏联人关在亚伯利虐待了五年。普遍身体瘦弱，许多人疾病缠身。管理所对这些战犯普遍进行了身体检查，对患有各种疾病者及时给予必要的医疗。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给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恩来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每人需要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

当时，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 15 元，中灶 20 元，小灶 30 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1960 年左右，管理所将战犯的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 20 元，高出当时普通中国百姓生活水平好几倍。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自己吃“瓜菜代”，战犯的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

每月 20 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理员崔仁杰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

子咕咕真受不了。”看上去十分瘦弱的日本战犯贯好男，原来体重只有48公斤，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猛增到63公斤。

3

1955年末，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召开大会，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共900余人参加。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当宣布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严厉要求党中央立刻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战士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也想不通。由于几乎是一致反对，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工作人员的意见，两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后说：“理解干部和群众们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之后，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发表了关于对次要的或者悔改表现好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回国的声明。

1956年4月25日，中国给苏联一份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109人，其中969人是苏联政府在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其余140人是由中国政府逮捕的。这1109人中间，历年来先后病死47人，当时关押的实际人数是1062人。

关于中国放弃起诉日本战犯的原因，这份备忘录中有清楚的解释：“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决定在近期内根据宽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中国政府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

1956年4月2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通过广播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主席令。当宣读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读到“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时，战犯们激动地欢呼雀跃起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中，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

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56年6月21日、7月25日、8月21日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帮助他们回国。

汽笛长鸣，“安丸”号客船载着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驶离了天津塘沽新港。战犯们和前来迎接的家属站在甲板上与岸上送行的人们挥泪告别。



解甲归田的日本士兵即将离开中国

日本战犯回国时，当年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全部归还本人。有个日本战犯在临行前感慨地说：“中国战犯管理所是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是尊重人权、体现人性，完全的中国人道主义的典范。”

二十七 遣返日本侨民和战俘回国

1

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为长久占领中国，除向中国派来大量侵略军外，还在国内招募了大批开拓人员，向中国东北移民。

1936年5月，日本公布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计500万人。此后，大批日本移民涌入我国东北地区，安排到中苏边境一、二线地带，担任对苏防御和镇压抗日武装任务。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开拓团”的真实面孔是关东军的活动兵源和后勤仓库。80%的“开拓团”集中在黑龙江省境内。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黑龙江省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日本人到来后，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把一部分农民赶到穷乡僻壤开荒。从此，这里成为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大批被赶到山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头棚子做成地窖子居住。“开拓团”所到之处，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农民的土地，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屡遭败绩。日本军部将大批精锐部队调走后，将25万在乡军人和“开拓民”紧急征集充斥前线。同时要求留在驻地的老幼妇孺以增产粮食来支援“圣战”。

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的4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共有 145 万侨民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加上分布在关内各省区的侨民和战俘，总人数在 300 万以上。

2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遍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当天下午，关东军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拥有 24 个师团 78 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当时有些“开拓团”无法接到命令，有些“开拓团”纵然接到命令也无法到达集结地。接下来几天内，由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将近三分之一的“义勇队”员死于战场。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撤退在长春的日本军政机关人员、日籍官吏及其家属和一般日本人问题。会议决定采用火车输送办法。按关东军家属、官吏及其家属、国策会社职员及其家属、一般日本人的登车顺序，将其分批撤到朝鲜，而后回日本。下午 5 时，士兵驱赶其他日本人群，给关东军家属开辟一条通道进入站内。8 月 11 日 1 时 40 分，首列输送关东军家属的列车驶出长春站。而后，至 15 日总共开出 18 列，运走关东军家属 17116 人、日本大使馆和关东局家属 750 人、满铁职员家属 16700 人……共 58364 人。

而在偏远地区的日本“开拓民”没有享受到关东军的“恩泽”，却品尝到种种灾难。

关东军撤退时将桥梁炸断，给后撤下来的“开拓民”带来极大麻烦。许多人被急流冲走或淹死；有的关东军溃逃散兵与“开拓民”混在一起，怕小孩的



争抢登车撤退的日本军政人员

哭声被苏军听到，便命令母亲将孩子杀死。母亲下不了手，他们就用刺刀将孩子刺死……

方正县是东北“开拓团”总部所在地。战败后，附近的日本人约有2万多人纷纷向方正县靠拢。因为极其害怕被苏联红军赶上，他们只走山间小路。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旁，或者被推进河中淹死。有些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同路的日本军人开枪打死自己。有些人将手榴弹绑在腰上自尽。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和自焚。



被关东军遗弃的日侨妇女和儿童

一群再也走不动了的绝望的日本人，有老、有小，也有妇女，决定集体自杀。堆起木柴，浇上汽油，所有人围坐在四周，母亲们用白布将小孩的眼睛包扎起来。男人们开枪，将妇女儿童和老人一一射杀。随后点火，再举枪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自杀。

1945年冬天，东北北部的极端气温为摄氏零下50度。方正县境内的几千具日本侨民的尸体，在野地里冻着、摆着、擦着。1946年开春后，许多尸体开始腐烂。方正县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将近5000具尸体集中到几个地方，堆上柴火，整整火化了三天三夜后，就地埋葬。之后，方正县政府根据幸存的日本侨民的要求，呈报省政府，直到国务院。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一些朴实的中国民众，面对四散逃亡的日本“开拓民”的惨状，伸出了援助之手。照顾一些患病的人，收养一些妇女和儿童。据不完全统计，仅方正县周围的地区，被中国家庭收养的日本孤儿就有4000多人，与中国人组建家庭的日本残留妇女超过1000人。

方正县收养的日本战争遣孤田江洋子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家庭却仍然收养了无数的日本孤儿。千辛万苦将他们抚养成人后，又将其送回日本。这种人间大爱是感天动地的。我们这些战争孤儿一直感谢中国的养父母。没有中国的养父母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中国养父母的博大胸怀，使我们感动终身，也感动了很多其他日本人。”

3

从1945年8月中旬到9月初，共有近百万日本侨民四散逃亡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周边的广大地区。面对日本侨民在中国东北地区滞留的困境，当时的“日本人会”于8月29日、8月30日、9月2日向日本东京发出三封电报。电报称：“面临两个月后的冬季和紧迫的粮食问题，实不胜忧虑。我等认为国家需要付出全副努力，对此妥善处理”。“新京的难民甚或有绝食数日者……关于取暖用煤，即使有劳力也不能运输。担心一入冬季，饿死冻死者将不断发生……烦请急速给予帮助，使之得以迅速送回国内，至盼。”但是这些电报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东北日侨救济总会的丸山邦雄、新入八朗、武部正道3人于1946年2月下午乘遣返船回国，向日本政府和盟军总部陈情。

3月5日午后3时半，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接见丸山邦雄等。丸山邦雄



陈情道：“在满同胞失业，生活渠道断绝，物价惊人暴涨，生活困难越发严重。170万日侨难民化的达46%，平均每天因饥饿、寒冷和疾病死亡2400多人，大多数是幼儿。期望得到

被关东军遗弃的日侨妇女和儿童

你——麦克阿瑟元帅的同情与决断，尽快派遣返船去葫芦岛。”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也着手进行遣返日军战俘和侨民的工作。当年11月17日即有第一批载有日本侨俘的遣返船自天津港驶往日本。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春天，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正式开始。

1946年5月7日，满载2489名日侨的两艘船驶离葫芦岛港。“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拉开帷幕，至同年12月31日，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达158批，总计1017549人（其中日本俘虏16607人）。1947年和1948年，又分别遣返了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的日侨33498人。日本侨俘的遣返工作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在大遣返中，中国人民在战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拿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火车就达13441辆。三年内从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人数达1051047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仍有许多日本侨民滞留在中国的情况，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继续进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根据1953年中日双方签署的协助日本侨民回国的公报，又有3万多人从上海、天津和秦皇岛三个港口返回日本。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又有7000多名遗留在中国的“残留妇女”和“残留儿童”回到了日本。到这时为止，希望返回祖国的日本侨民已经完全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遣返日本侨民的工作才正式宣告结束。

据统计，从1945年11月17日第一批遣返船离开塘沽港，到1972年中国邦交正常化后最后一批侨属妇女儿童回国，总计有125万日俘，80万日侨分别从塘沽、葫芦岛、青岛、连云港、上海、汕头、厦门、广州、海口、三亚、基隆、高雄等港口乘船回国。

在每批遣返回国的日本侨俘上船后，中国政府都向他们散发了如下内容的宣传品：

这次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民，虽然随着战败而成为战俘、敌侨，而中国方面仍然一本传统的精神，没有给你们丝毫侮辱和危害。你们想想中国人民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处在水深火热急待拯救的凄惨情形。你们不能不深深地痛自反省，彻底觉悟！中国民族由于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人类是应该同样的发展，同样的有生存权利。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德性。沦陷区

的人民在八年抗战中，虽受尽了日本军阀的暴行和财阀的掠夺，但对日本侨民始终没有报复的行为。就以上海地区而论，日侨的人口之多、居住之杂，中国人民均能和平相处。这是你们居留在上海的侨民所目睹的事实。

我们不是要你们对中国感恩，而是要你们彻底地反省，认清过去的错误。世界上没有一个杀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个专横跋扈强取豪夺等事兼并的国家能够生存于世界。这是历史上无可逃遁的史例。谁违反它，谁就会招致失败和覆亡的教训。

多数日本侨民在来中国前接受了政府为动员他们而做的欺骗性宣传，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被抛弃在中国的土地上，许多人曾经十分绝望。因为在以往国家间战争结束的时候，对滞留在敌国国民实施报复或惩罚性的劳役是普遍的现象。然而，中国人民却严格区分了遭受苦难的日本侨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界限。

中国政府遣返日本侨俘的举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但是，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却以大海一样的民族宽容，对滞留在中国境



等待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

内的日本侨俘，以仁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帮助他们平安回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善举，是中国人民为世界树立的一座高大的人道主义丰碑。许多被遣返的日本侨俘在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对照战后处理的不同情况后，都称颂中国是伟大的“仁义之邦”。

二十八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

1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侵略和掠夺。1874年侵台战争掠去中国白银50万两；在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后，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掠去中国白银2.3亿两；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强迫中国赔偿白银6000万两，并取得京津一带的驻兵权；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库页岛西部、中国辽东半岛，以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权；1914年，日本利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攻陷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1931年发动“九·一八”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在1931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就使3500万中国军民失去了生命，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信奉同一天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交谈时，双方就谈到了日本投降后赔偿问题。蒋介石提议，战后日本给予中国的赔偿，一部分可用实物支付。日本的许多工业机器和设备、战舰和商船、铁路车辆等可以移交给中国作充赔。当时，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1945年7月，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战

后日本赔偿的原则。1945年9月6日，即日本签署投降书的第五天，美国就发表“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日本战后赔偿的问题。在文件的第四部分第四条中规定：

四：赔偿和归还掠夺物资

（1）通过移交（由适当的盟国当局决定）处理日本今后可保留的领土以外的日本财产。

（2）通过移交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应并非必需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除指定列入赔偿清单或归还掠夺物资而装运出口者外，对于其他出口物资，则规定：受货人必须同意提供日本需要进口的物资作交换，或同意用外汇支付，才能出口。任何赔偿形式，属干扰或有损于日本非军国主义的纲领者，都不得强迫采用。

任何掠夺物资，一经认定，应立即全部归还。

2

日本赔偿归还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是1945年8月21日成立的“远东咨询委员会”。执行机关是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盟总”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下独断专行，包办一切，完全操纵对日索赔的权利。

日本投降不久，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一个“中国要求日本赔偿计划”，还拟定了“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作为附件，于1946年初在南京发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委派吴半农去日本经办索赔事宜。

1946年5月，远东咨询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临时赔偿方案”。当年12月，美国政府援用远东咨询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的办法，采取单独行动，向远东咨询委员会建议制定“先期拆迁”计划。按这个计划的范围先提30%，作为直接接受日本侵略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菲律宾、荷兰、英国各得5%。由“盟总”负责就远东咨询委员会规定的拆迁范围，对于应拆迁的设备作最后的选择，编制详细的资产目录，并加以估价，送请受偿国家进行申请。各申请国在接到最后资产目录和估价后，应在6个月内向“盟总”正式申请。在赔偿物资分配后，应在两年内接收运回。



中国军队在向受日军迫害的中国女性作调查笔录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在 1947 年 4 月 4 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美国要在远东逐步建立一个反苏

反共基地。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制赔偿，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1948 年 5 月，美国陆军部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称：战后日本殖民地丧失、食料和原料缺少，本土的工厂战灾甚巨，生产量急剧减少，海外日本人撤回几百万人，故须运用大量生产工具，增加生产和输出才能维持日本人民生活。主张消减日本承担的占领军费用，大量减少其赔偿物资。

3

“先期拆迁”开始后，中国接收委员会向招商局租借装载赔偿物资的“海康号”，于 1948 年 1 月 11 日驶抵日本横须贺。首批物资于 1 月 16 日装毕，合计 1610 吨，当日举行接收仪式。该轮随即起航驶往上海。此后，海浙、永兴等轮船相继赴日。至 1949 年 9 月止，中国前后派船 22 次，运回赔偿设备 12504 箱，计 35912.76 吨。

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是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 1 万 5 千瓦 60 周波发电厂一套，还有同厂的 200 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吴港发电厂原不在 30% 的先期拆迁范围内。经中国代表团力争，“盟总”于 1948 年 12 月 12 日正式通知，将吴港发电厂和

起重机分配给中国。中方立即派电力专家前往拆迁。这两套设备正在拆迁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指令，取消“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也就是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美国政府还声明，保留日本一切工业设备，就连军需工业也包括在内，听任日本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美国这种偏执的主张和专横的态度，公然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和盟国战后对日本的基本政策。

为了抵制和还击美国政府的声明，吴半农立刻以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向驻东京各通讯社记者发表如下声明：（1）赔偿是日本的义务，盟国有权要求其执行。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权应属于11个盟国组成的远东咨询委员会而不是美国政府。（2）日本赔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依据《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本基本政策解除日本的作战潜力，免其再对邻国作武力的侵犯。“先期拆迁”只占临时赔偿方案的30%。执行至今，所有民营军需工厂和飞机制造厂，还全未触及。而这些军需工业则同日本平时需要毫无关系。事实上由于原料缺少等原因，日本即对其现有的和平工业设备也无法全部运用。（3）这次美国政府的行动是否明智，因影响太大，须留待将来历史评断。

1949年5月18日，在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上，吴半农提出严正抗议：赔偿物资分配规定，就是一种契约。我方为接收这些设备，曾从国内调派监拆人员多人，并已办妥种种准备工作，人力物力消耗很大。现突然停止，致我方承受很大损失。国际间除因宣布战争外，似无采取这种急剧措施的必要。吴半农具体说明，对我方分配赔偿物资有包装已毕待运者；有已拆卸还未包装者；有正在拆卸者；有已通知分配还未开始拆卸者；有协议分配还未由“盟总”正式通知者。由于进行程度不同，一律停止拆迁，抑有差别，理应先行决定，始能便利执行。



中国对日索赔首席代表吴半农接见受害的民间妇女

5月20日，吴半农又正式致函“盟总”提出抗议，要求迅速恢复吴港发电厂和起重机的拆卸工作。27日“盟总”复信称：停拆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指令，恢复拆卸一事，碍难办理。后来，吴半农发现，美国政府停止“先期拆迁”的指令中有“已着手进行拆迁者，仍继续拆迁”一语。“盟总”竟密不发表。吴半农又致函“盟总”，重申前意，并指出“盟总”的答复和美国政府指令也不符合。“盟总”又复函，语气虽较前缓和，仍诿称应俟停拆指令施行细则决定时再予考虑。6月7日，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主席竟宣布施行细则已决定，兵工厂的附属电器设备和剩余设备，凡已分配者，不论是否发出正式通知单，都照旧拆迁。唯吴港电厂和200吨起重机除外，应予停拆。7月17日，“盟总”在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正式宣布停止拆迁。至此，美国实施的“先期拆迁”计划半途夭折，对日索赔的整个赔偿计划实际上也在美国一手操纵下停止实施。盟国战后对日索赔事宜被美国腰斩。中国战时的损失，根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有620亿美元之多。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仅约值2250万美元，约占万分之三。

4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年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

1950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日本首相吉田茂举行第一次会谈。在9月底提出对日和约七原则。10月20日，杜勒斯同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会晤。提出中国放弃对日赔偿问题。顾维钧表示，可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但完全放弃赔偿这一权利是很困难的。11月4日，根据台湾当局决议，由“外交部”整理的备忘录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采取了无可奈何的态度。备忘录称：“我国目前国际地位至为低落，于此时与日和约，我方发言力量自极微弱……美方既已痛下决心，我方反对无益，即以索价还价之方式略事延宕，亦将招美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方重大反感与误会……关于赔偿问题，我方不得已时可酌减或全部放弃”。

对台湾当局一味追随美国，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软化之快、之大，“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感到吃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会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 14 年，不但受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偿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负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偿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



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

1951 年 4 月，英国向美国政府提交备忘录，提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和签字。当年 6 月初，杜勒斯访英，同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会谈。几经交涉，达成妥协，决定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不参加和约签字。6 月 15 日，杜勒斯与顾维钧会晤，转告英美达成协议，希望台湾当局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7 月 12 日，对日和约草案正式在华盛顿、伦敦及 40 余国首都公布。条约草案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任何一个代表。台湾“外交部”发表了书面抗议和严正声明。美国由于害怕台湾当局参加引起半数以上的其他国家反对而拒绝台湾当局参加和会，表示尽力使日本在它签署多边和约后不久与台湾签订双边和约。

1952 年 2 月 20 日至 4 月 27 日，日本全权代表河田烈和台湾当局全权代表叶公超举行正式会谈 3 次，非正式会谈 18 次，于 4 月 28 日签订了《日台和约》。其中对赔偿的处理是：原台湾当局草案中所列的索赔，第 12 条约 200 字全部取消。只在议定书的第一条第二款中载明：“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事后，在《蒋介石秘录》中记载：“关于赔偿问题，中华民国将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所规定的服务补偿予以自动放弃。是故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

赔偿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5

新中国成立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讨论了日本战争赔偿问题，认为可以放弃战争赔偿。其理由，一是为了对日本表示友好。二是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支付巨额赔偿，使德国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引发了德国复仇主义，使得希特勒上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三是，一些国家已放弃了对日索赔。

1972年中日建交前，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时说：“日本有的人十分关注中国是否要求赔偿。但是，我国不能要求赔偿。为什么呢？日本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现在还有军阀的话，我们将要求赔偿。现在日本军阀没有了。如果要求赔偿的话，那就让同为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承担。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

1972年7月，我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如下指示：

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恩来总理对日本赔偿问题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大风度和长远眼光。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前来北京，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谈判。

在9月29日上午举行的双方外长谈判中，谈到中日联合声明是否写战争

索赔问题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硬说台湾国民党政权在 1952 年签订《日华和约》已放弃了赔偿。如果中日联合声明再写上放弃赔偿问题就意味着日本同台湾缔结的和约无效。由于日方坚持《日华和约》的有效性，上午的会谈不欢而散。

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方的无理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局长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来的吧。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论棍那一套嘛！”

周恩来接着说：“《日华和约》是日本同被中国人民抛弃的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是非法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府 and 人民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但是，从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中国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中国的态度同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有原则的不同。那时，蒋介石已逃至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他全部放弃战争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全部放弃赔偿要求的。这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有权要求日本赔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词严的说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即对他上次发言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的行为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才平息下去。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在《联合声明》第五款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战争赔偿要求。”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在谈到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时说：“假使要日

本 500 亿美元的赔偿，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需要用 50 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的集团心理》一书中写道：“今天，日本得以成为经济大国，当然是日本国民放弃战争而勤奋工作及其高度教育水平的结果。然而，我深信，盟军各国在日本战败时为日本的复兴而采取的政治决策也有很大作用。在各国对日政策中，我认为应当高度评价中国的放弃对日赔偿的政策。”

再现二战末期日本战败始末

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崎

苏联对日宣战

伪“满洲帝国”灭亡

二战最后一役——虎头要塞攻坚战

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屠杀

接受日本投降

叛国投敌者——汉奸的可耻下场

庄严审判——战犯的可悲归宿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

挑起战争者必在战争中灭亡

上架建议：历史 纪实

ISBN 978-7-5317-3012-5



9 787531 730125 >

定价：35.00 元